

太平洋战争的 警号

方知达
梁燕 著
陈三百



——记几位反法西斯战士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后的情报活动

过去，这段中日情报斗争史曾被视为绝密……
今天，经过特准，他们中的幸存者终于说出了这个保藏了50年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神奇故事。

东方出版社

本书主要人物介绍

中西功

抗日战争期间日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 1973 年去世。

掩护身份：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负责人，“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

西里龙夫

抗日战争期间日籍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 1987 年去世。

掩护身份：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兼伪“中联社”、伪“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部报道（情报）部”顾问。

程和生

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纪光与中西功之间，与张明达（南京情报站联络员）之间的联络员。 1942 年牺牲。

掩护身份：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班长。

陈一峰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文革”后去世。

掩护身份：伪“中联社”、伪“中央社”首席记者（采访部主任），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顾问。

李得森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站长。

掩护身份：有名望的中医师。

张 敏

中共党员，李得森的妻子和秘书。 1979 年去世。

掩护身份：家庭主妇。

汪敬远

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战略情报员。

掩护身份：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随从秘书。 1992 年去世。

张明达

中共南京情报站负责人与上海情报科负责人的联络员之间的联络员。 1995 年 9 月去世。

掩护身份：伪“中联社”、伪“中央社”向宁、沪沿线各支社之间的电讯稿和重要信件的传递—联络员。

序

《太平洋战争的警号》是一部根据历史事实写成的纪实作品。当时这一重要“警号”的发出，引起国共双方的重视，对预先揭露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党中央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是一批以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中共党员程和生为代表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无名英雄。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以世界人民的利益为重，听从党的召唤，深入龙潭虎穴，进行了极其艰苦危险的斗争。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堪称楷模。

时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纪念前人，启迪后辈，不忘历史，愿为之序。

罗青长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太平洋战争的警告

引 子

1983年春3月，一股西移的太平洋暖流，到达中国东海岸后盘桓不前了。它给江、浙、宁、沪、杭一带送来了好天气。

上海满街是人。大家出门享受春光。

上海人喜欢快节奏，说话嘴快，作事手快，连逛街也是脚步匆匆。于是满街人流，形同春潮。

上海人似乎不太看重节气变换，而是根据冷暖增减服装。这几天，有的姑娘已经穿裙子了。在四川路汉口路一处房建工地的六层楼脚手架上进行室外装饰的几个青年，竟然光起膀子干活。

在这工地东北向的马路边，有四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缓步而行。他们边行走边交谈，时而停步伫立、四向张望，互相示意地伸手指划着什么。他们还穿着呢子大衣，戴着帽子，个个庄重肃穆，泪水盈眶。他们的异常神态和街上行人的欢快情绪很不协调。

那位女士名叫中西方子，日本人。42年前，她20岁时，曾随丈夫来上海居住过。和她同来的，还有她丈夫的妹妹中西惠子。她记得，他们住的那地方叫留青小筑28号。中西方子的丈夫叫中西功，当时在日本“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任职。在那个调查室里，中西功是首屈一指的权威，他还是东京派驻上海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的实际掌权者。中西功在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个“特别调查班”，专门搜集中国重庆方面、延安方面以及上海租界内上层人物活动的情报。这个“特别调查班”花高价派员潜入非占领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和情报，都要上报给中西功。“满铁”上海调查室，专门负责对中国华中、华南及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调查。他们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研究，得出结论，用来制定日本在上述占领区的各种政策。那个简称“满铁”的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式的财团法人。其实，除了经营满洲铁路和重工业而外，它还是个庞大的情报研究机构。它把研究所得的决策性意见，上报给日本最高当局。所以，凡是知它底细的人，都把它叫做“国策会社（公司）”。它是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最大智囊库，是参与侵华战争的间谍机关。普通人不知其底里，被它的名称蒙蔽着，还当它是个纯企业机构呢。

1938年，中西功从大连“满铁”总社调到上海办事处不久，便被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特务部借去，参与操纵汉奸政权和策划汪精卫派投日的阴谋活动。因为他办事能力特别强，“满铁”又把他要了回去，安在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里，专管调查研究，独挡一面。

事过42年，他的妻子现在又回到上海来了。

和中西方子在一起的三位男士中，身材较矮的老人叫汪敬远。42年前，他是汪精卫汉奸政府的“特任官”；精通日语，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特别宠信他。那位瘦弱的小老头叫倪之骥，日语也很好；42年前，是“特别调查班”里的骨干人物。最后那位瘦高的老人叫钱志行。42年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尾崎庄太郎和白井行幸，为了安排他的活动，不知费了多少脑筋。

他们这几个人，此时此刻聚在一起，来到这四川路汉口路上干什么呢？追本朔源，事情还得从42年前的1941年说起。

第一章 神秘的东京来电

1941年，是世界战争风云急剧变幻的一年，也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殊死搏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东西呼应，互相配合，气焰嚣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在遮天蔽日的飞机群狂轰滥炸之后，接着是大炮，大炮之后是坦克，坦克之后紧跟着步兵，没多少日子便横扫了欧洲大陆。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入侵苏联，兵分三路，直指莫斯科。

消息传到那个自称是“日出之国”的首都东京时，军国主义的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调兵遣将，加速实施南进国策，准备向美、英、荷兰不宣而战。

他们作梦也没料到，在这年的10月中旬，正当东京街头的扩音器反复播放《军舰进行曲》等军乐曲、狂热的好战分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招摇过市的时候，突然爆出了一条震惊全球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团案”的大新闻。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密友和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及其智囊团的主要成员。单凭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人们就不难想象他们可以收集到多么不容置疑的绝密情报——纳粹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以及日本决定的国策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战略方案等等。这就使受东西夹击威胁的反法西斯主力苏联的统帅部得以从容地迎战，并从东线抽调大批兵力增援西线，拒敌于莫斯科城下，为改变世界战争局势的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佐案”的爆发，使当时日本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集团借机逼迫近卫内阁倒台，把近卫文麿强行送进了贵族医院，由东条英机亲自组成一个更加露骨的战争内阁。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虽然被东条下令绞死了，但他们的功劳却永载史册，被誉为反法西斯英雄当之无愧，西方也一致公认他们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最成功的间谍”。

不少记载二战资料的史书在谈到这位苏联英雄佐尔格的事迹时，都认为：“佐尔格是在他认为在日本已经没有值得刺探的情报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捕的。”

这说法有其准确的一面，那是指佐尔格取得的情报已经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而言的。

但是，从太平洋战争的实施方案而言，这说法也有其颇不准确的一面。当时，战争实施方案还在日本帝国最高决策层之间运筹之中。佐尔格被捕时，他还没完全掌握日本南进战略行动的确切情报，以及50天后爆发的偷袭珍珠港的绝密阴谋，因为这个绝密阴谋仅只掌握在天皇和极少数几个重臣手中。

这个绝密阴谋被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视为大东亚圣战胜利在此一举的关键，视为日本帝国的天机。天机当然是“万万不能泄露”的。一旦泄露，帝国必遭灭顶之灾。

日本人把间谍活动叫“谋略”。这倒有点实在，间谍和反间谍活动都要用“谋”。负责审讯佐尔格的高桥兴助发现，佐尔格为首的“兰瑞”小组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奇怪！”

对此，高桥百思不解。

对中国蒋介石的“蓝衣社”，他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他们弄不出佐尔格式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

“他们会不会派出他们的佐尔格式人物在日本或其他什么地方弄‘谋略’？”

高桥心中没有底，想着想着便害怕起来。他后悔以前对中共太轻视，对他们知之太少“按常理说，作为警视厅特高课司法警察官，他应该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是无论开战前和开战后，警视厅都没有对中共的这方面下过功夫，只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过几次严厉镇压；并且，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空气笼罩在警视厅各课室，好像准若涉问中共，不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真荒唐。

高桥为此向佐尔格提问，为使提问合乎逻辑，还补充说：“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是有名的中共的巢穴。”

佐尔格说：“你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括你们已经逮捕的一些人，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来自德国驻日本大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高桥不愿再听下去了。他很明白，佐尔格是在承揽他人的罪责。这种手段，在被他审讯过的共产党员中，差不多都使用过。他决定隐蔽地不惊动任何方面和人物，把手伸向中国占领区。

高桥首先把手伸向上海。

“佐案”中有个尾崎秀实，他和佐尔格都于30年代初到过上海，而且一住好几年，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上海他们有许多朋友，他们的朋友们都是些什么人？暗中有没有“谋略”活动？

就在当天夜里，有一份电报从日本东京发到了中国上海。收报人是住在虹口施高塔路留青小筑28号的中西功。

中西功并不每天都到“满铁”他那个“办事处调查室”去上班。研究工作需要安静的环境，留青小筑28号就很安静。有什么重要情报，“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会随时来报告。他到办公室去，多是为了翻阅东京最高统帅部寄来的各种密件和“满铁”的内部通讯以及各种重要报刊，以备研究工作参考。

在“满铁”的诸多要员中，他的这种地位性的待遇也是少有的。道理很简单，他被“满铁”和“中支派遣军司令部”所倚重。

中西功之所以被倚重，不是无缘无故的，略看一下“满铁”总社有关他的历史档案就知道了：

1929年，18岁，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1933年，在东京《日本劳动年鉴》任助理编辑，在《国际评论》、《东亚》杂志发表论文；

1934年，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

1937年，在《中国问题研究所所报》发表《冀东农村实况调查资料概况》一文，引起帝国军方的重视；

1938年，担任《满铁调查月报》和《华北总览》两刊物的编辑，发表《华北农业特征》、《河北省农业经济实况》等文章多篇；

同年5月，调往“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立即被“中支派遣军特务

部”调去从事重要的谋略活动，按照军方委托的需要，写出《孙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作为帝国提交汪精卫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指南。并把它当作课本，由他在“维新学院”亲自向学生讲授。

中西功的中国话很流利，在“维新学院”讲课时，学生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

结论：中西功是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日本警视厅逮捕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事，由于“事涉赤色”，有失警视厅的威严，一段时间内只在有关的少数人间严守秘密，不见诸文字、报刊。中西功不知其事，近卫内阁倒台的消息从电台广播出来，他才吃了一惊，急于想了解其中内幕。国内出了这样大的变故，尾崎无论如何也该告诉一声才是；是否因为近卫倒台要移交国事，手续繁忙，没有时间？抑或近卫“患急性重病”住进医院，他也跟到医院里去了？几天来，他到“满铁”去上班的第一要事便是急着翻阅新到的各种“密件”和“绝密件”、“机要件”等等参考资料。回到家，便在书房里守着收音机听日本电台的广播。总想看到或听到点对于他可用的重要内部消息，或者说与他有关的消息，或者说与尾崎秀实有关的消息。他们是好朋友啊，但是十几天来，一无所获。

他很着急，为尾崎担心，总仿佛看见有一团凶险的乌云紧紧压在尾崎头顶的上空，尾崎走到哪里，乌云便跟随到哪里。

他认识尾崎秀实，是在1933年春天。当时，他正在“东亚经济调查局”特别阅览室里埋头研究“中国满洲问题”。一天，“东亚同文书院”的同学水野成引来个仪表不凡的男子，介绍他们见了面，说这就是他幕名的尾崎秀实。

尾崎举止温文尔雅，谈吐不俗，有一种吸引人的内在感染力。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中西功来到上海后，每次到东京出差，都要去见他。尾崎每次出差到上海，也必定约见中西功。每次相见，两人都要作对时局分析的长谈。谈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谈中日战争的现状与未来，谈近卫在内阁的处境，谈东条和近卫的矛盾，谈陆海两军对“南进”“北进”的争执，谈苏德战争，谈希特勒对日本施加压力，谈松冈外相访欧归途中与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日本政界引起的迷惑，谈日美外交谈判的困难……总之，他们有谈不完的话。因为战争形势变化快，政治内幕更复杂。

东条登台，发表了广播演说，中心重点是“新内阁将继续坚持关于处理中国事变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

这说明，日本“南进”将加速。那么对美、英、荷兰的战争很难避免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中西功自认没有必要对此再多费脑筋了。

他关心的是尾崎秀实。

正当他心烦意乱地在书房里转来转去的时候，他的妹妹惠子倒背双手轻步走进来，站定后，笑眯眯地看他。

“什么事？”他烦恼地问。

惠子举起右手，手里捏封电报，向他摇晃一下，又背回手去。她今年16岁，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也具有这个时期的某些特征，譬如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或一句有趣的话而哈哈大笑，爱显示自己的聪明，搞点小恶作剧等等。

“电报？哪来的？”

“东京。”“东京？快给我。”

“难道不道谢一声吗？”

“噢，谢谢，谢谢。”

“道谢是用这样冰冷的口气吗？”

“好了好了，给我吧，谢谢啦。”

“难道不应该陪我们出去走走，或者用点实际行动向我们表示谢意吗？”

“好吧，依你说，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是吗？很简单，现在去向嫂嫂道声歉。”

“我并没有伤害她。道歉什么？快给我吧。”

“不，这几天，你进出家门，连声招呼都不跟她打，难道她得罪你了呀？”

“好了好了，我最近很忙，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多多原谅，我会给她道歉的，快给我吧，求求你了。”中西功无可奈何地说。

“说话算话，否则下次绝对不给你。”

“算话算话。”中西功深深鞠躬，惠子这才把电报交给他。他急忙拆开电报封套，抽出电文看，三个字赫然跃入眼帘：

——“向西去”

发报人姓名：

——“白川次郎”

他握着电文纸发呆了。

“怎么了？”惠子见状不解地轻声问。

“没有什么，”他掩饰地应付：“是公务方面的事，很难办，你让我冷静地想一想。”

惠子出门去后，书房里又只他一个人了。他紧蹙着眉头思索这“向西去”三个字的实际所指，他心里明白，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到此，我们得把中西功另一方面的情况，再作简要介绍：

在中共高层特殊部门，有关他的档案记载着的是：

“中西功，1931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他看着电报不由地轻声自问：出了什么意外？这发报人是谁？

从电报口气看，发报人很着急，竟如此不容犹豫。像是大喊一声的警报。

他自然地想到了尾崎秀实。是他发现了于我不利的情况，给我发的报？

他强制自己冷静，但是心却跳得更厉害了。

他深思：我若就此“向西去”了，会有什么后果？到了“西边”以后，能作些什么？当然，不怕从头作起，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及在上海方便，特别在上海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和拿到各种别处根本接触不到的重要情报。

应该找人商量一下，事情来得这么急。

在上海，能够立刻找来商量的，只有一个人——“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只有他，看到这“向西去”三个字，会明白是什么意思。

程和生，广东人，中等身材，方额长脸，机智的眼睛透露着诚实和热情。眉宇宽阔，常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他不多说话，但是做事严肃认真。少年时跟随哥哥到青岛读书。“七七事变”后，参加青岛郊区学生抗日游击队。不久转到上海，参加江南抗日游击队。1939年秋天，调来上海情报系统工作，担任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老吴同中西功之间的联络员，1941年夏天，“满铁”上海办事处受“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委托，调查重庆抗战力量。中西功根据

办事处的命令，接手承办此项调查，公开“雇用”了程和生和倪之骥两人当助手，在虹口西华德路的大利庄公寓内办公。今年6月，日本军宪兵部队接管了公共租界黄浦滩路的交通银行。经中西功活动，得到宪兵队许可，他们迁到了交通银行二楼办公，发展了几个人，成立了“特别调查班”，由程和生当班长。然后又安排了程维达等几个共产党员共十多人进了这个“调查班”。

和中西功联络之初，程和生对于一个日本人帮助中国抗日，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只按照纪律，准时准地和中西功见面，接到情报就走，一句话也没有。后来被“雇用”组织“特别调查班”，和中西功公开接触了，当然不能当扎嘴葫芦。要听中西功布置对“蓝衣社”的调查，要和中西功研究在“特别调查班”里安插党员，要帮助中西功对汪精卫汉奸的“调查统计部”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时间长了，他发现，中西功完全像个中国人一样地在为抗日熬费心血，便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尊敬。只是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缺陷，就是不能公开地喊他“中西同志”，即使背后两人在一起也不行，只能称他“先生”。此时他才感觉到“同志”一词的深刻含意，在根据地，男女老少一律互相称同志，不觉得有多大份量，现在切切实实体会到了。

尊敬常是产生感情的基础和土壤。感情这东西，一旦产生了，便很难掩藏。于是，他们的谈话便多起来。程和生很想了解一些有关日本的情况。他对日本国，耳朵里早熟悉，在地图上也常见，还和日本兵交手打过仗，说来不算陌生。可是，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的？日本兵为什么这么凶残？既然入侵中国肯定要失败，天皇不想想后果吗？如此等等问题，他都想向中西功请教个明白。

有一天，他们两人按规定在法国公园碰过头之后，趁天色尚早，便边散步边闲聊起来。

“先生，日本字好学吗？”

“很好学，如果学会讲话，学字不难。”

“日本话好学吗？”

“依我看，话这东西，不管哪国的，只要留心，多听、多说，都容易学。中国话不是很难学吗？我也学会了。共产党员最好能学会儿国语言，我们要搞世界革命。”

“唔，日本国什么样子？”

“什么什么样子？”

“有山吗？”

“有”，中西功眼光闪动了一下，“有很多山，山上有很多树，一到春天，满山遍野便开满了樱花，就像一望无际的海洋。我爱樱花，日本人民也都爱樱花，因为它是和平幸福的象征。”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道：“只是它太娇嫩了，需要保护。每当山风拂响，美丽的樱花雨簌簌洒洒，铺满山路，沦落成泥的时候，不由使人顿生物哀之情，由怜悯而产生悲壮之美，它太可爱了！”中西功无限深情地边说边仰望辽阔的天空，那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

“是吗？”程和生用向往的目光望着中西功问。

中西功脸上堆出了笑意，半晌，轻声叹口气，说道：“等战争结束了，我请你到我的家乡三重县去看一看，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话还没说完，他的眼圈竟红了。程和生和他接触以来，尚未见过他如此动情，立刻后悔不

该向他提问这种话，触动他的乡思之情。连忙道歉说：“对不起，先生，我是好奇，请不要介意。”

中西功却转笑道：“没什么，你不问，我也会给你说的。日本确实是个山青水秀的国家。”

“那么，战争结束以后，我一定到你的家乡去看一看。”

“我领你到处走走。”

话题便自然地转入对战争结束后的向往上了。中西功说：“战后，日本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首先是政治斗争，各派都要争夺国家领导权，共产党当然不会放弃斗争。但是日共被几次严重镇压后，力量太弱。因此，将来的任务艰巨，现在还难以估量。然而，人民一定要自由、平等、幸福，工农劳动大众一定要从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法西斯军国主义一定要打倒，这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和个人的历史责任，我们必须为之努力。……噢！我说远了，刚才讲到那时领你去各处走走，恐怕暂时不能兑现了。”

程和生笑道：“没关系，将来中日恢复和平，亲如一家，总会有一天，我跟随你到日本去作客。”中西功沉思了片刻，叹息一声说：“现在想象战后，还为时过早。”

“还要打多久呢？”

“难预料，已经三年多了。”

“顶多再打三年吧。”

中西功摇摇头：“恐怕还不会这么快，日本的军事实力还没受到根本性的打击呢。”

“依你看，还要打多久？”

中西功苦笑一下，“我也难说，要看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变化。现在德国进攻苏联了，英美取什么态度？还要看。重庆蒋介石很看重这点。汪精卫是个政治尤物，东京目前只好利用他。总之，看各方面的发展吧。但是，无论怎么发展，我们都要努力使日本法西斯集团彻底失败。”

两人沉默了一阵，中西功又深深叹口气说：“日本，给几个武夫毁掉了。”

那以后，他们俩便无所不谈，“满铁”收集到的情报、材料，开的研讨会、写的和印的密件以及东京寄来的“绝密件”，常被中西功摘抄下来，由程和生交给老吴。1940年1月，高崇武、陶希圣带着《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跑到香港，引起了国际轰动。中西功和程和生却相视而笑。程说：“重庆得到这个情报材料好像得到了个宝贝。”中西说：“他们能搞成这样的结果，也算不容易了。”

他们之所以这样评论，自然有其因由。因为那份《要纲》在日本主子和汉奸头目们密谋炮制完的第二天，中西功便把它的一个副本交给程和生转给老吴上报领导了，那东西，对他们来说，已是旧闻。而当高崇武、陶希圣在香港一公布，却轰动了全中国，轰动了全世界。“蓝衣社”由此趾高气扬。

程和生和中西功像一对手足弟兄。程和生凭着“特别通行证”，常到留青小筑28号去看中西功。中西夫人把他当弟弟，惠子把他当哥哥。但是她们却都像中西功那样，称他“先生”。她俩丝毫不知道他俩的真实关系，那层深深的同志关系。

今天，中西功电话约程和生到留青小筑28号去一趟。程和生匆匆吃过午饭，急急按时赶到，进门第一眼，便从中西功神色上看出有重要事情。于是

轻声道：“先生，我来了。”

“噢，请坐。”中西功脸色阴沉地给他倒了茶。

“有什么事吗？”

“你看这个。”中西功把那封电报交给了他。

程和生看罢电报，心中着实吃惊，不觉低声惊叫：“哟！”抬眼看了看中西功。

两人四目相向，半晌谁也不说话。程和生明白，这“向西去”，是要中西功到根据地或者延安去。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为此请你来商量啊！”

“这事——怎么——这样突然……？”

“是啊，我想一定是日本国内出了事。”

“什么事呢？”他张大双眼。

“还不知道，反正有人认为我需要离开这里，否则，也许，有危险。”

中西功慢吞吞地说。

“那当然，这是给你发的警报。定是你有暴露的危险，或者已经暴露了，才给你发这报。在日本，有哪些人知道你的底细？”

“有几个，都是非常了解我的好朋友。”

“那么就是说，有人怕牵连到你。”

“我也这样想。或者已经牵连到了。”

“白川次郎是谁？革命同志？还是亲戚朋友？”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中西功苦笑了：“和我来往的同志和朋友中间，没有叫白川次郎的。”

“没有？”

“没有。”

“奇怪，是哪位同志的化名吧？”

“肯定是，因为他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电报，这种事谁都会这样做。不过，这个名字，我用过。”

“你用过？”程和生奇怪起来。

“那是几年前我在《中国论坛》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叫《镇压日本左翼运动的状况》。临时想出来的一个笔名。”

“噢？那么应该是个知道你有这个笔名的人。是谁呀？”

“我想过，想不出来。”

“知道你用这笔名的人多吗？”

“很少，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

“谁呀？”

“说出来你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

“好吧，事不宜迟。你的意见怎么办？”

“我正是请你来参谋呀，我现在离开这里，向西去，会是怎样？”

“什么怎样？”

“我是说这里的工作呀。”

“自有我们留下的人来做嘛。”

中西功不响了。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程和生决然地说。

“当然，我相信你们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但是，我一走，日本警视厅必定要追查你们。”

“追查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是日本人，你的事，我们知道什么？”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满铁’的人都清楚，‘特别调查班，是我建立起来的，是我‘雇用’你们进来的。我走了，宪兵首先要查抄你们，首先要审问你。就算他们查不出你什么问题来，也不会允许你们继续存在，那样，好好的一个班子可就被我们自己撤销了，你们再建立这么个据点，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不甘心。”

程和生恳切地说：“安全第一，你不必考虑这么多了。”

中西功又摇摇头：“不，现在，在我们上海情报科，没有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地位和条件。没有人能替代我取得这么多的绝密情报。我能占据这么个地位，是经过了不少努力和曲折的，太不容易了。”

“有人在，我们可以建立新据点。”

中西功默默地摇摇头，半晌，叹口气：“我说过了、谈何容易，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

程和生忽然觉得中西功今天不像以前那样明智果断了，变得左顾右盼，犹豫不决，以前他可不这样。以前中西功说话，总是稳健中透出明快。刚才，看完电报时，他还曾想，中西功叫他来，是要他帮助下决心的，现在却要他想个什么万全之策出来，眼下还有什么万全之策？他耐不住，正色道：

“我的万全之策就是你赶快走，立即走，马上走。”

“没有别的办法了？”中西功恳切地看着他。

“难道你下决心在这里等待被抓？”

“当然不是，我是想，最好，我们既坚持着这个据点进行工作，又要不出现受损失的局面。”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程和生的口气像是个教师。可是中西功像没听见，继续说：“我们多想想。”

程和生觉得这样地和他想下去，是白耽误时间。他看出来要说服中西功立即“向西去”，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推他走，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组织手段了。于是便用无奈的语调说：“这样吧，我去问问老吴，看他有什么办法。”

中西功张眼看了看他，也似无奈地点点头：

“也好。”

“把电报给我拿去。”

“要不要，这种东西，不要随便带在身上。”中西功一边擦火柴把电报点燃，看着它在抖动的火苗里渐变成蜷曲的黑灰，一边说：“先告诉老吴，通知大家提高警惕。我想敌人在没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是没有道理撤退的。而且，我想即使他们发现了我们，在他们没有摸清楚我们的全部情况之前，一般来说，也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是希望把我们一网打尽的。何况他们对我们上海的情报组织，到现在为止，可说是一无所知。”

“你说的道理是对，可是现在已经有人给你发警报了。还是问问老吴吧。”程和生脸色沉重，一本正经地说。

第二章 中共上海情报科

老吴名叫吴纪光。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具体负责人。大家这样称呼他，不是因为他年纪有多么大。而是因为他现处的地位和作用。地下情报工作的环境，使同志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种感情充溢于心头，而绝少有机会公开表露，除非在绝对安全的场合。一般大家都不指名道姓地互相称呼，更不能以亲热的语言调侃，或抚肩靠背地交流亲近。日久天长，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工作形式。于是，提到吴纪光，也都只称“老吴”。同志之间谈到老吴时只要岔开五指一晃，对方便心明了，这是因为“五”与“吴”谐音之故，恰如老百姓岔开拇指食指暗示八路军一样。

吴纪光中等身材。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16岁初中毕业便参加革命。开始，他在华北做地下工作，聪明胆大，干得有声有色。领导决定培养他，调去搞根据地边缘区开辟工作，他干得更加出色。新区本来没有扩军任务，他却一下子拉出三十多人，亲自领着，参加了正规部队。他对工作有一种热情，喜欢寻求新的刺激；又有开拓新局面的魄力，没有明显的成效便不安心。

他来到上海前，情报科的负责人是金鹏。老金手下有几位同志，直接联系着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这些日本同志，都是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二三十年代接合期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1937年，王学文被调往延安从事对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此前，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原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因客观情况变化发展成为情报科，其主要任务是对日进行战略情报的侦察工作。金鹏主持上海情报科时期，对日本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获取过许多重要的战略性情报，在组织和人员方面也逐渐有了发展和扩充。老金作为领导人，很受下属同志们的敬仰。现在，新从延安来的领导人，同志们都说他是位神通广大的实干家。接手了情报科的领导工作以后，不显山，不露水，作风很稳健，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吴纪光心里暗暗高兴：自己碰上又一位高明领导了。但是，这位新领导到了上海以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被接见。这和他希望的有点不同。

“你觉得怎么样？”新领导人问他。

吴纪光明白，这是询问他对在情报科工作的意见呢。

“有信心。”他明朗地笑答。

新领导人不经意似地瞟了他一眼。

“工作要大胆，可不能蛮干。”

“知道。”吴纪光轻声答，满脸笑。

“日本现在的各种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的：逼、拉、招降蒋介石。蒋介石在上海的军统有几百人，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纲领，我们得和他们讲统一战线。我们的目的是阻止蒋介石动摇、投降，逼他抗日。”新领导人很随便地这样说，但言简意赅，很有分量。同时毫不掩饰地用审视的眼光快速地打量了吴纪光一下。

只这简单的几句话和眼神动作，吴纪光便对这位新领导人有了个鲜明的感受。首先，这是位高层领导，对上海敌情熟悉。其次，看来上海情报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战斗单位，由他管管而已。

“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得和军统蓝衣社打交道。”新领导人又轻描淡写似地接着说：“统一战线，不是和他们搞混合编组。而是我们去统他们，还得随时提防他们咬我们。”说罢他又用眼角余光瞟了吴纪光一下。

这第二瞥，又给吴纪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是在告诫他，工作中麻痹不得。他明白地看到在这位新领导人的眼光里，藏有一丝对他信任程度未敢完全确定下来的警惕。关于这一点，他的自尊心被刺痛了。因为从未见过有哪位领导人用这种眼光看过他。他内心不由一颤。他知道，到上海来作这个工作，必须绝对服从领导。这可以说是这位新领导人给他的第一个要求。

“好吧。”新领导人见他不出声，便向他伸出手，吴纪光也忙伸出手去。两人的手紧握了一下。新领导人又郑重他说：“记住，这个环境很复杂。”说完，皱了皱眉头，仿佛烦恼自己说了多余的罗嗦话。这表情使吴纪光得到点安慰，因为它说明新领导人对他并不完全不信任，而且对他的水平还是有所了解的。

握别之后，吴纪光按指示规定的那样，自动到咖啡馆的柜台前付了账款。待新领导人走出门后，他才急急出门去，像个店伙计追随老板。出门后才径自走自己的路。

他一走，一边心里把这次见面从头至尾回忆了一遍，把“老板”给他的第一印象、感觉、信息和自己今后应该怎样在这里展开工作，方方面面仔细地进行了琢磨。

结论是：这位领导人一方面胸襟阔大、视角高远，另一方面又很精细。虽然眼光神色都很随和，但却明显地隐藏着极为严厉的某种要求。

这种要求是什么呢？

想不出。

如果只从外形表面判断，可以说这位新领导人平常至极，没有任何特点。个子不甚高，脸稍微有点胖，有几粒不大被人注意的浅麻子。但是他的神气却可以作多种揣度，你可以认为他是个小买卖字号的掌柜的，也可以认为他是个大买卖跑街的，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个吃白相的。同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某个股票市场的阔佬，某个行帮的大辈，某个财团的代理人，甚至某个政治集团的决策人。总之，他给吴纪光的总感觉是：此公可展视的幅度很大，绝不是等闲之辈的一般领导，作风也许很泼辣、雷厉风行。他就喜欢这种领导人，在这种人领导下工作，必须尽可能迅速、准确地领会其指示意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自信自己不至于出现什么令人不满的愚蠢行动。

时过不几天，吴纪光便把这位新领导人的大致底细搞清楚了。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这位新领导人来自延安最高机关，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不仅要领导上海情报科和地下党组织、外围团体和个人，还要领导在香港的有关组织。并且，在那里他还要和许多抗日、反蒋人士联络。他还要不定期地到延安去。至于旅途上的安危，在他纯属细末微事。他可以坐豪华的一等船舱，坐飞机，坐火车软卧，在上海可以坐某些名人的私人小汽车。他来无影去无踪，不知什么时候便会突然出现和离去。什么场面他都能应付，因为凡他出现的所有场面，都有人为他暗中预先作了安排和安全部署。

他在上海的活动，连自称是汪伪特务总管和汪蒋密线之一的周佛海也一无所知。

潜伏在上海的“蓝衣社”们，只能凭感觉知道共产党的存在，却连影子也看不见，更看不到他。

无疑，这是一位身负重任，十分隐蔽的“大亨”人物，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背后只是用赞美的口吻呢称他为“小开”，作为代号。

这些都是吴纪光从周围同志和情报科当时的负责人金鹏同志的接触中听来的。金鹏的夫人也是情报科的成员，她以一位名人的秘书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夫妇二人，一方面掩护的身份适当，同时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磨炼，经验丰富，工作作风稳健，所以虽然作了大量重要情报工作，却不为一般同志所详知。

金鹏在向吴纪光谈到“小开”时，像个严肃的孔门贤人。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小开”褒词溢美，而只是冷静地予以介绍。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吴纪光凭他善于开辟新局面的特长，观察到上海情报科内部同志间的气氛不甚和谐。好像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工作焦的、紧张。虽然没出现公开的意见抵牾，却都有一种不快和不安的情绪流露。

在第二次会见“小开”时，他作为一种观感反映出来，问“小开”：“这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个环境很复杂。”“小开”思索了一阵，向他点了一下头：

“看来介绍人对你的评价不错，你很敏锐，你暂时不要过问这些事。”

极平静的寥寥数语，使吴纪光心下暗吃一惊。原来“这个环境复杂”，不仅指与敌伪顽的斗争，也包括自己内部，这是他未曾想过的。

从此，他恪守“小开”的嘱咐，不过问同志间的事。

又过了半个月，金鹏约他见面，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有几条线你还不知道，我都交给你。”

“交给我？”

“这是领导决定的，这摊子交给你了。”

“你呢？”

“上延安。”

“有新岗位？”

“去学习。”

“是去学理论？”

“不知道。”

吴纪光接受了金鹏的交代，心下却莫名其妙。暗想：怎么不交代给老同志中的随便哪一位而交给我呢？我到这里的时间比任何人都短。细看金鹏的神态，一如既往的冷静严肃，不苟言笑。

不待金鹏交代完毕，他已经明白，交他接工作，是组织决定的，而且意识到这决定与“小开”有直接关系。

他要求会见“小开”。

联络人告诉他，“小开”三天前已经离开上海了。

在回住地的路上，那熙攘的人群没有影响他的思路。他心里喃喃自语：“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整顿出个新局面来，也是一种开拓。”

怎么整顿呢？

这里既不是根据地，也不是军事前方。

这里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工作。

按性格说，他喜欢搞军事。明枪明刀，痛快。而此时此地却全是隐蔽。不能开大会喊口号，不能敲锣打鼓戴红花庆功。他来以前，曾想，搞情报就是对敌人情况的侦察。但是这个上海情报科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里是搞敌人战略情报的，不是了解点敌人的皮毛外表就算侦察了。这里的任务是

获取敌军的战略计划，探知敌方首脑机关的战略决策，像牵牛先抓逼绳那样，先去抓敌人决策集团的核心绝密。只要掌握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我们也就取得了斗争的主动地位。

这个上海情报科，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多次作出重大贡献，不参与其事的人是绝不知道的。他吴纪光在到此之前就未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对敌斗争单位。

“干吧，只要坚决执行指示，认真领会‘小开’的意图，就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他鼓励自己。

整个情报科人数不多，走群众路线不难，个别谈话比开大会更容易深入工作，成效面对面地就呈现出来了。

他展开了活动，依次和科里每个成员谈话。

第一个是在“满铁”办事处调查室的日本同志中西功。

中西功给他的印象不甚好。这个中西功，对吴纪光的热情和诚恳，几乎没有作出必要的反映，只是默默地听吴纪光谈。吴纪光和他谈了半天团结和纪律在秘密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都没表情。轮到他谈时，竟出吴纪光意外地谈了一通对时局形势的认识，特别强调他对德日两国潜在矛盾的分析。依他看来，希特勒希望日本北进攻击苏联，不过是给他起壮声势的策应作用，是对日本的一种利用而已。而日本怎愿被利用呢？并且陆海两军的矛盾，恰恰集中表现在这个“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上，大本营举棋不定，这就造成希特勒对日本的不满。在这点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然后又谈了一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力消耗的情况，特别强调战略物资储备量几年来没有增长，难以靠临时掠夺支应日渐铺开的战线供应。在政治方面，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收效甚微。目前只得把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等等，尽力往一起撮合，企图组成个对蒋施加压力的工具，等等。他说得不紧不慢，像是只和吴纪光交流敌情。在整个谈话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战争胜负决定在人，而不在物。若依他所重视的这些内容推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好像是双方物资的比较。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吴纪光没有在这个论点和他展开讨论。

最后，分别时，中西功给了他一包大炮台香烟。说是他的党费，态度很是郑重。

拿回家打开一看，原来香烟包里装的是三张大额军票。真有意思。

第二个约见对象是在南京“中华通讯社”任顾问的“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日本同志西里龙夫。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位老革命，态度很谨慎。中国话讲得不甚通顺，有点吃力。对吴纪光的谈话，唯唯而已，比中西功显得温和。关于情报科内部的情况，一概不谈。他关心的是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尾崎庄太郎，打不开局面，派去个钱志行，到现在还没安排好一个适当的掩护职业。他提出意见：“希望新领导给以实际指示，从速加以解决。”

第三个约见的是“秀才”陈一峰。这个“秀才”已和吴纪光相见几次了，对吴纪光担任领导，一付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还主动提出，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出行不便，吴纪光不必特地见他。由他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整个谈话，在陈一峰那“稀里马哈”的冷热不定中草草结束，使吴纪光产生了一种空落感。

第四个约见的是李得森，这条山东大汉，不容他多说，瞪起眼叫道：“有什么说的？叫你领导你就领导呗，我是绝对服从，你放心。”

至此，吴纪光心下清楚了：不客气地说，这是个乱摊子，每个人的能量都很大，却未能发挥，必须采取根本性措施加以调整。

他经过深思熟虑，果断行动，根据每个人的特长，从组织上做了调配。上海是大本营。派出李得森、张敏到南京和陈一峰组成个情报站，使每个人都得以发挥能力。经过调动，一个月后，大家各就各位，工作进入正常运行。

在人力使用上，他心里又有一个军事建制。

他把上海的中西功当“第一军”，把南京的西里龙夫当“第二军”。隐蔽在南京“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采访部主任陈一峰，是“第三军”。隐蔽在汪精卫公馆里的汪敬远，是“独立旅”。活动在上海、南京、无锡的倪之骥、邱麟祥、程维德、郑百千等等，是游击队。李得森的南京情报站，只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联络机构。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钱志行，山西的白井行幸等，是驻华北的“野战军”。

他确实掌握着一个情报大兵团。

一年多来，这个大兵团，发挥了作用，他们随时掌握着日本南北两方的军事机密，或可直说掌握着华中、华北两大沦陷区日本占领军的重大行动计划。至于汪伪军的活动，汪精卫和西尾寿造、坂垣征四郎之间的秘密谈判，汪伪内部的宗派内江，汪派同王克敏、梁鸿志之间的明争暗斗，蒋介石“蓝衣社”在上海的活动，影佐祯昭通过“梅机关”摆弄汪伪这具败类木偶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更是一清二楚。华北八路军“反扫荡”，华中新四军“反清乡”，在哪摆战场，是军事首长的事，仗怎么打，由指挥员决定。上海情报科，可以向上级提供这些方面的情报，但打仗不是他的任务，更不用直接提供这方面的意见。

一年多来，“小开”没有拒绝过他的约见。每次对他的汇报都点头赞许，然后轻声说：“就这样干吧。”

领导这样放手，当然是出自信任，而信任是出自领导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和表现的观察分析。

但是怎么说呢？他心里始终有一丝不安，这不安来自“小开”第一次见他时那眼角余光的一瞥。他至今没有忘记。那一瞥说明什么呢？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所意识到的对他那某种要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要求呢？

不管怎么说吧，他决心无条件地服从领导，这不会错。

前天，上级突然来了个通知，说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把日军即将南进，发动战争的行动日期，核实准确，及早报告。

这可是个大题目，他一听，脑袋就胀了。

日本要“南进”的国策，他是知道的。

“南进”矛头是指向英、美、荷兰及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缅甸，这他也知道。

可是，核实发动战争的日期谈何容易！

他挠头，一筹莫展。

这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国都需要的重要大情报，非同一般。

他意识到，把这样一个重大任务交给上海情报科，就是说，中央要上海情报科担负国际情报的重任了。任务完成得好，加速法西斯阵营的灭亡，减少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这又是何等光荣！

但是，怎么去完成呢？

他还是挠头，一筹莫展。

挠来挠去，他想到了“第一军”。中西功有办法从“满铁”的密件里取得情报，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延安要的是准确日期，不是只提供些情况资料就行的。

正在为难时，程和生来了。

“什么事？”他问。

“中西功收到东京一份电报。”

“电报？什么电报？”

“叫他向西去。”

“叫他向西去？”吴纪光一下愣住了，他明白叫中西功向西去意味着什么。近卫倒台，他已经想到中西功有受牵连的可能。现在果然，他收到了警报。

“你看到电报了？”

“看到了。”

“谁发的？”

“大概是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用的是中西功的一个笔名。”

“笔名，什么笔名？”

“叫白川次郎。”

“那就是……发报人是日本革命同志？”

“他也说不清。”

“噢，他怎么说的？要向西去？”

“他考虑的很多，说怕他走了以后，敌人要追查我们，结果可能造成我们在上海站不住脚的局面。”

“噢。”

“不过从我们组织上来说，应该赶紧打发他走，送他到延安去。至少到苏南或者苏北根据地，离开上海！对不对？”

老吴沉默了。

“一个日本同志，我们要对他负责任。”程和生又补充说。

“是啊！他是个好同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吴纪光心里掀起浪头，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么办？这等大事，不是他作得了主的。他沉吟了一阵，告诉程和生：“等我请示了再说。”

“要快。”程和生要求。

“就去。”他答复。

程和生一走，他立刻去见“小开”。把事情作了汇报。“小开”听罢，沉思一阵，轻声问：“你见过那个电报了？”

“没有。是程和生汇报的，”

“叫他向西去？”

“是。”

“发报人叫什么？”

“白川次郎。”

“小开”沉思一阵，轻声说：“这种时刻，这种事，你得动脑子。”停顿一阵，又深沉地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峻，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我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我们中央是从世界形势的发

展考虑我们中国抗战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话，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你想想，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随声问。

“是叫他离开阵地向西去？还是要他继续坚持？”

吴纪光一下回答不出，他知道，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他不敢多嘴。

“得慎重考虑。”“小开”点了下头：“容我想想。”

第二天，他按时会见“小开”。

“小开”说：“我考虑决定，不能叫他向西去。恰恰相反，不仅要他继续坚持岗位，还要请他向东去。”

“向东去？”吴纪光懵然地问：“去干什么？”

“完成延安交来的任务。”

“这？！”吴纪光目瞪口呆了。半天，才低声说：“那是很危险的，万一？！”

“万一被捕？”

“是啊！有这种危险。”吴纪光用诚挚的眼光向“小开”解释。

“那就有这种危险吧。”“小开”极平静地说：“他经验丰富，现在，只有他能取得这份情报。”

“可是——”

“不用可是，他有胆有识，善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完成任务。你对他的认识恐怕还不够，他是个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

吴纪光心里抱委屈。如果说他对中西功认识还不够，未免冤枉。他和中西功联系，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来，他渐渐熟悉了这位日本同志，从第一次见到他所得的“不甚好”的印象里，快速地超脱出来，他为什么把中西功当“第一军”？就是出于对他各方面的信任。相信他的能力，更相信他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和忠诚。然而——他对“小开”低声说：“可他是个日本人。”

“不，不能从这个角度考虑，首先要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考虑，要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自己吧。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更相信他会接受这个任务。要不要我跟他面谈？”“小开”用冰冷的眼光问他。

“不要不要。”吴纪光急忙答。

“那好，叫他马上行动。”“小开”好像看穿他的回答缺乏决心。然后轻舒口气说：“他去了，无非是两种可能，回来，或者不回来。回来，要完成任务再回来。不回来，必有他不回来的原因。”

吴纪光此时感觉到“小开”不仅斗争坚决，而且思路敏捷，跳跃跨度大。相比之下，自愧不如。

但是，怎样才能完美地把这任务交给中西功呢？联络员程和生那一关就有阻力。

果然。当他把“小开”的决定传达给程和生时，程和生两眼愁苦地眨个不停。

“在这种形势下叫他去东京？”程和生问。

“不派他派谁呢？”

程和生像突然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似的全身打个颤，说：“你这不是把他往敌人手心里送吗？”

吴纪光望着他那一付憨厚而又天真的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从程和生脸上，看到了在这年轻人的心里蕴藏着对中西功深厚的革命友谊，但是……

“听我说，阿程，”他轻轻地拍着程和生的肩膀用委婉的口吻说：“这是一种策略，也是将计就计。即使敌人的眼光已经注视上海，盯上了他，何不来个出敌不意，反其道而行之呢？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那样，也许更安全。他在东京，可以找到那个朋友白川次郎，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还可以根据情况，采取对策，我们不能收到一个不明来历的电报便糊里糊涂地叫他拔腿就跑。这是个常识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他得到的情况，确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到时候，哪里该切断，哪里该撤退，再作决定也不迟。”

程和生不吭声了，老吴是领导，又有斗争经验，并且也知道他已经请示过上级了，上级的决定当然应该是对的。但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就这样决定了？”

“决定了。”

“如果，如果中西持反对意见呢？”程和生的问话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悻悻地走了。看得出，他嘴上不说，心里仍很不服气。其实，吴纪光又何尝不知道，这个决定有多么大的冒险性呢！但是他更知道，整个情报科不是无时无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吗？在危险中再冒险一下，应该说也是正常的。

此时，我们的这位大兵团司令的内心真有点大将的气概了。

程和生去请示老吴以后，中西功没法使自己镇静下来。程和生同他谈话的表情，他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位小弟弟的心情，他完全明白，也十分感激。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至于方子和惠子，他相信组织也会作出妥善安排，不用担心，说不定会把她们送到西边去和他会面，那是不难办到的。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点。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点就存。他走，情报点就亡。道理本来就这么简单。

可是，怎么坚持下去？

他设法带着“特别调查班”转移到某个日本驻华单位，或者到汪精卫某

个机关？那样一来，可就拿不到在“满铁”所能得到的那类重要机密，实际上还是把“满铁”这个情报点放弃了。况且哪个单位又能收留他和他的“特别调查班”呢？“满铁”知道他的身份，绝对不会放他走。那样做，其后果还不及“向西去”来得干脆！

怎么坚持下去？

这是中西功收到白川次郎电报以后一直在思索的课题，也就是他所要想出的“万全之策”。在一瞬间，他后悔没有在“满铁”培养教育发展一个党员，没有后继力量。他想起研究室的津金，津金是京都人，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专业把他造成个能言善辩的雄才，有点锋芒毕露，不容人对他的发言有所辩驳。在几次研究会议上，他的发言说明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有初浅研究，对国际形势也能作较客观的分析。中西功曾和他作过几次经济学术恳谈，从个别接触中观察，这个人基本素质是好的，心地善良，也可说是正派的。在他理屈词穷后，能认真思考，并且当即认真承认自己学浅，然后尊敬你，主动向你求教一些问题，在求教过程中，不带一点虚假的恭维。他应该是个有为的青年。中西功向他流露过友谊之情，他极为珍视。可惜没敢和他深入交谈有关共产主义的话题。更没敢向他流露一丝有关他的隐蔽工作。

不过，中西功又想，即使已经把津金发展成中共党员，一旦我向西去了，他能否保持下这个情报点，也是件未可预料的事。如果程和生等“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都撤退了，他得另建一套搭配班子。建一个班子谈何容易！他建立这个“特别调查班”，曾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他深深叹口气。

无论如何要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满铁”情报点坚持下去，全部症结在于怎样做才能坚持下去。

“怎样做？！”他紧锁眉头在沙发上苦苦思索。

“先生！”耳边响起一声轻柔的呼唤，他睁眼一看，见惠子手按沙发扶手，弯腰凑在他耳边，调皮地笑着：“请君幸膳！”

他往饭厅看，方子在厅门里探出半个身向他微笑。

他勉强起身，走进饭厅。依惯例在他的位子上坐下。

佐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鱼青虾红，都是新鲜的。一盘嫩茭白丝，像还没下过锅。

方子为他斟酒满杯，他握着酒杯还没缓过神来。

“你为什么这样？”惠子的眼光在他和方子之间看来看去。

“公事上的小困难。”他应付地随口说。

“你这愁苦的神色很像爸爸没钱还债时那样。”惠子笑了。

“是吗？”他苦笑一下，开始“幸膳”。然而仍旧“心不在焉”的两眼发呆。

“有时候，爸爸会找人临时借一大笔钱，打发几个债户，消息一传开，别的债户便不急着登门催讨了。”惠子一边吃饭，一边开心地笑着。

“是吗？”他又应付。

一杯酒喝下，方子再为他斟酒间，他像受到惠子说话的某种启迪似的，双手合拢，拍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好像是向方子道谢。这一来，饭桌上的空气顿时变得和谐了。

然而他却起身到书房去了。

他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南京陶谷新村“同盟社”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私

宅。

“西里君，我有事需要见你。”

“我也想会见，如果你有时间，我立即到府上造访。”西里龙夫说。

“不不，谢谢，我到你府上拜访，立即动身去南京。”他抬眼看看壁上挂钟，又重复一声：“立即动身。”

挂上话筒，他抓起件外套，转头向饭厅招呼一声：“我走了。”便出门而去。

待惠子追到门口，他已经转过楼房的墙角不见了。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微妙关系。说来他俩都是中共党员，都属上海情报科领导，似乎颇为简单。但是他俩又都被一种特别的感情所煎熬，所驱使，这就是为自己的祖国日本的命运而焦虑。共产党员讲国际主义，但是连自己本国的命运都不能掌握，这国际主义从何谈起？日本军阀侵华给日本人民造成的苦难虽然被御用工具严密封锁，但他们却了若指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亲眼目睹，真可谓“罄竹难书”啊！处于这个战争漩涡中的日籍中共党员，国际主义的责任是最直接的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都心里自明。由于痛苦的压迫，才使他们都不夸夸其谈，而只埋头隐蔽地艰辛工作。

西里龙夫不仅比中西功年长，若从“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学校的班级顺序论起来，还是他的学长，或者说是他的前辈。

西里龙夫的学问道德，在与他交往的人中被广泛称赞。中西功对他敬佩有余。若从这方面而论，他内心把西里当师尊。

西里龙夫在分析战争局势方面常有独到见解。近卫文麿施政期间，他就对中西功预言过：“如果近卫的‘大政组合’只维持一个形式，而不能从政治观点上彻底统一，那么它将徒有虚名，无所作为，最终必然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压垮。”现在，不论近卫倒台出自什么原因，事实的发展，证实了西里的预言。

关于白川次郎发来的电报，不仅是对中西功报警，也是对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的报警。需要大家研究，采取统一对策。

他对“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已经有个朦胧的设想，需要和西里龙夫商量，听听他的评论。

中西功从登上火车到踏进西里龙夫宿舍门，一直都在为他的“万全之策”作各种方案的设计和修补。

两人见面，没有一句客套，开门见山，首先的共同话题都是“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内幕可能是什么。

两人谁也说不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他们都没见过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是他们都感觉到：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

“我怀疑‘白川次郎’的警报是他发的。”

“是吗？如果是那样，事情也许不至于太糟糕，因为他毕竟可以给你发报，说明他还有自由。”

“那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我们的报告材料。”

“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

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在日清码头送中西功上了轮船，程和生慢步徜徉在马路上。前天晚上，他把老吴的意见传达给了中西功，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堪的局面。本来，他是要劝说老吴催中西功离开上海“向西去”的，结果碰了钉子，而且老吴一再坚持要中西功“向东去”。既然是组织决定，当然要一字不改的传达。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他推辞，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孰料，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虽说程和生只是个负责他们两人之间传递意见的联络员，可是作为党员，他对老吴这位上级作出如此的决定，心里不能接受。他觉得老吴只知道任务，不为中西功着想。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的时候，便带着一种情绪。中西功倒反过来劝说他，热情勃勃地解释，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中西一席话，说得那么轻松，那么乐观，那么无私无畏，程和生不但未能说服他，反而被他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事情既然如此明白、壮丽，使他一时间连同对老吴的不满也一古脑儿烟消云散了。

但是，当时的心情变化是当时的情绪。码头方向传来低沉的汽笛声。中西功走了，他程和生那深藏着的不安的心情却没被带走。眼前所见，活动在街面上熙熙攘攘的市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不安和愁肠。日军占领上海4年多了，人们好像已经习惯这种被异族统治的生活了。他想，这些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健忘，父母兄弟被野兽枪杀，大街上的血迹被洗刷之后，他们脑海里的仇恨也随着被洗刷去了。

忽然，传来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活动在街上的人们都往两边躲避，上海人都熟悉这种声音了。果然，眨眼间，三辆敌伪警车嚎叫着，由北而南开来；程和生被一个急忙躲避的老太太撞了个趔趄，老太太口念“阿弥陀佛”，低声骂了一句“‘赤佬’又来抓人了！”

程和生赶忙扶住老太太，站定街边，目送军车驰去，心里暗暗生出一丝喜悦：中国人并不健忘，他们的武器是沉默中的实际行动。只要有人站出来组织领导，每个上海人都会是点火就着的干柴。

恰在这时，倪之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挤到他身旁，低声说“76号抓了蓝衣社，他们的头头陈恭澍，也被抓了。”

“噢。”程和生推了倪之骥一把，两人便分头走开了。

陈恭澍是“蓝衣社”潜伏在上海的头头。“蓝衣社”的活动，上海情报科是很不赞成的。但是没法子，管不得他们，既要和他们打交道，又得躲着他们，既要渗入他们内部，完成我党的推、拉他们抗日的任务，又不能让他们有丝毫察觉，这真大艰难了。这个陈恭澍，前年3月在越南河内跟踪行刺汪精卫，结果，打死了个曾仲鸣，打伤了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汪精卫连点皮也没蹭破。汪精卫派人和陈立夫交涉了一阵子，双方没达成协议。去年6月，“蓝衣社”要给汪精卫点颜色看看，打死了《国民新闻社》的社长穆时英。汪精卫急了，发表声明：“要坚决消灭在上海的蓝衣社”。现在果然动手了。蓝衣社在上海有多少人，他们的活动计划，汪精卫是不掌握的，但是他们在上海的存在，汪精卫是明明白白的。蒋汪之间的矛盾已经激烈化，表面化，这必然使日汪特务的破坏活动强化，对在上海的各种抗日力量也是个威胁。

这帮子“蓝衣社”！

话说回来，他们也只会这些办法、相信这些手段。

第三章 谁是重大情报的获取者

随着轮机声缓慢、沉重地停止，轮船停靠在码头前。东京到了。

中西功向船窗外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海水。舱室外通道上，已经有人提箱背包准备下船了。他不着急，决心走在最后。

两昼夜的海上航行，他没到甲版上去走过一趟，也没到餐厅去吃一餐饭，只沉沉地大睡。醒来，喝杯水，吃点饼干，躺在铺上大睁双眼思索到达东京后怎样进行活动。

第一件事，先寻找发电报的“白川次郎”。是谁呢？他搜遍枯肠地想来想去，十有八九是尾崎秀实。只有他才有机会得到有关他的安危方面的情报。也许，近卫下台，尾崎秀实在整理文件时，看到了警视厅给内阁的报告之类的东西，其中有涉及到他的材料。于是尾崎发了警报。

如果不是尾崎秀实，还可能是谁呢？

水野成？浜津良胜？他们现在都在东京。他们几位知道我用过“白川次郎”这个笔名。可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得到关于我安危的消息呢？他们都不在可以得到这种机密消息的机关。

这几位朋友，都是日本革命志士，1938年，日本取缔共产党和革命者，他们辗转分散到了满洲。这时中西功前后在“满铁”大连分公司和天津事务所当调查员。他把他们、还有现在在北平的白井行幸和尾崎庄太郎，各别联络起来，成立了个“中国满洲共产主义者组织”，还在大连老虎滩开了个会，研究开展反战活动。中西功率先行动，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发表，用的笔名，写了个“白川次郎”。这篇文章，在中国左翼人士间和日共流散各地的党员中，引起很大影响，给各地日共党员带来希望。他们偷偷互相打听，白川次郎是谁？结果谁也打听不出来。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人们对这个名字也淡漠了。但是知道此事的几位，肯定不会忘记。

会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位？白井行幸和尾崎庄太郎在北平和山西活动。在东京的就是他们几位。

第二件事便是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的确切日期的情报。现在这个任务变成此行的主要目的了。只要见到尾崎秀实，这是有希望的。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船大掉头难，战略计划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在上海，他已经听过新首相东条英机的广播讲话了。东条讲话的重点是申明新内阁执行国策的立场，他说：“新内阁将继续坚持关于处理中国事变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既定国策。”这就是非常明白地说，日本“南进”的国策没有改变。所以上级才要了解日军发动战争的日期。

总之，见到尾崎秀实，就一切都好办了。

他提起皮包，走出客舱，跟在下船旅客们的最后。

他还不知道，此时，尾崎秀实确实已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关在临时刑审室里已经12天了。

他更不知道，水野成、浜津良胜，也早已被拘留了。

他走出客舱通道，来到扶梯口，转眼望见了东京市，从这里高处看东京，还是那样子，一片低矮的民房，散落几幢灰色的楼，很寂静。

下完扶梯走上码头，抬头望见岸上挤满了人，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他最后一个登上岸，岸上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散光了。在检票的木柱门外，有三个穿军装的光头青年人，抱着挂在脖子上白布裹起的方盒子，神色木然地站着，几个妇女对着他们哭泣、鞠躬，孩子们莫名其妙地拉着女人们的长裙。不用说，那方盒子里装的是日军阵亡者的骨灰盒。

他决定按计划先找个旅社住下。

奇怪，海边所有路上都清静无人，进了市区依然街道冷清，不像往昔的东京街上总是那么热闹。

他在一家叫“千代”的旅社里住下了。这是家小旅社，但是，有电话线从二楼窗旁拉进房去。

住宿的客人不多，柜台前很清闲，店员招待很殷勤。这店员走路一拐一瘸，很艰难。他见中西功低眼看他的腿，便笑笑解释说：“这是在中国，河北省的泊头镇，宋哲元的队伍，把我的脚打断一根骨头。”

中西功从他手里拿回了他的皮包：“我自己来吧，你不必爬楼梯了。”

“没有关系，一点也不妨碍爬楼，我已经习惯了。”瘸子说。

“好了好了，不麻烦你了，谢谢，我会找到房间。”

“你看哪间合适，就住哪间好了，都空着。”

“好，谢谢。”

中西功上了楼，在靠近电话间的一间向阳房里放下皮包，转身四面看了一下，房间倒也干净，一个铺，一张桌，一把椅，一对沙发。地板是白松木的，靠门口处油漆已被踩掉，露出褐黄色。

楼梯传来一脚轻一脚重的响声，瘸子店员上楼来了，站在门外，先向他半鞠躬，然后走进门，陪笑道：“先生，真感谢您光临。”说着把几张报纸和一本“客人注册”放在桌上，又陪笑道：“有什么需要我们办的事，请随时吩咐，注册，请您按项填写。”

中西功拿起“注册”，快速填写好，交还给他，口说“麻烦了”，手掏衣袋，摸出几张钞票，塞到他手里：“请收下，请多关照。”

瘸店员脸上痛苦地抖动了一下，又半鞠躬：“真不好意思，多谢多谢。”

“您到过中国？”中西功歪头问他。

“到过，先是在满洲，后在天津，打宋哲元，在泊头镇，那天下雨，我们把他们包围了，结果他们又跑掉了，您看不出吧？我当过上士班长。”

“噢，这旅社是您自家的？”

“不不不，除了这条瘸腿，我什么也没带回来，这是我一家亲戚的。没法子，我一个人，家乡又没有土地，叫我怎么办？总要活下去呀。”

“是啊，战争嘛，大家都要艰难些。”

“是啊是啊，我还是幸运的，活着回来了。我看您先生写字，是有学问的人，依你看，我们对中国的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

“当然要取得圆满的胜利罗。”

瘸子脸上又痛苦地抖动了一下：“是啊，可是在本土的人，都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以为枪炮声和欢呼胜利的口号声一样的悦耳呢。”

中西功笑了：“是啊，真惭愧，我也没听到过枪炮声。”

“还有伤兵的呻吟声，当着大家的面，都要强忍着。可是单独一个或者两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

中西功又笑道：“你说得很可怕。”

“先生，我是有资格说这话的。你没听说吗？好像说，我们又要和美国开战了。”

中西功作出吃惊的样子，拖长声调问：

“早吗？”

“怎么不是？一个中国就够我们麻烦的了。新首相东条先生——”瘸子摇了摇头，想了想，又摇了摇头，张口结舌的不说了。

“你好像不赞成和美国开战？”中西功还笑着。

“不不不，我已经无所谓了，我是可怜那些新兵，他们应征前，知道什么叫战争吗？呃！应征以后，又没经过像我们那样的训练，唉，好了，先生，你休息吧，不打扰了。”

“没关系，我倒是很愿意听听一个参加过战争的老兵，说说我们日本该怎么办。”

“日本该怎么办？那是内阁的事，让他们办去吧，我们平民没有资格办国家的事。”

房门外出现了一个中年女人，向瘸子大声问道：“居正，你又喝酒了吗？”

“噢，先生，”瘸子居正向中西功点个头：“你休息吧，”说罢，掂起“客人注册”走出门去。

中年女人向中西功鞠一躬，道歉地说：“请原谅，他就是喜欢饶舌，不像个男人。喝了酒以后，更烦人。”

中西功笑一笑：“没关系，他是个诚实的好人。”

中年女人也笑一笑，抬腿走了。看得出，她对中西功给瘸子居正宽厚的评论感到高兴。显然，在东京，向一个陌生人，居正那样的议论战争，要被怪罪的。

这是他这次到东京后接触的一个人，第一次听到关于战争的谈话。他深感意外，原来，对美国作战的舆论，已经在平民间公开流传了。

他忙翻看报纸，匆匆例览标题。在10月20日的《朝日新闻》头版，有外相东乡茂德的广播讲话摘要报道，这篇报道，在上海曾经看过，大意和东乡的广播讲话一致，只是其中的一句，此时特别引他注意，东乡说：“若情况影响到日本的生存，或涉及日本国际威望时，则一定坚决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来捍卫它，以完成日本的光辉使命。”这些话，在上海看时，认为是笼统的日本大话，现在想来，作为外相演说发表，却是日本对美、英等国家发出的警告，也就是说，目前正在对美国的谈判，到了日本需要申明最后立场的程度了，这是日本政府告诫美国的最后通牒。从中可以透视出在日美谈判中，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已经使日本不能忍受了。更可以看到日本为实现“南进”的决心，到了需要表明“毅然决然的态度”，也就是发动战争的时候了。这不是空洞的恫吓，因为日本没有可对美国进行恫吓的战争实力。这一点，东条和东乡都是明白的，要发动战争，只有毅然决然地拼命到底。

说实在的，即使此刻，中西功对日本是否真敢发动“南进”战争，心下仍存怀疑。

再翻10月26日的《朝日新闻》。26日，他正在海上航行，船上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在报纸头版，有条加边消息：“首相偕海相参拜伊势神宫。”

他暗吃一惊，这可不是好兆头。

东条提前晋升了大将，组阁担任了首相，仍兼着陆军大臣。陆军和海军的矛盾，由于他地位的变化，会有某些缓和，而和海相岛田繁一郎一起去参

拜神宫，无疑是向陆海军各部各级的一次姿态展示。但更重要的，这是一次对外宣传性的展示，具体说是对美、英的展示：日本国内军界一体。

参拜神宫，一般人都认为是无事消闲的活动，中西功却知道，东条和岛田是要借此机会进行个人密商。这恰恰不是他们的消闲活动，而是战前的积极密谈和希企得到精神支持的真心祈祷。

中西功决定：马上找到尾崎秀实。

他出房进电话间，拨号码找尾崎通话，半天没一点回声。

他自问：怎么回事？近卫下台，尾崎的电话也撤销了？抑或出了意外？

他轻轻挂断了电话，又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尖细：“你是谁？”

“请找水野成先生说话。”

过了一阵，传来男人的声音：“你是哪位？”

“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因为我有点感冒，您是哪位？”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听出来我还要问你吗？你是谁？”对方紧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彦三郎，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

“是吗？噢，多多保重，哎，哪个彦三郎？”

“好的，再见。”

中西功重重叩上话筒。接电话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听到他第一句话后，便会惊喜地轻叫一声。然后用调侃的语调，学他的话：“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这是他们每次通话的习惯，后来变成接头暗语似的。

而且，从口气听，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那么是什么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拨号码，找洪津良胜。

“请问，滨津良胜先生在吗？”

“滨津良胜？”对方温和地反问：“你找他干什么？”

“朋友，好久不见了，想念他。”

“到警视厅看他去吧。”对方挂上了电话。

中西功手握话筒怔住了。

事情很明白了，滨津良胜进了警视厅，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

可见那位“白川次郎”给发警报并非无缘无故。至于他到底是谁，现在无需查证了。也许是他们之外的某一位朋友，也不需再想了。所谓自己的安危，推到一边去吧。眼下最急迫的是赶快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怎么完成法？他放下话筒，回到住房，眼望窗外，凝思：可惜海军部里没有熟人。

到总参谋部去一趟怎样？在那里会看到些有用的现象。但是，凭一个“满铁”调查员的身份证，硬闯进去，是毫无道理的。即使闯进去，有谁会对你谈什么“南进”不“南进”？谁会给你看绝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亲友，要想进那个大门，警卫也是不允许的。那是何等森严的机关？

只有到军报道部去试一试，那里有个佐藤癸二，是个记者，过去有过一面之识，从他口里也许能探得一点消息。记者、医生、演员，这些知识分子，最喜欢高谈阔论。记者们见了面，首先说的是他们各自获得了什么新闻，通

告对方，某条消息他已占领了，对方不需再去白跑腿了。有时甚至把写好的稿件向对方展读，以示消息来源和他有密切关系……

第二天，他真的到了军报道部。只见楼上楼下编辑记者们都在忙碌。办公室的门都大敞着，整个大楼有一种奇怪的嗡嗡响声。他向一个编辑打听佐藤癸二。

“噢，你请坐。”这位编辑头也不抬。

他便在他对面坐下。

这位编辑正忙着改一篇稿子。一边改，一边低声骂：“自杀，自杀，日本人就会自杀。不爱惜生命……可是抢劫也不是出路啊……”

他改着改着，突然停笔，面对满篇涂红的稿纸发愣，过了一会儿，摔下笔，抓起稿纸暴怒地把它撕掉，抛进桌腿旁纸篓里了，然后抬头看中西功：“你是？噢。”

他伸手在桌角一探稿件中翻找着，同时说：“你是佐藤先生推荐的……噢，松山先生，实在抱歉，你的稿子，我们不能用。”

他从稿件中找出几张字纸，推给中西功。说道：“因为没有版面了，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谢谢。”

中西功客气地笑着：“不不，我是来找佐藤癸二先生的。”

“噢，实在对不起，请到记者间去看看吧。”他向斜对面的大房间指一指，那里记者们吵吵嚷嚷，闹不清谁在干什么，有几个正在打电话，好像在和对方吵架似的大喊大叫。

中西功起身走进记者间。

没人理他。也不见佐藤癸二在那里。

他站了一会，自己拉把椅子在张空桌前坐下。左前有三个记者在谈论什么，其中一个坐在桌子上，一条腿蹬着椅子背。声音特别大，好像要和打电话的人比高低：“那么好了，以后不要我们记者了，等仗打起来，让大本营自己去作战地采访吧。”

“简直莫名其妙，采编主任都不得入场，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不就是开战吗？”另一个发牢骚。

“他们忘记了，我们是无冕皇帝，仅次于元首。”第三个笑嘻嘻地说自我解嘲的俏皮的风凉话。

“好了，不要说了，把荣誉让给美联社吧，日本是劣等民族，没有资格发世界新闻。”第二个又发牢骚。

“他们是拿不到这种内幕消息的，他们只能发表罗斯福和赫尔的谈话。”第三个仍旧笑嘻嘻。

“够了，”坐在桌上的那位“腾”地跳下地，一挥手说：“先拟下底稿，大架子写出来，把开战的日期和时间几点几分留出空白来，把攻击地点也空出来。把消灭美国佬多少兵力，写上个万字，然后写皇军正在乘胜追击残敌等等。谁来写？”

“还要写上摧毁美军兵舰多少，飞机多少之类的吧？”笑嘻嘻的记者问。

“对，也留出空白来。你干去吧。”那位跳下桌的记者推了推他。三个人散去了。

中西功起身拦住从他旁边走过的那位笑嘻嘻的记者。微笑着，点点头：“你们要发什么重大消息？”

笑嘻嘻的记者顿时沉下脸来：“你是谁？”

“我来看朋友，佐藤癸二先生。”

“噢，佐藤已经出发了。”这位记者沉下的脸还没泛上笑来。

“出发了？到哪里去了？”

“台湾。”

“台湾？他到台湾干什么？几天前还写信约我来看他呢。”

“那是几天前，几天后他又要离开台湾了。”

“到哪里？”

“不知道，留出空白好了。”

“噢，这么说，他随军去了？”

“还要问吗？内阁和大本营联席会议开了六天了。”

“我们要对美国开战吗？”

“绝密，采编主任都不得入场采访。再见。”这记者一点头，走了。

中西功没有理由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但是，他仍旧没有离去。他想尽可能地利用“赴约找佐藤癸二”这个借口，多听、多问一些情况。他微笑着又在另张空桌旁坐下了。这是一个情报员最低级的调查手段，但是许多间谍都使用过，尤其在火车、轮船、电影院、跳舞厅等等公众场合。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尾崎秀实、水野成、滨津良胜的线都断了。他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去搞到情况，然后推理。

直到午后1点钟，他才回到“千代”旅社，全身疲惫不堪，一下子躺倒在床铺上。这一上午，他注意力高度集中，没放过每一句能听到的话，没露出一痕迹地进行巧妙探问，记者们的夸夸其谈，帮了他大忙。他了解到，驻在中国南方的军队，正在向台湾集结，佐藤癸二去台湾，正是要随军报道的。也就是说，集结在台湾的部队将有作战行动。同时，7月调到满洲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部队，正在海运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岛集结，有的直开东印度。

无疑，南进作战已经在行动中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计划中的开战日期，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关于坚持“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迟。因为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未来难以预料。

怎么能得到开战日期呢？从哪里下手？

一般机关和人员谁也不知道。

正在进行的内阁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连军报道部的采编主任都不得入场。

他想，必须用最短时间完成任务。东京更不是久留之地。

但是，可以预见，战争不会在十天半月之内爆发。武器弹药、粮秣、医疗器械等等物资运输，也不是十天半月可以完成的事。

更何况，和美国的谈判还在进行。

这真奇怪，一面备战，一面还要和人家谈判。他已经在“满铁”编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过些日美之间谈判的情况报道，从已经了解的情况分析，日本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怎么可能呢？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已经很强硬了，他们要求日本放弃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要求日本无条件撤出在华驻军。只这两条，日本就绝对不会答应。日本不仅要坚持这两条，还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解除对日本的经济冻结。

这都是妄想，根本谈不拢，达不成任何协议。

但是还要和美国谈判，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简直像个可怜虫向昂首挺胸的阔佬乞求布施似的。这是违背东条英机内阁内在愿望的行为。

有一种解释：大兵南调，是为对美谈判壮声势，对美国施加压力。美国一向不愿意为战争流血，更不愿为他人火中取栗，也许东条看准了这一点。

但从目前美国的对华和对日政策看，罗斯福根本不把日本看在眼里。对日本的谈判能拖则拖，纯是敷衍。他才不在乎你什么声势不声势的威胁呢。

还有一种解释：谈判达不成日本希望的结果，便立即发起战争，打美国个措手不及。

这倒符合东条内阁的野心和鲁莽行径。

他们迷信以战养战。他们的所谓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幻想为日德意三国统治世界的战争建立日本的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内能得到足够的战争物资，促成和德国均衡的战争力量。

那么，这次的大兵南调，就不同于今年秋天在满洲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了。“关特演”是掩护“南进”和为“南进”而预演的结论也被证实了。这个结论是他经过实地调查向吴纪光报告，由吴纪光上报延安的。

那是今秋7月，老吴在上海法租界的金陵酒家约见了，告诉他，上级通知，日军正在向满洲集结，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查清日军这次举措的目的，是否要进攻苏联？正好，“满铁”要派他到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他到了东京，约见了尾崎秀实。尾崎告诉他，这次大兵北调，名义上是“演习”，虽然有“北进”苏联的危险，但是要看苏德战场的形势。因为7月2日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因为美、英、荷兰是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必须冲破的阻碍，北方的苏联则不是。另外“北进”所能取得的战争物资，也不如“南进”丰富。“北进”不能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寒冬一到，军队只能在冰雪里冻饿待毙，所以海军根本不同意，总之是在“北进”论受挫，“南进”论占主导形势下决定举行“关特演”的。尾崎还叮嘱他：“你不妨在回上海时，路过满洲实地观察一下，把所见所闻告诉我。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陆军用造成事实的办法压迫内阁的可能。”

他遵照尾崎的意见，回上海时，特地在大连逗留了几天。满眼所见，尽是日军士兵，连街头公园、学校、工厂全挤满了兵。车辆、马匹、坦克、被服、弹药、汽油，一条战备物资的洪流从大连海边向岸上流淌。

然而，在海边，士兵们却在进行登陆演习。

奇怪！就他所知，如果日本北进苏联的话，第一步作战区全是平原、森林、山丘和沼泽地带，搞什么登陆演习？

他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尾崎秀实。

他圆满地完成了老吴交给的任务。明确地回答延安：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是否会北攻苏联，要依苏德战场形势而定。但是，如果到8月中尚未对苏进攻，则今冬明春，日军都不会攻击苏联。

当时他便想到，这个对延安的回答，也是对莫斯科的情报。

情报起到什么作用？苏德战场已经作出反映。希特勒军队未取得可供日军利用的形势。他们在列宁格勒和基辅都碰上了苏军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到8月下旬，“关特演”的日军，大部转入登陆作战演习。9月，再听不到“北进”的议论了。这是他从“满铁”的“内部参考”看出来的。

之后，在一次和老吴个别会面时，老吴发自内心喜悦地低声告诉他：由于对“关特演”动向分析的情报准确，受到上级组织的重视和好评。

现在的大兵南调，乃是日本“南进”国策的开始实施。

那么，还纠缠着和美国谈判干什么？还有第三种解释：这是一种麻痹美国的手段，在谈判中寻找开战借口。甚至，说不定在谈判过程中便对美国发起突袭，这倒符合东条的性格。

据此，可以认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那么，是哪一天呢？这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呀！

从哪里去取得这个情报呢？

他从铺上一跃而起，站在窗前凝思。

从窗口望出去，东京没一点异象，矮房还是那些矮房，灰楼还是那些灰楼，寂静如常。

楼梯传来脚步声，一轻一重地，瘸子居正上楼来到了他的门前。中西功见他手拿报纸，忙迎去连声道谢，居正鞠躬说道：“先生，有人给你来过电话。”

“谁？”

“他没有告诉我姓名，只叫我转告您，请您到西边去。我问他到西边什么地方，他说您知道。”

“噢，”中西功暗吃一惊。

“是不是您的朋友给您在西边什么地方找下合适的房子了？我们这里很好嘛，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可以改善。”

“噢，是，我托过一些朋友找房子，你们这里也很好。”中西功寻思着，随口应付。

“是啊是啊，在这里住着吧。我知道，您先生不是一般人物，住在我们这里，是委屈点，可是，我们的房间很清洁，对吧？而且，比起来，我们的租金是很便宜的。”

“是是，我不想搬走了，不过既然朋友费心，我应该去看看，是吧？”

“那当然。应该去看看，不过我想，在东京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房子了。当然您不在乎这点房租，您要住得舒适。”

“好吧，我看你们这里很清静。”

“是啊，凭这一条，我们的房租就很便宜了。你今天不会搬走吧？”

“我想不会。但是我要出去看看。”

“是是，您这就去？”

“就去。报纸您留下。”中西功从袋里摸出几张钞票递给居正：“谢谢啦，如果我朋友再来电话，请您问清楚他的姓名，我在东京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帮我找住处，免得出错。”

瘸子居正收起钞票，点头鞠躬：“谢谢先生。我一定作到。”

中西功下楼站在“千代”旅社门外沉思片刻，慢步向海边走去。无疑，来电话的那位朋友，就是给他发“向西去”电报的某君。是谁呢？事实说明这位朋友肯定已经看见他了，可能是在他下船以后到达“千代”旅社之间的这段路上吧？

他慢步走着，尽量走得让路边各户人家都能看得见他。

也怪，这位朋友既然看见了我，为什么不出面直接同我说话呢？

也许，他有什么不便？

或者，他不愿让我知道他是谁？

这两种情形都未可免。

但是，这位朋友一定知道些尾崎秀实、水野成、浜津良胜的情况。甚至知道些内阁和大本营的情况。

他在海边码头前游荡了一阵，又慢步走向“千代”旅社门前，犹豫了一下，继续向军报道部走去。心想：也许，这位朋友就在军报道部。只是他不愿意把自己暴露给我，而在暗中帮助我。在反法西斯阵营中这是常有的事。

对，军报道部的消息比“同盟社”要灵通，它的记者们享受着“同盟社”记者所羡慕的某些特权。

他轻车熟路似的大摇大摆走进军报道部。

他在走廊里，在楼梯口，在记者间，在各编辑室走来走去，凡有人问“您找谁？”他便说“看个朋友”。同时用最友好的微笑争取和人家谈话，譬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你们很忙啊？”“我好像见过您。”

令他非常失望，竟没有一个人向他显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种眼神和脸色。

在回“千代”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位朋友不会在大庭广众出面和他打招呼的，只能寄希望于他再来电话。

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饭，他没离开房间一步，但始终没收到一个电话。

这位朋友是谁呢？他又着急，又紧张。

不管是谁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负，应该赶紧离开东京。

但是，日军南进发动战争的日期是哪一天？

这个任务不完成能离开东京？

在这里会被警视厅发现而出现麻烦吗？

中西功相信不至于，茫茫东京至今还未发现有人跟踪他。除了那位暗中帮助的好朋友。

就这样，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点，他决定到银座走一趟，去找一个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学。佐山在银座经营一个小书店。他在满洲受过伤，在大连军医院安了个假眼珠。出院的时候，用一条军毯换了一个朝鲜中士一枚金戒指，那中士说，他的未婚妻嫁给一个商人了，他看见那金戒指便伤心，本想把它扔到海里的。佐山凭这枚金戒指做生意发财了。

银座各处还和以前一样，街上人多些，不断有汽车缓缓驰过。但中西功看去，街道似乎变得比以前宽阔了，两边的楼房也矮小了。这大概和在上海住的时间长了，看惯高楼窄街有关。

在三目町街口，他找到了“佐山书屋”，佐山一见他，便亲切地拉他到后房里吃茶。他觉得佐山的热情有点过分，夹带着虚假，特别他那只假眼珠，不能随那只真眼珠一起转动，使他的热情减去一半真诚，好像掩蔽着什么诡计，不让人看破。

“你从上海来，正好问问你，我想到上海去开个书店，你肯不肯帮忙？”佐山认真地说。

“中国人不喜欢日文，而且他们把商人和军人一样看待，所以，你去经营书店一定很困难。”

“不喜欢日文？”佐山不解地瞪起双眼，直视着他，这时候，他的两只眼珠成一正方向。真假难分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最后还要屈服于我们吗？不要两年，他们统统要学会日本话，要用日文写信，孩子要念日文书。我就是预见到这一步，才决定先去那里的，我要先去站住脚。我们俩可以合伙，

你在‘满铁，给我作靠山，怎么样？’

“我不善经商。劝你也别去。两年占领全中国的愿望难实现。”

“要全中国干什么？汪精卫不是在南京建立政府了吗？”

“重庆蒋介石不承认他。”

“谁需要蒋介石承认他？岂有此理。我们不是已经承认他了吗？有我们承认就行了，他在全世界就合法了。全世界都要承认汪精卫！”

中西功嘿嘿一笑：“你想得太简单。”

“是吗？当然，你比我知道得多，可是从商业说，中国将来有大市场，现在都在议论我们要向南方扩展。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南方有什么？天边海外几个小岛子，全部加在一起，不及半个满洲的四分之一。”

“重要的是海洋”。

“我们的海洋还不够吗？鱼虾没有国籍。我们占领了海洋也占领不了它们。他们乱跑。”

“不只鱼虾、还有别的。”

“我知道，还有大米、橡胶。但是，连东条在内，都糊涂。”

中西功笑了：“什么意思？”

佐山笑着：“我不怕你把我写进‘满铁，调查报告去，我受过伤，得过铜牌，我敢说，东条也糊涂。我们用那么多钱去打仗，如果用那些钱买下蒋介石和他周围的将军们，也就买到全中国了，我们的军队，等签订条约以后，开去治安就可以了。到那时候，他们起来反抗，军队就开机关枪镇压，中国人本质上有奴隶性，打死他几千，天下太平！”

中西功“哈哈”大笑：“你这法西斯。”

佐山也认真地笑起来：“法西斯是好东西，能稳定政权。所以我反对浪费士兵的生命和炮弹去占领。只要用钱得法，连美国也能买来，根本不用和他们谈判。”

“你也听说和美国谈判了？”

“我姐夫在军令部供职。”

“噢，我们真的要和美国谈判？”

“好奇怪，怎么不是真的？我赞成谈判，但是我更主张花钱。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把钱都花光了，所以我只得赞成谈判。”

“可是现在我们准备向南方作战了。”

“所以，糊涂，都糊涂，总参谋部又下令征用民船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战？”

“不知道。我才不管他那些呢，我已经赔出一只眼睛了。现在用一只眼数钱，我总担心看不清，数错了。”

“这是很重要的。你应该打听一下，和美国开战以后，美国空军会来轰炸东京。如果说你想到上海去开书店是为赚钱，不如说去躲避空袭更实惠。”

佐山眨眨眼：“我没想到空袭。”

“如果在开战以前你能离开东京，最好。这是我作为同学对你的忠告。”

佐山瞪大眼睛。不响了。他那只真眼珠的闪光，像在思考。

中西功又诚恳地说：“真的，是忠告，据我从‘满铁，得到的消息，开战是不可避免了。你不妨问问你姐夫。他也许会知道开战日期，你问清楚了，可以早点离开东京。”

佐山思索着轻轻点头：“对。不过，开战的日期，他会知道吗？”

“他在军令部怎么会不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

“通讯参谋，收发电报。”

“哟！重要职位。掌握机要，他肯定知道，只怕他不肯告诉你。”

“不会，只要他知道，我一问他就会说。他从不对我保守秘密。”

中西功暗自高兴。想不到，这里竟发现一条渠道。太好了。他和佐山直闲聊到中午，请佐山大吃了一餐。他自己也胃口大开，几杯酒下肚，佐山答应他，去找他姐夫问清对美国的开战日期，立即告诉他，以便他在上海帮佐山找房子开书店。继之，两人卧区起“美好的少年时光”了。佐山突然哈哈大笑，摇头对他说：“你还记得我们那次春季远足吗？我跌了一跤，我说脚脖子痛，不能走了，全班轮流背我爬山，你们这些傻瓜！”

中西功也陪他开心地笑。

日本在明治以前，是个闭关锁国封建落后的国家。维新以后，师法西方，学科技，造舰艇、建海军、炼铁造枪炮。用封建野蛮的武士道训练、驱使士兵，教育他们把为天皇而战死视为神圣，视为日本臣民的天职。其目的都是为了向海外掠夺。台湾、澎湖、朝鲜被日本地图相继标上“日本”两字之后，发动侵略战争以富强便成了日本的国策和活命符。西邻的“支那”，军政混乱不堪，官僚腐败无能。派出几个陆军师，开了几炮，便得了满洲那一大片土地。再派十几、二十几个陆军师，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小城市和周围地区——半个中国。军事取胜的速度之快使扶植傀儡政权都来不及跟上。他们的谍报工作干得也很出色。在中国军队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上，连偏僻的小山村都画得清清楚楚，甚至哪里有棵树，哪里有口井，都标画得甚为准确，令中国人大为叹服。对蒋介石集团的各派人物，他们也有各种渠道信息沟通，或收买，或诱骗，每每也都得手。但是对中共的谍报力量，他们却一无所知。即如现在，中西功竟能在东京大街上走来走去，在军报道部，在银座闹市，谈笑问进行刺探活动，这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对此，不能用警视厅大忙作解释，只能说他们狂大疏漏。

中西功到东京去了。程和生日夜提心吊胆地等待，中西功行前曾对他说过，大概三五天即可归来复命，想不到八天过去了，还不见他的影子。这几天，他凭着特别通行证，在日清码头转来转去，每有船只自日本、大连或别的地方来，他都要仔细地看每个登岸旅客。渐渐地，他发现有几个人也像他一样，总在码头附近活动，这几个面孔，他熟悉了，派倪之骥去调查，回报说是“蓝衣社”的。“蓝衣社”陈恭澎等被捕去的14人，全被汪精卫的“76号”收买了。不知他们在码头有何美差，是专来等候中西功的吗？过度的紧张，使他有点神经质了。因为，据他看来，这几个家伙，对旅客们并不特别注意。仿佛有眼线在后，专候什么人。或者他们在等候香港或广州来的新朋友登岸？

中西功走后，他没再去见老吴。除了担任中西功和老吴之间的联络外，他还担任着南京情报站和老吴的联络。南京情报站，也有个专职联络员，每隔三天，由南京到上海一次，传递南京站送来的情报和消息，领取者吴对南京站的指示。这个联络员叫张明达。自从中西功走后，他们已经会面两次了。今天又是该会面的日子，他决定下午到闵行路张明达家去一趟，张明达上午由南京坐车，下午到上海在家休息。

他到张家时，已经下午五点了，意外，张家人说“他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他不由紧张起来，出了什么事？天都发灰了，快黑了，

怎么还没回来？

他走出张家，在街上游荡。时而走进小店铺借买烟买火消磨时间，时而在街边巷口穿过，不失时机地向张明达必经之路扫一眼。直到6点，还不见张明达的影子。

是不是暮色中错过了？他决定再到张家去看看。

踏出一家小店门，前行没几步，忽见张明达在他右前方大摇大摆往前走，中等个头，斜挎的大帆布包特别显眼，这个身影和装束他特别熟悉。快走几步，赶上前，待和张明达走并了肩，见四下无人，便低声问他：

“怎么才到？”

“戚墅堰的铁路给‘老四’扒了。”张明达声音里含着笑，脸上也笑咪咪。

“我当你出事了呢？”

“我出事？”张明达语调带着傲气，转头看他一眼，脸上还是笑咪咪，他这笑咪咪，含有很多内容，是乐观、信心、大胆，对人友好的综合。他的大胆，可不是北方人说的那种“愣头青”，是南方人说的那种机灵、精明。这是生活磨炼出来的。

他已经26岁了，但是这张笑咪咪的娃娃脸，很容易使人把他误看成个失业的中学生。

“有什么事？”程和生问。

张明达把一本日文的《中央公论》递给他。他俩都知道，那上面有南京站密写处理的重要情报。然后张明达轻声说：“老李叫问，听说东京出了事，上海知道不？是真是假？如果是真，我们采取什么对策？”

程和生低声答道：“派人调查去了。还没回来。不管真假，你们要提高警惕。有了消息就告诉你们。”

“好吧，还有别的事吗？”

“告诉老李，上海‘蓝衣社’14个人叛变投敌了。你们南京要注意。”

“知道了。”

就这样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两人在吴淞路口分别各走各的，程和生回自己住处，张明达回家。

在许多描写地下工作者的作品里，尤其电影、电视里，作者们往往给人物过多地涂抹些神秘色彩，同时，又多在情节的紧张上着力渲染，主人公如何在危险的九死一生中取胜等等。不必否定艺术创作的需要，但过分了，便常弄巧成拙，从漏洞中让人们看到了虚假。其实，地下工作，岗位明确，任务明确，关系明确，各司其职，出于对同志的无限信任，越是长期隐蔽，工作越是顺利。以这两位联络员而论，他们只管联络，传达情报，上通下达。情报由情报员去搜集。他们像行政人员管理业务干部一样，作情报员们的后勤；他们的联络，有时非常按部就班，按时见面，按时吃饭、睡觉。当然他们也逛闹市、下饭馆，春秋也作郊游。不过，那都是提前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是他们完成任务的一种活动形式。

张明达是浙江慈溪人，贫困的家庭生活，本来难供他读书，不幸又父母双亡，12岁时，跟随乡亲从宁波坐船到上海，经同乡辗转托人介绍，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谋生。

说起来，中药铺应当不同于一般手工行业那样有各种封建陈规陋俗，而有文化行业的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然，学徒第一任务是无休止的劳动，搬

晒药材，铡切药材，炮制药材，药材、药材、药材，每天夜以继日地在药材堆里忙碌，满身汗垢，疲累不堪。还要给客户煎药、送药，还要手里捏个“折子”跑熟悉的商号给“先生”买茶叶，买水烟。三年“出师”除了贴在药柜上的各种药名还熟悉外，没学到一点医术和别的文化知识。什么学徒！出师！就是药铺拣个12岁的孩子干活，童工！

三年出师的张明达，只觉得两手空空，前途茫茫，无路可走，还得在药铺里继续“学徒”。三年间的社会见闻，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直觉地感到，人没有学问，便不会有生路，不会被人尊敬，更不会有社会地位。恰在这时，他从《新闻报》上看到厂职业教育社举办职工晨校的招生广告，并说经济困难者，可以少收学费，他立即去报名。

发榜那天，他跑去看，竟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他大喜过望，从此，他每天早晨6点前到晨校读书，8点前返回药铺干活。

但是东家说这“有犯店规”，请来他的介绍人，当面打了他一顿，申明：再去念书，便要逐出店门。

张明达挨一顿打，换来的却是打掉了念书求知的机会，他越想越觉得这世道太不公道，天下哪有不让念书的道理？这里就有。如果从此不念书，便只有在这里继续为活命而卖苦力。若要去念书，便要逐出店门。他想与其让你逐出，不如我来辞职，看准丢脸，看谁体面。人都有起码的自尊心。他到职教社找他的潘仰尧老师求援，把情形一五一十讲个明白，潘老师听罢，流露出非同一般的同情和愤慨，特意托人把他介绍到虹口舟山路胜达呢绒厂当了一名“练习生”。从此，他可以有较多的钱买书和有较多的时间来读书了，还可以到职教社图书馆去看各种藏书。

到图书馆去看藏书，大开了张明达的知识眼界，帮他学会了对社会各种现象做分析，他像突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对社会道德美丑善恶区分明白的知识世界。他如饥似渴地不放过一点时间去图书馆，在那里他结交了几位理想、志趣相投的各种年龄的朋友，在与这些朋友交往中，他又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为推翻他所痛恶的旧社会而努力、而献身的有主义、有理想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奋斗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理想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压迫。在眼前的中国，第一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叛变孙中山革命的蒋介石。此时的他，已经不再计较对无知的药铺店东那点个人怨忿和不满了，他的眼光看的是整个社会，要根除社会的病源。这是他在药铺学徒三年，和医药打交道三年从没听说过的中国的“大病”！

为此，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这头一年的秋天，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侵华战争。蒋介石的不抵抗，激怒了全中国老百姓。在席卷大上海的抗日浪潮中，他参加罢工，参加游行，参加义勇军训练，誓死以身报国。翌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击。上海商会组织“上海市民义勇军”，年仅16岁的他，人还没有步枪高，走上最前线，爬在堑壕里，配合156旅翁昭垣部，向日军开火射击。

张明达所见到的翁昭垣，是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指挥部队谨慎而坚决，说话温和，却斩钉截铁。由此，他相信，在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军人中，民族大义是非常强烈的。可惜，他们都奉行军人不问政治的老传统。他们认为政治是政客们在政府、在幕后活动的手腕。他们厌恶政客，也便厌恶政治。虽

然他们也参加国民党，但在他们的概念里，那是当军官必不可少的，像佩在胳膊上的臂章，是上级按军衔发给的一种待遇。所以在战场上，张明达和任何一位军官谈论政治。也没那时间和心情，也没有那必要，大家对侵略军开火。守住分给的阵地就是了。

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华北步步蚕食。中国人的抗日怒潮逐浪高涌。张明达在这汹涌激流里，从未停止过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抗日。日军占领上海郊区和南京后，他背起驳壳枪，参加上海近郊游击队，再次和国民党武装并肩作战。可是没想到“友军”的头儿戴笠竟那样坏，暗中勾结了日军，一支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小队伍，被日本飞机炸了个死伤惨重。这使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诚意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1939年夏天，他奉组织之命到南京朱雀桥北堍开了个小百货店作掩护，接收在“中华联合通讯社”任首席记者的陈一峰送来的情报，处理后，送上海情报科联络员程和生上送。这是南京情报站的初建阶段。

张明达本来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习惯大规模群众运动。搞街头宣传，工人罢工游行，学生罢课请愿，他都走在前面。在人头攒动的大会上演说，举行飞行集会时，他带领群众在敌人的警察、特务包围中高呼口号，散传单，与敌人徒手搏斗；打反共的白俄报馆时，他怀里揣里铜板，蒙过警察检查线，一声令下，用铜板砸白俄报馆的印刷机。后来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和敌人明枪明刀相对，用机关枪手榴弹拼杀，他更展眉舒气。现在突然转到隐蔽的情报战线，他着实不习惯。

但是没办法，这是组织决定，他得服从。严格的纪律约束，使他不得不收敛一些锋芒。随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造成他性格的急剧变化，由外向转内向。办事先看三步棋，小心谨慎，不能多言多语。由于先天性格是明快爽朗的，受到这种压抑，使他在言行表现上常发出突然的爆发性，使周围人觉得他脾气火爆，甚至古怪。

每次，陈一峰送来情报，他得连夜处理。把原件烧掉，然后送到上海交给程和生。他很矛盾，一方面，他从看到的情报中得知了这些情报的重要内容，看到了这些情报的重要价值，也看到了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然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憋得慌。但是，还是那句话，没办法，只得强制自己去习惯。后来，他又渐渐发现两大工作问题，其一，为送情报，陈一峰必须经常来光顾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店，一次来买条毛巾，再次来买包香烟，三次四次没完没了的来买些小零碎。这对于一位西装革履，经常活动在上层人物中间，进出高级机关、大饭店、跳舞厅的堂堂“中联社”首席记者的陈一峰，不是太不合身份了吗？容易露马脚的。其次，隔不了几天，他必须到上海去一趟。开始，可以对左邻盲舍放风说：“去进货”，“去兑付款项”，但是，次数多了，难免引起邻居们议论：“张老板怎么老往上海跑？”“有多大的买卖？进了多少货？”“有多大款项可兑付？”诸如此类的猜测，会引起更多怀疑。起码，“这位张老板真是靠这小买卖谋生度日的吗？”这又会引起更多的议论和猜测。中国人对邻居的观察和议论，比对他们自己的病体安危还要关心，这也算是一种传统吧。

缘于这两种考虑，他向组织上提出，经陈一峰活动，终于进了“中联社”。担任该社由南京到上海沿途各城市分社分发新闻稿、公函、资料的传递员，也称为“联络员”。他臂戴臂章，身穿制服，挎着“中联社”的大帆布公文包，上火车由“中联社”派摩托车送到站，走日伪军政机关高级官员专用的

通道，不受检查。沿途各站的“中联社”分社，则派专人按火车到站时刻进站接收新闻稿件等，到了上海，又有专用通道可走。日伪军警宪特没人过问，十分安全。

“中联社”雇有三个传递员，他是其中之一。三人轮流，每三天往返一次，休息一天。

但是，任你怎样巧妙，天下没有绝对安全的对敌工作，现在他就碰上了“事儿”。

他前次从上海回到南京，第二天休息。他租房住在复兴路“中联社”南隔壁八条巷2号院一家小房里，这里西斜对过是陈一峰等“中联社”高级职员的4号院。往东北不远的小火瓦巷里，是情报站站长老李开的中医诊所，走动很方便。他按例定时要到老李的诊所去联络一趟。巧不巧？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穿伪军中校服，肩章金线熠熠，佩把金光闪闪的短剑，见了他，笑嘻嘻迎上来，紧拉住他的手，连声说：“啊呀，怎么在这碰上你！咱们多年没见了。”

他仔细一看，猛地想起，此人名叫段天柱。当年在上海职工教育社图书馆里，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共青团。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到苏南去搞武装，再没见到他。

“噢，噢，老段！”他忙陪出笑脸，也紧握他的手。

“什么老段！嗨，我们都还年轻。你怎么在这儿？”段天柱颇诚恳地说着，上下打量他。

“那你怎么在这儿呀？人是活的。”他努力用别后重逢的情绪笑着反问

他。

“对对，唉，真是两山碰不到一起，两人能碰到一起，怎么样？现在干什么呢？”

“我能干什么？你想想看，中国这么个形势。”

“是啊，我也是。嗨，走吧走吧，好久没见到一位老朋友了，今天我请客，走吧走吧。”

“哪里去？我还有事呢。”

“哎，什么要紧事？不给点面子？走走走。”

从段天柱邀请的诚恳态度和语气里，他看出了他心里有某种不愿表达的私密。也可说是他隐蔽着的一种和他的隔阂、距离，但毕竟又是老朋友，原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这是一种什么私密呢？张明达一时还判断不出。共青团员们，都转成了共产党员。根据组织分配，大多转入各自的战线。也难说没有失去关系的，脱离组织的，走上各种道路的。汪伪军中校不值钱，可也不是随便可以拿到的军衔。没有重要关系，不送点够分量的礼，能当上中校？

段天柱是党组织派去的？从他见面后的一笑、一语、一握手的神态看，不像。

张明达心里马上决定：不管他是党组织派去的还是什么原因投靠了汪伪，眼前唯一要作的是赶紧脱离他。于是极为诚恳地道谢：

“啊呀，谢谢谢谢，我确实有事。”

“有事也得吃了再走。”段天柱紧拉着他的手，死拉硬拽地朝着一家饭馆走。

这使张明达起疑。心中顿时暗想：他这样紧拉着不松手是什么用意？怕

我跑吗？要把我拉到个饭馆蹲起我来他去报信？

“没那么便宜的。”他心中自明：“现在硬走，于情于理都不合适，说不定反会引起更难处置的局面，好，且看你把我怎样。”

他跟着段天柱进了饭馆，被堂信招呼在一张桌旁。直到这时，段天柱才松手放开他。两人对面落坐，段天柱便招呼堂信，要现成的酒菜，要现成的米饭。他对堂信说：“我们有事，要快。”

从进饭馆到堂信端来酒菜饭，段天柱始终没对他说一句话，只用手反复去擦抹筷子碟子，转头转眼东看西看，偶而向张明达笑一下，看样子是想说几句什么话，却又找不出什么话来说。

张明达也随着他的眼光在厅堂内东扫西扫，见不多的餐桌上，没有几个人吃饭，从那些人的衣着举止看，不像是传说的蓝衣社之类的人物。相反，大家见这位中校上场，都敛声息气，吃罢饭便匆匆会账离去。张明达又在心中盘算，第一，不能让他离桌而去，他走到哪里，跟他到哪里，找机会脱身。第二，看他说什么，来初一，去十五，随他怎样，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即使他提到职教社图书馆的往事，也给他一团迷雾。第三，不问他现在何处，干什么。

酒菜饭来了。段天柱挺挺胸膛，仍如旧友重会，说声“来吧，”动手给他斟酒。又给自己斟满，举起杯，对他照一照，先自一饮而尽。又斟满杯，举起筷子，像“蚂蚁戳大垛”那样吃起来了。

于是两人“闷头大发财”，猛吃快喝，转眼间，一餐饭吃完了。段天柱把两张军票放在桌上，对他说：“你不是有事吗？咱们各奔前程吧。”

张明达点点头：“好的。”

两人出门便分手。

张明达没有到小火瓦巷者李那里去，在街上左转右绕，直至确信没有跟踪的，才回去。

他没把此事向老李讲，这算什么了不得？不期而遇罢了。以后走路多长个眼就是了。

孰料，今天在火车站竟又碰上了他。张明达换了出差的行头，穿制服，戴臂章，挎大帆布包，走在专用道上，猛抬头见他 and 一群校尉军官簇围在月台上。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得用眼光向他招呼，他竟像没看见。张明达便径自上了火车，隔窗望见他也和军官们上了后节车门。张明达盯着车厢后门，直到开车，又往前走过两节车厢，找个座位坐下。车到镇江站，他下车把新闻稿件等交给分社前来接站的。又故意送了送接站的，结果自然是按预想的漏乘了。在镇江站游荡一个钟头，换乘了下班车，到常州南戚墅堰，车停了，站上说：“到横林不通了，各位自己辛苦吧”。他便随乘客大流沿铁道走，总悬着一颗心，怕段天柱他们走得慢碰上，便故意又走在最后。边走边欣赏游击队员们的破路成绩，铁轨都搬走了，枕木一根也不见了，路基这儿那儿的都是大坑。人民的力量，在这里显示出来，不知段天柱和他的同伙们见此有何感想。反正他开心。在横林又上车，到了上海站，他先在站内各处观察一番，未见段天柱的影子，出了站便穿街过巷走过街门洞，直绕到天黑，两条腿也实在累了才回家。

所以程和生见面对他说：“我当你出事了呢。”他才自信得骄傲他说：“我出事？”他真想大笑一声。他现在担心的倒是老李叫他问程和生的那个口信：“听说东京出了事，如果是真的，我们采取什么对策？”

东京出了什么事？这消息是西里龙夫还是汪敬远得来的？怎么个底细，他都不知道。老李叫问，作为联络员，他便问；程和生怎么答，作为联络员，他回南京便怎么答。

当然，如果是真的，若牵连到南京情报站的话，不管是谁，都要百倍警惕。张明达一路都在想这个。

南京站提出的问题，程和生作为联络员，直接回答张明达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正因是联络员，他必须报告老吴。

他去见老吴。说了南京的提问，随着问老吴，怎么回答他们。还交给他一份密写了情报的《中央公论》。

老吴沉思半晌，低声说：“大概是西里龙夫听到了什么消息。”

“叫他们做些准备吧？”程和生问。

“准备什么？”老吴抬眼问他。

“中西功到现在没回来，我担心出什么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

“这还要说吗？”

“要相信他，他在东京关系多。”

“只怕正因为关系多，才容易出问题。”

“不要老往坏处想。他是很精明的人，出问题也是在东京出，他不会扯出我们来。要相信他。”

程和生不说话了，心里憋气。怎么可以这样对待问题？把中西功推到最危险的边缘。要说那是去完成任务，没说的，组织决定嘛。但对整个情报科的所有同志们呢，不及早作一点安排，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南京提问，当然是由于西里龙夫已经得到了什么消息。西里龙夫是个很严谨的人，除了供应情报，平时从来不给组织上找什么麻烦，这样一位日本同志，万一出了事，怎么给上级交代？还有，南京的汪敬远，整天闷在汪精卫公馆里，不叫他做个准备，出了事便措手不及。程和生终于耐不住，冷脸问道：“汪敬远呢？给他通报一声吧？”

“通报什么？情况还没查清，先把自己搞得人心惶惶？”

连续吃批评，程和生决定再不开口。

老吴也不开口。两人沉默了一阵，程和生告退。老吴叮嘱了一句：“不要耷拉个脸。这种时候，你的脸色很重要，他们都是些聪明人，看见你的情绪，就知道我的情绪。”

程和生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脸色好看，锁紧眉头在街上逛了一阵又赶到日清码头。东京的来船到了。码头上顿时熙熙攘攘，接客人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工、维持秩序的海关人员你来我往，乱成一团。

船抛锚了，磨蹭了好一阵，才停靠好。有人下船来了，男男女女，各色人等，多是日本人，行李都很简单。人流的密度比较大，只见许多的人脸，拥拥挤挤地向他走来，忽然在拥挤的人流里，出现了穿着制服的中西功手提咖啡色软牛皮包稳步走来。待走出检票大门，他忙迎了上去，向中西功深鞠一躬，眼泪都几乎掉下地了。

“先生，您回来了。”他伸手接中西功的提包。

中西功很激动，也向他点头致谢，急不可待地问：“您好吗？”

“很好很好，谢谢。”他转头招呼黄包车，顺势抹了下眼泪。扶中西功上车，低声问：“身体好吗？”

“谢谢，很好。”

“辛苦了，辛苦了。”

两人坐车到了留青小筑 28 号，惠子高兴得围着中西功转来转去，方子在厨房忙烧水、做饭，中西功执意留程和生一起用餐。程和生边笑边抹眼泪，说：“先生回来了，我不喝酒已经要醉了。”惠子莫名其妙，张眼看他，用不通的中国话问：“这种酒，不喝，有？”

饭后，中西功赶走了惠子引程和生走进书房。两人好像刚见面，紧紧地握了手，程和生忙问：“朋友们都好吗？”

中西功苦笑一下：“很不好。”

程和生吃一惊：“出事了？”

中西功点了一下头。

两人相视一眼，沉默片刻，程和生又问：

“见到那位白川次郎了？”

中西功又苦涩地一笑：“没有。”

两人又沉默了一刹，中西功轻声说：“不过上级给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应该说不虚此行。”

“这就安排你和老吴见面吧？”程和生一听大喜。

中西功轻摇手：“不忙，有个要点，我还得查一下。不过你可以先告诉他一声，我回来了，免得他挂念。”

程和生听了，心中又不免有点伤感。今天他看到了老吴和中西功两种脸色和感情。一个是可以解释为冷静的淡漠，一个是明明白白的热情。作为两者之间的联络员，叫他怎么评说呢？

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跳出个人圈子，就完成任务的角度而论，也许不能不承认，老吴这种淡漠也是一级领导在特定形势、条件下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地下工作，哪有缩手缩脚或者嘻嘻哈哈、纠缠个人感情，可以完成任务的？这样一来，他心平了许多。不过仍旧对中西功说：

“如果你需要的时间不长，暂时也可以不告诉他，反正你已经回来了。”

“不长不长，今天下午我就查一下。”

原来，在东京，中西功把探知日军“南进”发起战争日期的希望最后寄托在佐山伊之助身上。三天内，先后两次去和佐山聊天，帮他卖书，和他谈如何到上海开书店，最好在开战前佐山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孰料，佐山竟对他笑道：“我姐夫说了，开战不开战还没定呢，也许明天就对美国佬开火，也许永远不打他们了，得看和他们的谈判。美国答应我们的条件，就不打他们；不答应，就不客气。还说，这种秘密，不要我问。他说现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谈话不小心，就会被俄国间谍听去。我姐夫是个一心向上的人。”

中西功哈哈笑：“你姐夫是个神经病，他没说你可疑？”

佐山也笑了：“没有。”

中西功在佐山书店应付到中午才告辞。正像俗话说的，无巧不成书，在回“千代”旅社的路上，他撞见了军报道部的佐藤癸二，佐藤脸上油黑，胡茬很长，斜背个皮囊，穿军装，没戴帽子，两人相视良久，才都露出笑容，继而惊喜地互相握手，互相问好，中西功抢先问佐藤：“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

佐藤先是愣怔了一下，继之仿佛明白了这位在“满铁”的朋友是掌握全

盘军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说：“没有。在等待，看谈判。驻德国的来栖大使已经到美国去帮助野村特使了。谈判最后日期在月底，到 30 日为止。内部消息说，没有成功的希望。海军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完毕，我想要到那里去，没批准，今天还得回台湾。”

“噢，”中西功紧握佐藤的手：“祝你得到功勋章。”

他真高兴，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佐藤说得具体，情况基本摸清，但是还需要查对一下，他估计在他逗留东京期间，在“满铁”收到的“编内参考”里，会有这方面的消息。

从留青小筑出来，程和生送中西功到“满铁”，自己回拉都路住处休息，连日来的紧张疲惫，使他几乎支持不住了。

中西功进了“满铁”，一头扎到资料研究室。匆匆翻阅近期内新到的各种“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军部通报”、“军密”、“绝密”、“机要”……

终于找到他需要查对的条目了。在 1941 年 11 月 6 日的《编内参考》上，“对美国谈判要领”栏内，刊载“来栖大使今日飞香港转美，协助野村特使与美国谈判，详细申明日本对美谈判条件之最后让步，坚决要求按甲案迅速达成协议。对美方徒尚空谈的非现实态度，要促使其对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认识，谈判以 11 月 30 日为限，不再拖延……”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刚才，他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密件里，也看到了这个“以 11 月底为限。”那里是这样写的：一、以驻满洲、朝鲜的 16 个师团对苏戒备；二、按既定方针对中国作战；二、对南方，以 11 月底为限，加强对美英的战争准备……

还有，他拿过纸笔，重新翻出“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一条，匆匆抄录下：

坂田中将，三个师团，泰国；
今村中将，三个师团，马来亚；
本间中将，四个师团，菲律宾；
寺内大将，二个师团，香港。

摘抄完毕，把原件放回原处，在椅上坐下，点燃一支“大炮台”香烟，缓缓吸着，沉思。看来，战争在 11 月底、12 月初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战争第一阶段将是极其猛烈的……日本海军将重蹈陆军命运之路了。……

由此，他已经看到日本的未来了，那个必定惨败的未来：陆军散在中国大地，海军沉没在无边大洋里……

日本……

无论怎么说，这是他的祖国，他的男女同胞们已经饱尝了战争的灾祸，还要继续往毁灭的深渊撞下去吗？……

要尽早把这个情报发走，让美、英、荷兰及早采取重大防范措施。让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领袖们共商大计，扑灭这个即将燃烧的爆炸引信，制止这场新的重大罪恶，拯救日本人民……

他略事收拾，打个电话到“特别调查班”，叫程和生到留青小筑 28 号等他。

回到留青小筑 28 号，程和生已经坐在书房里喝茶。

“先生。”程和生站起身躬迎他。

他向程和生伸出手，按一按，示意他坐下。

他也在书桌前落坐，却见桌上放一册《中央公论》杂志，又听程和生轻声说：“南京给您的。”

他翻开杂志，里面没有夹带什么，知道是西里龙夫给他的密写件。仔细地寻找，找到了有标记的一页，撕下来，进行浸水处理。在印刷字行间便显出了西里那快笔疾书的字迹。他不得不仔细地擦擦眼镜，他是个高度近视眼，西里龙夫从未想到要照顾他这个生理弱点。

“中西君：近卫倒台，尾崎秀实君境况如何？甚为悬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牵梦绕，不敢设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为助君功成，特将我日前应邀参加‘总军’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来的点滴资料奉告：

——关东军留 20 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

——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择捉岛卑冠湾”；

——11 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消息系参观团团团长酒后密告。不知是为讨好我这报道部顾问，抑或向我宣扬他广知军情？皆不必细究，然准确无疑。因该君虽已微醉，但口齿清楚，装腔作势地出言庄肃。”

他看完信，向程和生指点一下水盆，然后坐在椅上凝神沉思。

程和生会意地把信就盆里销毁，端起盆，进了洗手间。一阵冲洗水声响过，他搓着双手回到书房。

中西功陷入从未有过的、快速的思索运转中。西里龙夫的来信，从口气看，显然是在他回到上海以前。这个程和生怎么这么刻板，不立即交给老吴而留给我？这么重要的情报，竟压下来，设若我出现意外呢，岂不误事？！该批评。

但现在事情也不算晚，批评留待以后再说。

重要的在于：从他在东京实地见闻，到在“满铁”看到的新“绝密”要件上登载的《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和“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以及西里龙夫的信上所写的“资料”，三个方面互相印证，清清楚楚地说明，东条的南进作战，已经从口头争论，图上和沙盘演习，落到陆地和海洋上了。“以 11 月底为限，加强对英美的战争准备”，“谈判以 11 月 30 日为限，不再拖延。”

战争在 11 月 30 日后，不可避免要爆发。

即使此时，他也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自思自问：“是否会有某种转机？譬如，谈判达成某种可以避免战争的协议？……”

但他终于断然肯定：不会。日本政府对美国的所谓谈判，是握刀在手，逼美国结城下之盟。日本要坚持的日德意三国条约和在中国驻兵这两条，美国不会答应。没有受到一点战争创伤的美国，不同于中国。这一点，东条内阁不是不知道便是忘记了。

现在无需再想这些，对上级的答复已经形成了，事不宜迟。

“老吴这几天怎样？”他问程和生：“情绪好吗？”

“这几天，我说不清。本来，我今天应该去见他。南京送来这本杂志，指明是给您的。”

“噢。”

“您想见老吴吗？”

“越快越好。”

吴纪光和程和生西装革履的行头披挂，使爱得华七世路上“三福楼”饭

店的侍应生们小心翼翼恭敬有余，他俩拣了雅座单间，点了酒菜，吩咐下去，不得打扰。准9点，中西功按时到达。

吴纪光第一眼看到他，心下便泛起难以名状的高兴和感动。从他的笑容、眼神都看得出，他没有空手而回，对他的希望没有落空。

他忙迎上去和中西功握手，连声向他道“辛苦”，直到安排他坐定，才在他对面坐下，亲自为他把盏斟酒，笑道：“为你接风洗尘。”

程和生观察过左右房间，向他们点头示意。中西功开始谈他的东京之行：从社会市民对南进的议论到军报道部记者们分散到各部队随军采访战争动态；从佐滕癸二说的和美国谈判最后期限到月底的内部消息，到“满铁”《编内参考》上的“对美谈判以11月30日为限”和《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上的“以11月底为限，加强对美英的战争准备”，还有西里龙夫信上说的三条“资料”；最后，把抄录下来的“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的纸条递给了老吴。接着，提出了他对于答复上级的个人意见：

“战争不可避免。日美谈判不会达成日本所要求的协议。”

“具体日期呢？”吴纪光最关心的是这一点。

“这是很明白的，谈判时限一过，日本就要实行对美国的攻击。同时向泰国、马来亚、菲律宾、香港展开全面的东南亚战争。”

老吴默然了。在他看来，中西功并未确切地回答开战日期。而只是一般地推理：谈判停止，战争即将开始。这样答复上级，欠妥。

中西功好像看出了他这一点，轻声道：“我算了一下，从海军航行时间，到地球东西两方时差，日本若对美国攻击，时间将在12月7日。”

老吴暗吃一惊，脱口而出：“12月7日？”

中西功重重点头：“12月7日是西半球美国的星期日。”

“星期日？星期日有什么特别意思？”

中西功嘴角泛起一丝笑：“我们处在战争中，对星期日已经由于紧张而淡漠了。美国不，他们到现在为止，举国上下还过太平日子，星期日是上帝规定的休息日。这一天，政府人员不上班，工厂工人轮流休息，军队官兵照例放假，从进攻的一方面考虑，这是个应该选择的最佳日子。德国进攻苏联就是选择在星期日，日本也不会放过这个日子。他们更不会往后拖，海军每天要消耗4万吨石油，陆军每天要消耗1万2千吨，现在石油是日本陆海两军的血，东条不会等到发贫血症的时候再进攻。12月7日。最晚不会拖过12月7日。”

吴纪光心里有了底，不觉点了下头，又疑惑地问：“会不会在这之前？”

“会”中西功立即回答：“日本现在的谈判，不可信赖，利用谈判寻找开战的借口，是他们的老手段，也会用来对付美国。我还想到：现在的谈判，事实是准备攻击的掩护。”

吴纪光又点了点头。松口气，说：“好了，非常高兴，你真是辛苦了，可以说圆满完成任务。”然后向程和生笑一笑：“怎么样？”

程和生没言声，因为不知他所问的“怎么样”何所指。感觉里，仿佛他在说，中西功终于经过冒险而胜利归来了。证明他下的决心是正确的。

这时，中西功又轻声说：“在东京，我探明了尾崎秀实的事。他是因为苏联情报员佐尔格暴露了，警视厅先逮捕了他，后检举了佐尔格。因为尾崎是日本人，佐尔格是德国驻日大使馆的新闻专员，要经过德国政府同意，和他俩有关系的凡位朋友都因为被怀疑而被捕了。”

吴纪光吃一惊：“是吗？”

中西功点头。

程和生突然插话：“你和尾崎的关系不是也很密切吗？”

中西功点头：“是这样，我们无所不谈。”

程和生转头看看吴纪光，轻声问：“怎么办？”

吴纪光明白，他这是问怎么安排中西功，也就是是否叫中西功“向西去”。

关于这个问题，自从那次他向“小开”请示后，心中一直犹豫不定。“小开”当时不同意中西功向西去，无疑是从完成任务考虑的，现在任务完成了，可以交差了。下一步呢？叫他向西去吗？别忘记，“小开”也交代过，在白川次郎是何许人未弄清楚之前，不让中西功向西去。也就是说，不能在情况不明之前，轻易放弃情报科这个据点，这才是“小开”指示的精神实质。

程和生在等待回答，中西功在等待决定，怎么办？

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程和生向他汇报过，中西功此次东京之行，未能弄清白川次郎是什么人，因之不能让他向西去。关于这一点，他经过考虑，到现在也没有告诉程和生。第二，此事要请示“小开”决定。

于是他说：“要研究，好好研究，要向上反映。”

程和生说：“你得先拿主意。”

他斜睨程和生一眼：“那当然。”

中西功对他俩说：“现在我是在中国，如果在东京，警视厅根据我和尾崎秀实的关系，必定要拘审我，或者传讯我，至少要派人监视我。”

吴纪光轻声问他：“尾崎秀实会说什么不利于你的话吗？”

中西功想了片刻，轻摇头：“不至于。”

吴纪光又问：“别的人呢？”

中西功慢声道：“别的人，我想，也不至于。”

吴纪光又点头：“这就好。”

程和生急道：“但是我们不能不作准备。”

吴纪光又说：“那当然。”又转头问中西功：“你说呢？”

中西功说：“我们都要提高警惕。不妨失观察一段时间。当然，日本警视厅不会因为对美国开战便停止他们的活动，相反，会加紧。总之，我们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活动。”

吴纪光急问：“现在还有人可以供应你消息吗？”

中西功笑着摇头：“像尾崎秀实那样直接的，已经没有了。”

他想了想，又说：“应该把这些情况和北平方面通个信息。南京方面当然也得通知。”

吴纪光问：“你通知西里龙夫了吗？”

中西功说：“我写信告诉他了，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我们应该通盘研究一下，这方面，我还没想完全。南京离得近，好办些，我还可以和西里通电话。北平，我把情况通知尾崎庄太郎和白井行幸，程和生通知钱志行吧，怎么样？”

吴纪光转头吩咐程和生：“今天办。”

程和生点头，转问中西功：“你怎么办？”

中西功说：“想想看。要通盘想想。”

吴纪光看着他，也认真地沉思，点头……

当他们三人走出“三福楼”分手时，程和生决定陪送中西功回留青小筑。

路上，他们不坐车，边走边低声交谈，程和生问道：“先生，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我两次要你对他说对你安排的意见，你不说。”

中西功皱眉点头道：“我听懂了，倒是你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们是个整体，要想整体，个人是第二位的。……”

上海位于中国东海岸，长江之南，气候宜人，但是到了11月下旬时节，偶而出现的那种阴冷天气，也够人呛。这几天，连日阴云。越发使人们缩手缩脚，有的人家已经烧起炭火盆来取暖了。

傍晚，吴纪光按时走进法国公园西边那条幽静马路上的一幢颇有气派的房子里。一位市民服饰的大嫂见他进门，忙把一盆炭火端在方桌前地上，又端来一个漆盘，盘上放着一只茶壶和两只磁杯，摆在方桌上。然后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吴纪光曾在这里和“小开”见过面，也见过这位大嫂，但是互相没有开口说过话。

今天他来向“小开”汇报，报告延安所要的关于日军南进发动战争的日期。他在“三福楼”见过中西功之后，又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作了仔细分析，作了各种推断，最后结论都基本趋向中西功的意见：12月8日——西方的12月7日，星期日，日军南进战争将爆发。

他担心自己受中西功各个论点的影响，几次想另辟思考蹊径。其结果逻辑上部不通，结论仍旧是12月8日——西方的12月7日，星期日，最贴切、合理。

为使报告准确的系数稍大，他决定把战争可能爆发的日期定在三个时间，都是在11月30日以后，都是星期日，那就是12月1日、12月8日、12月15日。在这三个日子中，12月8日的可能性占百分之九十。

“小开”从后面的房间走进房来，穿套矮领灰呢中山服，像个汪伪机关高级人员。向他点头示意，让他坐下，然后把方桌旁的椅子拖向炭火盆，伸手在火上烘烤了几下，抬头看他一眼：“说吧。”

“他回来了。”

“唔。”

“看来情绪很好。”

“唔。”

“他作了全面报告。”

“唔。”

“我们作了仔细研究，根据他报告的内容，从几个方面作了判断。我认为可以向延安报告了。”

“唔？”

“日军南进战争最早可能在12月1日爆发。”

“是吗？”这么快？”

“考虑到大军团行动的各种困难，最可能的是在12月8日；最晚是在12月15日，但一般不会拖得那么晚。”

“那就是12月上半月。”“小开”侧起头，定睛思索。

“12月8日占百分之九十。”

“唔。为什么定在这三个日子？”“小开”问。

“都是星期日。”

“唔，”“小开”思索良久，像是自言自语地轻声说：“如果事态发展

证实这个情报，它将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愿各国人士能重视它。”

“我们应该迅速上报。”

“那当然。”

又过了一阵，他转头问：“白川次郎是什么人？”

“他说没见着，不知道。”

“那么，关于向西去他有什么表示？”

“他没提。倒是联络员程和生挺着急，我看这是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小开”沉思着。吴纪光觉得他那眼角的余光又在从旁瞟他。为证实自己的感觉，倾身向前凑了凑。

“小开”轻声说：“形势发展很快，斗争也会更复杂，我们应该从多角度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势。假设：日军在南太平洋得了手，疯狂之余，会不会发动北进呢？即使今冬不可能，明春呢？他们是战争狂人，不像常人理智。所以，你们上海情报科这个阵地不能放弃。明白地说，把这个阵地交给你，你就得守住。你要勇于负责。”说罢，扭转头斜眼瞅吴纪光。

吴纪光是个聪明人，听“小开”的口气，看“小开”的神态，心下已经完全领会这个指示的深层含意了。他向“小开”重重点了一下头。

“小开”也轻点了一下头。茶没喝一口便起身。

吴纪光随着站起身，两人握手告别间，吴纪光轻声问：“情报通给 21 号吗？”

他感觉到“小开”重握了一下他的手，那就表示同意了。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前后，根据国共全面合作的协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展开。当时中共在上海、南京等地公开设有“八路军办事处”，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就有“小开”。这里面当然也有对日情报的合作，由延安方面派来个情报参谋，与国民党在沪的情报组织进行定期会晤，但这个情报参谋虽属“小开”领导，而与绝密的中共上海情报科毫无关系。

前面所说的吴纪光问“小开”是否把情报通给那个“21号”，则是另外一条重要线索。他是中共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统内、现是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搜集中共所需的重庆方面的情报。他手下有 80 多人，配有四部电台，堪称兵强马壮。“小开”规定吴纪光只能通过以下绝密方式同“21号”进行联系，不得见面。即“21号”派出二名货真价实的军统分子，代表军统上海站同中共派出的代表合作，互相交流情报。但这两个军统分子，能力低，做不出成绩，被他们的同事们看作“玉石菩萨”，好看而不中用。这两人在活动中，又阴差阳错把吴纪光当成汪特的“调统员”了，想从他手里掏情报，主动拉拢他。吴纪光将错就错，和他们周旋，给他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他们认为，吴纪光情报方面有可用之处，但多是“马后炮”，长处是重朋友义气，不吝钱财。来往日子长了，竟真的有了感情，“老吴”长“老吴”短的亲热起来，关系日渐密切。常向吴纪光倾诉他们不被军统着重的苦恼，言外之意是想托吴纪光引荐，投靠汪伪，吴纪光怎能办得此事？

今天吴纪光经过请示，决定利用这两个人一下，把这个重大情报，提供给他们。因为我们的战略目的是为了推动重庆蒋介石抗日，也为通过蒋介石的渠道给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国政府发出警报，以便及时地采取措施，扼制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狂。因为军统有电台直报重庆，重庆可和美、英、

荷兰等国大使通报。

当然，这样做的附带结果是帮这两个苦恼的“朋友”一把。同时，为“21号”更加深入潜伏和地位的巩固实施了巧妙的帮助、策应。

于是，当天晚上，他约见了那两位“朋友”，明确告知他们：“据从高级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日军将在12月8日发起南进战争，你们赶紧报告上峰。到时候战争一打起来你们定会时来运转。”这两个人追根刨底问他：“那个最高方面？姓皇（指皇军）还是姓汪？”他笑笑说：“上海人王黄不分，莫再错过时机。”

那两个人立刻作了报告，他们的“上峰”问他们消息来源，他们故作神秘，不正面回答。这“上峰”从未见他俩有如此本领，将信将疑。但由于大家都在为日军动向纷纷猜测、活动；又见他们那有绝对把握的神态，便报告了更高一级的“主官”。这位“主官”转告了他的“正手”，这位正手一听之下立即拟稿发电，报给重庆，并建议迅速通告“美、英、荷盟邦”。

关于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准确日期的情报获取和传递的真相，在当时及以后，直至半个世纪后的现在，见于报刊的众多“回忆”和评论文章中，都未作过如实的、准确的、公正的叙述。原因很多，有的是根据某些人写的片段传闻，加以推理，想当然地信手写来；有的出于集团私利，故意掩盖真相，甚至编造谎言；有的为提高集团或个人的身份，节外生枝地捏造出一些情况，据为功劳。亲历其事的中共党员出于保密的考虑，对此一直默不作声。任凭种种政治家们去“创造”，去“自我欣赏”。

亲身从事这项情报工作的中西功、吴纪光及其同志们长期以来只在一旁微笑。

但是，有谁知道，他们的微笑含着多少艰辛和苦衷？！

第四章 珍珠港事件不可避免吗？

中西功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这份关系着万千人生命财产的重大情报，经过中共组织安排、拐弯抹角地转到了戴笠那里。戴笠闻讯，立刻亲自报告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榻上沉思半夜，凌晨3点半，急召宋子文，面授任务，令他立即通告美国驻重庆大使詹森先生。宋子文立即行动，直到上午9点40分方返回总裁官邸复命：

“詹森表示感谢。”

“他报告罗斯福总统了吗？”蒋介石急切地问。

“我告别前还没有。我想他当然要报告。”

“他们一定会有行动。”蒋介石口气肯定地自言自语。

“起码要对日本谈判团当面揭露他们的阴谋。”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几经周折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出的警报，准确无误——

1941年西方的12月7日，星期日，亦即东方的12月8日，星期一，日本以大量海空军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夏威夷瓦胡岛珍珠港。美国8艘战列舰和10余艘其他大型船只、20余艘中小型舰艇被炸沉或炸伤，180多架飞机被炸毁，美军官兵死伤3500多人，致使停泊在港内的美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同日起，日军先后开始对泰国、马来亚、香港、菲律宾、东印度发动全面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东条内阁所说的“大东亚圣战”。

日军暂时得手。山本五十大将登台表演，获得了法西斯阵营的鼓掌喝彩。

当然，无论从哪方面和任何角度去观察评论，“大东亚圣战”的爆发和发展都是日本以及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美国为什么不及早制止这场战争？

事实是：这个事关世界人类命运的重要战略情报发出后，除了对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红军起到些战略调整作用外，对于美国简直是石沉大海，毫无反映。据说，美国方面认为：情报来自中国，可靠系数不大，未予重视。

这出悲剧本可以制止在它发生之前的。

为什么未能制止呢？

二战结束后，从血泊里爬出来的人们对此发出了质问。

罗斯福说：“12月7日（日军）偷袭之事，其有关电文，早已被我‘魔术解码机’所截获。之所以不先发制人，完全是出于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引自松实让著《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日夜夜》）

舒尔茨1945年在“珍珠港事件联合调查委员会”上作证说：“战争爆发前，他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根本未谈及（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事），丝毫也看不出他们已预料到明天就会爆发战争的迹象。”

让我们相信他们哪个说的是实话呢？又怎么去理解他们这些话呢？

作为情报人员，取得情报是一回事，所获得的情报能否被重视而发挥作用，又是一回事。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军统人员，由于向“上峰”提供的情报准确，受到重庆方面重金奖励，并颁给了奖状，一下子身价猛增。他们此后便得到“上峰”的青睐，确实“时来运转”了。

由于情报来自“老吴”，他俩对吴纪光感激之深，便不言而喻了。尤其

这两人对“老吴”早已有些私交的感情基础，那以后便更加靠拢吴纪光，时有默契配合。

中共党员们微笑中所含的苦衷，还不止于他们取得的重大情报没有被恰当地使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还在于此后他们坚守岗位继续斗争所遇到的更严重的挫折和牺牲。

战争在中国海外远方的大洋里进行，在南京和上海，看不见海战，听不到铺天盖地的轰鸣，除了12月8日“同盟社”、“中央社”播发了“皇军赫赫胜利”的头版头条消息外，市民百姓照常过自己的生活。其中上海稍有例外的是，停泊在黄浦江中的美、英军舰，在开战当天清晨，受到了日舰的炮击。英舰“彼得烈尔号”被击沉，美舰“威基号”投降。继法租界之后，英租界也成了皇军的天下。

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几天，尤其12月1日以后，中西功坐立不安。连日来，听不到对美谈判有进展的消息。一清早，他便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东京广播电台的新闻，结果什么新闻也没有，只有“勤劳奉仕全民踊跃”“人造石油即将高产”之类的老调子。

他极为矛盾，希望自己对上级答复的情报是准确的，但是又宁愿担负“情报不准”之责，而希望不爆发日美战争。

他厌恶日本的侵略战争，更痛恨把日本推向毁灭的疯狂行为，曾在的一瞬间，他看到双方战舰炮火互射的场景，燃料油在海面上烧起熊熊大火，黑烟笼罩天空。落水的士兵们在大火燃烧的海面上挣扎，他们游动着，再也无暇厮杀；他们咒骂着，无力地沉下水面。

整个日本国这艘太平洋上的战舰，最终也倾斜着像要缓缓地沉下海去。

那时，日本国内没有一种能够扼制法西斯军阀集团这种战争狂的政治力量。这是日本的悲哀。

日子一天天地挨着过去了。过得那么慢，不见有开战的消息。中西功内心那难言的希望之芽又萌生起来：也许和美国的谈判已有某种进展，而已达成或可望达成某种协议了？

他又进入“满铁”资料研究室，看了新收到的《编内参考》，一下从头凉到脚。看来，开战是铁定的了。《编内参考》的一条“宫内讯”称：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宫中举行政府和重臣恳谈会，出席者，政府方面为首相、陆相、海相、企划院总裁，重臣为若槻礼次郎、阿部信行、广田弘毅、近卫文麿、林銑十郎、冈田启介、米内光政。若槻重臣持重告诫政府：“南进战争，若为求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开战宁败也无悔；若非为此目的而诉诸武力，则危险非常。”广田、林銑、阿部三重臣称：“既然政府决心已定，只好表示信赖。”经首相诚恳解释，全体重臣对政府开战决心，最后“表示谅解”。

他久久挺立桌前，喃喃自语：“开战是铁定了。”

12月3日，他又次派程和生去见吴纪光，传告：“战争将在12月8日爆发。”

这之后，直至12月8日，中西功再未到“满铁”去过一次。他沉默寡言。当听到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取得辉煌大胜”时，他竟麻木了，毫无反映。他不断地借故对方子发火，吓得惠子躲在房里一声不响。为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最使他难以理解甚至愤怒的是：他出生入死用生命换来的重大情报，竟丝毫未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他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语：“美国人愚蠢，蠢

到了极点！”这个怨忿是无处可出的，只能出在方子身上，方子默默地承受着。但她又何曾知道，半年之后，她即将承受另一场多么沉重、多么巨大的灾难！“大东亚圣战”在中国的连锁反应是日军为配合进攻香港，发动了第三次长沙战役，以第11军为主力，渡过新墙河，又渡过汨罗江，由于进展顺利，得意忘形，竟超计划地进攻起长沙来了。重庆方面早得到我方提供的情报，用十一个军对他们实行包围，几乎把他们全歼。

“大东亚圣战”在中国华北和华中战场的配合反应，是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讨伐”和华中的“加强清乡扫荡”。这些，上海情报科所属的南京站和北平站筹备组，早把情报送出。华北的我军主力部队成了“华北派遣军”日夜奔突的催命符，游击队更令他们伤脑筋，不知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军火仓库便会突然爆炸起火，连运兵火车和输送物资的轮船竟也会爆炸。华中的“清乡扫荡”，只能依靠皇军，天晓得李长江、任援道等汪伪汉奸军师长们为什么如此胆小，必要求皇军打头阵，这些“皇协军”也是“狡猾狡猾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情报科引起反映最强烈的是老吴，他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兴奋和骄傲。事实胜于雄辩，上海情报科的情报被证实了。眼见得美国对日宣战，世界形势从此剧变，在中国的日军不是东调西调，便是坐守孤城，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胜利就在眼前；对于东京逮捕尾崎秀实可能牵连到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一事，被内心的喜悦冲淡了。又不见中西功提什么意见和要求，判断日本警视厅也无暇顾及中国的上海、南京了。12月31日除夕之夜，他叫程和生通知中西功，请他选择时间，会一次面。1942年1月3日清早，程和生引中西功到了一处幽静的小屋。三人在火盆旁坐下来，老吴端详了中西功一阵，笑道：“好像瘦了些，要注意革命的本钱啊。”

中西功变得比以前沉静了，几乎是冷淡地说：“谢谢，大家都保重，1942年将是艰难的。”

老吴笑道：“1942年将是胜利的一年。”

中西功沉默了一阵，轻声说：“只能说是开始迎接胜利的一年。”

老吴仍旧笑着说：“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就完了。”

中西功冷脸摇头：“要有个过程。”

老吴不以为然，说：“过程是要有的，但这个过程不会很长了。”

中西功脸色沉重慢声细语地说：“日本入侵中国以来，都是陆军作战。兵员、物资消耗，都是陆军。海军还没有使用过。舰船、飞机都没受过打击，战略物资储备没动过，海上作战能力没有受过创伤，没有损失。这次偷袭珍珠港，应该说是取得了奇胜。美国损失很大，两相比较，现在日本海军在战略形势上暂时处于优势，这一点，我们不能回避。”

老吴却开心地笑起来：“但是美国已经对日本宣战了。他们有工业，比中国强，他们的军队还没出动呢。”

中西功点头道：“这也是事实。但是制造兵舰和飞机需要时间，尤其是航空母舰。所以说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艰难的。”

老吴沉默了一刹，语气断然：“我们不指望美国，日本不去打他们，到今天他们也不会对日本宣战。我们老早把情报送给他们，他们不相信。他们那怕放几架飞机，在天上瞭着点，摆几条兵舰在海上望着点，也早看见日本舰队了。他们睡大觉，好像中国人骗他们似的，活该！尽作发财梦，这下叫日本打醒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

中西功说：“美国参战对我们有利。”

老吴忙说：“我不否认，我是说我们不能指望他们。”

中西功又微笑着：“你还没懂我的意思，我们不能轻敌。”

老吴笑道：“我是气美国人投机取巧。他们本意想等世界战局胜败有个眉目了再参战，坐收渔利，现在是日本逼他们提前参战了。好了，说正经的吧，今天，一是给你贺新年；二是当面给你传达个上级的通报，表扬我们上海情报科了。去年日军‘关特演’和这次的情报，我们作出了贡献，延安非常高兴。这两次都是你直接工作。尤其这一次，亲自深入，我们得到荣誉，是你工作出色的结果。现在不可能给你援助，我先传达给你和大家，以后再说。我们的工作，取得多大胜利，也无法对外讲，只能任劳任怨地干吧。”

中西功微笑着：“我不要授勋，也不要宣传；我们不是为那个。”

老吴挺了挺胸，庄重地说：“胜利以后是要授勋的，我们得跟上级要个脸盆大的勋章给你挂上，然后在中国各地游行三年。”

三个人都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他们不由回忆起1941年的经历来，在1941年里，上海情报科空前繁忙。1月皖南事变，日军利用国共两党矛盾，在各地加强了武力进攻。4月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一时间，疑云密布全世界，各国政府莫衷一是。为此，吴纪光要求中西功作一次专题研究报告。中西功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把总形势向他作了详尽介绍和精辟分析。最后指出：日苏条约的签订，不仅是日本各阶层的希望，也是日本轴心派和英美派暂时妥协的结果。问题在于这之后，这个条约是受轴心派利用呢，还是受英美派的控制？现在在日本，已经因此而出现新矛盾了。松冈外相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而统治阶级却因此而感到恐惧。平沼联合近卫建立起来的英美派，镇压亲苏倾向，松冈在日比谷公园发表演说，平沼派人在底下散发小册子，捣乱，是个典型的实例。吴纪光听过他的分析后，颇为形势的复杂和变化的莫测而皱眉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西方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法西斯侵略和反法西斯侵略，在全世界搏斗。在这场大搏斗里，位居东方的上海情报科，默默地占据着她重要的位置，她的目光要全方位地注视着日本这个法西斯野兽。“关特演”闹了一个秋天，冬天却又爆发了太平洋大战……

他们说着说着，不知不觉间都变得沉默了。还是吴纪光突然笑道：“怎么了？我们不是说要迎接胜利的一年吗？这么闷着，像个迎接胜利的样子吗？啊？”

中西功沉默了一阵说：“我总是在担心。”

“担心什么？”吴纪光问。

“日本陆军会就此罢休吗？”

“你指什么？”

“当日本海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耀武扬威的时候，陆军会怎么样？他们忍受得了吗？会不会在春季化冻之前来个突然北进呢？别忘了，他们是军国主义，法西斯！”

吴纪光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上级表扬了上海情报科，消息传到分散各地的每个人。但也只是传到而已，准确些说，除了老吴谁也没把这当回事。他们都把表扬看作是上级的鼓励，份内应该完成的任务。大家都被日美开战后的形势变化所吸引。张明达每三天往返上海、南京一趟。作为联络员，他对上海科和南京站的各种情况

都熟悉。但是，牛皮灯笼心里明，对谁也不能说。只有到了上海，和程和生接头的时候免不了谈些与工作有关的话。

但是不知为什么程和生最近的情绪有点阴郁。说话常吞吞吐吐，好像变得胆小了。张明达则不然，日美战争爆发以后，形势变得空前剧烈，日本失败的前景已经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他高兴，本来被强压在内心的外向性格，不断地冲击他。但除了按时往返京沪外，行动上无可表现。只有到小火瓦巷老李那里的时候，尽量多坐一会，和老李及张敏谈论一番时局，心里才痛快一点。

美国人在珍珠港吃了大亏，继之又被日本夺去威克岛。这使他们自总统罗斯福至每个国民都陷入从未有过的震惊。罗斯福在震惊的同时，自然想到那份来自东方中国的警报，竟是那样地准确无误，实在使他深感意外。这之前，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没有哪一个方面是放在眼里的。尤其中国在抵抗日本军事进攻方面所表现出的脆弱、无能，简直不堪一提。至于说到战略情报方面，在他看来，中国既无人才，又无科技手段，充其量不过是制造些想像，目的是拖美国参战，然而事实竟如此地说明他们在这方面的巨大能量。由此，他从内心对蒋介石先生肃然起敬起来。所以，后来除了向中国派出军事联络组外，还建议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领袖们，委任蒋介石为中国战区同盟军最高统帅。由此可见，蒋介石从中西功的情报工作中捞到了实惠，他的国际声誉也因此有所提高。

蒋介石是何等样人？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个可以在历史上记一笔的人物。在他收到那份“日军将于12月7日发起南进战争”情报的那天当晚，他就想到：不管从哪方面分析，这份情报无疑来自与共方通气的左派，实际就是来自共产党。因为他对他手下的“中统”、“军统”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知底的。也就因此，他才辗转反侧了大半个夜晚，最后终于叫宋子文把这个情报告诉美国总统。因为，毕竟这是有关也有利于中国取得抗战胜利、有关也有利于蒋介石本人能继续统治中国的大事。

美国人因“珍珠港事件”而被“从未见过的、无耻的欺骗”激怒了，进入4月，竟用B—29轰炸起东京来。他们倒也真玩命，飞机受了伤，照样扔炸弹，汽油烧完了，或者仪表被打坏而迷航了，回不了航空母舰，便宜飞中国浙赣一带机场降落。有次，几个飞行员跳伞竟落到一家中国农民的后院里了。仿佛他们觉得到了中国，就等于回到了基地。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日军早看见他们降落了，就派出部队搜索。幸亏驻在当地的新四军紧急发起强力战斗，把他们抢救出来并辗转护送到他们的浙东基地。

美国空军的大轰炸，引起日本朝野震惊。东条们没料到，美国在短期内能投入如此强大的轰炸机群：来则遮天蔽日一大片，沉重的马达轰鸣声震得东京的木板平房打颤，那重磅炸弹，落地便是一个大坑，地皮颤抖，房倒屋塌。

争夺制空权，在空中是打飞机，日本空军作过殊死搏斗。怎奈美国护航战斗机太多，数量质量都占优势。在海上，要炸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也非易事。在地面，日本本上倒还无虑，主要是中国浙赣一带的机场，渐有被美国空军大量利用的趋势。这些机场的存在，几乎成了日本的时腋之患。大本营下达一道命令给“华中派遣军”：限期打通浙赣铁路，摧毁金华、丽水、玉山一带的中国机场。

命令被中西功看到，叫程和生转告了老吴。

南京的西里龙夫也看到了这份命令，一字不漏，全文抄给了陈一峰。陈一峰送给了老李，张敏用米汤照抄在一本日文杂志《文艺春秋》上，交张明达送上海。

这是太平洋战争发起以后，波及在华日军的第二个战役性行动。“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派驻上海的13军，沿铁路由东向西主攻，派刚吃过败仗的11军由西向东配合策应。

又到去上海的日子了，张明达一早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

老李名叫李得森，山东沂水人，身高体壮。老家原有200多亩地，靠地租吃现成。父亲担任过沂水县民团团长，在当地颇有名望。李得森念过私塾，学了三年北平中医研究院的函授，然后行医。日本侵略东三省后，他的国家民族意识强烈地表现出来，经同学介绍，参加了共产党，他巧妙地把县民团掌握在手，在组织领导和同志们合作下，又团结了红枪会、大刀会、浩浩荡荡数万人，横冲直闯反起省政府来。把个沂水县闹了个不亦乐乎。韩复榘出兵镇压，数万人被打散，他跑到辽宁。过了两年，呆不下去，又回了老家。老家地主劣绅要告发他，便跑到了上海。通过组织派在情报科工作。两年前，张明达到南京开小杂货店为掩护，接收陈一峰的情报，后来考虑到活动方式和陈一峰身份不相称，小店也不利于掩蔽，向上海科提出意见，恰好者吴决心整顿组织，决定在南京设个站，派他来当了站长兼书记。妻子张敏作他的秘书，负责处理情报。地点选在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这是座徽式建筑的院子。灰瓦、青砖、白墙、黑门、红柱，有正厅和厢房，院里有小假山。正厅用来行医会客，厢房用来起居读书。门外挂个牌子“世传中医李得森寓”。

时间尚早，张敏把处理过的《文艺春秋》包一包，交给张明达，交代说：“把这个交上去。”张明达点头收起。这时，李得森从寝室来到正厅，像是神不守舍，看了看他，说道：“有个情况，你要带回答复来。”

张明达问：“什么事？”

李得森道：“你明白地告诉程和生，我们要求赶快对日本同志妥当安排，千万不要大意失荆州。”

张明达不由暗吃一惊，就他所知，南京、上海两地的日本同志，一个是中西功，一个是西里龙夫，去年10月底，中西功到东京，程和生就向他流露过对老吴的不满，担心中西功的安危。后来中西功回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大家受到了上级表扬，此事好像无形中过去了。今天怎么又提起安排日本同志来了？他忙问：“出了什么事？”

李得森说：“不用问，程和生一定知道了。你的任务就是传达我们南京站的意见，告诉他，我们南京站要求，赶快安排日本同志。”

“好的。还有什么事？”

“然后坐等答复。”

“好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用再问了，程和生知道。”

坐上火车，张明达心里不安。从李得森的神色、语气看，日本同志碰上紧急事了。如不及早安排，便要“大意失荆州”。中心意思是不能大意。

他和中西功没有见过面，但是早知道有这么位同志。他和西里龙夫倒是常见面，但是除了向他点头而外，没说过一句话。他已知道西里龙夫的身份，但是，一层窗户纸，不能捅破，这是纪律。

那是在南京情报站组建的初期，张明达关掉了小杂货店，经陈一峰辗转

托人，进了汪伪“体育协会”，这里比开杂货店稍隐蔽些，但是这个协会极其松散，挂空牌子，无所事事，到底仍旧不方便，不方便的关键是他必须不断地往上海跑。

有一天，陈一峰对他说：“注意看报，如果见到‘中联社’招考联络员的启事，你就去试试。考上了，你的隐蔽工作就有可靠掩护了。”

他愣了一下，“中联社”是伪“维新政府”的中央通讯首脑机关，忙问：“能考上吗？”

陈一峰有点大咧咧地说：“大胆去吧，我保你能考上。”

他知道，“中联社”的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说“保你能考上”，岂有考不上之理？至少有八九成把握。于是，便每天看《南京新报》上“招聘”、“招考”的启示和广告，到第八天，果然看到“中联社”招考联络员的启事。翌日他便去报名应试。

原来他担心考不上，有了陈一峰那句话，心里有了底，再想想那是个汉奸文化机关的大门头，又是个联络员，这种差事，不会有几个人去考。可是待到现场一看，竟有30多人等在门外，多数是失业青年。有几个身体魁伟，像是铁路职员失业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店员。相比之下，他觉得“危险”了。但是转念一想，有陈一峰在里面呢，便也沉住了气。

待轮到他应试时，走进考场，抬头一看，凉了半截，不见陈一峰在场，主考位子上坐了个穿西服的日本人，30多岁，瘦长脸，戴眼镜。两片眼镜玻璃反亮光，看不到他的眼神。旁边一张桌子后坐个胖子，很明显是个陪考，他桌上摆着纸和笔。

胖子看了看他，开口问：“叫什么名字？”

他脑子里闪电般犹豫了一下：他和陈一峰约定，趁这次改换地方的机会，再改个名字，他原名叫颜仁章，转入地下工作后，改过几次名字了，用过颜杰、颜柏、张秉德等等，现在面对的是个日本人，95改不改呢？会不会给陈一峰招来麻烦？想了一下，既然和陈一峰有言在先，还是改，便回答说：“张明达。”

陪考动笔记下，原来他还兼作记录。又问了他的年龄、籍贯、现住何处，便不再提问了。

“到本社来，效力，你的愿意？”于是，那位戴眼镜的日本人接下去问。

“愿意。”他答。

“辛苦，不怕？”

“不怕。”

“经营，什么的，作过？”

“商业、店员、自己的、买卖。”不觉之间，他竟用起日本语法来了。

“书，几年？读过？上学校？”

“十年。”

“书，孔子的，多少？读过？”

他不知该如实回答好，还是扯谎好。他小时候读过几天书，但是没有读过孔子的。说读了十年书，那是他在中药铺学徒出师以后，考入上海职业教育社办的“职工晨校”以后开始的。他在那个晨校的图书馆里读了一些翻译苏联的书，尤其介绍马克思、列宁的书，这些，能对这个日本人说吗？他眨眨眼，摇摇头，说：“不多，不过，《论语》，读过，那是很早了。”

日本人点了点头，陪考的胖子也向他点点头，示意他可以退场了。他站

起身，那日本人又对他说：“请你安心，等待本社の录取通知。”

当天下午他问陈一峰：“你怎么不去主考？”

陈一峰无所谓地说：“一样的。”

在他接到录用通知当上联络员后，才知道，主考他的那个日本人，是“同盟社”南京分社的首席记者，负责指导“中联社”的新闻业务，是个重要人物。在上海住过多年，是个中国通，名叫西里龙夫。

陈一峰送情报像流水。从周佛海、梅思平等大汉奸和日本上海“梅机关”的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等一次又一次连续7次密谈《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每个细节，到“梅机关”给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安排青岛会谈所拟定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以及青岛会谈期间他们的每日活动；从“还都委员会名单”到“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名单；从“兴亚院”决定派专使参加汪精卫的“还都典礼”，到汪精卫亲自拜会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提出要求去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方的三角黄布片，遭到西尾和坂垣严厉拒绝而悻悻告退；从清乡委员会每次讨论决定的“清乡”地区、用兵数目、行走路线、日伪军前后配备布署，到任援道被步步提升的内幕，真个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详。这些日伪军政的高级绝密，陈一峰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得手呢？

张明达渐渐悟出来，大都来自西里龙夫。

怀着国际主义之情，怀着共产党员的阶级战友之情，张明达对西里龙夫的尊敬油然而生，每次见到他，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都对他恭敬地鞠躬。西里龙夫也一本正经地向他还礼。这种两人心里自明的友谊、感情，即使有人留心观察也难发现。

东京尾崎秀实被捕的事，是陈一峰报告老李的，不用说是西里龙夫告诉的陈一峰。老李曾召张明达到他家去，三人研究过，并作出过决定：一旦中西功在东京遇险，南京站立即把西里龙夫转移出去。后来，中西功从东京回来了，此事便不再有人提了。今天老李又叫他向上海情报科提安排“日本同志”的事，而且“要坐等答复”。可见事情严重。

“什么事呢？”他在车上一路想。“是不是东京牵连过来了？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怎么又冒出事来？”

车过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他把分发给沿途各站“中联社”支社的电讯、稿件、信件一一发给前来接站的，顺利无话。到了上海，坐上分社接站的摩托车，到分社点件交差。然后直奔拉都路顿和里去见程和生，先交了张敏给他的《文艺春秋》，后开门见山说：“老李叫我传达，南京站要求，赶快安排日本同志，叫我坐等答复，带回去。”

程和生还是那副守礼作人，坦露平和的样子。但是，以前那见面必先微微一笑不见了，张大眼睛看着他，轻声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老李说你知道。”

“噢。”程和生微点下头：“今天不能答复。”

“老李叫我坐等。”

“坐等也不能答复。”

“坐等也不答复？”张明达觉得奇怪。这哪是情报工作上级对下级的态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形，都是有问必答，有求即办。再看程和生，好像心有愁肠，面有难色，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是躲不过他的眼睛的，他俩之间的友谊，可非同一般，见了面，一两句话，便把要说的交代清楚了。

有他人 在场，一个细小动作，一个眼神，对方便能心领神会。今天两人一屋，程和生该对他说清楚，为什么坐等也不答复，可是程和生只皱眉不言语。

第五章 一个宪兵朋友的忠告

“为什么？告诉我。”

程和生抖一下眉头，想了一阵，说：“上海的日本同志，有位宪兵朋友，对他透露说，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给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一份密电，叫上海宪兵秘密逮捕他，送北平审讯。”

张明达一下愣住了，原来如此！上海的这位日本同志是何许人，他不知道。但是，此事肯定扯到南京的西里龙夫了，难怪老李要求坐等答复呢。不觉急问：“组织上怎么决定？”

“没有决定。”

“没有决定？”

“没有。”

“总得有个措施呀！”

“没有措施。”

“没有措施？”

“没有。”

张明达疑惑了，瞪眼问：“这是什么意思？在这等着被抓？老吴怎么说的？”

“说等等看看。”

“等等看看？看什么？看被抓？”

“日本同志得知这消息已经4天了，还不见上海宪兵的动静。他在宪兵里的朋友说，上海宪兵对北平宪兵这种命令式电报很不满，决定不予理睬。”

“这也不过是暂时的，应该趁这机会采取措施啊。”

“措施就是等等看看。”程和生苦笑。

“这位日本同志自己怎么说？”

“问题就出在他身上，他犹豫，以前他不这样。现在，想前想后，原先那种明快果断全没了。我看，他是舍不得离开上海情报科这个摊子。尤其舍不得他们一伙日本同志，南京有了，北平有了，又都在机要情报单位。架子搭起来了，当然，多年辛苦，不容易。可是事到如今……真对他没办法，如果他明白说一句，老吴也许不会这个态度。”

“你得劝他，这是你的责任。”

“他不听。”

“我不管你们，怎么答复我们南京站吧。”

“南京站能不服从上海科的决定？就这么回去答复。”

张明达忽然觉得胸口涨满堵得慌。一段时间以来，压在内心的外向性格终于由此为机地冲动起来，正色道：“遭了事你负责？！”

程和生却一如平常，喃喃道：“我怎么负责？”

“再去问老吴！”

程和生叹口气：“没有用，再去问也没有用，他也说到你了，大家统一执行决定。”

“总得有个应变计划给我们吧？”张明达急了。

“没有。”程和生仍旧平静地说。

“这算什么话？”张明达终于爆发了。刹那间出现了当年他在沪郊游击队遭日机轰炸后的那种脸色。

程和生轻按手示意他：“你不要叫，也不要跳，要叫要跳暂时也用不到你，有我在先呢。再说现在叫也好跳也罢，都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照我说的，回去答复老李吧。”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两人默默相视良久，张明达痛心疾首，狠狠低声地说：“怎么这样！”算是泄出了一点怒气。程和生留他吃饭，他一跺脚扭头便走：“还吃得下饭！”

程和生急忙跨步追上，探手按住他肩头，一迭声地叫：“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他扭头冷脸问：“干什么？”

程和生笑道：“我还没问你呢，你要干什么？”

“回南京。”

“回南京怎么办？闹事去？”

“我闹什么事？”

“你当我看不出来？你自己照照镜子。”

“我没镜子。”

“得了，冷静点。我刚才说过，要叫要跳暂时用不着你，我也一肚子莫名其妙。交换交换吧。”

他定睛看一眼程和生：“是吗？”

“坐下吧。”程和生拉他在长桌旁一把竹椅上坐下。从壁橱里拿出两盘小菜，一盘干大饼。递给他一双筷子，然后自己也在桌旁竹椅上坐下。又起身去拿过两只磁碗，放一只在他面前，同时说：“开水在暖瓶里，自己倒。”

张明达既不摸碗也不动筷，拉开架势等他说话。程和生催他：“吃啊！”

“你，什么莫名其妙？”他直视程和生问。

程和生看看他，侧过头沉思。

“说呀！”

“让我想想该怎么跟你说。”

“说话还要先想一想？你怎么回事？”

程和生苦笑地轻声说：“现在说话都得先想一想，你以后说话也得先想一想。”

“又是什么意思？”

程和生叹口气，“不想不行啊！”

“你真有话，就赶快说，我可没时间陪你想。”

“咄咄逼人！”程和生又向他一笑。

他被逗笑了。

程和生又轻叹口气。这几天，为怎样安排中西功的事，他像一把织布梭在老吴和中西功之间跑来跑去，也可以说被中西功和老吴这两只大手抛来抛去。往返的次数越多，他的“莫名其妙”也越多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中西功对程和生说了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给上海宪兵司令部来电要求密捕他的事。那是由在上海宪兵司令部里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的。那位朋友对他说，“如果你真涉嫌赤色政治，趁他们还没动手逃亡去吧，因为宪兵总归是宪兵，不会永远不动手的。”

程和生一听便吃一惊，问中西功：“怎么办？”

中西功却沉静地说：“这是很复杂的。我承认，他和我私人感情很深，但是我对他说的这个情况不敢相信。”

程和生不解地问：“怎么不敢相信？”

中西功轻描淡写似地说：“他不是党员同志。”

程和生情急起来：“不是党员是朋友嘛。”

“你记住，”中西功向他重重点头：“党员是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人，党员们目标一致，互相之间，可以信赖。至于朋友，就不同了。朋友之间，可以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朋友不一定能为你的政治和他自己的利益冒风险。”

“你这位朋友不是在为你冒通风报信的风险吗？”

“他是个日军宪兵。”

“你不能把职务看得超过友情啊。”

“我还不相信真有其事。日军各部之间，互相比门头，比战功，确实有龃龉。但是，上海宪兵拒不逮捕我，不合常理。”

“难道他在刺探你？”

中西功不声响了，两人沿马路慢步走了一阵，中西功轻声说：“我们的环境处处充满凶险！”

程和生征询地问他：“把这情况报告老吴吧？”

中西功点头同意，程和生去见老吴，把事情详细说了，然后问老吴“怎么办”。老吴皱眉想了好一阵，然后轻声说：“他考虑的对，你也应该学他这样，从多方面思考问题。”

程和生是个善动脑的人，轻声问老吴：“如果是日本宪兵刺探他，我们怎么办？”

老吴注视着他，反问：“如果不是刺探他呢？”

“我来报告就是为这个。我们得为他想办法啊！”

老吴紧紧盯着他，好像程和生没听懂他的话，过了一阵，平淡地说：“想什么办法？”

程和生确实说不出什么妙方良策来，只能干皱眉头等着。忽听老吴说：“你问问他自己有什么要求。”

返问留青小筑的路上，程和生纳闷：看来，老吴也认为那位日军宪兵朋友不是刺探中西功，可是为什么那么个不在意的态度？

回到留青小筑，他对中西功说：“老吴认为那位朋友不是刺探你，请你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中西功隔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片呆呆的看他好一阵，然后抬手向上推了推眼镜架，皱眉说：“我是党员啊，得听领导的决定。”

“领导叫你先提出意见，是尊重你。”程和生笑着说。

“我不愿意离开‘满铁’。”中西功语气犹豫。

程和生为坚定他，表情认真地说：“先生，那个宪兵是刺探你也好，不是刺探你也好，都表明你现在已经被他们怀疑了。”

中西功聚眉静思好半天，像喃喃自语：“我到哪去好呢？”

程和生忙说：“听老吴决定呗！”

中西功却不点头。程和生便劝他：

“先生，优柔寡断常误大事啊，你别再左三右四的了。”

“好吧，你去告诉老吴，我听从组织决定。”

“他要你的意见。”

“我仍旧想坚持在‘满铁’。当然，最后我听从组织的决定。”

无奈，程和生说：“我如实传达你的态度吧。”

“好的。”中西功终于点了头。

程和生再次去见老吴，一路上，心里琢磨，中西功心底不愿意离开“满铁”，但是他服从组织决定。那么，只消对老吴说，他没有个人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就是了。这也是一个党员的最好表现。

不料，老吴听过这话后，只是发愣，仍旧不作决定。

程和生问：“怎么给他说？”

老吴不回答他。又过了一阵，才轻声说：

“很好。就这样。”

“哪样？”

“就这样等等，看看。”

程和生大惑不解：“等等看看？”

“等等看看。”

“这是组织决定？”

“是。”

程和生更加不解：“等什么？看什么？”

老吴歪头问他：“你还记得那个白川次郎的电报吗？”

“记得。”

“结果呢？”

“结果？他没见到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等等看看吧！”

程和生根据对老吴的神情语气观察判断，老吴是不想作具体决定了，便轻声说：

“我们要对他有些保护措施吧？”

“什么保护措施？”老吴问。

“我不知道，但我……”

“就这样，等等看看。”

“我总觉得这个形势下，应该保护他。”

“怎么保护？”

“我不知道。”

“我不能把他锁在保险柜里，我也没有这种保险柜。”

程和生张口结舌，不敢再说什么了。从人情道理上说，他知道，此时此刻，老吴的担子也不轻松。但是他觉得叫中西功“等等看看”，等于不管他，这是十分危险的。作为领导人的老吴，怎么这样处理情况？正想着，忽听老吴又说：“就这样通知他，对所有人都这么通知。包括南京的，北平的。”

程和生觉得老吴这个决定有点独断专行。就支部组织来说，程和生是个委员，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老吴却不理他。按上海情报科的组织说，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和白井行幸等日本同志是由中西功联络的。他应该和中西功共同研究再作这类重大决定才好。

他提出这个意见。老吴想了想说：“不必了。连他自己都要求我决定呢。”

程和生回留青小筑的路上又纳闷起来：从老吴这么粗率地作决定来看，所谓老吴和中西功共同领导这个上海情报科下属系统 105 的日本同志的说法，实际上是老吴在领导。中西功只起个和日本同志通讯联络的作用。

回到留青小筑，程和生只好把吴纪光的意见对中西功说了。由于中西功

一贯考虑党的当前重大需要，所以，他总是采取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工作岗位的态度，听过以后，当然地同意了。于是，由程和生安排，第二天，老吴和中西功在“三福楼”会了一次面，结果，两人意见没有分歧。于是老吴更加坚定了“等等，看看。”的方针。

这是个程和生只能勉强接受的决定。中西功看出他的情绪，轻声细语的劝了他半天，最中心的意思是：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为革命事业作牺牲，明知道有牺牲的危险，也应该为革命的利益去工作，去坚持。中西功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也许某一天的早晨或者夜里，我就被日本宪兵抓去了，那么，我仍旧要坚持我的誓言，我不会吐露有关组织的任何秘密。你也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你突然被捕了，你也应该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

程和生的眼眶潮湿、红润了，轻声说：“先生，我可以对你说，一旦我被捕了，我不会泄露一点有关你的情况。”

就这样，两人都默默地相互点头，算作结束。

话是这么说了。但是，程和生总觉得老吴这个决定有违原则。中央对隐蔽工作早有明确的指示：“长期埋伏，深入隐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向全党发过文件。这十六字方针中，若不能保存自己，怎么长期工作？所以，今天张明达要求他回答南京站的问题，他只说：“等等看看”，带着情绪。

他的情绪当然瞒不过张明达，但是，作为联络员，他不能说什么别的话。更不能把他的疑惑、纳闷、莫名其妙全说给张明达。

张明达看出他的情绪不对，笑道：“我俩这样‘坐饭’吗？”

程和生笑一笑；“你不吃嘛，还怪我！这么说吧，我们是党员。”

“对。”

“要服从组织决定，还要自觉地服从。”

“好了，作为组织决定，说出来吧，我服从。”

“等等看看。”

张明达想跳起来大叫，发火，但是强忍住了，他没精打采地站起身，冷冷的说：“我如实传达，不过，你要知道，责任重大啊。”

“知道。”程和生轻声说。

张明达走了，剩下程和生一个人，不知怎么，心里不是滋味。

.....

第二天，张明达回到南京。当他走进李得森诊所时，见有个老太太在向李得森絮絮叨叨述说腰痛难熬。陈一峰坐在椅上等“看病”。李得森向他点个头：“请坐。”

陈一峰忙用眼光询问他，他明白问的是什么，扭过头，在椅上坐下。

陈一峰向他笑一笑：“您哪里不舒服？”

这是病人候诊时间常见的聊天话。可是张明达知道，他问的是上海怎么答复的。他向陈一峰摇摇头，叹口气：“现在我还说不清呢，得等先生给看过才能明白。”

“噢，哪儿难受还说不清？”陈一峰奇怪了。

“就是。头痛眼花耳朵聋，鼻子不透气，全身难受。”张明达烦恼地说。李得森瞟了他一眼。向他点点头：“稍安勿燥，稍安勿燥。”

陈一峰脸色却惊疑了，忙问：“几天了？”

“好几天了。”

“噢。”陈一峰吃惊凝神地看着他。

陈一峰是个才华横溢、充满浪漫情调的文化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白净面皮，衣着随时，行动举止都是一副高级记者 107 的派头，潇洒大方。又有魏晋文人的遗风，好喝酒，这位无冕皇帝生活作风颇有点真皇帝的随意气息，不拘小节，常有心不在焉、大大咧咧、丢三落四，因而时有失误的毛病。但是在情报方面却从未出过差池。噢，不不，有过一次，差一点儿，只差一点儿误了大事。

那是张明达刚到南京开小杂货店的时候，陈一峰从西里龙夫手里收来一份情报，看了一遍，共有十来行小字：

“汪精卫在东京拜见近卫文麿、杉山元，恳谈日本承认新政府事项。

“日军现在满洲分布情况：

“关东军司令部，新京；

“铁道守备队（各铁路沿线）；

“直属特种部队（公主岭机械化部队）；

“蒙疆派遣军（司令官，东条少将）；

“三个方面军（司令部在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

他知道，这是上级索要的日本在东北驻军新近组编调动的情况，太重要了，便到朱雀桥去找那家小杂货店。领导交代过，以后他的专线联系人就是那个小店的老板。那人很年轻，圆脸，个不高。他把情报交给小老板，就是完成任务。

走进小杂货店，果然见一个小青年趴在小小案板柜台上拨拉算盘。他认定，无疑联系人就是他了。

小老板抬头看了看他，笑容可掬地问道：

“先生，您要买点什么？”

如果，他接着说：“我想买一条手帕。”小老板再问他：“带花边的吗？”他再说：“不，在当中有花的。”那么，接头暗语就算对上口了。但是我们这位大大咧咧的无冕皇帝，把这么几句简单的暗语早忘个一干二净了。现在经小老板一问，竟不知如何回答了。但是他毕竟见多识广，机智灵活，仰起头，看货架子，一边说，“先看看。”一边开动脑筋回忆。

小老板张明达也有领导交代，说将有个文化人，挺潇洒，专给他送情报，接头暗语是，他要“买当中带花的手帕”。并且他要提议给张明达“供应日本进口的当中带花的手帕”。只有到此，才算接上头了。今天进门来这位，挺潇洒，着装打扮和举动神态像个文化人，他便发出暗语，孰料，他竟说“先看看”，而且真的仰脖子抬头傻眉瞪眼地看架子上的货色。张明达小心观察他，忽听他又说：“货挺全嘛。”

“啊，小店虽小，可是日用百货，能置办到的，都尽力置下了一点。您先生要买点什么？”张明达第二次向他发出了接头暗语，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人，只看他怎么回答了。

我们的无冕皇帝还是没想起该接着说什么来，但是他急于和小老板接上头，便只好用亲热话拉近乎，笑着，轻声问道：“顾客多吗？”

“呃——生意还好。”张明达虽然看他像交代的那个来接头的人，但人不可貌相，从这个毫无来由的关心看，说不定是个来打秋风的地头蛇。

“听说过我吗？”陈一峰向他笑一笑。

张明达暗吃一惊，忙陪笑道：“开张没几天，街坊邻里都还未来得及拜访，不知先生贵姓大名？贵府住在哪条街？门牌多少号？”

陈一峰心里自笑糟糕，但再也无计可施。本来，他想，如此问一声，如果这位小老板笑一笑，然后说：“听朋友说起过，但不知是不是您。”那么，往下，凭他的记者采访本领，是会慢慢说到一起的，谁知这位小老板那警惕的目光使他失望了。没法，他说：“不必问了，以后我还会来。”说罢，眼光含笑地注视小老板，心想：“你还不明白？”

可是，看样子这位小老板就是不明白。

山穷水尽，他只好转身出门去了。

在街上转了一圈，心里有点气恼，怎么也想不起那几句简单的接头暗语了。记忆里好像是要说买一件很普通的什么日用品，是买什么来着？忘了，忘得干干净净。

情报今天非交出去不可，不能捏在手里在街上乱逛。他又回到了小店。

“您要买什么？先生。”小老板用微笑掩饰着吃惊。

“呃，就是很普通的日常用品。”陈一峰可怜巴巴地皱起眉，半晌，才说：“先给我拿两包香烟。”

“好的好的，请问先生，喜欢什么牌子的？”

“白锡包就行了。”

小老板从货架上拿下两包白锡包香烟，轻放在柜台上，口称“先生”，把香烟向他推一推，同时张起眼，仔细端详他。

陈一峰笑了：“再仔细看看，记住了吗？”

“记住了，先生，希望您多多照顾。”

唉，唉，堂堂无冕皇帝，被这么个孩子般的小老板难倒了，街上太阳晒一阵，心里火又大，急出一头汗，伸手裤袋里摸手帕。这下突然想起来，用手拍了一下柜台，低声叫道：“想起来了。”

吓了张明达一跳，忙问：“什么？先生？”

“你有手帕吗？”

“有的，先生，您要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

“品色很多，先生。纯白的，带花的，麻纱的，您喜欢哪种？”

“有带花的吗？”

“有，先生，您看这样的可以吗？”张明达从货架上取下一摞印花的手帕。

陈一峰翻看着手帕，皱眉回忆，忽又轻声叫道：“噢，我要当中有花的。”

“好的先生。你看这种，”张明达又从货架上取下一摞手帕，纯白，连花边也没有。

“有没有日本进口、当中带花的？”

“货还没到，先生。”

“我可以帮你订购点日本手帕。”

“谢谢先生，有样品吗？”

“下次带来。”

“好的先生。”

两人相视微笑了，至此，全部接头暗语才算结束。

“你有点呆板”。陈一峰不觉发起皇帝脾气来。

张明达眨眨眼睛笑了：“如果错了呢？”

陈一峰自知无话可辩。叹口气说：“行了，给我拿条毛巾，一块香皂。”

“好的，先生”。张明达不苟言笑地从货架上拿下一条毛巾，一块香皂，用纸包好，放在柜台上，向前推一推，“先生，您还买点什么？”

“就这。”陈一峰把两张军票夹着的情报压在柜台上：“不用找钱了”。

“谢谢先生”。张明达伸手接住军票拉向怀前：“以后请多多关照。”同时点了点头。

他们这第一次接头的情形，谁也忘不了。这以后，他俩偶而谈起这次接头来，便互相戏谑。陈一峰说张明达“死心眼”。张明达说陈一峰“没心没肺”。

但是在“中联社”大楼里，两人严格遵守自己的职务身份。在他们的公开职务间，是没话可说的。然而到了李得森诊所，两人都是“病人”。没有其他病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便连“病人”也不是了。研 111 究时局形势，分析情报价值，商量应该主动猎取什么情报，有时也谈笑。

今天陈一峰是专来等候张明达传达上海情报科答复的，西里龙夫得到中西功的消息，说北平宪兵司令部有电报给上海宪兵司令部要密捕他。为此他替中西功担心，告诉了陈一峰。陈一峰更担心西里龙夫，便和李得森研究，决定向上海科提出意见，要求答复。

李得森把罗哩罗嗦的老太太打发走了。房里只有他们三个人时，忙问张明达：“怎么答复的？”

张明达恼怒地涨红着脸说：“等等，看看”。

“什么？”李得森皱起眉头焦躁起来。

“你再说一遍。”无冕皇帝极严肃而文雅。

张明达只得从头到尾把见到程和生以后怎么说的，程和生怎么答复的重复了一遍。

三人默默相向，谁也说不出来。别看李得森山东人气粗好斗，到了三关隘口，悬崖绝壁，地位不利的时候，也就“没咒念了”。陈一峰呢？共产党是个革命组织，党员个人要服从组织，下级要服从上级，莫说无冕皇帝，就是有冕皇帝，在组织命令前也得老老实实。现在他面无表情，像个腊人塑像。

张明达看看他们俩，轻声道：“不能这么愣着，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李得森怒气未消。

“没有办法才想呢，有办法还用想？”张明达尽力耐住性子。从昨天见到程和生到现在，他只想一件事：怎么保护住西里龙夫。中国人，不管怎么说，好办。戴上一副眼镜，换套衣帽化个装，人堆里三混两混就能出城门过关卡。西里不行。就他那中国话，张口便露馅。他想过：唯一的办法是用武力把他接出南京去。南京地下党在伪军警中会有秘密组织，但是情报站和他们毫无关系，而且他们大概不会这样做。南京郊外有游击队，但情报站和人家也没有联系。即使出面去和人家联系，其一，人家是否相信你？其二，没有上级的通知，哪个武装敢随便乱动？他叹了口气，关键的关键是上级。上级批准了，一个通知，莫说接一个西里龙夫，接十个百个，也能办到。没有上级的通知，莫说西里龙夫，就是李得森、陈一峰和三天跑一次上海的交通在内，离开南京一步试试！没有组织的命令和批准，擅自离开岗位，就是自动脱党，一切都完。事情就这么简单。

他又叹口气。

忽听陈一峰喃喃自语道：“南京虽大，又是日本人的天下，可是藏不下一个逃亡的日本人……”

“轻装。”李得森决然道：“不管上海怎样，我们轻装。”

张明达不解他所说的“轻装”是何意，转头看他，只见他满脸涨红，忿忿然道：“把每个人的工作都轻装。”

“工作怎么轻装？”张明达问。

“可做可不做的，不做了。交下来的任务，坚决完成。重大的，战略动向性的，坚决拿到，其它一律不动。”

陈一峰莫名其妙，问道：“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李得森说：“腾出时间来，加强应变联络。”

陈一峰说：“问题在于要先有应变方案。然后才是联络，联络是第二位的。”

李得森指点迷津似的轻声说，“应变、应变，随机而应变，随时联络才能随时掌握情况，掌握了情况，才能随机应变，不联络谁知该怎么变？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也得看清山前什么样才能找出路来。现在我们只有多观察，多联络，才能临时想办法。”

谁说不是？三人几乎同时叹气。

过一会儿，张明达先开口了：

“老是这么叹气楞着，没有别的办法啦？”

“什么办法？”李、陈二人几乎同时出声。

“事到如此紧急关头，老吴只会说等等，看看。既不讲明是什么原因，又不讲明有什么困难。领导上这个态度，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二人又同时问他。

“我看，现在我们需要独立思考了。”张明达沉思地说。

“对。”李得森思索着点头：“作为南京站的负责人，我首先就得独立思考。现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暴露在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的侦察视野里了。当然，我们应该不怕牺牲，坚持战斗岗位。但是坚持岗位，首先要创造坚持的条件。”

“你说吧，怎么办？”陈一峰急切地说。

“具体研究，具体安排。”李得森胸有成竹似地：“来，首先研究汪敬远。”

汪敬远是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在汪精卫公馆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汪精卫一直在向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允许他的“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未得他主子批准，十分焦躁。告诉汪敬远，汪精卫宣战不宣战，既影响不了国际格局，也算不上有价值的情报，随他去吧。汪精卫每天的会客名单以后停止抄送。会客谈话内容，属重大军政决策的，临时简报，一般的不送。汪伪政权官员们勾心斗角地狗咬狗，不报。李长江、任援道、孙良诚等伪军活动，意义不大的，也不报。汪精卫和日方条约性活动，待有结果再报。关于日方用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条件诱降阎锡山的事，拖拖拉拉，至今无结果。今后，阎锡山是继续跟蒋介石，还是投靠汪精卫，他还在对形势作观望，他有两万人驻地处在八路军的包围圈内，想借日军力量把他们接出来，没有那么容易。日本人不是傻子，不会先为他的两万人去流血。看来事情还要拖下去。即使有了结果，意思也不大，无关大局，停止，不报。关于中西

功和西里龙夫已处危境的情况，暂不通知汪敬远，这位老弟性子特别急，以免引起他波动。

“不合适吧？”张明达插话说：“这不报，那不要，汪敬远会问，我干什么？”

“注意应变联络。”李得森说。

“那样，他一定又要问，应什么变？你能不对他说日本同志的事？”

李得森点头同意：“有道理。可是……这事我亲自办。研究第二个，郑百千。”

郑百千是汪伪政府博物委员会主任的二公子，在师范学校当讲师，他的力量放在文化战线。以前报过张资平要投汪当汉奸，提请领导上警惕他投敌后，在知识分子群中可能产生的坏影响。现在张资平投敌已成事实。最近延安传来消息，毛主席已经给他戴上汉奸帽子了，有讲话纪录为证。他翻不了身，影响不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告诉郑百千，文化战线的调查停止。某些知识分子动摇性大，准要当汉奸，由他们当去，我们也拦不住。国难当头，考验每个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另外还要通知他，以后有重要情报，也只口头面谈，不许他再长篇大论的写那些书面报告。对他也要把面临情况的严重性讲清楚，要他勤联系。

第三个，从郑百千带出个无锡的邱麟祥来。

邱麟祥的家是隐蔽点之一。他在无锡南门外开个米行，兼个小学校长，从他家向南走半天就可到苏南根据地边缘区。他不在南京，危险性不大。他由郑百千联系，叫郑百千通知他，叫他通过亲友关系，开辟一条从他家到苏南的临时交通线，要绝对安全，万不得已，由我们想法把西里龙夫他们送出和平门去上火车，在无锡下车。

“那样走路程太远，”张明达又插活：“走半天，还要带着他的夫人，不如往北，上火车轮渡过江，奔六合，很近就是游击区。”

“是啊，还要带他夫人，怎么把他们送出和平门？”陈一峰沉思着说。

难题又回到日本同志身上了。

而且，即使把他们送出了和平门，或者也过了江，到了根据地。那时候交给谁？谁接受？上海情报科是直属最高层的绝对保密单位，在党内也绝对保密，谁泄露了，都要受纪律处分；在党外，哪个人知道这单位？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没有上级的部署，随你多么周密的计划方案，要送日本同志去根据地，全是空话。

最后，三人大眼瞪小眼，你看我的嘴，我看他的口，他看你鼻子底下那个能说话的东西，看它说什么。

归根到底，只有也只能执行“等等看看”的指示。

日子一天天平静地过去，中西功又次拜访了他在宪兵队的朋友，谈话间，他发现，这位朋友对他过分地客气，看得出，他明显地在恪守着一种分寸。绝不涉及宪兵队内一点情况，更不提及中西功该不该离开上海的话题。好像他根本未向中西功透露过北平宪兵队给上海宪兵队电报要密捕他的事。

两人互相道别时，这位朋友仍是那么客气有余。

中西功挑眉凝思：这位朋友开始回避他呢，还是另有蹊跷？

他满怀疑惑地进了“满铁”他的办公室，翻出新到的各种内部密件阅读。以便了解当前日本国内形势对他自己安危的关系。但是，这些密件，虽然也有军事方面的，大部分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凭他的经验，很快看出，太平洋

战争后，不到两个月，日本船只损失惨重，粗略统计一下，便近 60 万吨。忽然，一条“代电”吸引了他：“关东军组成 6 个军”，其中的两个驻扎地，更令他注意，一个是安东，另一个是牡丹江，这不是北攻苏联的态势部署又是什么？从牡丹江东下到达绥芬河，直取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和符拉迪乌斯托克（海参崴），然后沿铁路北上曼佐夫卡，再沿兴凯湖东岸，直取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在解冻以前的初春季节，这片沼泽地是理想的行军路线，并且，他还注意到一条“内阁密讯”称：“政界有人建议，大东亚圣战应以占领新加坡作为一个行动段落，停止使用武力，与美国认真谈判一次，取得谅解，缔结个某种协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至少可以认为，日本在解冻以前向苏联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很大。

他决定约老吴面谈一次。

他正要出门，程和生进来了，神色有点惶急。

“先生，宪兵队叫我们搬家。”

“唔？”

“银行二楼，我们调查班的房子，进去五个宪兵，限令我们立即离开那里。”

“他们没说为什么？”

“没有，只是命令我们立即离开。”

“说话语气凶狠吗？”

程和生想了想：“不客气。”

“带有危险迹象吗？”

“没看出来。”

“唔。”中西功思忖片刻，轻声说：“立即撤离那里，一周之内，除了你和倪之骥，其他人谁也不许再露面，一律隐蔽，你俩仍旧是我的雇员。”

程和生答应一声，转身出门，中西功又拉回他，低声说：“请老吴考虑，我要见他，时间地点由他决定。”

吴纪光和中西功在四马路一家小菜馆见了面，两人都是一副消闲神气，一瓶法国白兰地，四小碟冷菜，整整消磨了一个下午。

开始，吴纪光听程和生说，宪兵把“特别调查班”撵出了交通银行，估计中西功要和他研究特别调查班的存留与否和他的去留问题，对于这件事，他已经考虑了个意见。形成这个意见的指导思想是去年 11 月下旬中西功由东京回来后，他向“小开”汇报关于日军南进的开战日期那天，在谈到是否安排中西功“向西去”的问题时，“小开”对他明确说过的那段话：“上海情报科这个阵地不能轻易放弃，因为这里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远东的前哨，是我们监视日本这个战争恶魔意欲把世界大战扩展到东半球的瞭望塔；你们这个情报科是由党长期建设起来的、隐蔽极深的、精明强干的战斗组织，特别在现时，你们是无可替代的战斗岗位。明白地说，把这个阵地交给你们，你们就得守住，而你要勇于负责。”那就是说，“小开”要求于他的，首先是怎样守住这个阵地。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能撤离这里。

未料，中西功所谈的，根本不是什么撤离问题，而是来汇报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动向。他先从日本陆海两军的矛盾谈起，继之谈到这种矛盾可能产生的行动分歧，就是关东军在春季解冻前发起北攻苏联的可能性，现在，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扩大。他还特别强调海军虽然初战取胜，但是造成的舰船损失，已经使他们陷入只能取守势的地步。日本政界有人提议以占领新加坡为

一段落，再和美国谈判，签个什么协定，就是这种处于守势的说明。在这个新形势下，陆军会乘机显示一下，在国内政界争取（或者可以说是巩固）自己的地位，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北攻苏联，在当前还有个和德国呼应的作用。日本占领越南，在上海进驻法租界，遭到了贝当政府的强硬抗议，如果北攻苏联，可以收到通过希特勒对贝当施加压力的效果。

关于这个大问题，吴纪光只能认真地听他阐述，然后去向上级汇报。

最后他们也谈到宪兵队把“特别调查班”撵出交通银行的事。中西功说，从几方面观察，日军和宪兵都没发觉“特别调查班”有什么可疑。他们只为自己的方便，不把“满铁”属下一个小机关放在眼里，“特别调查班”倒正好趁此机会转入隐蔽分散活动。至于程和生和倪之骥两人，仍以雇员身份继续公开活动，坚守阵地。

吴纪光非常满意这个安排，两人又探讨了以后活动的注意事项，便分手。始终没谈中西功是否向西去的问题。

1942年江南的梅雨季节比以往哪年来得都早。雨，紧一阵慢一阵，不管人世沉浮，只顾下个不停。田野一片茫茫，城市泡在水里，整个江南看去悠闲宁静。人们无事不上街，上街得撑把油纸伞。

日本兵不带雨伞，他们穿粗呢军衣，据说隔水防潮。到底什么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帽子上左右挂下两片布，原是为在北方防风沙而设计的，现在用来挡雨倒也合适。脚下的高筒皮靴经水一泡，在杭州城街青石板路上走起来也没有了那威武的“咔咔”响声了，只听得“咕兹”“咕兹”一片乱响。他们有的痛恨中国人在这种连绵雨天里可以躲在青砖瓦房里不出门，消受清福。有的羡慕中国人不征兵，愿意当兵自己去，不愿意当兵在家里呆着。尤其那些应征新兵，扛着步枪在雨水中东张西望，他们听说过中国人把杭州叫“天堂”，天堂原来这个样。

“雨西湖”，是杭州一大景观。现在岸边挤满日军兵马，空酒瓶和罐头盒散落在岸边湖面上，随着大雨敲碎的水面跳动。湖上一片白雾，能见度不过百公尺。怎么看怎么叫人伤心。

侵华日军13军，自接到担当打通浙赣路主力的命令后行动迟缓。直到北方部队南下助阵才算振作起来，5个师团、两个混成旅团在大雨中行进，火车、汽车，还有那些倒霉的马拉铁轱辘运输车，走着走着便陷进泥水里，越陷越深，一辆运输车得派十几个步兵跟着走，忙碌10多天，各部总算布置停当。5月15日，两翼从余杭和奉化，开始攻击前进。16日，杭州司令部得到报告：国民党军在新119昌、诸暨顽强抵抗。

消息传到13军设在上海的“藤”“樱”两情报机关——“藤”和“樱”是13军专门收集重庆方面军事情报的机关，负责人是佐方大佐，和上海影佐祯昭的“梅”机关是两回事——佐方亲自出马到“满铁”上海办事处向“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求助。

“快快的，快快的，求求阁下，求求阁下。”佐方说日本话，向中西功说一句鞠躬。

中西功根据掌握的资料，向佐方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军第3战区的兵员装备和作战传统作风，并把他们这次投入的抵抗部队是那些，数目多少，装备怎样，实战能力等等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佐方听后，大为感激。提出来要求中西功进一步给以帮助，介绍一下国民党的抵抗部队和重庆的关系，以及他们可能坚持作战多少时日，中西功笑笑说：“这方面，由于战役开始前未

作调查，很难解答。”

佐方悻悻告辞。

中西功送佐方上车时，一个通过 13 军搜集东京战略情报的念头在脑际闪现出来，他对佐方轻声说：“但是，我可以去作一次实地调查，也许可以得到些对阁下有用的情报。”

佐方惊奇地笑起来：“是吗？这太感谢了。求阁下马上动身吧。”

中西功思索着说：“我要准备一下。”

佐方忙抢话：“需要我向 13 军作介绍吧？”

中西功不当事地挺一下胸：“不需要，我的行动，13 军要严格保守秘密。”

佐方连说：“是的，我为阁下出具一份随军调查员的证明，马上送来。”

中西功笑一笑：“不必不必。”

佐方感激涕零似的：“非常感激，谢谢，谢谢，我等待阁下的消息，谢谢。”

送走了佐方。中西功找到程和生，叫他通告老吴，要求立即见面。

程和生去见老吴，把情况作了传达。老吴沉吟一会儿：“我考虑一下。明天上午九点，三福楼答复。”

老吴所说的“考虑一下”，是去请示“小开”。

“小开”听后眨眨眼，轻声说：“可以。一来通过 13 军了解东京的战略意图和重庆的态度，二来可以自然地静观事态的发展。”

吴纪光每次见“小开”，都全神贯注地听“小开”讲什么，同时动脑筋仔细想他话里的含意。今天他尤其集中精力，从语气看来，“小开”对中西功的活动和去留很关心。可不是嘛，“小开”也知道中西功的能量，不看重他才怪呢。但是今天他要向“小开”讨得个对中西功安排的高远方案，便轻声问：“以后怎么办？”

“小开”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情况。”

吴纪光心中暗想：应该怎么理解领导这句话呢？从口气听，很决断。从神色看，好像“小开”心中也没底，情况会有多种多样的发展，难以预料。待看到不利的情况后再作处置，不是为时已晚了吗？眼前在中西功背后，就有个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密电要逮捕他的危险。这件事，他已经向“小开”汇报过，从开始，“小开”就指示“整个情报科都要‘等等看看’”。时至今日，所谓“看情况”，实际还是“等等看看”。怎么等？怎么看？当然就是坚持在阵地上，观察敌情变化，但这是没有定谱的事。现在，可以说是个转移中西功的好时机。可以命令他趁出上海到杭州的路程期间，经过联系，进苏北根据地。当然，中西功一走，相应地，其他同志都得撤离。那样，组织就撤销了，这个老一辈苦心经营、长期建设起来的情报科阵地就消亡了，是在他手里消亡了，而不是在他手里坚持住了。这是 he 不敢负、也负不起的重大责任。然而不顾一切地一味地坚持阵地，等等看看，其结果将是什么呢？他不敢想下去。

但是，不敢想也得想。他搞过武装斗争，知道什么叫军令如山，只要坚持阵地的命令一下，就得与阵地共存亡。血要流在阵地上，人要死在阵地上。现在领导命令已下，就得服从。

他正想着，忽听“小开”问：“那个白川次郎到底是谁？”

“不知道。”他答。

“那个说北平宪兵司令部来密电要密捕他的宪兵是什么人？”

“只说是朋友。”

“这两个人不是全出自对中西功个人的关心，也不像有宪兵阴谋。”

“小开”这个分析，有其独到见解，从最低限度说，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反映出来。就一般情况而论，有些共产党员自觉地策应同志，也是常事。

然而，中西功的身份，在日本人间竟暴露得如此严重？即使暴露得如此严重，仍然得到了有形无形的帮助，这是事实。

能依靠这些帮助去长期坚守阵地吗？当然不能，只能依靠每个党员的自觉牺牲精神。

他再抬头看“小开”，只见他脸色沉重，正眼光犀利地注视着他。

他知道，不必再说下去了。

第二天，他按时到达“三福楼”，中西功已经在等待。像过去一样，两人没有寒暄客套，直接了当，他问中西功：“决定了？”

中西功侧头笑：“听你决定。我想利用13军遇到顽强抵抗这个关口，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他们的命令里，会反映出东京的战略动向。这是我们需要的。”

“也好。”不知是由于彻夜失眠身体受影响，还是由于感情撞击，吴纪光喉头涌起一阵酸辣，直冲眼眶。自己也不知是哭是笑他说：“既然答应了他，就去吧，东京的战略动向，我们是需要，但是目前不必过于费心。重庆方面，太平洋一打，可以说态度有所好转，注意一下他们对汪精卫有什么变化就行了。不管那位宪兵朋友说的是真是假，到了杭州少露面。南京的西里龙夫由我联系。你在杭州尽可能多呆几天，我在上海观察动静，到时候叫程和生去找你。”

中西功说：“我想带他到杭州去，方便些。现在我没有他，像没有手脚似的。”

吴纪光思索一下，点了点头：“可以。”转头吩咐程和生：“负起责任来。”

程和生严肃地点头：“一定。”

“走以前通知张明达，南京方面，目前没有大任务，你们停止会面，等你回来再说。”吴纪光又转头问中西功：“你还有什么交代吗？”

中西功笑一笑：“没有，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吴纪光说：“杭州是风景城市，比上海安静，但也要警惕。”

两人就这样握别了。

5月20日中西功和程和生到了杭州，在西湖边找家旅馆住下。此时的杭州，大兵西去，又恢复了安静，看到的是雨水冲洗过的房屋和街道，迷蒙的西湖山水，听到的是雨声中透出的隐隐炮声。

中西功当然没去调查国民党军的情况，也没去13军了解东京的战略动向。

程和生撑把雨伞在杭州街上转了三天。在几家书店买了些报纸和杂志。和书店老板们攀谈，说想买点国民党出版的杂志书报，如果能买到，肯出高价钱。老板们都畏畏缩缩，说没有进那种货的渠道。

最后，在望江路一个小书摊的女人说，如果您先生肯出大钱，我不妨托亲戚试试看。程和生问她亲戚在哪里，她说在绍兴乡下，又说那里是政府军的地方。程和生当下给了她五百元储备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女人吓得脸

发白，但还是收下了。她说一定给办到，明后两天过去，大后天来拿吧。程和生又问她，能不能买到四明山地方的报纸，女人一听，连忙把储备票又退还他，连声说：“先生，这种生意我们从来不做。你不知道，那里是共党游击队的天下。”程和生笑笑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啊。”女人看了他一阵，连说：“不敢。”程和生把储备票又推给她，说：“不要怕，能买到最好，买不到也不要紧。”双方约定，过几天程和生再来见面。

程和生并不是随便把几百元储备票扔给那女人的，他攀谈中观察，这女人看去单薄，但不似沪杭一带经商女人那种精明机灵。而且，她的店面那样窄小，存书也不多，她的那双手极粗糙，总体说，他猜想她像个地下联络点的人，如果她能拿来四明山区那怕一张报纸，程和生就有办法和她深入交谈下去。

他有他的想法，他知道中西功向老吴要求带他来杭州，为的是随身多个耳目，接触中国人方便，更重要的是暂时离开上海，以观察上海宪兵的动静，相机行事。他知道这一点归他掌握，但是作为自己便不能只限于这一点了，他想尽最大努力找到一个地下党组织的人。他的所谓“相机行事”，是要在出现危急的时候，把中西功通过地下关系，护送到根据地去，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就是他在杭州逛大街、逛商店的目的。

他对这个小书店的女老板寄予希望。

他又用两天时间过钱塘江，骑上租来的自行车在乡间转游。虽然穿了雨衣，仍然淋成落汤鸡。他真想碰上几个游击队员把他捉住当俘虏。可是没有，一个也没碰上。每次回到旅馆，中西功都问他，“到哪去了？”他不实说，只说出去转转看看。

第七天，当他回到旅馆时，中西功叹口气说：“好了，我明白你了，明天不要出去了。我计算了一下，从我知道消息到现在，20天了。如果宪兵队要抓我，早已经动手了。至少，他们要先向‘满铁，作个通报，可是我们出来，‘满铁，丝毫没阻拦，说明他们一无所知。还得利用这段时间想想以后的工作吧。”

“以后的工作以后再说吧，”程和生沉恩着说：“杭州和上海不同，在上海，我们一点周旋余地没有。”

“在杭州就有周旋余地了吗？”

“至少可以临时躲藏一下。”

“如果他们决心抓我，藏是藏不住的。如果是真的，宪兵队的朋友也不会再给我送信了，到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我想在这里作好安排，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就到四明山去。”

“到四明山去？没有组织介绍信，能找到游击队吗？”

程和生被问住了，这才不得不把心中的小九九倒了出来，说：凭他在根据地那么多年的生活体验，一下就闻出味来了，那个女老板十有八九是游击区的外围联络点，过几天她拿来游击队的报纸，我自有办法接上关系云云。

中西功听后深受感动地说：

“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安全着想，我很感激。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不通过组织便自由行动。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我们都不能脱离党，我们都要坚持斗争，就像你们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我们那怕被捕了，也要坚持，坚持我们的信念，你想过吗？”

“想过的。你可以相信我。”

“共产主义，不是口头说说的。我们要有为它付出生命的决心。苏联的胜利，不是一晚上攻进冬宫得来的。那之前，已经有千千万万布尔什维克倒下了。我们个人的生命，比起革命事业的需要来，太渺小了。”

“我知道。”

“我是随时准备着的。当然，我不想落到他们手里，我要看到我们的胜利。”中西功笑了。

程和生看看他，也笑了：“是啊，我们不是为牺牲而干的。不过目前，我们已处在这个边缘上了。”

“那我们就尽可能地迎着狂风恶浪战斗吧。你知道潜水艇吗？”

程和生笑道：“太知道了。”

“是，你在航海学校上过学，当然知道。潜水艇，在所有的船只靠港躲避风暴的时候，它往港外开，到深海去潜伏。现在日美开战，大形势这个大风浪对我们有利。你说呢？”

程和生同意这个分析，于是他们谈论起日美战争的前景来，进而联系到苏德战场、中国战场和去年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今年延安的整顿三风，上海情报科老吴的领导作风，“特别调查班”疏散隐蔽的几个党员，南京的同志，北平站筹备组的同志们，也谈到他俩自己的家庭成员和个人参加党的思想经过，自己的爱好和抱负，最后又回到了眼前的处境，回到了老话题：“下一步，怎么办？”

“要有思想准备，”中西功沉思着认真他说：“我也许逃不出宪兵的手。你也可能被捕，他们会怀疑你，因为我俩关系太密切，抓你个嫌疑犯，在他们不算回事。”

“先生，”程和生深情他说：“如果我被捕，无论到什么地步，我绝不会说一句不利于你的话，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你的安全。”

中西功眼圈红润了：“我相信你，真的，请你也相信我。”

“当然。”程和生微笑着：“我早就相信你了。”

话题又转入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上。

他们谈了很多很多……

第六章 特高课警官到上海

5月28日，13军越过金华、兰溪，直逼衢州。在杭州即使雨停时间，连隐约的炮声也听不到了。6月7日，日军攻占衢州，然后继续向西，连下玉山和上饶。南下一部占领丽水，一路烧杀过去，浓云暴雨加滚滚黑烟，江南大地天昏地暗，所到之处，铁路、机场全被破坏。

中西功和程和生在杭州25天，对于国民党军的连续后退，唉声叹气。还调查什么？佐方用不着了。“满铁”和宪兵都没有来信和电话。两人每天在西湖边雨中闲步，心里也渐趋平静。

6月16日，吃过午饭，中西功刚走进房，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惠子从上海留青小筑打来的。告诉中西功家中一切都好，说是两位东京来的客人要找他，请他回来一下。

“东京来的？”中西功心中不禁一颤，忙问：“谁？呃？……”

惠子没有马上回答，像是跟旁边什么人说话，听不清。中西功又催问一遍，才传来惠子的声音：“他们说是你的老朋友，又说你早些时候到东京找过他们的，不说你也知道。”

“噢，真的吗？”中西功听此一说，心里不免暗喜，但还是有点不放心：“他们是什么模样？惠子。”

“什么模样？！……”惠子顿了一顿才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说好让你到时候大吃一惊！”

中西功还想说些什么，惠子已把电话挂掉了。

中西功刚挂上电话，程和生进屋来，问道：

“哪来电话？”

“惠子，说东京来了朋友，要我回去叙叙。”

“回去吗？”

“不妨回去看看。你留在这，等我，我处理完事，立即回来。”

“顺便到‘满铁’，观察一下。最好见见宪兵队的那位朋友。”

“当然。”

中西功收拾了盥洗用具。程和生送他上火车站。

火车启动了、两人挥手告别，程和生低声叫道：“先生，请向夫人和惠子小姐转达我的问候。”

“谢谢！”

下午4点半，中西功回到留青小筑28号，推门进屋，不见惠子和方子，便大声说：“我回来了。”

先是惠子雀跃着冲出房，向他鞠躬，笑着：“您辛苦了。”继之是方子紧跟着走出房，向他鞠躬，笑着：“您回来了。”说着帮他脱雨衣，惠子接过他手里的盥洗袋。方子帮他拿来拖鞋换鞋。他问：“有什么事？”方子笑道：“有朋友来看你。”惠子叫道：“先别告诉他。”

“噢，”中西功抬头见书房出来两个人，穿西装，结领带，脚上皮鞋，头发梳理得有型有样，油光发亮，脸刮得干干净净，眼角边挂一丝微笑。每人时上搭件浅蓝色雨衣，手里拿顶宽边巴拿马草帽，两人向他点头问：“中西功先生吗？”

“你们？！”中西功一眼看出他们的身份，心下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奉命来请先生。”

“请我？到哪里去？你们是谁？”中西功镇定自若地用生硬的口气反诘。

来人几乎同时翻开西装领子，露出一枚银灰色徽章，又几乎同时说：“东京警视厅，特高课。”方子和惠子忍不住突然掩口惊呼起来。她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仪表端正、笑容可掬、口口声声说是中西功的老同学、老朋友的客人，竟是搞“特高”勾当的便衣警察，多么可怕！而这两个魔鬼竟使用了卑劣的手段，骗取她们的信任，还逗惠子信以为真地跟着他们对哥哥说起谎来，要不哥哥哪会轻易上当受骗。原来期待出现的喜剧场面竟成了一场恶梦！惠子洁白无瑕的心灵像蒙受一场奇耻大辱，此刻竟愤怒得毫无顾忌地冲上前去护着中西功，愤怒地指着两个“特高”吼道：

“无耻！你们无耻！你们把话说清楚了，凭什么来抓人！”说着眼泪一下子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流了出来。

这两个“特高”一点不感到意外，只是冷冷地看了中西功一眼，然后微微一笑，客气地说：

“中西君，不要给家人制造不愉快了，请吧！”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并没有使中西功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为他早已有思想准备，做秘密工作随时可能发生不测，遇到这种情况，保持沉着冷静，随机应变，是巩固士气、防范敌人乘虚而入的最佳对策。现在，在他看来，事已至此，无论软的硬的都改变不了局面，便坦然地向他们点点头说：

“好吧，请你们稍坐片刻，我对她们说几句话。”两个“特高”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点头表示同意。中西功便一手挽着方子一手挽着惠子向书房走会。

两个“特高”守候在客厅里并没有闲着，一个站在房门外监听，一个走到阳台上赏花，眼睛却注视着书房的窗户。

中西功把方子和惠子按坐在沙发上，然后拉把椅子在她们对面坐下，平静地说：

“也许在哪件事上我没办法，出了差错，惹怒了什么人，我不知道，‘满铁’的事，很难办。不过我想，既然他们来了，去调查一下，对证一番，也容易消除误会。所以你们放心，我走以后，你们在这里不方便，回日本吧，回到多气郡，爸爸和妈妈会照顾你们。不要哭，都不要哭，我办的事都是为日本着想的。”中西功明知那两个“特高”在门外窃听，故意亮着嗓门说。

“不，我要跟你去，倒要看看他们把你怎么样！”惠子不哭了，她被哥哥一股遇事沉着、临危不惧的气概所感染，猛地站起身子。

“别耍小孩子气性，”中西功忙按住她说“你已经是大人了，好好照顾嫂子，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等着我。”

“你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回家？”方子是个不苟言笑、感情内向的贤淑女子，她轻声地却充满深情地问。

“我想，用不了多久……”中西功思索着又补充说：“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会给你们写信的。”

房门“笃笃”响了两下，这是“特高”催促的信号，中西功站起身，方子忙去取来中西功的皮鞋，先给他穿上衣服，然后再按旧式礼仪，跪着替他换上皮鞋，结好鞋带。她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侍候丈夫了，一股生离死别之情突然袭上心头，不禁颤抖了一下，中西功察觉到了这一点，忙把方子扶起来，替她擦去挂在眼角上一颗晶莹的泪珠，同时用轻得连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说

了声：“坚强些！”

方子笑了，便和惠子一起挽着丈夫走出书房。这时中西功的心情自己都觉得平静得出奇，他像平时一样向妻子和妹妹告别后，随即向两个“特高”点点头，便默默地跟着他们离开了这一低矮的日本式住宅区——留青小筑。他没有低头，没有一点沮丧表情，和平日上班一样昂首阔步地向前走。

在街口，路旁突然冒出一辆军用小汽车，两个“特高”向他伸手示意，他便上了中间坐，两个“特高”一左一右夹着他，这是部老爷车，车头上插着一面小太阳旗，发动了好几次，这才启动，缓缓开上大街。

车子开得很慢。

从虹口施高塔路坐车到四川路桥北挽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或外白渡桥傍的日本领事馆，要经过较长的路段，小汽车开得再快也得半个多小时，这正是中西功冷静下来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大好时机。

在他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被捕了，这已毫无疑问，但是原因呢？是谁出了事连累了他？

在上海和他有党组织关系的只有程和生，可他现在杭州，正在眼巴巴地等他回去呢！

是老吴被捕了？不可能，除了程和生和我，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地址。即使他被捕也绝不会牵连到我。

是的，我和南京的西里龙夫是同学又是同志。但，我坚信，即使他被捕了，也绝对不会把我供出来。还有个陈一峰。陈一峰在外面活动多，消息灵通，别看他文人气息浓厚，这方面却特别警觉，像只麻雀，敌人休想轻易抓住他。有个风吹草动，他便会迅速向组织发出警报。

他也想到了北平的尾崎庄太郎，白井行车。北平站的筹备情况，架子还未搭起来。为给联络员钱志行安排个掩护职业，半年多也没落实下来，也不会出问题。

再说，只要有一个人得到警报，整个组织就会安全转移。问题在于是否有人已经被捕而来不及发警报？

问题更在于“特高”是否已经全盘掌握了整个上海情报科的情况？

他想着，想着……

“不可能，绝不可能！”他像突然开了窍似的全盘否定了以上设想，差点没喊出声来。

原来，他发现在乱成一团麻的思绪中，竟忽略了一个至为紧要而又最简单不过的细节。那就是两个“特高”在向亮出衣领上那枚银灰色徽章，随口说明他们是“东京警视厅”的身份时，恰好证明他们是从东京专程为他而来的。以及在此之前，他们为了骗取他的信任，不得不指使惠子，在电话中对他说出“他们知道你去过东京，找过他们”这样的话来。这就足以证明：事情是出于他的东京之行，是他在活动过程中，什么事情有失检点，譬如住店，打电话，到军报道部等等，被警视厅抓住了把柄，才惹出麻烦来的。这就好，这只是我个人问题，只要与上海组织无牵连，我个人的事，他们什么也不会得到的！想到这里，他顿觉如释重负，一身轻松。接着他需要考虑的是：这两个东京警视厅派来的‘特高，到底是什么货色？找他到底为的是哪桩？

他紧闭双眼，又沉思起来……

小汽车开到了四川路桥北堍，没有驶进宪兵队，而是七转八拐地向外白

渡桥方向驶去，忽然在一座楼房前停下了。

一个“特高”先下了车，站在车旁，“扶”他下了车，他抬头看，认出这里是日本领事馆海军武官府的大院，他多次到这里来过。

他被引进院东南角平房里。房间很小，有股潮湿的霉气味，有张桌子和新铺设的床位，有两把新油漆过的椅子。整个布置不伦不类。

“请在这休息一下。”两个“特高”警察说罢，便匆匆地走了。

中西功站在门口外望。院里很安静，没人活动。过了片刻，两个“特高”警察又回来了。其中一个在床边坐下，另一个拉把椅子送到中西功面前，客气他说：“请坐，”然后他在另把椅子上坐下。

中西功在他对面坐下。

“中西功先生，”一个“特高”警察向他点头说：“咱们先认识一下吧，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来的，我叫野村，他叫松本。我想，您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中西功微笑道：“恰恰相反，我正要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野村和坐在床上的松本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沉默了一阵，坐在床上的松本道：“中西功先生，您和一般国民不同，就是现在，我们对您也很尊敬，希望您不要给任何人制造麻烦。包括我们，包括您自己。您当然明白，我们不会无缘无故从东京跑到这里来见您。”

“我和你们两位素不相识，”中西功刚说出一句，松本便笑着打断他的话：“啊，先生，这些虚伪的过程，让我们免去吧，我们很累。”

“你们要我干什么？”中西功不解地问。

松本惋惜地叹口气：“先生，我想您比我们更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中西功十分坦然地说。

“好吧，我们还有事，下一次再谈吧。”松本遗憾地叹了口气，又和野村交流了一下眼色，随即和野村一起走出门，经过院子到主楼里去了。

中西功有点暗自高兴，看来，这两个“特高”警察，是差来逮捕他的。从他们这简单的行动和急切的谈话分析，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捕到了他一个人。

他们急切地想要中西功与他们“合作”。

很好，所有同志们都可以趁此时间转移。

问题在怎样把消息报告他们，如果现在见到一个熟人，他就会巧妙的利用他。

他又起身向门外望。

来了一个陆战队的兵，给他送来咖啡和点心，不声不响，放在桌上便退出门去了。

“好的。”中西功心里自言自语：“在这里和他们打持久战，等待机会。”

中西功在日本上海领事馆海军武官府同松本和野村整整“愚谈”了三天。他揣摩这两个“特高”，定是奉有对他要敬之以礼，动之以情的命令。否则，他们不会对他表现得如此谦卑。有时，中西功几乎是用语言游戏取笑他们，而他们也忍气吞声地和他继续“愚谈”。

“中西功先生，白白耽误时间，对你没有好处，其实，你的那些同志，早和我们合作了。”

“是吗？我没有这样的同志。”

“那就是说，你有不与我们合作的同志？”

“也没有，你们想想看，我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国，和你们一样是侵略者，在这里除了‘满铁’的人，谁肯把我当同志？”

“那么，在‘满铁’以内，有你的同志了？”

“你们应该知道‘满铁’是什么机关吧？我再说一遍，你们回去吧，我可以托‘满铁’办事处最高负责人向你们担保，我任何时候都不离开‘满铁’，一旦你们调查清楚，大家冰释言欢，我都不会责怪你们。你们两位也是奉命差遣，这次我们互相认识了，以后见面是朋友。”

松本和野村气得脸色煞白透青。一个说：“中西功先生，你太欺人了。”

另一个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走了。

当天夜里，他们把中西功送到领事馆的拘留所。走过灯光昏暗的过道，两个警官把他送进一个拘禁室里，“哐啷”一声锁上了铁门。

拘禁室黑黝黝的，看守在门外走走停停，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中西功看他的监房里，地板上睡着四个人，他在南角空地上坐下去。由于被摘去了眼镜，看不清那四个人的面孔。躺在他脚边的那个人，好像体格相当粗壮，大概不到50岁，头发很长，胡须至少有两个月没有修剪了，那个人睁着眼在看中西功，嘴角上有微笑的深深皱纹，向他表示友好。

“躺下！”看守在铁门外吼了一声。

中西功依墙偎偎身躺下了。他旁边的那个人挪了挪身子，给他宽一点地方，现在看来，那人的胡子、头发更长了。

看守走去后，那个人轻声问他：“什么罪？”

“我没有罪。”中西功颇自傲。

“没有罪怎么关到这里来？”那人怀疑地侧起身。

“我不知道，你是中国人？”

“是。为什么捕你？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没有重罪不会捕你。”

“也许，因为我不赞成侵华战争。”

“有违犯法令的行动？”

中西功犹豫了一下：“没有，也许我不知不觉中帮助了你们。”

“偷卖武器？”

“不。”

“卖军事秘密？”

“不。”

“那么，你怎样帮助我们？”

“研究日本。”

那人莫名其妙：“日本人研究日本，不是和中国人研究中国一样吗？和帮助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闹不清为什么捕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任得山，台湾人，你呢？”

“我叫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你是台湾人，会讲日语吗？”

“会的，我还会说朝鲜话，你的中国话讲得不错。”

“你为什么被捕？”

“我是重庆方面的。”

“担任什么职务？”

“在香港，侦察日军的动向。”

“噢，你在台湾住在哪里？”

“我家在重庆，有两个孩子。”

“你从事上层活动？”

“也可以这么定罪，是广州领事馆逮捕的我。其实我没向重庆发什么重要消息。不过我的身份，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妻子正在活动。大概可以离开这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

“你没审判就送这里来，一定有重罪，不跟他们合作，恐怕不会活着出去了。”

“死活我无所谓。”

“不必逞好汉，不会轻易把日本人送到这里来，你不说，我也猜出你和哪方面有关系了。没意思，我出去以后，还卖我的自来水笔去。”

“……你回重庆吗？”

“不会被允许的，大概可以在上海租界住。”

“在租界？”

“我妻子正在和他们谈判。”

“我可以托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刹那间，他的思想像快速滚动的车轮撞到了巨石前，突然停止了，如果向这个台湾人任得山和盘托出拜托他去办的事情的全部内容，必须先确认他的可靠性。他是重庆方面的人。有关重庆方面和日本的秘密往来，几年来，他听到过一些。没听说有任得山这么个人，那么，充其量，他不过是个潜伏于香港的中下层人物，发送一点香港日军动态的消息，或者兼顾一点经济动态之类的情报，再联络几个英国方面的人物——这一点，又好像不大可能。这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抵抗日本侵略这个基本点考虑，应该能从他身上找到感情的共同点。也就是说，他是可以争取的，在国共合作虽危机四伏、经常闹磨擦，但还没彻底决裂的今天，这种中下层人物，民族大义多有尚未混灭者，在万分紧要关头，求其一助，也未尝不可。然而，重庆方面的人，又常是些面目不清，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如果把全部内容都告诉他，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所要拜托于他的正是日本方面求之不得的情报啊。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意外的机会。他决定，从最基础的谈话入手，争取这个重庆方面的人，为他服务一次。一次，只一次，只这一次就够了。以后可能的话，也许最终可能把他变成个同情分子，进一步改造他，变成个革命力量也未可知。

“其实，在反对日本侵略这方面，你们重庆的态度，我还是很尊敬的。”

“是吗？”

“当然，蒋介石先生在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的压迫下，始终把眼睛看着未来，看着胜利，日本是奈何不得他了。”

任得山同意地点点头。

“汪精卫是个中国人的败类，他的所谓政府，日本人都承认没有代表性。”

任得山又轻轻地点头。

“可见，重庆和延安的合作抗日，一定能取得胜利，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希望，是代表中国人利益的。我的话你相信吗？”

任得山连连点头，继之轻声问他：“你是延安方面的？”

他坦诚的点点头：“我帮助延安，也就是帮助你们，我很早就想到重庆去看看。”

这句话引起任得山的好感，他那眯细的眼睛里流露出那么一点亲切的微光。说明基础谈话已经收到效果了，必须快速深入谈话内容的核心。

“所以，我想拜托你，如果你能回到重庆去，请您务必去拜访中共代表团一次，告诉他们，一句话就行了，我中西功，被日本逮捕了。”

任得山绝望地摇摇头：“我是去不了重庆了。”

“那么，如果您在上海见到了重庆方面的人，就请您拜托他们去见一见中共代表团，同样只说这句话，‘中西功被日本逮捕了。’可以吗？”

任得山沉默着，像在思考，好一阵又绝望地叹了口气，低声说：“只能碰碰运气。”

“这就多谢您了。”

正在这时候，看守突然出现在门外，“咣当”一声打开了铁门，在看守背后有几个衣帽不正的人。

看守声调平和地喊：“607，608，609。”

躺在里面的三个人急忙起身，挨个默默地走出牢门。

牢房门又被锁上了。看守最后一个慢步走了。

任得山轻声说：“至少有一个回不来了，这间牢房只关四个人。”

“他们是哪方面的？”

“不知道，也许有你们的，说不定还有南京方面的。”

“只要是反对日本侵华，大家就是一个方面的。”

任得山默不作声。

“你在香港负责什么事？”

“不要说话，听枪声，数着有几响。”

过了一阵，果然有一阵枪声传来，很远，不怎么响，闷声闷气的。

任得山叹口气：“完了。”

“是枪杀他们吗？”中西功疑惑地问。

“凡夜里从这里提出去的大都是不肯和他们合作的。”

中西功不响了，刹那间，在他面前出现了程和生、老吴、老李、陈一峰、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以及所有他接触过的同志们那清晰的面孔，交替不停的活动着。他们一个个都还是老样子，程和生目光坦诚，嘴角藏着微笑，老吴眼光机警，老李那热情过分的笑带有强烈的感染性，陈一峰对一切都无所谓地斜仰着的脸，西里龙夫一副学者稳重的神情，尾崎庄太郎典型的日本人那种谨慎稳重、沉着应付的气势，白井行幸干什么都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劲头。在他们这一群背后，还有他知名未见面或者见面不知名的共产党员们的身影。有多少？没法细数点。他们组成一道厚厚的人墙，人墙的后面，又攒动着无数的人头……

他一夜没合眼，始终噙着泪水。

任得山倒是轻轻打起鼾声。

直到天亮，那三个被叫出牢房的人，一个也没回来。

早饭，中西功一口没吃。他没有碗筷，给他那一勺只有几粒米的混汤，

任得山竟喝个干净。

上午大约 10 点钟，看守来开了铁门。两个官员走进来，把中西功的眼镜、手表、牙刷、毛巾等等一件一件交给他。这时候，看守背后出现了个 30 多岁的女人。梳个飞机头，穿一身旗袍，双手空空，伸长脖子向牢房里望。任得山怯怯地站起身。看守向他歪了一下头，他便走出门去。待两个官员出门去后，看守又锁上了门。

这女人的出现，使中西功心头一怔：

“他的妻子没在重庆为他活动？”

“对，昨夜他说过，他妻子正在和他们谈判，当然不在重庆。”

“可见不是上层人物。”

大约过了 10 分钟，任得山被看守送了回来，面部毫无表情。戴上了眼镜的中西功仔细看了看他。他的脸型，那么宽扁，不像台湾人。他熟悉台湾人那颧骨突出的脸型。他自己的脸型倒略有些和台湾人相近似。

“那位太太是你的夫人？”

任得山点点头。

“带给你什么好消息？”

“大概本星期六，我就可以离开这里。”

“噢，可是，你的夫人不是在重庆吗？”

“她到上海了。所以，我不会到重庆了。”

“明天她还来吗？”

“要来的。”

中西功不响了。这个任得山现在和日本方面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是必须弄清楚。重庆方面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自己和汪精卫方面的汉奸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又和日本方面发生接触。但是不管怎样，要利用他。要尽力把危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只要他能给带出一个警报去，那么，上海、南京、北平的同志们就可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损失。时间要争取快，那怕早半点钟，早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昨夜拜托你的事，如果你夫人再来，请你转为拜托她，可以吗？”

“叫她怎么办？她不会到重庆去了。”

“叫她到上海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找到一家叫弗利浦的俄国书店，问店员，塔斯社在哪里，会有人告诉她。”

“然后呢？”

“请她到塔斯社所在地点，告诉那里的人。就说中西功被捕了。”

“噢！”

“开始，塔斯社的人可能装着不理睬她，这没关系，只要她说出是我——中西功请求你，拜托她去送这个消息就行了。”

“塔斯社是俄国机关，她一个中国女人进进出出是很惹人注意的，再说，我这种案子，她也要被宪兵监视。一旦被发现，要出大事啊。再追究我，就没命了，而且，她不懂俄语。”

“是啊，是。”

“如果你在塔斯社有熟人，可以把名字告诉我，我叫我太太通过电话和他联系，倒是可以的。”

“那里有我们的人，可是，能叫上名字的熟人，我没有。”

“那么，你有没有要好的中国朋友？或者，最好是日本人，我太太会说

日本话，那就方便多了。”

中西功沉默了片刻，事情虽然紧迫，却绝不能把“满铁”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这个名字告诉这个结识不到 20 小时的人。但是他想到了在“满铁”的津金。于是说：“我有个朋友在“满铁”任职，叫津金，是个日本人。可以叫您太太到“满铁”去找他。托他去通知塔斯社也是可以的，如果津金不在，可以请您太太到公共租界香港路“同盟社”去找一个叫管沼的人，如果他也不在，就请您太太找个同伴，两人到霞飞路，像朋友相见那样高兴地大声说话，就说：“你知道吗？听说日本人中西功被宪兵逮捕了。”在一个地方说过以后，换个地方再说，这样，人群里或许有知道我的人，他们自会去活动的。

“这太冒险吧？”

“是啊，所以请求您，如果怕这样做危险，就请您太太请个人到南通附近的启东去，在那里可以找到新四军，请她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新四军，新四军一定会非常感激你们的。”

任得山沉默了好一阵，皱眉问道：

“为什么一定要把你被捕的事张扬出去呢？”

“事关重大。”中西功着急地重重点下头。

“希望他们营救？”

“我根本不需要，那是徒劳无益的。”

“哪是因为什么？”

“关系到我们延安方面的行动，关系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千千万万生命。”

“你的事情这么重大吗？”

“是的，所以，无论如何，请求您答应我。”

“好吧，我一定努力。但是，最好你告诉我一个我妻子能很容易找到的中国人。”

“找到津金或者昔沼就可以了。”

“好吧。我妻子明天也许会来，我告诉她。”

中西功眼睛里充满了激动的泪光。很想向任得山深深鞠躬致谢，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不能也不宜。他只能用感谢的语气，清楚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的同志们一定会感谢您。请您转告您的太太，我恳求她，无论如何，费心了，拜托了。并且，告诉她，“满铁”上海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13480。13480 您记住了？”

任得山轻轻点点头。

为了坚定任得山，中西功又向他说了许多中国必须打败日本，日本必定要失败的道理。也讲到希特勒必败的各种根本条件，墨索里尼必定失败的各种军事政治的条件。其中特别强调支持战争的经济实力比较：钢铁、粮食、石油、橡胶。这方面是他在“满铁”几年的研究专业，说起来，数字清楚、准确。他也说到了目前国共双方合作的危机和对将来的估计，力劝任得山不要参与破坏抗战团结的活动，做那种事，对不起子孙后人。任得山听着，频频点头，有几次，脸色羞愧似的苦笑。

第二天，任得山的妻子又来了。

任得山出去 10 分钟就回来了，死眉呆眼地愣神。中西功问他：“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明天我要离开这里了。”

“你好像不高兴？”

任得山一直不说话，只默默地发呆。

中西功深感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看任得山，像在思索什么重大行动决定，一直沉默了一天。当夜也未和中西功说什么话。第二天，他离开牢房前收拾东西的时候，轻声问中西功：

“有没有我可以直接去找的中国人给你送信？”

中西功紧握他的手低声说：“没有，一切拜托，这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啊！”

中西功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员以后，在情报战线上，尤其在反对日军侵华战争的活动方面，功勋卓著。但是，当身处囹圄时，对敌斗争的经验却十分不足。完全凭一腔共产主义者信仰的力量，正气凛然地指导自己。这绝对没有错。但是在特定环境中，在无人帮助下，他由于着急，担心同志们的命运，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地轻信了任得山，实是一大憾事。

然而，对这一点，我们毫无理由，也绝不能指责他，任何时候都不能。

任得山，本名林得山。他不是台湾人，而是朝鲜人。他的原籍是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石风古洞。但是他又确实是中国人。大正十五年，他用林亨一的名字，在重庆取得中国国籍。他有两个妻子，一个朝鲜籍，一个中国籍。中国籍妻子给他生下两个孩子，这是事实。在大正八年，他因为轰动朝日的“万岁事件”被日本方面检举，逃亡到上海。大正九年，被缺席审判，判刑十年。当时他已在设于上海法租界的“大韩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并当选为“大韩议政院”议员。他是朝鲜民族革命党的资金调度。随着侵华日军的进攻，国民党政府军步步败退，他也到过汉口、重庆、桂林，并到香港，他在香港被捕，并非日本广东领事馆检举，而是在上海投敌的蓝衣社头目陈恭澍派人持信去见他劝降的结果。

他既能说中国话，又能说朝鲜话和日本话，很快便和宪兵方面合作了。双方的条件是：他为日本警视厅服务，而日本警视厅在两年后撤消对他的判刑。如在合作期间有越轨行为，双罪同罚。正当他要收拾出狱时，突然接到了帮助“特高课”官员审查一个日本要犯的指令，这个“特高课”官员就是松本和野村，这个要犯就是中西功。时间非常紧迫，只限三天，要求他在牢房中套问出中西功和中共哪些人有联系。姓名、特征、职业、地点。

他表演得不错，分寸掌握恰当。基本完成要求。虽然未得到中国人的线索，却得到了两个日本人：“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管沼。

这两条线索关系，符合中西功的身份。东京警视厅警部补高桥兴助密电通知松本和野村，不要马上惊动他们。交由上海宪兵派人去监视，以便发现新线索。林得山立即出狱，利用中西功委托的身份，接近津金和管沼，探明他们和中共的联系，进而探明中共和中西功联系的人员。

这是个看去轻易实际艰难的差事。

而且中西功对他讲解的那些动人心腑的道理，对他也并非没产生一点影响。想当初，他也是为挽救祖国挺身而出的一个一心救国的朝鲜人，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听任日本宪兵驱使；实在有损初衷，并且，这种差事也太不符合一个“大韩议政院”议员的身份了。

所以他离开牢房前愁闷不语。

出牢房后，在监狱门口，有一辆汽车在等着他，他的妻子坐在车里，也

满脸愁苦。看样子，她也知道他的差事了。

林得山出狱后，牢房里只剩下中西功一个人，这期间松本和野村又和他“愚谈”过两天，以后便再也不来了。因为他对他们一本正经地讲解共产主义，再三再四地阐述他是为挽救日本才反对侵华战争的。松本和野村大伤脑筋。

松本和野村是东京警视厅的警吏和司法警察官，是高桥兴助的得力臂膀。在东京警视厅内部，他俩以办事干练著称。颇有名气。这次到中国来，是受高桥兴助亲自指派。

东京“佐尔格案”发，东条英机借端逼近卫文魔下台，由他组成内阁。他对日本宪兵机关和警视厅反间谍系统的无能大发雷霆。整个警视厅从上到下，个个战慄不安，尤其特高部门，人人自危，不知自己是否会由于某一失误而受到重罚。高桥兴助审讯佐尔格时受到的震惊程度，他人不能想像。一个俄国间谍，在东京住那么长的时间，送出那么多的重大战略情报，警视厅竟毫无察觉，不管对友对敌，都丢尽了脸。

他在发现“兰端”小组里没有一个中国人时，便意识到可能会有另一个佐尔格式的“兰端”小组存在于中共。他专心致志地查阅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每页档案资料。竟也没有嗅出一点与中国人有关的味道。仅有一个名叫中西功的人，和尾崎秀实交好。而这个中西功却是“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首席调查员。明白地说，他干的是和高桥一样性质的差事，有什么可疑呢？而且，这个中西功在“满铁”任职近十年。八年前，东条英机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曾密令宪兵对驻满洲的军、政、宪、特机关中的每个成员进行秘密审查。那次审查，对有不忠于大日本的言论者，概以“涉赤”镇压。那次镇压，由于捕杀过多，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像中西功这样的老“满铁”经过了秘密审查，应该是可靠的。但是，他还不放心。首相秘书尾崎秀实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事发前，有谁怀疑过他？高桥决定发个密电给“满铁”上海办事处，调阅中西功的全部档案和有关材料。同时，在东京布下网罗，各处侦察与尾崎秀实有过来往的人员的一言一动，在尾崎秀实、水野成和洪津良胜家中安下眼线，坐待不知情的大鱼撞网上钩。

两个月过去了，迟迟不见“满铁”上海办事处寄来中西功的档案，倒是收到了他们一份复电。内称：中西功君已被借调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嘱托（顾问），“满铁”无权调动其有关档案云云。高桥兴助差点被这个复电气疯了，最后通过陆军部调来存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西功的“详录”一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全是些显赫功劳的记载。再看一遍，仍无半点可疑和破绽，俨然是一位出色的帝国情报专家，难怪结论上写着：中西功是一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情报专家，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这么说是毋庸置疑了！”高桥兴助由失望而泄气。但是他仍迷惑不解。因为尾崎秀实出差去大连和上海时，都曾和中西功会晤过，他们之间，原是没有公务来往的。若说仅是朋友关系，那么作为情报专家的中西功竟未嗅到尾崎一点“赤色”气味，那还算什么忠于大日本的情报专家？如果说他们的来往不含政治内容，那才不合逻辑呢。

而且，“佐”案的最大特点便是合法的甲冑厚而硬，潜伏时间意外的长。

无奈，高桥兴助找来他的左臂右膀研究，一个是特高课长、警部补松本，另一个是他的老搭档、警吏野村。

“你们有什么可报告的吗？”他问他俩。因为在东京所有的侦破点线，

都属他俩掌握。

“没有。”野村说。

“一点没有？”

“没有。”松本作证。

“一点可疑的也没有吗？”

野村看了看松本，吞吞吐吐他说：“好像，有人给尾崎秀实家通过电话。按说，在东京，现在再不会有人为什么事和他通话了。”

“哪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尾崎家的电话，在搜查时被拆卸坏了。”

“噢！”

“有个人给水野成家通过电话，说是水野成的叔父彦三郎应征入伍了。”

“水野成有这么个叔父吗？”

“现在应征的人很多，或许有。”

“或许有？查过吗？”

“没有。没有查过。”

高桥兴助脸色陡变：“为什么不查？”

“或许水野家族确实有个应征的彦三郎。”松本壮胆地说。

“或许，或许或许或许！”高桥兴助咆哮起来，同时连连拍桌子，震得记事册和电话机都跳起来。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们对高桥这般发作，全不理解，很为之奇怪，像在说：“这有什么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现在应征的人确实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没有个应征的，有什么奇怪？！”

“或许他就是我们要捕捉的呢？”高桥兴助神经质般吼叫。

松本和野村又相视一眼，显然这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

高桥兴助怒冲冲，对他们咬牙瞪眼好一阵，然后强按怒火，压一低声音，狠狠地又问：“还有什么或许？”

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说：

“也有个人给洪津良胜家打过电话……”

“是谁？”

“只说是朋友，许久不见面，很想念他；”

“没请他到滨津家里来会面？”

“他要请洪津亲自接电话，监听的回说洪津不在家。对方追问：‘他到哪里去了？’监听的急了，说：到警视厅去找他吧。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

高桥仰天长叹了一声：

“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他：洪津已经被捕了吗？！”

松本、野村面面相觑，以为高桥又要大喊大叫呢。孰料他竟定睛凝思起来。他们等待着，片刻，高桥说：

“好啦，坐下。”

非日本人不能体会日本军阀统治下存在于各机关阶层中那种上下级关系的表现形式。即如现在的高桥和松本、野村，他们都是天皇的忠诚臣民，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始终把他们捏在一起，各自为表现对天皇的忠诚而努力，以至于剖腹尽忠。

高桥兴助和松本、野村交谈的结果是：由他俩亲赴上海，密捕中西功。因为，即使捕错了，也是为天皇；中西功也应该为天皇承受这点委屈。何况

他和尾崎秀实有瓜葛！

事情的顺利进展，确实使他俩大喜过望。现在，中西功竟坦然地承认自己是个中共！然而绝不说出任何另一个中国人。

他又使他们陷入攀登荣誉高峰前常见的泥淖，他们得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

中西功不肯和他们合作。

他们想在中国为警视厅挽回面子，企图在短时间内创造奇迹。

中西功却给他们讲什么他“为挽救日本才反对侵华战争。”

第七章 “中共谍报团案”

张明达四天往返一次上海南京，除了向沿途各站发送稿件、公函而外，别无他事，日子倒也平静。

算算程和生到杭州去已经快一个月了。不见回来，也没听到什么消息，说明太平无事。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每上火车，穿上制服，戴上臂章，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心里还喃喃自语：

“咳，本来就没事！”

又轮到他去上海了，一早，穿戴整齐到“中央社”去取稿件、公函，出了八条巷口，不意陈一峰斜里迎来轻声对他说：“我有信，给我带发。”

“是，先生。”

他明白，陈一峰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于是，到编辑部和收发科转了一圈，该拿的拿了，该取的取了，该带的带了，上楼去见陈一峰。在楼梯口，女打字员从打字室门里向他招手。

“张明达，进来进来。”

“干什么？”他警惕地笑着走进屋去。

女打字员亲热地拉住他的胳膊：“托你点事。”

“什么事？”他更警惕了，因为这位打字员是出名的“见人粘”。

“上海先施公司二楼卖‘凯司米，香水，给我带瓶来。”

“钱。”他向她伸出手，笑着。

“真小气。”女打字员拍了他的手一下，同时向他一撇嘴，送上妩媚的一笑。

她常用这种表情托人从街上给她带东西，凡是给她买来了，她总是操着上海话说声：“谢谢侬”就算完事，倒是好像那个人特意送礼讨好她，她只好勉强收下似的。因为她在打字室，有一段时间，陈一峰提议利用她做点工作，说有些密件，可以方便到手，张明达坚决反对，说此人素质不好，有什么密件他和日本同志拿不到？再说情报站是绝密，不准轻易发展人，而且提醒陈一峰：“你可不要被她‘粘上了’，”陈一峰“哈哈”大笑，拍他一掌：“你想到哪里去了？”

现在他给粘上了，得赶快甩掉她：“好吧，小姐，那您先借一点钱给我，我一定如数还你。”张明达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

“一定要还的哟！”女打字员掏出小钱包，拿出两张军票，捏在于里，对他晃一晃：“够吗？”

“我看够了。”他说。

“一定要还的哟！”

“一定还。”

“凯司米！”

“记住了。”他接过军票，向她调皮地一笑：“小姐，你知道‘凯司米’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吗？”

“该死了你！”女打字员嗔声嗔气嗔怒地举起手在空中向他扇一下。

张明达笑一笑转身出屋，却听见她又叫一声：“回来！”

张明达又回身，她向他招手：“靠近点。”

“干什么？”

“有话跟你说。”

张明达侧过头，送给她个耳朵。

她探起身，靠近他，轻声说：“听说了吗？西里龙夫是共产党！”

张明达大吃一惊：“胡说！”

“你也不相信，是吧？我也不信，他一个日本人，怎么是共产党呢？”

“别胡说八道，这可了不得。”张明达正色劝她：“传出去，人家要怀疑你。”

她害怕了，埋怨道：“我对你好，才给你说嘛，别不知人心嘛！”

“好了，好了，好了！别乱说话。”张明达向她摇摇手示意，忙出门。心里“噎噎”地直跳，进了陈一峰办公室。

陈一峰脸色阴沉，见了他，劈头就问：“看病去了没有？”

张明达说：“没有。”

陈一峰向他指指隔壁。那是西里龙夫的办公室，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被捕了。”

女打字员的话被证实了，张明达只觉得头脸发热，怔怔地瞪眼看陈一峰。

陈一峰向他一摆手：“快去吧。”

他当下明白；急忙出门下楼，出复兴路125号，回八条巷自己的屋，脱去制服换了装，赶往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李得森的诊所。

李得森不在家。张敏告诉他：“老李到上海找老吴去了。”然后向他证实：“日本同志确实被捕了。”

“我们怎么办？”他问。

“等着吧。”她说：“该于什么干什么，等他回来再说。”

张敏是个小学教员，举止言谈恬静文雅。到南京站来，和李得森夫妻两人以开设中医诊所作掩护，建立起南京站，指挥大家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工作。

“我们失误了。”张明达恼恨他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怎么交待！”

“我们只能如此。”张敏低声说：“西里刚交来一份情报。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要进攻中途岛。我处理的，老李带去了，今天你到上海，打听一下程和生的消息。”

“程和生叫我等他。”

张敏想了一阵，轻声说：“也好，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着，一切等老李回来再说吧。”

张明达去了上海，当晚宿在闵行路自己家里，家里人说：“程和生没有来过。”第二天回到南京，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

老李却还没回来。

一连三天没见到老李的影子。

张明达问张敏：“会出什么意外吗？”

“不知道，反正我在这坚守着。”她说。

“那当然没有问题。”张明达横眉仰头：“但是听不到消息，憋死人！”

是啊，在公开战线上，敌情不明的时候，令人着急，难下决心。在这隐蔽战线，情况不明，尤其令人不安。

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归来，才见李得森摇着大纸扇在给患者瞧病，他大大松了口气，排在候诊的最后一名，坐在椅子上观察老李。

看不出老李有什么异样，仍如往常那样不慌不忙，按部就班，也不向他送什么暗示的眼色。

他的心稳住了。

待最后一位患者告辞出门去，他到老李桌前坐下，轻声问：“怎么才回来？”

李得森起身去洗手，张敏给他送来一杯茶，一条毛巾。老李回到桌后坐下，半天不说话，张明达意识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话，便单刀直入问道：“出了什么事？”

“哪能老出事！”老李故作平静。

“见着啦？”

“见啦。”

“怎么决定？”

“暂时不动，坚持，原地不动。”

“还有呢？”

“如果我们立即撤退，恐怕要给被捕的几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难。使他们陷入不能应付的境地。”

“这两句话说了六七天？”

“不错，六七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张明达感觉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辆快速行进的轿车里，车子突然刹住了，心理顿时升起一股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滋味来。两人沉静片刻，张明达自言自语他说：“就这么干等着？领导上总该给想个具体办法呀！”

李得森没有回答，脸色很难看。

“怎么？吵架了？”

老李仍然不声不响。张明达明白了，定是他和老吴发生了争论。

“中西功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着说。

张明达不觉惊问：“程和生呢？”

“没有消息。”

张明达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说道：“事已至此，只能是这么办了。应该说，领导上这个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是正确的。当然，决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险性，特别是我们南京站，应该坚决执行领导上的决定。我是站长、书记，没得说的，叫我上刀山，我眼睛不眨。可是我身后还有一大帮呢，就是现在转移，也不能拍拍手、掸掸灰，说走就走啦。得安排掩护职业，得改名换姓，得找妥关系，哪点安排不当，一旦出事，又是白白送给敌人了。”李得森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

张敏急忙制止他：“看你说了些什么？”便转向张明达道：“回来就这个样子。”

李得森把大折扇“哗”地一声打开，扇了两下，又“哗：’地一声折起，往桌上一摔，突地站起，冲动得脸红脖子粗：“现在几个地方都出了事，情况这么紧急，剩下我们这个南京站，还要我们在这等着。”

张敏向他正色喝道：“你冷静点好不好！”

李得森焦躁地左转转，像寻找什么，不响了，张敏把掉在地上的大折扇捡起来，往桌上一拍，转身走了。

过了一阵子，李得森才用缓和的口气对他说：“就这样，六六天来，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等着吧’。”

张明达无话可说，还有什么好说的？等就等着吧。他希望有转机，但是他干过武装，知道什么叫阵地，内心里便打定主意，准备牺牲。回到八条巷，

重新把自己房间里的每件东西检查了一遍，床上席下，桌子抽屉里，到处翻个遍。除了“中央社”的印刷品而外，一张可疑的碎纸片也不留，任你什么宪兵特务翻找去吧，墙角砖缝花盆里，电灯罩子底座下，门窗木板裂隙间，什么也没有，衣袋里除了“中央社”的职员证而外还有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还有一张“良民证”。噢，不，在另外几件衣裳袋里还有三张“良民证”，得转移到别处。最后定神仔细地想，现在只剩一条百来斤的汉子，看着办吧。除此之外，找不出一点牵累别个同志的痕迹和可疑之物。在这个胸膛内除了鲜血别想得到别的。那颗心，即使不跳了，也是共产党的。行了，如此这般，等着。

他心境平静了，从头到脚轻松了。但是，还有一缕心事：他惦念程和生。李得森朝张明达这么发泄，并非无来由。

自从陈一峰告诉他西里龙夫收到中西功来信说，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密捕中西功的消息后，他便为西里龙夫担心，西里是归他领导的唯一日本同志。多少情报都来自他，若有个差池，该是多大损失，怎么向党交代。于是，便派张明达去上海请求“专项请示”，并要“坐等答复”。孰料答复竟是“等等看看”！并且还说这不仅是对西里问题的答复，也是对南京站的指示。在服从上级的原则下，他才想出了“工作轻装”的动议。他自己也知道，那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西里龙夫被捕的那天傍晚，陈一峰来给他报了消息，他当即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见老吴，商讨良策。到了上海，见了吴纪光。吴纪光对他的到来，好像并不意外。很快做了食宿安排。因为上海情报科调整组织之前，他们已经熟悉了。所以，双方没有什么废话。吴纪光听了他的意见，也说言之有理。但到底怎么处置这个局面，他得去请示上级。谁知一去就是一天，当夜没回来。他以为老吴出了意外，一夜没敢上床，躲在门后，竖起耳朵，直到天亮。第二天傍晚，老吴回来了。看得出神态有变化，脸色眼神都是表演出来的平静和稳定。李得森问他上级怎么答复的，他不当事似地催他先吃饭。饭后李得森又急着问他，他才对他说：“回去吧。”

“回去？”李得森惊问：“南京怎么办？”

“坚持。”

“坚持？”

“坚持。”

“怎么坚持？”

李得森目瞪口呆好一阵，又轻声问：

“这可是你的指示？！”

“怎么是我的指示？是上级的指示。”吴纪光做出笑脸。

“我要求见上级！”李得森沉下脸说。

“已经不在上海了。”

李得森认为这个指示不符合形势。于是，他极认真地问：

“你说句实话，这是不是上级的指示？”

他这一问，伤了吴纪光的自尊心，怎么可以在传达上级指示方面怀疑他呢？谁敢于这种事？他脸色涨红，猝然说：“是我的决定。”

李得森虽然感到这话带气，却低声说：“我很难执行啊！”

再看吴纪光，见他脸色严肃，没有冲动的情绪。可见这的确是上级的指示。他不由得慌乱他说：“叫我怎么办？”

“别再说了。”吴纪光正色他说：“回去吧。中西功已经被捕了。”

“啊？”

“北平方面，白井和尾崎也被捕了。”

李得森连“啊”也叫不出来了。中西功、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都是他熟悉的名字。

他正发愣，忽听吴纪光又说：“你在这住两天也好。看看形势怎么发展！”

他在上海住了几天，这几天里，脑子里翻来复去想主意，怎么保全南京站，却始终没想出来。心里惦念同志们，没有主意也匆匆赶了回来。

很显然他是勉强执行“上级指示”的。在上海他向吴纪光告别时，有点伤感地问：“如果因此造成牺牲损失，怎么办？”

“每人都要准备牺牲！连我们自己。”吴纪光不容再问地板着脸。

为做到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他回到小火瓦巷1号后，端个“稳坐钓鱼舟”的架势，照常开门营业。但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停的折腾。张敏劝他冷静，竟越劝越不济事，刚才一提到中西功，他又不能自己地激动起来。可以看出，他对上级的指示有意见。但是作为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能是一边又叫又跳，一边严守纪律，服从指示，坚持工作。

在这里必须补叙明白吴纪光向“小开”请示的经过情形：

“小开”听他说完关于日本同志被捕的报告后，心情沉重他说：“现在你们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危险，到了关键的时刻。如果判断得准确，处置得当，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走是留，我也很犹豫，难下决心。听说中西功等日本同志的问题是发生在日本本上。如果我们中国同志马上撤退，很可能暴露他们与我党的关系，给他们造成更大的困难；如果不立即撤退，可能会牵连到更多的同志，使组织遭到更大的损失。考虑到中西功等同志都很坚强，肯定下会说出组织秘密，为便于他们在狱中应付敌人，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再等等看为好。”

听罢，吴纪光大彻大悟似他说：“我坚决贯彻。”

但是，他没向李得森详细说。只在送李得森回南京时对他：“准备牺牲。”而且还没看李得森的神色。

程和生在杭州等待中西功。无事，在街上转游，先后两次到望江路小书摊去看，仍不见女老板的影子。第三次，见门开了，女老板打扮一新，开门摆摊。程和生一喜，走上前去：“老板，忙啊。”

女老板向他一笑：“先生，您忙。”

“拜托的事，有劳您了。”

“好说，大家都是为赚钱嘛。”

“东西有了吗？”

“东西有是有了，先生，您想想，我一个女人，怎么敢带在身上？”

“在那里呢？”

“在绍兴乡下我家，你什么时候要，我什么时候带你去拿，我不骗你！好吗？”

程和生一听口气，挺诚恳的，便欣然答应：“好吧，一言为定！”

他像完成了一个任务似的，闲着无聊，决意回上海去看中西功，算算他回上海去已经十多天了。

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他到留青小筑28号敲中西功家门，没人应。

他在留青小筑绕了一圈，也没见中西功家的一个人。估计大概有事外出

了。

第二天，他去看老吴。老吴一见他吃惊地问：“你怎么才回来？”

“中西功叫我在杭州等他，但他回来十多天了，也不回杭州去，所以我回来了。”

“噢，你还不知道？”

“知道什么？”

老吴沉思了一刹，平静地轻声说：“他被捕了。”

程和生一怔，呆了，轻声问：“什么时候？”

“十来天了。”老吴脸色阴郁地向他说了最近发生的情况：中西功6月16日被捕，第二天南京的西里龙夫也被捕。7月7日，北平的尾崎庄大郎被捕，同一天，出差山西的白井行幸也被捕，那是华北宪兵干的。最后他说：“看来，日本警视厅对他们早有布置。”

程和生听罢，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说什么敌人“早有布置”？分明是你不采取措施。他低声问道：

“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现在在哪里？”

老吴凝神他说：“不知道。”

“我们有可利用的关系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吗？”

“没有。”

“我们应该打听到他们。”

老吴轻蹙眉：“是啊，不过要相信他们，不会出事。”

程和生说：“我相信他们。但是我们要去了解情况。再说，我们也要作准备啊。”

老吴轻声他说：“要沉着。”

“只沉着不行，还要行动！”

“怎么行动？我们只能这样。”

“我们要对党负责任，他们被捕，我们损失了两个‘主力军’和一个‘野战军’，再等下去，要全军覆没的。”

老吴不讲话，蹙眉半天，才说：“损失是难免的了。可是，我们要坚持，和阵地共存亡。”

程和生明白，他这话是准备实践誓词，便向他告退。临出门时，又回头对老吴说：“但是，你要提高警惕。”

老吴只是点点头，看也没看他。

傍晚，他又到留青小筑28号去敲门。想见见方子和惠子，打听中西功的消息，半天仍没人应。楼梯口下来个年轻日本女人，看了他一阵，向他摇手，对他说了一串日本话，程和生跟中西功学会几句简单的日语，听出她的话里，有两句是说“这里没有人”，“回日本去了”。

当天晚上，直到深夜两点多，他还没睡着，在膝陇中忽然看见中西功出现在面前，刚和他说了句什么话，忽然不见了，他忙伸手去拉他，身子一动，便惊醒了……

最亲密的战友被捕，他痛恨自己失误。后悔在杭州时没有坚持说服他到四明山去。特别是那天，当中西功接完电话，说家里有事要他回上海的时候，自己不多个心眼想一想，哪怕替他回上海来看一趟也好啊。或者，提醒中西功在电话上问清楚什么事也好啊，都没有，连一句话也没说，就送他上车了。这还算个什么联络员？临去杭州还向老吴作过保证呢！

现在中西功在哪里？日本宪兵定要对他施刑折磨。他忍受得了吗？相信他会坚持，给组织一个转移的时间。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整个上海科却原地没动，像没有这么回事，老吴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他坐立不安，其它事情都可暂时向后推一推，无论如何也要打听到中西功的消息。他决定到“满铁”调查室去一趟。他去了，由于会几句日本话，没费什么事便进了情报科，见到了堀勇记。这个堀勇记，昭和12年4月，就是1937年4月进的“满铁”总裁室，12月受委派到派遣军司令部顾问室从事重庆方面情报工作。1938年10月重新又回到“满铁”总裁室情报科，这人涵养极好，从他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情绪变化。他有超人的记忆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和他见过一面，半年后他仍能说出这人的体型五官和语言表情特点。程和生认识他，是跟随中西功和他研究过情报。

堀勇记见了他，既没有对相识者的客气，也没有陌生者的盘洁。问他：“你有什么事？”

为使谈话尽快达到目的，他说他受中西功先生雇用，到西安去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现在回来却不见中西功先生，特来向堀勇记先生打听。请问先生，中西君现在在哪里？

堀勇记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两眼直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拉开桌抽屉，拿出一叠军票，放在他面前，说：“中西功先生确实向我表示过，他能够派人到西边去，现在我决定撤销这个协议。这笔钱是给你的绝交费，我们之间，从现在开始，关系完全断绝了。你走吧。”

“请问，中西功先生现在在哪里？”

“中西君回国旅行去了。”堀勇记伸直左手，指向门口，向他点了一下头。

他只得告退。

“拿走绝交费。”堀勇记把军票向他推一推。

他心里自问：“这个堀勇记是什么人？他和中西功是什么关系？绝交费是怎么回事？”抬眼再看堀勇记，还是那样子满脸无表情。

中西功下落不明，领导又是这么个态度，他心急如焚，几天便消瘦了一圈，两只眼睛更大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莫解的惶惑。

没有领导的命令，他不能擅自乱动，更不敢对他所联系的党员们流露一点情绪。他也没到闵行路张明达那里去，见了面说什么？何况他还必须遵守老吴的指示：“目前是非常时期，停止一切活动，静观形势发展。”

到上海情报科担任联络员以来，他处处谨慎，恪守纪律，他心里总在琢磨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这是给党中央搜集战略情报的，是卡敌人脖子的最重要的斗争岗位。他暗中有一种自豪感。每当和中西功接触，他都要从中西功那里学到点什么，或理论，或对时局的研究，或对日伪军政决议和行动的分析，或对“满铁”内部周围各色人物间怎样应付，每有体会，便牢记在心。他常把现任工作和公开武装斗争作比较，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公开武装斗争，流动性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突击性大，战斗一打响，一鼓作气，胜败立见分晓。连续作战，当然也要力争胜利。战斗下来，休整、学习、练兵、宣传、大张旗鼓地壮军威声势。地下工作则不然，需要绝对隐蔽，使敌人没有一点感觉。在长期观察敌人、积累敌情、摸到敌人脉搏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任务。上海情报科还不同于一般地方和部队的敌工科，那些单位任务比较单纯，情报也多是局部性的。上海情报科要在敌人心

脏里长期埋伏才能达到目的。

对他的职责，他兢兢业业，力求使自己在中西功和老吴之间、南京站和老吴之间信息及时、气氛自然和谐，工作合拍顺利。他从来没耽误过事，出什么差错。他本来就不多言多语，什么事都是心里明白就行了。他和老吴接触，没有和中西功接触的那种亲切感。老吴不像中西功那样平易近人，甚至随和。对中西功，你可以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问题，都可向他请教。中西功像个老师，直解说到你明白为止。老吴总是三言两语，除了交代任务，别的没有话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你快离开他。但是看得出，老吴绝对信任他，把他当得手应心的工具。从党内原则讲，这很正常，然而总觉得缺少同志间那种亲切。就他所知，老吴对南京站的老李、张敏、陈一峰、汪敬远，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四人去南京前，都在上海和老吴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闹得不愉快，汪敬远常叹气，张敏两眼“咕噜”转，就是不说话。陈一峰嘴不把门，两杯酒下肚便借生活琐事，用说笑话指桑骂槐地发牢骚，绕来绕去，最后必落在讨厌这“首长作风”上。他常大谈痛恨商店老板，说他们是衣架饭囊，这些话，可以理解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意识，但是了解内情的，也可作另一种理解。老李是另一种形式，平时有不满憋在心里，节骨眼上说两句不冷不热的风凉话，如果在领导碰头研究问题时，只要老吴对他板脸，他就毫不客气地瞪眼和他对吵。

建立南京站以后，他们四人都去了南京，上海科清静多了。

但是这一次，事关整体，老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一味叫大家等待，静观，这可不是办法。等待什么？静观什么？几个日本同志全被捕了，连一点下落的消息都没有，时间一天天地耗过去，难道这也叫长期隐蔽吗？他想过，至少叫大家改换个住址，改变个掩护职业，也是一种措施，即使不许离开上海、南京也行。

他实在地忍不住了，决定去找老吴，向他平和地陈述一次自己的意见。

老吴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请他坐下，递给他芭蕉扇，又给他沏了茶。这些动作，过去也有过，可是这一次，老吴没有正眼看他，也不坐下，像在心里琢磨怎么应付他；冷冷地问他：“什么事？”

他仍然用以往对上级的尊敬态度和口吻，向老吴笑道：“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老吴看他一眼，等待着，仍是站着。

他原是不善辞令的，但今天下定决心要认真地和老吴谈一次，便也不慌不忙，逻辑清晰他说起自己要说的话来，先说中西功被捕，自己内疚、悔恨，在斗争中缺乏经验、幼稚，没有保护好同志，请示组织根据情况，给以处分，目的是教育别的同志。

说到这里，老吴在他对面坐下了，摇着一把大蒲扇，歪着头，眼睛仍旧不看他。

他继续说，由于不知道中西功的情况，心里很着急。而且每过去一天，这种着急心情便增加一分。不知道上级通过什么渠道掌握了中西功的情况没有。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老吴，老吴还是那么不动声色，也不回答他。

他敏感到老吴不想和他说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拐弯抹角打住，把谈话限制在打听中西功消息的范围以内，也无不可。老吴对此也无可指责。

但是老吴却是一副拉开架势尽他说的表情，他意识到谈下去将遇到困难。说可不说了呢？转念一想，既然他是这副架势，而且自己也是决心准备了

的，便索性说下去。他说他对当前的形势很担心，日本人对“特别调查班”不会不怀疑，班里那么些党员，还都蒙在鼓里。毫无思想准备，一旦日本宪兵动手，一个也逃不出去。这个损失太大了。南京站呢？都是些党的骨干，是些有资历、有经验的干将，如果不及早安排，遭受了损失，势将没法弥补。

他说得很慢，郑重其事，使他自己都吃惊，怎么竟对领导如此讲话，好像对小学生那样上起课来了。再看老吴，只歪着头，呆呆地一下一下扇扇子。没有过去那种不许说话的神色，他心里有点高兴，想道：“他在考虑我的意见吧？”

他说完了，老吴还是那样一下一下扇扇子，像在思索。

“我的意见全说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

老吴又摇了几下大蒲扇，看了看他，问道：

“都是你个人的意见？”

“是我个人的意见。”

“见过张明达？”

“没有。”

张明达没找你？”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见过李得森？”

“没有。”

“他没去找你？”

“没有。”老吴直眼盯了他一阵，口气缓和地轻声说。

“意见嘛，党内民主，谁都可以提。”

老吴摇了几下蒲扇，好像在生谁的气，继续说：“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人，形势有利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是好汉，也能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他们的法宝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两人谁也不说话。程和生壮壮胆子说：“把大家换换住址地点怎么样？”

“怎么换？”

“调动一下。”

“怎么调动？”

“互相调动一下，暂避一下风头。”

“怎么互相调动？”

“南京上海两地换一下。”

老吴拿起大蒲扇猛摇了几下，然后抬眼看着他：“都离开各自的掩护岗位？”

“可以找新岗位掩护。”

“工作呢？”

“在新岗位上逐渐深入。”

“什么样的新岗位？”

“研究嘛。”

“什么样的新岗位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们为安排一个陈一峰费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说汪敬远了。你说是调换，敌人怎么看？人不见了，不就是逃跑了吗，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

敌人的手掌了吗？我们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吗？你怎么想的嘛？！”

“可是，我们……”

“我们怎么了？”

“作为领导，你要考虑我们的处境。”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这样直视老吴，顿觉全身发热，头上冒汗。

老吴却冷冷地正面直视着他，轻声问：“你还记得入党誓词怎么说的吗？”

“记得”。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记得就好。”老吴摇起扇子：“现在你要反省为什么随声附和地提撤退。”

“我没随声附和谁，这是我自己的意见。”

“那就更应该深刻反省。”

“我也没提撤退，我提调换住址地点。”

“本质是一样的。”

他很想起身告别，但就是站不起来。他又很后悔，本想来好好和领导谈一次心里话，给领导当参谋，共同研究一个使同志们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继续工作的方案，却怎么谈着谈着竟要用入党誓词自我反省了！

从什么地方错起的？赶紧补救。

“你听着。”老吴直视着他，脸色严肃：“以后，不要再提撤退了。”

程和生抬起头，快快地起身而去。

吴纪光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茫然，刚才硬端的领导架子垮下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本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才对。”

林得山被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车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270弄26号他自己的住宅后，倒比在拘留所里还坐卧不宁了。在拘留所里，他安排他的中国妻子跑领事馆，跑拘留所，跑陈恭澍，请求他们按照谈好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在上海经营旧业，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帮助新“国民政府”办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陈恭澍出面活动，事情还算顺利。不料却冒出个中西功的事来，他不敢不接受领事馆、“特高”、拘留所三方联合交给他的差事。虽然比预想的提前几天出了牢房，但还不如在里面多蹲几天呢。因为与其说早放他出狱，不如说是早被日本人驱使。

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赋，林得山也不例外。当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围几个同胞间流传，那歌词是：

“流亡到这里，不知多少时候，
我亲爱的祖国！
望了又望，再不看见你那美丽的山河！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
我亲爱的故乡？
静静的夜啊，
冷冷风啊，
明月向西落。”

那曲调是纯粹的朝鲜民歌旋律，凄婉深沉，他每唱起来便潜然泪下，从

心里往外发冷。

那时他用经营自来水笔的生意作掩护。30年代，自来水笔是洋玩意，在中国市场销路很大，收入可观，他把盈利都用来支援“大韩临时政府”的活动了。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对蓝衣社的行动很赞赏，和他们来往很密切，和陈恭澍私交尤深。陈恭澍派人拿着信到香港去见他，他知道逃不脱了，因为他对蓝衣社的手段了若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必须绝对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现在他倒从心底钦佩那个中西功了。他是个日本人，竟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这是反对他自己的祖国啊，而他却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祖国免遭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

想不到他们的宗旨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连日本在内。他从中西功的谈话中看出，中西功就是那种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但是，但是啊！他不能实践对中西功的承诺。他知道，在他身后，有日本的和汪精卫的甚至还有蓝衣社的人在监视着他。

他的中国妻子只知道可怜巴巴地听他指挥。

他没叫他妻子到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去找俄国的弗利浦书店，也没叫她去找塔斯社，更没叫她找个女伴到霞飞路去大声谈论：“中西功被捕了”，当然也没找到启东去给新四军送信。

他给 13480 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日本人：“找哪个？”

他用日语说：“请找津金先生讲话。”

“你是哪个？”

“我是他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

“林山一郎。”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霞飞路 1270 弄 26 号。”

“你有什么事？”

“你是哪位先生？”

“我就是津金。”

“噢，津金先生。有朋友托我带信给你。”

“什么信？”

“你的朋友中西功被捕了。他要我见你。”

“噢，请你在府上等候，我马上到。”

“好的，记住，霞飞路 1270 弄 26 号，林山一郎。”

他挂上电话，回家等待。只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 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闯进了 26 号房里，各处张望一眼，围定林得山问：“你是林山一郎？”

林得山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连忙用日语向他们申明，他是受领事馆差遣寻找津金的。但是他们说他们无权听他解释，根本不由分说，把他装上汽车，直送到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他才闹清楚，原来津金早已不知去向。“满铁”接到特高

课通知监视他的时候，便已找不见他了。既然林得山通电话给他带信，接电话的人当然怀疑他而报告领事馆了。

一场误会。

林得山被他们这样抓来抓去，心下很是懊恼。但是，投敌分子有什么懊恼的权利？从领事馆出来，他又到“同盟社”去找菅沼。

“同盟社”的人都说不知什么时候起，菅沼便已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他明白，这位菅沼先生也逃走了，差事没办成，心里倒有点幸灾乐祸。奇怪！

他不敢耽误，立即到领事馆去如实报告销差，以为从此可以自由了。

领事馆两个日本人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对他很温和，向他道了“辛苦”，然后对他说，还要“拜托”他给以“合作”。并说：据他们调查，“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菅沼，都是中西功的朋友，都是嫌疑犯，现在既然已经逃亡，就是中西功的同党、帝国的叛逆分子。那么，毫无疑问，中西功在“满铁”领导的“特别调查班”，每一个人都是大大的嫌疑犯。其中它的班长，叫程和生的那个，和中西功关系十分密切。既然上海“同盟社”菅沼是中西功的同党，南京“同盟社”有个西里龙夫也是中西功的同党，那么，在“同盟社”内，嫌疑犯必定还有多多的。这些，都由两地的特高部门去调查，林先生不必费心。“拜托”林先生去费心的，是调查共党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同盟社”和“满铁”之间的联络人员，也就是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联络人员。

“那是一定有的。”一个日本人微笑着肯定地向林得山点头。

“他们不用无线电联络，我们是知道的。”另一个说：“如果用，我们会截获电码加以破译。他们很严密，只用专人传递信息。”

“你可以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的人交朋友，可以到南京‘同盟社’去交朋友，你可以走出上海，在京沪之间活动，我们和你太太联络。”

“时间，20天够了吧？”另一个陡然变色，喝问。

林得山已经领教惯日本人这种喜怒无常的“德性”了。于是平静地说：“我试试看。”

“不！”那日本人狰狞地毗出牙叫：“一定要拿到，这是你的服刑劳役！”

那个微笑着的日本人仍旧微笑着：“我们已经相信你了，不要错过机会。你愿意回到监狱去吗？”

林得山点一下头：“我努力！”

“要拿到真正的共党的！不许胡指乱说，不许敷衍塞责，如果出现那等事情，定要严厉惩罚。”另一个日本人越发凶狠了。

林得山又点头：“我不敢！”

他知道，现在他如同一只脖子上套了铁圈的猴子，绳子的一端握在日本人手里，听见锣声不爬竿，就要挨鞭子。

他悲哀，因为他不是猴子。

他到“满铁”上海办事处去，打听“特别调查班”，据看大门的说“特别调查班”不在“满铁”院内，在对面楼上，但是那里现在已经被宪兵队占用了。

他到对面楼上去打听，被值班宪兵盘问了一番，所幸他会说日本话，又有领事馆发给的“派司”，未引起大麻烦。至于“特别调查班”搬到哪里去

了，值班宪兵说不知道，也不允许他上楼去打听。

于是他去进行另一项差使，调查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去同“特别调查班”和“同盟社”的人交朋友，是个好手段。但现在死乞白赖去找“特别调查班”，如果里面真有“共党分子”，会不怀疑他？闹不好，难说不把小命丢了。近年来，他与蓝衣社打交道中，耳濡目染，变得十分胆小。在拘留所里，对中西功，他把原名林得山说成任得山，为的就是留一手。

他决定先到南京“同盟社”去观察一下。同时路上留意各色人物，既然那个“共党分子”是在京沪两地传递信息，自然要往返于京沪间。他可以化装成各种人物：商人、小贩、农民、士兵、学生、官员、记者、工人、职员，天哪，这可太难了。

他化装了一下，头戴草帽，身穿纺绸裤褂，手摇黑纸折扇，使自己看去像个赋闲的政府职员，神态滞洒，在车站候车室内外游荡。

他可不像那些愚蠢的日本宪兵和汉奸便衣。他们走到哪里，都先把幌子挂出去：大瞪着眼，故作威严地注视着一个个毫不可疑的人。有时竟要面对面地看那人十几分钟，只要那人有一点“反常”表现，便动手抓，不管怎样，抓到宪兵队就是“抗日分子”，就是请了“财神”。

他快速地扫视在他视野之内的男女青壮年，绝不研究他们的服饰和携带了些什么东西，而只观察他们的神色，对公职人员打扮的尤其注意。他忽然觉得这又好像是个显示能力的好机会了。

开往南京的票车还没检票就已经过点了，检票口外挤满人。汉奸警察在入口处两边把守着。他又扫视了一阵，未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便又到人堆外观察在广场上流动的人们。在他想来，这种“共党联络员”也许常趁人不注意之间悄无声息地混过检票口，坐上火车，或者不经过检票口而径直从什么地方溜进车站。

检票了，放行了，他随人流进站上了车。

日本占领区的普通中国人坐火车只有一个字：怕。怕走过身旁的日本人，怕坐在邻近的汉奸，怕查票的敲诈，怕穿白褂子故意敞开怀的流氓，怕背着锯斧铸挫的和那些一直抱着一条扁担两腿泥的黑脸汉子，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汉奸或者国民党的“游吃队”队员。因为徐州铁路上常有冒充八路军游击队打票车而趁火打劫的消息在偷偷流传。

林得山一出现，便招得许多人向他投来畏惧的目光。他自觉突然矮人半截。他知道，这种情势下，注意看哪个人一眼，哪个人都要远远躲去。

“你的！”突然，从他身后车厢门里，一只手抓住他腰后衣襟，用力一拽，把他拉进车厢。他忙转身看，是个腰挂短枪的日本兵。

这是跟车的日本“乘警”。

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坐下！”

他用日语向日本兵说道：“我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

日本兵见他说日本话，而且很流利。脸上的凶狠，顿时消失，眉头挑起笑意。

“日本人？”

“是的。”

“那么坐到我身边。”

“谢谢。”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这是“特席”。

这个车厢里，坐位空闲。没有人说话，被沉默的不安笼罩着。

“你要到哪里去？”日本兵问他。

“南京。”

“公干吗？”

“不，我是侨民。”

“噢，大东亚战争胜利，你高兴吗？”

“当然。帝国海军，世界无敌。”

日本兵举起头，向前凝视，像是不高兴了。

“不是吗？”他问。

“首先是陆军的赫赫战功。”

“的确是这样。”他附和地讨好。

而日本兵却不再理他。他也学日本兵那样坐正了身，作出肃穆的表情。

日本男子都要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气质，因为这有关国体。

但是规矩死板地坐在行驶的列车上，是件很枯燥乏味、很累人的事。他又不好马上离开这个座位，离开这个日本“同胞”。

车到无锡站停靠了一段时间。旅客上下，互相拥挤，嘈杂了阵，车启动时，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特席”上。这时候，车厢尽头甬道走来三个人，一个穿白绸长衫的老头，满脸皱纹，身后跟个小女人，衣着洁净，搀扶着他。他们后面，一个矮个青年，一张娃娃脸，身上穿套制服，肩头挎个大帆布公文包，凭着年轻力壮，三挤两撞，抢到了老头前面，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走到车厢中部，在一张空椅前，从肩头上抹下公文包，往椅上一扔，像早被这大包压累了。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揭去盖，仰起脖，大口大口往肚里灌水，灌了一阵，抹抹嘴唇，把玻璃瓶盖好，塞回包里，又伸手在包里毛手毛脚地翻腾了一阵，拿出了一捆新闻稿，抽出一份，又把大捆放回包里，这才坐下。他向窗外看了一眼，拿起稿子，身靠车壁，伸开腿，看新闻稿，既不观察周围，也不作任何掩饰，好像在自己房间里。

林得山一时心里好笑。再仔细看，见他高高撑起的胳膊上，戴着臂章，黄底红字：“中华联合通讯社”。

噫？中华联合通讯社？不是中华维新政府的“通讯社”吗？不是和“同盟社”有业务联系的吗？太好了，不妨和这个“小把戏”攀谈一下，交个“朋友”，由他引路进“同盟社”。

现在马上和他说话？还是跟踪他，找机会？

思索一阵，他对日本兵说：“要那个年轻人坐到这里来。”

“干什么？”

“我有话跟他说。”

“你会说中国话？”

“侨民生活时间长，会的。”

日本兵向小伙子吼一声：“喂，Boy！”

小伙子闻声撩开稿子，转头看日本兵。

日本兵手心向上。像往嘴里扇空气，向他招手，示意他坐到他的面前来。

小伙子立时起身，抓起公文包带，往肩上一甩，手里捏着稿子，挺着胸膛大摇大摆快步走到日本兵面前，把公文包往空椅上一撂，坐下了，挺胸直腰，仰头青日本兵。他学日本人那样直眉瞪眼，等待这日本兵要他干什么事？

日本兵见状很高兴，向他呲牙一笑，同时向他竖起大拇指。

我们的张明达碰上热闹了，他作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地被一个日本兵拉上了这个小舞台。过去，他坐火车的次数太多了，没有哪一个押车的日本兵招呼过他，更没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和押车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再看那穿便衣的，那穿戴和神态颇有点来“你是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林得山问他。

张明达转眼看他，又看看日本兵，仿佛不明白，日本兵招呼他过来，这个汉奸怎么问起他话来？他又看林得山，脑子里打转，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招他过来，这家伙却先和他说话，而且问得好奇怪，臂章上写着呢，既然看到了，问什么？找话题套近乎？坐车闷了寻开心，还是另有所为？不管你干什么，“中联社”的牌子是很响亮的。

他点了一下头，带着挑衅的口气：“是的。”弦外之音像说：“怎么了？”

“知道‘同盟社’吗？”

“当然知道，和我们在一座楼里，南京复兴路125号。”

“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林得山笑道。

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信差！”脸上顿时布满不可一世似的骄傲。这一来，林得山便对他产生了错觉。在他看来，这是个还不谙世事的失学青年，捞到这么一份差事，自觉了不起，不自觉地狐假虎威起来，这种“小把戏”，在上海、南京，他可见的多了。于是不觉笑起来，又问道：“干了多久了？”

“嗯”，张明达脑子里打转：问这个干什么？毫无来由，我对你小子没有说实话的缘份，干脆答道：“半年了。”

“噢。”林得山看着他：“满意吗？”

“当然满意，很满意。”

这时候，那个日本兵对张明达的大公文包感兴趣了，探手去拉。张明达没拒绝，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怀里去。今天他的公文包里，没有一张密写的情报。

日本兵解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新闻稿，打印的、手写的，还有一摞信，有的是白纸封，有的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机关长大信封，除了装水的玻璃瓶，包底下还有一个虎牌万金油小圆盒，日本兵揭开小铁盒，闻了闻，捏在手里，举在张明达面前抖动着，笑着，用日本话说：“好东西！”

张明达眼皮一眨，脑筋一动，为了工作方便，也是他求知欲太强，自学了日语，这时正该用上，便用日本话说：“送给你了！”

这一来，日本兵大喜，立时用日本话问：

“你会说日本话？”

张明达立即说：“可以对话。”

“哟唏！”日本兵抠出一点万金油在鼻下、上唇抹了抹，高兴得“哈哈”笑。

张明达这一句日本话不打紧，却令林得山起了疑：这个“小毛头”会说日本话？小瞧不得，这种年龄的少年，会这样发音准确流利地说日语的，实属少见，是个什么人物？带着欣赏又有点讨好地问道：“是日本人？”

“不，中国人。”

“唔，南京同盟社有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你认识吗？”

张明达心头一怔，他问西里龙夫，是个什么人？和日本兵坐在一起，是找西里龙夫的，还是一般认识西里的？他打定主意：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同西里关系怎样，老子不认账，便断然回答道：“不认识。”

“他是我的朋友，”林得山说。

“是吗？我们那里日本人很多。”

“你怎么不认识他呢？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记者。”

张明达好像逐个回忆了“同盟社”哪个日本人名叫西里龙夫，抱歉地一笑：“不认识。”

这令林得山又起疑：干了半年的信差，又会说日本话，竟不认识社里的日本头面人物？再看这“小把戏”的神态，忽然觉得他又不像是个失学青年了，倒像个在社会上经过风浪的“老把戏”，看他对日本兵那应对的态度，再看他对我的神气，俨然是个在社会上、人际间很能恰到好处的、掌握分寸的“老职员”。上海领事馆警察署交代过他：到南京“同盟社”去活动，可以声称自己是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的朋友，人们会告诉他，西里龙夫已经被捕了，他可以打听西里龙夫和谁是最要好的朋友，然后约他私谈，说他见过西里，西里托他有要事转告，然后相机行事，调查清楚西里与共党的关系，那样也就会调查到活动在南京、上海间给中西功和西里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了。现在这个看似“小把戏”而行动神态又像“老把戏”的青年，就在“同盟社”的楼里任职，竟不认识西里龙夫？奇怪！

他哪里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小把戏”也罢，“老把戏”也罢，就是不仅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而且给南京、上海两地中共重要情报部门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

在他脑际，刹那间也掠过一个念头：这个人会不会是干这个传递信息差事的“共党分子”？他略加思索，很快便自我否定了，从是个“小把戏”分析，共党不会使用“嘴上没毛”的毛孩子担负这种重要差事；从是个“老把戏”判断，共党更不会使用一个老奸巨滑的“老把戏”，因为他们常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那可真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为，共产党敢把这种重要差事交托给这种人？

在他的想像里，这个传递信息的联络员，当是个风流调俏的文人、上层人物，类似活动在军政要人间的说客式的人物，譬如陈恭澍。

“你是日本人吗？”张明达突然问他。

“不，中国人。”林得山笑一笑。

“哪里人？”

“哎，上海。”

“在哪里供职？”

“赋闲，在家。”

“住在上海？”

“在上海。”

“你的口音根本不是上海人。”

“噢？你听我是哪里人？”

“不知道。到南京？”

“到南京。”

“会朋友？”

“会朋友。‘同盟社’，西里龙夫是我的好朋友。”

这时，日本兵突然用日本话向他们低声呵斥：

“喂，要讲日本话！”

“喔，可以。”

于是张明达使用日本话盘诘起林得山来，问他上过几年学？干过什么

事？到过什么地方？怎样结识的西里龙夫？此去找他要办什么事？可熟悉南京的街道？最后突然问他，在什么地方学的日本话？林得山既要回答他的攀谈，又要使身旁的日本兵听不出他有什么漏洞，真是穷于应付，本来天就热，累得满头汗。

张明达渐渐品出味来：此人没有起码的中国文化，对上海街道很不熟悉，中国话说的倒是可以，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有南腔北调的影子。他断定，这是个日本浪人，或许确实认识西里龙夫，但是绝不是和西里同一个档次的人。

车到镇江站，他收拾好公文包，对日本兵和林得山点头起身：“我该去办事了。”

和镇江分社来接站的办了交接。他又背着大公文包回到了原地，在日本兵和林得山对面坐下，大大方方找话题和林得山攀谈，可是林得山却好像很勉强地和他答话。

到了南京站，他们和日本兵道了别。出得站来，张明达本来可坐“中联社”来接站的一辆小摩托；但是今天小摩托没有来，只得依照惯例，同林得山一道，上了公共汽车；过捐江门进城时，要受军警严格检查，张明达想看看这个浪人怎么对待检查，却见他手里拿着通行证，一晃就让通过了，令他顿生怀疑。

当天下午，他到小火瓦巷去见李得森，把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可疑的人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老李听了，并提出个人意见：应该立即通知陈一峰，提防这个人，弄清他的面目，研究对策。

李得森忧虑地说：“敌人已经行动了！”

张明达着急地说：“我们应该有整体措施。”

李得森轻声问道：“见到程和生没有？”

张明达也轻声回答：“还没有。”

“怎么回事啊？！”李得森愁容满面，不安地走动……

两个“特高”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秘密押回东京警视厅，先把他关在一间小审讯室里，叫卫兵守着。他们便到最高司法警察官办公室向高桥兴助报告。

高桥像接待远方客人那样热情地和他们握手，送烟敬茶，然后高兴地说：“多多辛苦了！遇到不少麻烦吧？”

“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是，嘿！”松本一肚子气恼，而对上司，极力隐忍着。

“怎么？身为帝国最高警视厅的特派警官，肩负着内阁首相赋予的神圣使命，谁敢不予合作？你们倒说说看。”

松本见高桥如此口气，便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在上海所碰到的种种不如意的事倒了出来。譬如：他们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他们硬说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虽经三番五次说明，这是帝国内阁总理的命令，他们却仍振振有词地说：“请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国。”“是在总军管辖范围内。”“中国有句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劝我们还是去找总司令部商量。没法，我们又找到总司令部特务部，奇怪的是，他们的回答和上海“满铁”事务所如出一辙，说

“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没有任何罪证，即使有，也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他们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又跑到宪兵司令部，他们回答得更干脆，说：“这是你们警视厅的事，还是去找兴亚院的特高课去吧！”到了兴亚院则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他们有治外法权专管上海日侨，这是他们份内之事，决无推辞之理。”就这样，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得到领事馆海军武官处的合作。谁知却又偏偏这时中西功随上海驻军 13 军做随军调查去了。由于 13 军西征神速，一时间无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出于无奈，我们只能冒昧找到中西功家，略施小计，终于骗取其家人的信任，才使中西功落入圈套……松本和野村一唱一和，添油加醋，互相吹捧，是不言而喻的。这使高桥深受感动，一面对他俩大加赞扬，一面破口大骂支那派遣军和“满铁”姑息养奸，无视内阁的命令，最后劝慰他俩说：“忍着吧，让我们用事实来回敬他们！”

高桥的话使他的两个左膀右臂欣喜不已。

“以后呢？”高桥接着又问。

“在领事馆拘留所里，我们收买了一个重庆方面的朝鲜籍蓝衣社分子，从中西功口中获悉他的两个在逃的同党，一个是“满铁”的职员叫津金，一个是上海“同盟社”的管沼。据我们掌握的“满铁”内部资料，中西功创办的“特别调查班”里的中国人，特别是班长程和生与他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们当时便要把他们当嫌疑犯抓起来，谁知又遭到上海宪兵队的刁难，说什么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让我们打草惊蛇……”

“好极了：意外的收获！应该早说。”

“书面材料都写了，但是又没办成。”松本不无遗憾似地说。

“他们是对的，要放长线，不能打草惊蛇！”

“是。警部补先生，您是否现在就先审一审他——中西功？”松本问。

“他怎样？愿意和我们合作吗？”高桥脸上有笑意。

“死心塌地的共党分子！”松本答。

“那么。你们把他的材料留下，先把他送巢鸭关起来吧，以后再说。”

“是！警部补先生。”

“慢着，”高桥忙又把他们喊住：“他是个死心塌地的共党吗？”

松本略加思索答道：“应该说倒还老实，只是太傲气，言语伤人。我们是严格遵守您的指示：忍气吞声地和他恳谈，一直只用嘴，绝不动手，争取他能和我们携手合作。可是白费口舌。”

“不过他却直认不讳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只是死不认罪，真拿他没办法！”

“这就好，我会叫他认罪的。”高桥像是胸有成竹地说。

当松本临出门时，他亲切地拍着他俩的肩头又补充一句：“今晚我为你俩洗尘，6 时整，我在‘军之友’沙龙等你们！”

松本和野村把中西功送进了巢鸭监狱。像向老朋友告别似地对中西功说了声：“祝君好运，后会有期。”便扬长而去。

提起巢鸭监狱，日本人都知道，凡是进去的，就很少能活着出来，简直就是地狱。

从表面看，这是一片独立的大型建筑。牢房之间，间距紧密，颇能代表日本建筑的民族传统风格，力求在最狭小的空间容纳最大数量的囚犯。牢房从墙壁到屋顶，全用钢筋水泥浇灌，关押在这里的都是要犯。有已判刑的，

也有尚在等待审判的。去年关进这里的“兰瑞”小组成员佐尔格、尾崎秀实等至今还未结案呢。甚至连涉嫌的帝国元老西园寺公的孙子以及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健也未能幸免。

入狱后不久，对中西功进行预审的正是警视厅特高一课的课长松本，他的上司最高司法警察官高桥兴助，还有反间谍局的局长大松，地方刑事检查厅的警察吏作为陪审官也在座，基本是审问佐尔格一案的全班人马，他们是先来摸摸底的。

中西功没料到，审讯他的竟是逮捕他的那个叫松本的“特高”。他今天已经换上了全副武装，警官制服。和穿便衣时相比，又是一番气派。他脸上毫无表情，但见到中西功时却露出一丝笑意，像是说：“没想到吧？”坐定后，他望了一下高桥，高桥点点头，他便开始审问中西功的姓名、年龄、籍贯，家中有几口人，每个人的职业，以及他的学历、履历。

中西功有点不耐烦地反问：“这些我们不是谈过好几遍了吗？而且档案上都记载得十分详细，何必浪费口舌！”

“告诉你，现在是在法庭上，过去的属于过去，一切重新开始，如实回答吧！”

中西功知道这是审讯的例行程序，心想，既然你们不嫌罗嗦，我也有的是时间。于是便如数家珍似地把父母亲 and 兄弟姐妹一家老小十来口，姓甚名谁，生辰八字、职务等等，不厌其烦地说个没完没了，问到 he 本人的学历和履历也都一句不漏：1910年生，1929年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求学。这时松本轻声说：“这是在日本，不是在上海，应该说昭和4年。记住，以后要用天皇纪年回答提问。”

“可以。”中西功继续说：“1930年，也就是昭和3年12月因散发反战传单，从事反战宣传，被上海总领事馆逮捕过，拘留9天后释放。”

松本又点头轻声说：“对，就这样用天皇纪年。”

中西功又继续说：“可以。1931年，也就是昭和6年，1月吧，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担任同文书院青年团支部组织部长。1932年2月，因‘一·二八’事变和同学们一起撤回日本。”

松本向他摇摇手：“用天皇纪年。”

中西功沉思了一下：“这件事，你们做去吧。我对用天皇纪年很不感兴趣，还要经过换算，当然这也不妨事，但是，这是个日本封建落后的纪年方法，而且有悖于明治维新。现在，全世界都用公元纪年，连中国都用民国纪年，只有日本用一个天皇个人年号纪年，太落后于世界了，你们承认这一点吗？”

中西功不愧是位理论专家，文章里手，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但松本也不愧是“特高”老将，中西功对天皇如此大不敬，而又无可辩驳，他竟沉着自如，不动声色，只是又望了高桥一眼，高桥却视而不见，松本便又重复了一遍：“用天皇纪年。”中西功又沉思一阵，然后轻声说：“这件事，我希望得到审讯官的谅解，我对这种纪年，在感情上拒绝接受。天皇是个日本军阀集团的傀儡，这一点，警官先生也是明白的。况且，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宣誓为共产主义献身，我们要推翻的，在日本，就是这种表面上君主立宪实际上法西斯军阀专政的国家政体。现在要求我每一年都用天皇纪年换算一次，非常违背我的感情。显然，我是你们的敌人，换而言之，你们是我的敌人，你怎么能要求我用敌人的纪年呢？”

松本沉思了好一阵才轻声说：“我们可以帮助你换算，继续说下去吧。”

于是中西功用公元纪年说完他的履历：

1932年进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参加中国问题研究会，用鸟羽二郎的笔名，在《无产阶级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1932年4月，因从事革命活动受警视厅检举，40天后释放。

1933年4月，进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任《日本劳动年鉴》助理编辑。10月，在东京东洋大楼内的“东亚经济调查局”的特别阅览室，研究满洲问题，同时，学习有关共产党的各种资料、书报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1936年夏季，第三国际第7次世界大会后，内心无保留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为之行动，直到这次被逮捕。

松平向他按手示意，仍旧轻声说：“好。这些活动，我们下次再详细谈，今天只问你一点，你，承认对帝国有罪吗？”

中西功坦然地一笑：“不，我说过，我是共产党员，我的行动目的，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日本帝国主义是要被打倒的，我对日本帝国，谈不上有罪。怎么能承认对敌人有罪呢？这不符合起码的逻辑。”

“你认为帝国能被打倒吗？”

中西功眼光里流露出一解的疑惑，看着松本同样轻声地问：“你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吧？”

“我承认，没有。”

从中西功的表情看，显然他觉得松本很可悲：“那么，我们俩人，就像在上海时一样难以继续谈下去了。”

“为什么？”

中西功不无惋惜地说：“我们两人差距太大，你应该先看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否则，许多道理，你难以明白，没有共同语言，审讯岂非多余。”

“噢！有件事要问一下，你身体健康情况如何？害过什么病吗？”松本准备收兵。

中西功好像认真地回忆了一下，才轻声说：“没有，小时候，体质稍差，现在很好。”

松本沉默了好一阵，仍旧毫无表情，点头说：“你我差距确实太大，今天到此结束。”

书记把记录交给中西功，轻声说：“看一看，记录有什么错误？”

中西功快速地浏览了记录：“没有错误。”

“请按手印。”书记给他递来朱红印泥盒。

中西功按了手印。他很奇怪，审讯怎么这样简单？而且，松本竟连一点共产主义常识都没有，这实在太可悲了。和这种人对话，太困难了。当然这也是日本帝国的悲哀，共产主义已经创造了苏联，而日本警官竟对她毫无所知的。

所幸，那以后，十多天，没有再审讯他。

这十几天，他也做过深思。那天审讯，他没一点像在上海领事馆拘留所对松本和野村那样，语言不恭地挖苦他们。他原计划要非常认真地向松本等众多陪审官阐述一下他信奉共产主义的道理。依他看来，共产主义本身有她自己的一番道理，而人们信奉她，拥护她，又有一番道理。不阐明这两番道理，或者，对方没有接受这两番道理的起码水平，审讯也罢，谈话也罢，都是白费口舌。

他并不想在审讯室里有意向敌人宣传共产主义，他只是想向他们说明他信奉共产主义的原因，提醒他们不要小看共产主义。

当然，回想起来，在中国上海，他对松本和野村的态度不适当。一方面，当时他心情不好。另一方面，他已看出他们的文化太低。不管怎么说，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放过了一次教育他们的机会，没有负起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宣传共产主义的责任。

他对松本之所以持那样的态度，不仅认为共产党员应该这样做，而且应从一个侧面向松本说明，日本帝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历史的必然，而战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松本却是那样地麻木，像木雕泥塑的玩偶，真令人扫兴。

退庭后，他被安置在一个单间牢房里。仅这一点便说明警视厅对他重视到什么程度了。狱卒在牢房外踱步，从他牢房门前经过的时间间距非常有规律，几乎可以用来计算时间。中西功用心仔细地心算过多次，大致是五分钟走过一趟，夜晚也是这样。

给他送水送饭的狱卒，是个老警察，名叫渡边十三。是个很谨慎的人，默默地打开铁门，默默地给他放下洗脸水或是食物。经过第一次审讯后的第二天早晨，渡边给他端来洗脸刷牙水。中西功漱罢口，洗脸时间问他：

“你在这里供职吗？”

“当然了。”

“月薪多少？”

“现在仅仅够我用的，以前不够，我要供女儿上学。”

“她毕业了吗？上什么学校？”

“……毕业了。”渡边嘴唇蠕动了一下。

“这样，她可以帮助你了？”

渡边的头颤动了一下：“她出嫁了。”

“噢。只有你一个人生活？”

“只有我一个人。”

中西功仔细观察渡边，他面容虽然苍老，年龄却未必是个老人。便问：“请问你多大年纪？”

渡边嘴角露出苦笑：“你看出来了？确实，我还不到50岁。我受到了惩罚。”

“怎么回事？”

“我喝酒，把我的妻子打死了。那以后，每天夜里她都到我梦中来，脸是浮肿的，黄色的，发亮，变形了，很可怕。我恳求她原谅我，随我回到家里去，一起抚养女儿。她总是低着头，摇头，一声不响地摇头。”

“你为什么打死她？”

“不知道，心里非常烦躁。那时我在中国旋顺，在土肥原兵团运输团特务连当兵，她去探望我，跟我唠唠叨叨说她种田怎样辛苦。不知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死了她，我被判了刑，送到这里做苦役了。”

“你烦躁些什么呢？”

“不知道，那时候，一到海边我就要发怒，看见海水我就想跳下去。想在水里和谁打一架，我要把他按在海水里淹死他。可是打谁呢？海里除了船还有什么？能打船吗？只有它能载我回国。军医检查过我，说我精神正常。”渡边又摇了摇头，不知他是对医生不满还是对自己不满。

“现在你还烦躁吗？”

渡边点点头：“非常烦躁。”

“为了什么呢？女儿已经出嫁了。”

“我不知道。娶她的那个人是个流氓，已经40多岁了，而我的女儿才只有15岁。那个流氓给了我3000元钱，把她领到中国去了，再也没有消息。”

“你是挂念你的女儿？”

“我怕那老流氓伤害她，譬如说，像我对待妻子那样……”

看得出，渡边十三是在绝望状态中挣扎。中西功决心宽慰他几句，便认真地说：“渡边先生，你的烦躁原因，其实是很清楚的，不过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是吗？”渡边十三眼光迟滞地看看他：“你说因为什么？”

“因为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军阀集团把你和所有日本人民赶进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去，士兵们都是农民、工人、学生、商人。譬如你吧，你的妻子种田很辛苦，因为你是丈夫，她才向你抱怨，而你呢？很想念你耕种的土地，你很希望自己去种，让妻子在家里，顶多要她给你把饭烧好，送到田边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

渡边惊恐似的直视着他，轻声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很简单的事，渡边先生，你希望自己种田，你很疼爱你的妻子，不愿她受累，而她却偏偏非得受累不可，这是你痛苦的原因。如果她不对你唠叨，你会更怜惜她。而她却向你唠叨了，像在你的伤口上又捅了一刀，你无法表达你的痛苦，又喝了酒，失手了，是不是这样？”

渡边爆发地嚎陶大哭起来，中西功慌了手脚，急忙劝解他：“渡边先生，请原谅，我只是这么猜想，不要悲伤了。你的痛苦，根源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没有这场侵华战争，你绝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狱卒听到哭声。走到铁门前站定，喝问渡边：“在这里哭什么？”

中西功对狱卒解释说：“为家务事，他难过了。”

“在这里说什么家务事？”狱卒如狼似虎地叫骂渡边。

中西功向他笑笑：“其实你也有这种家务事。”

“我有什么家务事？”

“你吗？不只是你，这种家务事，每个日本人都有。我不信你没有，难道你心里很舒畅吗？侵华战争没给你带来麻烦吗？”

狱卒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地直盯着他，好一阵，慢慢转身走了。

第二天，这狱卒再来值班时，隔着铁门便和中西功攀谈起来。他问中西功犯了什么案？中西功直爽地告诉他，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战争，日本必定失败。将来，日本共产党和广大日本劳苦大众一起，要在日本本土建设一个没有地主、没有垄断资本家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再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这狱卒像在听天方夜谭，时而笑咪咪，时而惊奇地睁着眼凝思。最后，他问中西功：“你想到叛国罪要处极刑没有？”

“想到过，想到过。那是一定的，所以我要把道理告诉你。”

这狱卒站在铁门外，痴痴呆呆好半天，才脚步沉重地慢慢走去。第三天，当这狱卒再次出现在铁门外时，眼光里流露出对中西功的尊敬，眉宇间潜藏着一丝极难察觉的笑意。

那以后，他们常常简短地交谈几句。这狱卒告诉他，在太平洋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海军损失很大，大本营已下令征用民船。有传说讲：一部分中国汪精卫政府征集来的军队，正在运往太平洋战场。日本又要征兵，有的青年为逃避征兵而自杀了。“中西功先生，你的话看来有眼光。我们怎么办？”

“日本失败早成定局，这不是你办得了的事。你只能为自己去办点事。”

“我能办什么呢？”

“离开这里，赶快逃到山里去。”

“天皇呢？”

“天皇与你有什么关系？”

自那以后，再不见这狱卒来值班了，渡边十三告诉中西功：他请病假了，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每到夜深，中西功必惦念起遥远的上海，那个他的第二故乡，和他在那里的同志们，程和生，老吴，还有“特别调查班”里的倪之骥等等一批同志。他想像，时至今日，他已失踪一个多月了，那些精明的小伙子们，早该转移阵地了，或者离开上海，到了乡下，或者到了部队，也说不定还留在上海，改变掩护职业，继续坚持活动。他常幻觉程和生化了装，行走在四马路上。每当这时，他便不觉地、喃喃自语地和他说话：“最近怎么样？”“坚持住，再有两三年，就会见到胜利了。坚持住。”“拜托了，一切都拜托你们大家了。”

这时候，他那微笑的脸上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一天晚上，已是12点过后，正当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远方忽然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尖细得只会往天上爬，刹那间，远远近近都应合着响起这种声音来。刺耳，凄厉，响彻夜空，令人毛骨悚然。巢鸭监狱也到处响起匆忙混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狱警们在牢房雨道里奔跑，一边喊叫：“谁也不许动！躲到墙角去！”“不许动！”“躲到墙角去！”

透过铁门栅栏，他看到远方升起许多粗大的光柱射向黑暗的夜空，胡乱地晃动着。渐渐地，有几条光柱在某一处交叉聚拢了，形成一个明亮刺眼的光点。又一处，也有几条光柱交叉聚拢在一起。这些交叉光点，徐徐地在夜空移动。

他猜想，大概是美军来空袭了，马上就要响起炸弹声了。

他心头升起一种无可名状的思绪，既兴奋，又悲伤。他希望听到这炸弹的响声，把日本法西斯炸个粉碎；但又不愿看到无辜的同胞遭受伤害，他为日本法西斯给同胞们带来的灾难而悲伤。

但是过了许久许久，仍听不到爆炸声，也听不到高射炮声，并且，突然间，所有的光柱都熄灭了。

原来是防空演习。

他似乎有点失望。

防空演习又自然而然地诱发起他对这场战争的思考，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把日本失败的大概日期推算出来。

他计算日军的陆军兵力和分布状况。现在，在满洲有6个军团约9万人；在中国华北15个师团，华中12个师团，华南2个师团，共约有29万人；在东南亚各国共有11个师团约11万人；太平洋战场各岛屿有2万人。其次是经济实力。粮食，满洲已经没有负荷能力，库存即将耗尽；华北粮食本来就紧张，强化治安后所能征得的数目，供应华北日军已非常勉强；华中地区，

原可月征上亿斤，但是由于汪精卫政权官员们大量贪污，导致往日本本土运送粮食的货船在吴淞口等待半个多月之久，无粮可装船。

在东南亚各国可掠夺到多少粮食？这个数目他还没有掌握，但是无休止的掠夺，必将重复在中国出现的局面，这是无疑的。……

一个多月来，中西功逐渐创造了一种适应这种监狱生活环境的内心世界。他知道，警视厅和法庭没有再审讯他，完全是因为没有必要。他们将对他处以极刑，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然而他估计错误了。

他被正式提审了，而且还是第一审。这次的主审官就是东京警视厅最高司法警察官高桥警部补。中西功一眼便认出，他就是上次坐在松本旁边的那个矮胖的中年人，长了一张极普通的脸，一撮小胡子，眼神十分猥琐。如果他穿上便衣走在街上，谁都看不出他曾是个警官学校的优等生。今天，松本成了陪审，其余还是预审时那伙官员。

两个书记在他们两边的矮桌后，神情很紧张，他们预备了一大堆速记簿和自来水笔。

高桥兴助声调平和地对他说：

“希望你不要制造太多的麻烦，愿意吗？”

“我不想制造麻烦。”中西功皱了皱眉头，毫无表情地说：“希望你也不要制造太多的令人讨厌的麻烦。”

“谢谢，那么我们开始吧，请你谈谈现在的心情。”

“好吧。”中西功早已打好了多种提问的腹稿，可以不加思索地对答如流：“我不想说你们逮捕我是错误的，因为我的行为反对你们。你们是实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而我是反对这种政策的。”

高桥兴助想了想：“是这样的。那么，你答应和我们合作了？”

“这是两回事。你们逮捕我，就像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会逮捕你们一样。这一点，你们没有错。至于合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们怎么能够希望一个共产党员和你们合作呢？最滑稽、幽默的人也编不出这种笑话来。”

“我想会的。”高桥轻轻掸了掸衣袖说：“看来，你是个很性急的人吧？”

“我还没感觉到这一点。当然，对你们办事这样拖拖沓沓，我有点不习惯。”不知什么原因，他第一眼看到高桥，心里就有点瞧不起他，所以，用了在上海对待松本和野村的口气和他对话。这种口气，常是撩拨、刺激一个人自尊心的手段，用这种手段，可以刺探出一个人的素质、修养、文化和性格特点。他要看一看高桥是个何等样人。

“我们没有那种讨厌的拖沓习气，请问我们什么地方有这种现象？”

“譬如对我，你们大可不必用什么审问啦、拷打啦等等令人厌烦的手段，要杀就杀。”

高桥笑了：“看来，你确实是个性急的人。当然，这是假象，你有你的目的。你想通过你的死亡，破坏帝国对你们这个叛国集团的调查，是不是？”

中西功自笑没有看出这个高桥竟还有这么点分析能力，也许是他们的经验吧？他决定同意他这一点，进一步刺他一下，于是点头说：“对。不过，不全对，有那么很小一部分对。我已经说过，我讨厌你们这种拖沓。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你们逮捕以后，我的活动便失去了社会和大众，我的历史使命，被你们剥夺了。就这一点来说，你们胜利了。但是，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共产党员多得很呐！所以，你们不必在我身上化太多力

气了。从历史发展说，最后的胜利者是我们。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好了，中西功先生，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为你，我们要进行许多调查。你给帝国造成的损失，同尾崎秀实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这一点，你承认吗？这是叛国间谍罪，你认为怎样？”

“不，不对！我不是叛国间谍。我是为拯救日本国民大众免受战祸涂炭，才这样做的。何况，我有我的共产主义信仰。”

高桥仍旧那么猥琐地瞧着他：“你总是用共产主义信仰回答问题，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许多隔阂和冲突。作为一种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每个人都可以研究，但是，不能允许相信它。你要清醒，共产主义，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那是一种空想。”

中西功笑一笑：“苏联呢？她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你该知道她吧！日本不是也和她谈判吗？不是也和她签订条约吗？她不是消灭过帝国关东军吗？中国共产党呢？她已经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她的军队不是把你们日本帝国的战争计划打乱得一塌糊涂了吗？东条集团不是连个从占领区撤退的方案都拿不出来了吗？中共的胜利，不只是对日本，她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一点，你还看不见？”

好象为了与中西功相对应，高桥仿佛也想笑一笑，以回答他这连珠炮般的挑战，但仿佛又忍住了。这个奇怪的表情，使中西功联想到整个日本警视厅的形象。

正在这时候，远方响起防空警报的声音。高桥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仿佛飞机在他头上飞。但什么也没看到，又侧头斜眼望着窗外。松本向他投去询问的眼光，两个书记急不可待地收拾纸笔。

高桥压低声音故作镇静地拖着长腔说：“今天到此结束吧。”

中西功仿佛不解地问：“出了什么事？”

高桥无可奈何地说：“防空。”

说话间，飞机马达的轰鸣声震撼得审讯室四壁打颤，同时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连房基地皮也颤抖起来。

中西功不无嘲弄地问：“这是防空演习吗？”

高桥终于被激怒了，板起他那十分猥琐的脸，正色地道：“中西功先生，我告诉你吧，我审讯你们，有我自己的方法。我不像那些愚蠢的法官，他们慢条斯理，像下围棋，一颗子，一颗子地把你包围了以后再吃掉你。我每进行一次审讯，都要有一次的成绩。”

“我相信，也许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在你没有包围我以前，怎样吃掉我呢？”

“整个棋盘上全是我已经安下的子了。”

“那么，我只有向你反包围，而你只能实行‘本土作战’了？”

“你会知道该怎么做的。”随着又一声霹雳般的震耳巨响，高桥从椅子上滑到桌下，然后从中西功脚前爬过去。中西功低头问：“这是你的‘本土作战’吗？”

高桥却无暇回答他了，急急爬出门外去。

警报解除了，东京安静得出奇。本来这种安静是正常的，现在却突然间变得不正常了。在中西功看来，必须像刚才那样连续响着爆炸声才算正常。

高桥离开审讯室后，进来两个人，矮矮的，胖胖的，看了看中西功，在

他左右站住了。

中西功抬头看看他们：“什么事？”

左边的那个走到他面前，弯腰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拉起他，右边那个也跨步上前，抓住他的另一只胳膊。

中西功暗想，他们将把他捆绑起来，送上囚车，押往什么地方，去施酷刑。因为高桥说过，他每一次审讯，都要有一次的的成绩，而今天他却一点成绩也没有。

他用力摔动胳膊，喝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

这两个人既不捆绑他，也不给他带手铐脚镣，只是每人握住他一只胳膊，然后左右分开，拉开架势，把他向各自的方向拉去。

中西功忽然觉得两只胳膊像被他们拉脱了臼，疼痛难挨；继之，左右两边胸肋像要被他们撕裂开，分成两半，像被一条火舌烧燎般的疼痛，从胸间直窜到头顶。他想喊叫一声，却没有那个喘气的的时间和力量。而这两个家伙，却像力大无比，只一味地把他向两边拽去，拽去，再拽去。中西功在刹那间仿佛听见自己的骨头清脆地响了一声。他吐出胸中最后一点气……

他感觉到，有人把他背起，整个身体在空中翻了一个360度的大筋头，然后重重地被摔在水泥地上。他觉得，从头到脚的整个腰背，被铁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五内俱焚般一阵剧痛……

当他渐渐醒来时，感到嘴里苦咸，怎么用力两眼也睁不开，只见一些金星闪闪明灭飞舞。全身、手、脚，已无一处可以凭意志抽动一下的能力。

眼前金星乱舞像炽热的钢花，让他十分难耐，他用力微睁开眼，眼前却是一片紫蓝色，紫蓝色渐渐消退后，出现在他眼前的，是那两个小胖矮人。他们坐在他面前“塌塌米”上吸烟，他们看了看他，拧灭了烟火，其中一个对他说：

“你要尊重司法警察官的提问。”

“听见没有？”另一个问。

中西功深深吸两口气，狠狠用力说：

“下流的警官，野蛮的法西斯！”

“是吗？”右边的小胖矮人向另一个使个眼色。两人从地上爬起，一人一边抓住他一只胳膊，又一次开始向两边撕拽他。中西功直觉地感到自己的头是向后仰着，其他是怎么回事，便全然不知了。

他又一次感到被他们抛在空中，全身骨头发出细微的响声。

他又一次觉得被摔在铁板一样的水泥地上……

……

……

杂乱而沉重的脚步声，渐渐震得他从昏迷中醒转来。他用了很大力，双眼张开一条缝，看见面前是几双脚。往上看，见高桥兴助坐在书案后，松本和他的搭档野村坐在他旁边。也有一张矮书桌，两个书记，挤在墙两角，斜放的矮书桌，刚好和墙角构成两个三角形。

高桥在书桌后歪身侧头看他，见他微睁开眼，轻声道：“我说过，你不听。不要玩那些毫无意义的表演。”

他闭上了眼睛，静听高桥说些什么。

“说吧，你现在心情如何？”

他仍旧闭着眼睛，用命令的口吻，拼力地说：“帮我坐起来！”

几响脚步声过后，有人扶他坐起，他觉得全身从里到外无一处不像火烧。他咬牙睁眼看，是松本和野村在扶他。他知道，此时如果他们放开手，他必将再瘫倒下去，便用松本审问他时那样的口气，轻声地对他说：

“就这样扶住我！”

高桥向松本点了点头，松本便双膝跪在他左边，吃力地扶定他。

他问高桥：“刚才你说什么？”

“现在，你预备怎样回答我的提问？”

“噢。你准备……向我……提问些什么？”中西功上气不接下气地反问，声音很微弱。

“你给中共提供了些什么情报？”

“还有什么？”

“你和中共哪些人员接触？他们的名字？特征？住址？”

“还有什么？”

“今天只要你回答这两点。”

“这样浅显！”他叹息了一声；开始强打起精神来：“我们俩的政治观念和信仰还没沟通，叫我怎么回答你？”

高桥歪头看了他一阵，显然，他有点恼怒，从他那紧闭的嘴唇就可看出来。但是他不发作，当然是为取得成绩，他拖着平稳的声调问道：

“那你说我们怎样沟通？”

“你应该先问我，为什么给中共提供情报？”

“好，可以。你为什么给中共提供情报？”

“这就对了。我这就坦率告诉你，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再问你什么？”

“你应该问我，为什么参加中国共产党？因为你可以从这里面，得到很多难以得到的‘供词’。”

高桥点头表示同意：“你说吧，我就这样问。”

“你还没察觉到现在你已经开始实行‘本土作战’了吗？”

高桥不响，只怔怔地看着他。而中西功心里已经决定，不再嘲弄这个下流坯，而对他实行正面阐述自己的信仰和这信仰的神圣的纲领。

“听着，警官，我不是无缘无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甚至，原来，我连参加这个党的资格都不具备。参加这个党，首先要有献身精神，而我，原来是个非常胆小的乡下农民的孩子。1929年，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到上海同文书院求学的时候，我对什么都害怕，连从北海道来的同学，我都怕。我不知道他们那种笑，是喜欢我，还是对我发怒、要打我？我不到上海街上去逛，我害怕中国人。因为我知道，日本强迫他们割让了台湾、库页岛，还有旅顺、大连。他们恨日本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躲避中国人，我只和一些和善的日本同学来往。课余时间，我一个人躲在图书馆里，看我喜欢看的书。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个人，和他交了朋友。”

“谁？”高桥兴助低声问，同时向两个书记使眼色，令他们动手纪录。

“列宁——。”

“在当时，已经有许多人认识他了，而我，很晚，才知道他。”中西功好像很惋惜地陷入沉思，补充说：“当时，我已经快20岁了！”他又陷入沉思。

高桥兴助显得有点失望地默默看着他，片刻寂静后，高桥无可奈何地嘟囔说：

“好吧，尽你说，看你能说出些什么来。”

中西功直视着高桥，艰难地笑了一笑：“你这个样子，我不能继续说下去了，你缺乏诚意。”

“你想要我怎样呢？”

“认真地听。”

“好，你说吧，我有的是时间。”

于是，他轻声地、顺序清晰地说下去，偶尔停顿一下，转头看一下松本，用眼色示意松本把他扶好，让他尽量坐得舒适些。他从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看书而结识列宁开始说起，说到他和同学们怎样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怎样萌动了要为实现这一主义而行动的想法。第一次怎样把反对侵华战争的纸条放进“东亚同文书院”参观的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的饭碗里，因而被领事馆逮捕；第二次怎样和同学们到上海大街上贴反战传单，又被逮捕；之后，怎样认识到应该从根本上推翻日本帝国，在斗争方法上应该怎样适应形势。又说到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后，给满洲和中国人民造成怎样的灾难。从对大众血淋淋的杀戮，到农工业的被摧残破坏。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说起，阐述共产主义者最高尚的人道主义，以及必须为实现这种最高尚的人道主义所要付出的一代人生命的代价。最后，他轻声问高桥：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要把我这些话，判为异端邪说？”

高桥不响。只默默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轻声问。

高桥沉默了一阵，也轻声问：“中西功先生，我们两个，应该谁问，谁答？一个法律上简单的问题。你是日本人吗？”

“原来是，现在不是，现在我属于全世界大众。”

“那么，你承认，你背叛了大日本帝国？”

“不，不不。那些把你们大日本帝国推上毁灭的人，譬如眼下的东条英机，当然还有那些跟随他的高级文武军政官员们，才是些真正背叛日本大众的人。”

在1942年的夏季，任何一个日本的军政宪警的官员，都不能忍受这种当面的斥责。高桥兴助却忍受了，他有他的目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中西功的正面阐述中，他捞到了正如中西功所说的一些原本他应该通过审讯得到的“供词”。另部分原因是：只要中西功肯开口说话，他就能获得可供提问的线索。还有第三个原因：对于共产主义，他和松本一样，也是一无所知，听中西功侃侃而谈，倒是真增长了知识。当然，还有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他原来估计，中西功不会对他开口，因而早在牢房外安下了打手，只待他和松本他们走出牢房，打手们便会进来再狠狠地“教训”一番这个“中共”。但从刚才他所见到的被“教训”了一番的中西功的身体状况看，显然经不起再一次的“教训”了。他要保住中西功一条命，留着用，把他打死了，便什么也没有了。

所以，当他宣布第二次审讯结束走出牢房门时，对两个打手轻声说：“适可而止。”

两个矮矮胖胖的打手服从地向他点了点头，很文雅地走进牢房，各人抓住中西功一只胳膊，把已经瘫痪在地的中西功拉起来，各自使尽平生力气地

把他向左右撕拽去。他们把高桥兴助那“适可而止”理解为“用尽力气”，因而要大显一番身手。

中西功没有一点声音，他眼前一片昏黑。

黑到至极，却出现了明亮。在明亮中，他看到了一群人，他们是程和生，老吴，李得森，陈一峰，倪之骥，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

他们在他眼前的明亮中反复出现……

在他们的背后，闪现着上海的街道和楼房、人流、拥挤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房间洁净的“金陵酒家”、爱德华七世路的“三福楼”和四马路上那些酒馆。过去，他常在这些地方和同志们见面。研究怎样开展工作……

第八章 坚守在远东前哨

连日来，天空浓云逐渐破裂，阳光从这几那儿的缝隙间射向江南大地。今年梅雨季节来得早，去得也早，稻禾吐出新穗来。

上海仍旧到处潮湿，家家晾晒衣服、被褥，弄堂里色彩杂乱。

程和生慢步走在四马路上，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后，老吴和他约定减少联系，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周围敌人动静上。他和“特别调查班”的党员们个别约定会见时间，让他们尽可能继续联络不致于失散。日子意外的平静，近20天来没见异常，也没发现宪兵、警察跟踪的迹象，更没打听到中西功的下落。他对这种安静，渐觉难耐。老吴曾分析说，事情会渐次过去，而他却觉得一个怪胎正在这安静中孕育。

日军在中途岛吃了大败仗，损失惨重。联合舰队的“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四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世界上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三隈号”也葬入海底，并损失飞机数百架，陆海军士兵数万人。苏德战场上，红军很艰苦。在斯大林格勒西南的顿河弯曲部，希特勒集中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150万兵力，战争打了40天了。如果双方这样相持下去，巴库的石油、顿巴斯的煤矿、库班的小麦，这些战略物资基地掌握在苏联手手中，社会主义苏联就能屹立不动了。这种常识是他从中西功那儿学来的。以前，他只看中国战场，现在他看全世界。

走着走着，感到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回头看，吃一惊，原来是汪敬远。

“你怎么来了？”他问。

“找老吴请示。”汪敬远向他投来一笑。

“见着了么？”

汪敬远点头。

“跟我走。”他仍旧脚步从容地引汪敬远走进南京路冠生园，两人找个位子坐下。要来点冷菜和啤酒，边喝边轻声交谈。

汪敬远个头虽不高，但身材匀称，面容洁白，一双眼睛闪动着明亮的青春之光，一眼看去，便知是个精明的奇人。他的父亲，是苏州一家富绅子弟，留学日本时和一个姑娘一见倾心，相爱成亲，于是生下了他。这位日本姑娘，不被中国封建家庭所接受。汪家长房长兄，不仅歧视她，进而累及她的丈夫。汪敬远的父亲，忧郁成疾，不治而逝。汪家长房，驱逐她们孤儿寡母出户。迫于生计，她带着小汪敬远流落上海，替人浆洗缝补，赚几个小钱抚养儿子。旧上海，一个流浪于低层的异国女人，该是何等艰难，不是个中人，难知其中味。无论她怎样辛苦操劳，终究养不了日渐长大的儿子。除了衣食，还要求学，她可不能让儿子失学。丈夫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出众男子，岂能让他的孤血成个“无能之人？”她写信求助于妹妹，妹妹回信满口答应，说她丈夫说，一定不委屈姐姐的“大桥”。于是托人把“大桥”带去日本妹妹家。“大桥”的姨父，身体壮得像他小院里那棵老槐树，但是胆子却那么小，只知道种田和见人就鞠躬。姨妈严格规定“大桥”，除了到学校，不许去河边，不许爬树上屋，不许和同学打架，也不许跟姨父下田，只准坐在矮墙小院里的槐树下小桌旁读书。累了，可以在院里翻筋斗，翻多少都没关系。唉，翻筋斗这游戏，还不如读书呢。

姨父姨妈勉强供“大桥”上了几年小学，生活越来越艰难。“支那

事变”发生了，打仗了。夫妻两口相对流泪，因为再也无力供“大桥”继续上学了。对不起姐姐，万般无奈，托人把“大桥”带回上海。临上船，姨妈递给他一个小蒲包，里面放两个“寿司”（白饭团），轻声说：“饿了再吃，”没说完，便哭了。

“大桥”回到上海，母亲抱着儿子哭了一阵，又从头到脚量了他的身高，然后郑重其事对他说：“听着，你现在是大人了，以后不再叫‘大桥’，还叫汪敬远，你是中国男子，男子要为国尽忠，中国太弱，国民太穷，根在政府腐败。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

当时的小汪敬远，懵然不知怎样去为强国作事业。眼前可能“为”的，只有谋职挣钱养妈妈。

汪精卫投敌，和日本的外交是重要事项。首先是语言。负责外交的汪伪官员在上海愚园路办了个“日语讲习会”，培养汪精卫未来的外交人物，要求日语的标准性，语音、语调、语法结构的规则性，含义的多重性。汪敬远应聘当教员，不用说，他的日本话无可挑剔，他的教授方法也获得众口一辞的称赞。高崇武在愚园路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是汪精卫外交部的底子，邀请汪敬远去参加座谈。这件事，被西里龙夫和程和生知道了，他应程和生密约去“相见”，原估计这个程和生会给他介绍个差事，却不料程和生竟出言唐突地对他单刀直入他说：“你应该救中国！”这在当时的上海，不啻是直面对他宣布“我抗日”。更奇怪的是，程和生竟知道，他妈妈曾教导过他，“你是中国男子，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这母子间最亲密的谈话，他是从何知道的？他没有问妈妈，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他和程和生继续往来，程和生交给了他一把看不见的“金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为强国作事业”的大门，这就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程和生的指点，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会”表现非常出色，上下左右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中日亲善”的结晶、楷模、桥梁、天使，天晓得这些人还能拽出什么溢美之词来恭维他。总而言之，当汪精卫“还都”南京时，按程和生的指示，他从“国际问题研究会”设法升迁到了汪精卫的身边，从上海到了南京，被派到汪公馆当秘书，并渐渐取得陈壁君的信任。陈壁君，人称“母老虎”。从“国民政府”部长、委员到公馆内外警士仆役；没人不怕她。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妖婆。只有周隆庠，敢接近她的虎毛。汪敬远初进公馆，只能听周隆庠指使，作些一般的文差，拿不到高级绝密情报。他曾一度想到外交部去直接掌握情报，请示上海程和生，程和生不同意，叫李得森转告他，情报在质不在数，希望他取得陈壁君的信任。汪敬远的精明伶俐，终于被陈壁君赏识，事无大小均委他办。如此一来，情报三天一次地从汪公馆飞出，经李得森处理后由联络员张明达传送到程和生手中。大自日汪密约，小至汪精卫每天会见的客人名单和谈话内容，总之，凡日汪之间的秘密，汪伪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无不在我掌握之中。为上海情报科分析研究日本政府、大本营的谋略，提供了最切实的保证和基础。如1941年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对华战争，不再采取大规模进攻作战，模仿中国的游击战法，击溃中国军队后，退回原警戒区。”这使我方明确地掌握了日军行动规律。不久，李长江投敌，与汪精卫会谈，陈壁君对李长江不放心，特命汪敬远去参加，他们说了些什么，程和生第二天晚上便知道了。又如，同年夏末，驻安徽的广西军李品仙，通过香港《自然日报》杨主编到南京联系投汪精卫的事；秋末，阎锡山派代表到南京与汪精卫交涉投降，双方讨价还价，汪精

卫嘲笑阎老西想“半瓶醋兑半瓶水，要个拿破仑葡萄酒的价钱”，汪敬远一时不明白，亲自去找李得森汇报，李得森一听“扑哧”笑了，告诉他：阎锡山不喝茶，每天只喝醋。他越发不解，直至李得森给他解释明白。原来山西人吃菜可以无盐，而不可无醋。也是去年春末，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夫人，忽然春心萌动，要去玄武湖玩，被日本宪兵在城门口当众拦阻搜身，败兴而归。跑到汪公馆涕泣告状，说“连部长夫人都限制自由，而且动手动脚，还说什么中日亲善？说什么中日平等？”汪精卫听了喃喃说：“暂时现象，暂时现象。”陈壁君气得脸发白，可什么话也没说……李得森听了“哈哈”大笑。这些及时送到延安的情报，供中央得以迅速对敌人作出对策。

汪敬远的情报活动越搞越细，竟想自己搭班在汪伪政府里建立个情报部。他对李得森说，我们都可以加入进去埋伏工作。并且。他计划，这个情报部争取由汪精卫直接领导。李得森写信请示老吴，这正合老吴开拓局面之意，回信答复同意。汪敬远便行动起来；他和航空署长陈昌祖私交很深，陈昌祖是汪精卫的裙带亲信，汪敬远想利用他，但陈昌祖对他的提议经过一番活动后说：“眼前没有把握，等一等再说。”此事才算放下。

日本警视厅特高课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消息，自然瞒不过汪敬远。说实话，他倒真不知道这两人被捕的缘由。但是，又下意识地敏感到，也许和他的事业有瓜葛，再加李得森通知他，暂停一切活动和接触。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新通知，心里嘀咕，硬着头皮去见李得森。

中西功、西里龙夫被捕在南京引起的大波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坚持”、“等待”，渐渐沉静下来。

这时，李得森对吴纪光的指示，内心很是钦佩了。鉴于自己曾为此和吴纪光有过脸红的不愉快，便鼓动汪敬远到上海去见一次老吴。恰巧，陈壁君要他到上海港税务局提一笔款，转帐。他到了上海，匆忙跑了税务局和银行，办完事，找到了老吴。老吴对他这个“独立旅”挺和蔼，向他阐述了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日本这次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日本政府的常规行动，从已经过来了的近两个月观察，无论中西功、西里龙夫，还是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都没有吐露上海情报科和供出中国同志的迹象。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阵地，应该相信日本同志革命的坚定性。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警惕敌情的变化。

汪敬远对老吴这番分析，心悦诚服。不失时机地传达了李得森托他带给老吴的话：“从事实发展看，者吴叫大家沉着坚持的决定是正确的。”

吴纪光笑道：“哪里是我的决定，我有那个水平和胆量吗？你回去告诉他，那是最高层的决定，‘小开’也不过是传达给我们。”

汪敬远听他如此一说，心中激荡不已：“我们上海情报科有最高层直接掌握着呢。”那份高兴使他在南京积郁的疑虑，全部消逝净光。他决定马上回南京，不意却碰上了程和生，即同程一起到南京路冠生园小吃。

程和生听罢汪敬远的叙述，沉思一阵，轻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警惕。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紧张情况下。”

餐毕，两人起身结账，就地分手。程和生按预约的时间走进四川路倪之骥的隐蔽点，一进屋却见倪之骥在桌旁坐着愣神。倪之骥见他进来，忙挤鼻子弄眼，暗示他赶快溜走，他急转身，可为时已晚，门后突然钻出两个人，他们身上西装笔挺，头上黑发油亮，一下子把他堵在门里。一个说：“程先生，请坐。”另一个便动手拉他到桌前。

虽然程和生时刻准备着出现“遭遇”，毕竟太突然。没想到他们竟在这里坐等他。

他不想和他们作任何争辩，那是毫无意义的。他沉静地在一张椅上坐下。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外游动的同志们，别再有哪一个，闯到这里来。

两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在门后椅子上坐下，擦火柴，悠闲地吸烟。

这两个不值一瞥的败类！

程和生心潮翻涌，眼前只有一条路，一条共产党员此刻必须走的光荣之路。

他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交代的，唯一的遗憾是不能亲眼看到同胞们欢庆抗日战争的情景了。这份欢乐，只得留给后人了。

父亲和哥哥会在欢呼的人流中骄傲地微笑。

中西功会在心中记住他。

直到下午四点半，进门来一个人，也穿西装，向门后的两个人点点头，马上又出门去。

门后两个人站起来，向程和生和倪之骥招招手：“两位，跟我们走吧。”于是，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程和生和倪之骥夹在中间，走出门去。

门外烈日很毒，刺得人睁不开眼，他们一行四个，走出巷口，一辆军用车迎面徐徐开来。到了他们面前，停下了。两个“西装”，挥手示意催他们上车后，也跟着爬上车。

汽车“嘟”地加速开动，惯性使他们晃了一下，便风驰电掣般开走了。程和生觉得风不停地刮走身上的躁热，他偷眼看坐在对面的两个“西装”，发现他们在默默地直盯着他。他抬眼扫视汉口路两边的商号和人群，商号楼房快速地由前向后闪过，行人杂乱的色彩点缀在这流动的马路两边。汉口路和四川路是他活动最多的街道之一，这里有他经常出入的商店，有些店员对他的脸孔也不陌生。他想：“如果现在他们见到我，消息会很快传播出去。老吴和所有的同志们便会及早转移。而我自己，绝不能让敌人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点有关情报科的秘密……”

“这是自己为党所能作的最后一点事情了……”

他没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心里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牺牲的时刻就在眼前，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

于是，他猛地大喝一声，奋身一跃而起，跳出车外，刹那间也没忘记故意使自己侧起身，头向下，用力撞去。

除了眼前火光一闪，再没有别的……

……

汪敬远回到南京汪公馆，陈壁君在化妆台前端坐，侍女给她梳头，她要日本使馆去参加招待宴会。听汪敬远说罢上海港税务局转账经过，她满意地点头，然后说：“你的事，主席答应了。”

汪敬远连忙道谢，极力作出感激的样子说：“我的前程，全靠夫人栽培。”

陈壁君没有再说话，他便告退。

原来，上个月，外交次长周隆庠想调汪敬远到“国际俱乐部”去主持工作。国际俱乐部是周隆庠提议设立的，在那里，每个月可有几万元经费过手，周隆庠就可多一只捞钱的手。汪精卫已经许可了。汪敬远闻讯，立即向李得森报告，认为到“国际俱乐部”，不及在汪公馆情报来得快而重要。李得森请示老吴，组织上同意汪敬远的意见。但是汪精卫成命难收，汪敬远便求助

于“第一夫人”。陈壁君问汪精卫：“周次长要我，你也给他？”汪精卫只好改变主意，通知周隆庠：“汪敬远另有任用。”任用作什么？想来想去，立了个官衔叫“国民政府特任官”，相当于有些国家的不管部部长。当然，这个特任官，只在汪公馆和国民政府之间行走。消息传出去，公馆内外军警宪特，每见汪敬远，必恭称“特任官”。而汪敬远对他们却一如既往，谦逊有加，照常和他们喝酒打牌，只说“没有的事”。直至今天，陈壁君才正式告诉他，那么只待下委任状了。

汪敬远回到他的办公室。电话铃“叮吟吟”地响，又是大门对面宪兵岗楼摇过来的，声音带着笑：“特任官，有空吗？”听声音就知道，不是叫去打牌，就是喝酒。

“我要洗个澡。”汪敬远确实有点累。

“好的，给你留着。”

“什么东西？”

“园林管理局朱鼎送来一筐鲥鱼，天太热，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过会去。”

汪敬远见过朱鼎其人。他原来是个山东济宁一家皮货商的学徒。矮个，宽额头，嘴唇薄而宽。因嗜赌成性，被掌柜辞退。临走头天晚上，偷了钱柜，潜逃上海，当了伪军，混上个排长，从此敲诈勒索百姓，被弟兄们半夜把他蒙头捆起来狠打了一顿。他没想到汉奸伪军里还有这等人，却不敢声张，因为弟兄们说了：“漏一点风出去，马上宰了你。”他见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当上了治安便衣，凭着手里有金条，结识一帮地痞流氓，混进了园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馆门外的警士们厮混。

汪敬远洗过澡，换了衣，见陈壁君已经出门坐车走了，抬脚过马路，进了警士团，警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大摇大摆上了二楼，果然一个个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饭饱后，照例又是一局赌，照例又是他赢。到晚11点，估计陈壁君该回公馆了，便起身告退，几个陪赌的，却盛情挽留。他说不敢久呆，万一夫人有事，担不起罪。他们说没关系，他执意要走，其中一个惋惜他说：“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这里委曲一会了。”

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 1921 年 6 月起，到 1949 年 10 月止，28 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

“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是地下游击队。”

“听说他跳下车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

“喊着口号跳车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们说过，中国人最后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后也不会沉默，因为另有人代替他，却不是代替他继续去沉默。

上海人传说这消息，并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于巨大的痛惜和震惊，且含有希望和鼓励的成分。仿佛如果他们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仿佛他们断定，这样的抗日分子在上海还有，不过人家不丘露罢了。这种自动着力的传说、猜测、议论，无意间既标明了自己，又鼓励了周围的人。张明达是第二天下午听到这传说的，当时他已到香港路“中联社”分社去交过差事了。在回家的闵行路上，听到人们议论，不由心头一惊。连忙到紧急联络点，给程和生发信号，要求见面。他在接头点附近，转来转去，直到天黑，不见程和生来，知道出事了。第一个念头便是：情况紧急，事不宜迟，要赶紧回南京，给老李报答。

昏黄的马路灯光，照着空旷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宽了许多。不见什

么行人，到处一片寂静。远方传来“隆隆”雷声，闪电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楼直耸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么回南京？直奔火车站？夜里几点钟有到南京的票车？凭这身服装，能像白天一样大摇大摆的不买票，走日伪要员专用的通道吗？

他的脚步渐渐犹豫了。

先回家去，过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紧急行动，只有“提上脑袋撞金钟”了。

他脚步越来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从哪个方位到火车站，走哪条街最近，穿哪条巷省路，他都了若指掌。他可以随时敲一家住户的门借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随时敲一家熟悉的商号的门，请求给点帮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没法计算。他认识的人多，认识他的人更多。

麻烦的是身上这套衣服，若在白天就好了。而现在，是宵禁时间，行人不准通行，怎么走啊？把衣服脱下来抓在手里，光膀子走？更容易招来麻烦。

走到一家旅馆门前，旅馆的门虚掩着，泄出一道浅黄色的灯光，从背后照着他，不高的个子，却投出条长长的影子。旅馆的门，都是这样通宵虚掩着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随时会有巡捕、包打听、便衣特务和汉奸、宪兵来查店，来打秋风。

“急中生智”，这话一点也不假。他随即推门进了这家旅馆，向店员说明，求借用一下电话。店员明白，这个时间，突然闯进来借用电话的，都不是等闲之人，便很客气地答应了。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对方通了话。然后坐下来和店员闲谈，问他店里的生意，问他自己的生活。店员很警惕，一方面客气地有问必答，另一方面不多说一句话。同时不断偷眼打量他。

大约半个小时，来了个老闸捕房的巡捕。店员忙迎上去。那巡捕向他摇摇手，口叫“去去去”，赶店员进了后柜房。然后拿出一套巡捕服和一套中式便服，问张明达：“穿哪套？”

“都穿上！”张明达先穿便服，手里一摸，是绸料，再穿巡捕服，竟是老厚布，倒是挺刮。穿罢衣，匆匆结好钮扣，巡捕又递给他一根警棍。两人出了旅馆，并肩向北火车站走去。

这个巡捕，是地下党外围同志。抗日初期，张明达在沪南活动时，就互相熟悉。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明达故意疏远了许多熟人，包括他。偶然见面，也只点个头，不说话。今晚他电话急召，并且明确地向他提出要借用服装，他当然明白。所以，干脆送来两套，随你用。没想到，张明达竟都穿上了。他现在唯一怕的是碰上巡长或探目来查哨，那可就三言两语应付不过去了。

张明达更紧张，穿上巡捕服，手提警棍，固然严然一巡捕。但是碰上巡长、探目或宪兵之类的怎么办？自己要露馅，还要把这位外围同志连累进去，所以他比这位巡捕更注意观察四周的动静。待他们走近火车站时，张明达从头发梢到脚底板，全身汗湿个透。觉得套在里面的衣裤，全粘贴在身上，头上汗水顺着帽边鬓角流进眼里，煞得眼疼睁不开，忙从里面裤袋掏出大手帕，抹一把，张眼仔细远望，发现快到北火车站的列车段了，他边走边把那位巡捕挤进一排长房黑影里。找个角落，匆匆脱下巡捕服，摘下帽子，匆匆叠起，

用袖管和裤脚扎好，递给那位巡捕。推他一下，低声说：“路上小心。”目送他转过墙角的身影消失后，他才整整便衣，向列车段值班室走去。虽然雷雨前的闷热仍旧包围着他，但是仍然感受到突然的轻快和凉意。

生活本身有时按意外的章法进行结构。当张明达和这位外围同志在墙角黑影里脱换衣服时，被躲在对面黑影里的一个人瞄上了。

此人是谁？林得山。

近半个多月来，林得山为他的差事，在南京、上海两地汽车站和火车站上往返忙碌，观察每个他见到的人。火车站，每天都有许多人上车、下车，既累眼又劳神，真个是苦不堪言。限期一天天逼近，拿不到这个共党“联络官”，他就要回监狱，这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在经过一段奔波后，他突然醒悟，暗骂自己愚蠢。“共党分子”多是夜间活动，而自己却在日间瞎忙，怎能得手？于是他改变战术，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守候在火车站外。刚才灯影里，他看见两个巡捕快步走过，进了黑影里，片刻之后，一个款款而去，另一个却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极力向黑影望去，好一阵时间后，才见另一个脚步沉稳地走出来。他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心中暗喜：“说不定交差有望了。”

张明达脱去巡捕虎皮，身着便衣，越发提心吊胆了。须知，这般宵禁夜里，在铁路附近走动是最危险的。从任何一个看不到的角落里冒出警戒的日本兵来，即使不被捅一刺刀，至少也要被捕无疑。正这时，转眼间，看见一个人，从右侧黑影走出来，一步步，跟上他。他的心“怦怦”直跳，胸膛里像在撞钟。

他边走边打主意，现在撒腿逃跑是最下策，而且已经太迟了。必须弄清他是个什么人物，随机应变。他突然转身迎上去，面对来人站住。

来人也在他面前站住脚，顶着灯光看他。

借着灯光看去，张明达一下子认出了他。

怎么会认不出呢？二十几天前，在票车上，他和押车日本兵并肩而坐，还和他用日语谈过话呢，他自称是西里龙夫的朋友，引起了张明达的警惕。就是为躲避他，从那天起，张明达安全观念大有提高。今晚他如此突然的出现，不是什么好兆头，但见他手里腰里没有刀枪之类的东西，张明达才放了点心，决定先发制人，便冷冷地道：“是你！”

“你？”林得山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眼前这个人，但猝然间，想不起，多日来，他见的人脸实在太多了，难记住。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明达斥问。

“你呢？”林得山也摆出架势，决意盘诘一下这个或将是 he 到手的猎物。

“你看我在干什么？呢？”

林得山听来，这口气不一般，脑子里打转转。刚才，他明明看见他穿着巡捕服的，现在换了便衣堵住他，用这口气说话，必有来头，正想着，又听对方训斥地喝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林得山再看他神色，一副不容抗拒的架势，好像如果不即刻遵从，他将被打倒在地，或者被带走。他顿时悟出来：这是个日本领事馆派出来监视他的便衣特务，惊恐之下，连忙点头，同时请求宽恕地一笑，急忙转身而去。

张明达一直注视他的身影消失在一条巷口黑影后，才转过身，一步步走向列车段。

他必须这样地把架子撑到底。他这一举措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通称

叫“胡文虎堂。”的万金油——“虎（唬）牌”。在刚才的特定情景下，便是“李逵上场，军师改姓”，顶用了。

其实，林得山也不是个初出茅庐的老实头，他毕竟熟悉中国社会，深谙日、汪、蒋特工人员那一套。他决定跟踪这个监视他的人物，和他再会一次面。若他真是个监视他的，则可以显示出他对特高课的忠诚。若他是个冒牌货，而且是那个中共的“联络官”呢？刚才仓促间让他从手指缝间溜掉，岂不溜掉了改变后半辈子命运的大大良机？况且，刚才那样并未真正弄清他的身份，就糊里糊涂地败下阵来，也太窝囊又可笑了！

他又绕回车站旁，躲在黑影里东张西望。

张明达左绕右转，进了车站区，条条铁轨在灯光里闪亮，像条条长蛇，他每走一步，它们便在灯光下扭动一下，整个现场竟意外的安静。有两个蒸汽车头并列停在两股道上，不停地泻出白雾，发出刺耳的“咝咝”响声，又尖又细。他躲在这两个车头之间张望，只见有一个人提只信号灯，在铁道问一晃一晃的向西走去，再不见回来，左前道上，停着一列货车，看不清装载的什么东西。正转头间，忽听车头吼了一声，又见那列货车徐徐启动了。

“是向西去的！”他心中一热，便三蹦两跳扑了上去。

他是怎么爬上车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只记得一只脚跳上了这列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的登车踏脚板，另一只手又抓住踏脚板的扶手下端，一纵身便敏捷地登了上来，跨进了守车车厢。

火车出了站，押车工从守车前门转身过来，忽见车厢里有个人，吓了一跳，忙喝问：“谁？”

张明达向他摇摇手，笑一笑。

押车工举起灯，细瞧他。红色灯光里，映出张明达庆幸微笑的脸，押车工也惊喜地笑了：“是你？怎么回事？”

“说不得！”张明达拉过他，两人挨肩在长椅上坐下，兴奋得大口喘气。

原来，当这列货车启动后，张明达决定扒车西去的瞬间，只见列车尾部“守车”的前一个踏板上站着的押车工正是他要到火车站求助的地方同志，就是他。

东方天色将晓的时候，张明达所乘的“专车”到达南京和平门站停下了。那位押车工帮助他乘上了去芜湖的轻轨小货车进了城。在白下路小火车站下车。这一夜，他心着急，脚不停，车上没合眼，实在累极了，一下车便跌坐在地上了。他用力蹬蹬两腿，双手按地，强撑起身，左右转头四望着，一拐一瘸，跨过一条铁轨，翻过车站矮墙，钻进市区小巷。

当他在南京市区小巷穿行时，在上海火车站那个鬼鬼祟祟地跟踪他的林得山，已被化装成便衣的宪兵推上了一辆黄包车，拉回监狱去了。他始终没敢提及曾遇到过一个换过巡捕服在车站上消失了的青年人。他知道，如果提及了，“特高”不栽他个“故意纵敌”才怪呢。因为现在他明白了，无疑那个人定是他要寻找的那个中共“联络官。”

从那以后，林得山下落不明，再无消息。

张明达先到复兴路八条巷的家，脱换了上海老闸捕房那个外围同志给他的外衣，马不停蹄地奔小火瓦巷去给老李发警报。到了长治里1号李得森的家门前，仍旧习惯地左右瞧了一眼，街巷各处，不见有什么人活动，寂静如常，便举手推开门，抬腿进院去。不意门后突然有个人抓住他胳膊，一下把他拽个踉跄拉进门去，与此同时，另个人把门又关上了。他定睛一看，竟是

两个穿着高级西装的日本特务，不禁大吃一惊，立时明白遭到什么事了。脑子里闪电般打主意，怎么对付？没待他张口，两个日本特务劈头盖脸对他拳打脚踢起来，他躲闪不及，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不由蹲下身去，却被他们捉衣提起，不由分说，连推加搯，把他送进李得森的客厅——诊室。然后，他们又返回躲在院门后，一左一右守候着。

张明达观看客厅里，已经有十几个病人在候诊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面带病容，笼罩着惊恐。一个挨一个地挤坐在地板上，他来得晚，被按在这最前边。

他低头侧眼望去，只见张敏被一个日本特务看押在卧室门口，几个日本警察和便衣在屋里各处搜查，翻箱倒柜，撬天花板，掘地板寻找什么，地上到处是纸片乱飞。

他只好硬挨着，什么都不必说了，也不必动了。共产党员的党籍当然是明明白白存在着的，实践入党誓词的局面已经出现在眼前。

牺牲吧，这是早有准备的。迎接酷刑审讯，寻机会像程和生那样，痛快一点，不让敌人从我嘴里得到一句党的机密，做个洁白无暇的共产党员。在外边继续工作的同志们，是会得知这消息的。

决心定了，情绪就逐渐安静下来，再看屋里的病人，一对老夫妻，相依相扶着，老头体弱黄瘦，老婆焦的不安。一个中年女人怀抱个孩子，木然神伤问掩饰着怨愤。一个黄脸男青年，浮肿得张不开眼，张大嘴边喘气边哼哼。另个中年女人，孤苦无告地低眉垂目，一副呆滞的表情。张明达一下子明白了：都是来请李得森看病的人。他心中一下子升腾起一线希望，急忙仔细打量着自己的衣袋，袋里只有一张“良民证”和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他顿时觉得，从他衣袋里放射出一线希望之光，骤然膨大了，且给他鼓起了强大的勇气。

过了好大一会，眼看着三个穿便衣的从西厢房李得森卧室里走出来，一个手里提着李得森出诊用的小提箱和一个布包，另一个怀里抱着李得森的书本、纸片。他们三人的后面，跟着几个警察，行色匆匆地走出院门去。接着后面又从卧室里出来两个穿便衣的日本特务，走进候诊室来站定脚，依次一个个扫视病人，先伸手指着那黄脸浮肿的青年喝道：“你的，滚！”

那青年缓缓站起，出了门，急慌慌地走了。

那便衣特务又指指那对老夫妻：“滚！”

然后他又指指抱孩子的中年女人：“滚！”

他这样指来指去，连声叫“滚！候诊室里的人，被叫到的，指到的便立即站起来，急急向外走，没有被指到的”没有被叫到的也都急忙起身等待，张明达也跟着连忙站起，那便衣特务看看他，问：“你的，干什么的来？”

“看病，我有胃病。”张明达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李得森为他开的几张处方。双手展开，送到那便衣面前。那使衣瞟一眼药方，伸手在他腰间、腋下摸索。张明达举起双手，那便衣摸索完了，顺势拉他的胳膊往门外一推，死脸丧气地大叫一声：“滚！”同时踢他一脚。

张明达恨不得马上蹦出院门去，但是取得的现场效果还必须演下去。他假意莫名其妙地回头问：“大夫的，不给看病的？”

那特务对他又吼一声：“滚！”然后转身对屋里的人们一通乱踢，乱叫：“八格牙路，滚，滚，统统的给我的滚！”踢过吼罢，拉一把另个便衣，径自大步走出院门去了。病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向大门挤去。

张明达反被落在后面了，他边走边回头张望，见张敏从卧室门里闪出来，便有意放慢脚步，想对她说句话。

但是张敏却迟疑不出门来。

张明达只得跟随人们出了院门，左右看一眼，不见警察和便衣特务，急忙回身又进门，恰这时，张敏赶来关门，他双手拉合大门用背抵住，对张敏向卧室方向用手指指，示意问：屋里是否还有敌人？张敏微合眼，向他摇了摇头。他明白，警察特务们都走了，暂时无危险，忙对她说：“应该马上向上海组织报警。”

她重重点了一下头。

“你呢？走不走？”他催问她。

“老李已经被捕，我当然走不脱了，他们肯定有埋伏监视我，你趁人多杂乱，快走吧。”

“郑百千和无锡的邱麟祥怎么通知他们？”

“由我负责，你快走吧，别耽搁。”张敏一手开门，一手推他。

“我告诉外围的楼志明同志，以后通过他来同你联系。”

张敏又点点头，用力拉开门，推他出去，马上把门关上了。

到现在他才感觉到自己心跳得震动全身，又左右瞟一眼，大步走去，边在心里盘算，下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作什么。虽然他早有准备。但事情来得还是突然，紧迫，当然，其实并不突然，完全可以早点避免。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也无人可埋怨指责。当务之急是快去给陈一峰报警，还有汪敬远。

街上行人来去匆忙。他发现，人们都对他投来奇怪的一瞥，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太快，大概神色也慌张，便忙转弯走进一条小巷，并且放慢了脚步，使之从背影望来也像平常走路的样子。

转过几条街巷，上了复兴路，到了中联社高级职员住的4号院，走到陈一峰住的房子前，正要举手敲门，却听见里面传出“呜呜”的女人哭声，那么低弱，那么悲伤，像在呻吟，他明白地意识到，这哭声，意味着：陈一峰也已被捕了。

不能停留，不能犹豫，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冒最大危险也要去给汪敬远发个警报。虽然他和汪敬远没有直接联络关系。但是，这时是非常紧迫时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用什么方法和形式，总有办法的。可以托人叫他出来，扔一句叫他明白的话就走。或者……他一边走，一边想，待走近汪公馆时，完全没有信心了。且莫说进汪公馆，踏上颐和路都不可能，汪精卫的警士团，日本宪兵，在这条短短的小街上构成个禁区。你踏进街口试试？先把你拉进警士团盘问清楚再说。

他只得改变主意。眼前只有一项紧急任务，就是立即赶回上海去，向上海组织报警。

他匆匆赶到了绫庄巷7号，这是他的备用秘密点。那位外围同志楼志明就住在这里。他向楼说明了发生的情况，然后换了衣服，戴上副眼镜，一下子变了模样，又带上另一张“良民证”，临走也没忘记嘱咐楼志明提高警惕，最好暂时换个地方住几天。然后匆匆赶到下关站，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直到火车启动，离开下关站后，才松了口气。

车到上海，他又没招了。茫茫大上海，熙攘大人群众，到哪里去找老吴？哪里是接头点？紧急联络信号是什么？联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所有这一

切，他一概不知。而且，自中西功被捕后，老吴住处不定。更何况，自他担任联络员以来，只和程和生联络，从未见过老吴的面。现在去找他，不是和自己开天大的玩笑吗？

当天夜里，万般无奈。他赶到了浦东乡间远房亲戚赵启新家屋后，没去惊动人家，在房外直等到天亮。一夜之间，没有一点悲凉和愁虑，一心只想用什么办法得到上海组织上的消息，就这样，直待到人家开了门，他才露面。

赵启新不是党员，但和张明达感情关系很好。这人从小学制作皮件手艺，后来专做“坤包”。他心灵手巧，走在上海街上，看见阔小姐太太们手提包里有新花样的，回家把那花样略加改动，便缝制出一个更新的样式来。就这样，自己缝制，自己销售。但是，在日本统治下，这种小本手艺，生活也难得维持。张明达偶而到他那里去，除了在经济上对他略有周济的原因外，更多的是两人话题投机，因之，他对张明达的为人，早已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对张明达说：“不怕，到了三关要命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我房后有个地坑，那是块宝地。急了眼，我还有刮皮子的刀呢。”

他们之间的谈话都不是随便说的，赵启新一见他，开口责怪说：“既然来了，怎么不叫门？在外面受罪！”

赵启新的父母，是两位典型的江南敌占区农民。一见张明达，忙给他换上种田人的衣裳，煮一大锅泡饭，把他按在方桌旁，两老一齐劝：“吃吧，吃吧，你们是打鬼子爱国的人，不吃饭怎么行？”

张明达就是吃不下饭，端起碗便出神。

他挂念着自己的同志们，想得到他们的消息。

他托赵大爷到上海闵行路他的家里去打听。连去三次，回来都说，屋里人讲：没听人们说过东洋兵捉人的事，又说，叫他在这里再住几天。这令他更加坐立不安。时间这样一天天过去，他将失去党的联络，没有工作，最后也将丢掉党籍。他常在半睡朦胧中，忽然看见程和生迎面走来，和他接头，也看见陈一峰漫步逍遥地在他面前走过，却不理他……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在世界所有共产党里首屈一指。每个人在被吸收入党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从家庭经济状况，到本人社会经历和他的亲属以及社会关系。在入党手续方面，要宣读誓词，誓词的中心精神强调，要为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为此，在行动上，要执行党的章程，服从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残酷的斗争需要，迫使全党都要特别强调组织纪律性。党员调动工作，需要有文字的（特殊情况下，可以用特定的接头暗号）组织关系介绍信。没有这个组织关系介绍信，任何一级党组织都不承认其党员身份，也就不与之发生党的组织关系。即使互相认识的党员，没有组织关系介绍信，也不能承认其党员身份。那么，这个党员，便被称之为“失掉了组织关系”，“失掉了党籍。”当然要问一问：怎么失掉的？被敌人俘虏了？被敌人逮捕了？何人可以证明？证明人在同一时期内在哪个党组织内过党的组织生活？表现如何？有无通敌可能和嫌疑？都要考查清楚。还有，失掉党籍关系的党员，在与组织脱离期间作过些什么？叛变投敌没有？积极寻找党的关系没有？自觉主动实行党的光荣任务没有？作证人都要对党负责任地详细加以说明，再经党组织多方调查证实才行。否则，是接不上党的关系的，那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因之，凡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把党的组织关系，也即党籍，看作比肉体生命更重要、更崇高，称作第一生命。从事敌占区地下工作的党员，尤其强调党的组织关系，强调党的纪律，把纪律冠以“铁的”，

有不服从党纪者，组织可以采取制裁措施，直至处分。

张明达是老党员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这些当然深知。现在他的不安，倒不在纪律和党籍方面，他担心如果上海情报组织被敌人完全破坏了的话，党的工作就要受到重大损失，当然，他也许会因此而失掉党组织的关系、党籍。

必须找到党组织！

怎么找？这么呆在这里，何时能找到组织？

赵启新的父亲看他如此神不守舍，决定再去打探一次。

老人直到晚饭后才回来，笑嘻嘻，说道：

“有好信了，你屋里人说，有个姓刘的，到你家里去找过你。你屋里人对他说没见你回来，姓刘的说过两天再去找你。”

他忙问：“姓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说。好像和你是朋友，说话挺亲切。”

这姓刘的是谁呢？张明达心里揣测。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中国姓刘的人可太多了。狡诈的日伪宪兵特务，也会冒充个朋友到家里去刺探他的行踪，随便说声姓“刘”，也不无可能。

但他确实有个姓刘的朋友，名叫刘广胄。曾和他发生过单线联系，担任过他和上级的联络员，1940年被调到苏北根据地去了，后来因病回上海治疗，常到张明达家去。

想到刘广胄，便更想到党组织这具体完整的关系网。十几天前，他的党组织关系，在李得森支部，如今书记李得森被捕走了，他的组织关系也因之被带去了，无着落了。如果到他家去找他的那人，真是刘广胄，那么，他是党员，会从党内听到些与上海情报组织有关的消息。譬如，李得森和陈一峰关押在哪里？汪敬远怎样？还在汪公馆吗？被捕没有？张敏逃出来没有？她说过，由她向郑百千和无锡的邱麟祥发警报，发了没有？他们俩逃出来没有？上海老吴现在什么地方？怎么和他接上关系？刘广胄当然能知道这些。

想来想去，无论如何，要回上海家里去看看。也就是说，要会会那位姓刘的。如果他是日伪军宪特，则不露面；如果是刘广胄，那就太好了。打定主意，告辞了赵启新和他的父母。起个大早，换了装，一路上百倍警惕，上午10点钟，到了上海闵行路口，向自己家门了望，不见动静，为谨慎，防万一，退到百老汇路上，在人行道游荡。

转悠到12点，肚子里早饿了。家里人大概该吃午饭了吧？现在闯进去，吃饭没问题，但是不行啊。如果家里有人上街从此走过，看见了，倒可以问一声，到底姓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又转回了闵行路口，转头间，猛见一个人走进闵行路，在他家门前四向了望了一下，走进门去。

是他，刘广胄，那身影，怎么改装，张明达都认得出来，他加快脚步往家走。

“老刘！”他轻声叫。

刘广胄转头看见他也低声惊叫：“你没出事？”

两人不知怎么搂到一起了。张明达急道：“我们南京出事了，李得森、陈一峰被捕了。”

刘广胄放开他，轻声说：“我料到了。”

“料到了？”

“上海科也被破坏了。”

“程和生有什么消息？”

“我也在打听他，没听到消息。”

“上海科的领导人呢？”

“更不知道了。我从苏北回来养病，一直没见着他，我的关系也失掉了。”

第九章 共产党人的风格

听说刘广胄的组织关系也失掉了，张明达心中叫苦，这可怎么办？两个相对无言，两张脸都布满愁虑的阴云。

张明达在椅上坐下，家里人忙着给他俩端饭。刘广胄坚决不吃，张明达更没心思吃。两人又四目相对，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党组织关系失掉了，党籍也就失掉了，失掉了党籍，就是失掉政治生命，那是他们的第一生命啊！离开党组织，一天也活不下去。

张明达拍一下椅子扶手，腾地站起：“找！我们找！”

刘广胄点点头：“我们想想办法。”

“你有办法介绍我到苏北根据地去吗？”

“刘广胄凝神想了半晌，突然说道：“哈，我有个老熟人，在新四军兴化独立团当团长。”

“好，他叫什么？”

“叫刘思民，我给你介绍，到了那里，可以请他帮助你，他可以把你送到华中局去。”

“那太好了！”张明达几乎跳了起来。

第二天，张明达带上刘广胄给他写的信，从十六铺乘客轮，出吴淞口，沿长江航行，在苏北口岸镇登陆，奔泰州。然后改乘小客轮去兴化。一路上，连闯口岸、泰州、兴化三处敌伪军警把守的关口，凭着几年担任联络员的经验，再加曾在上海生活多年，应付他们的检查，绰绰有余。

到了兴化，按刘广胄交代的地址，找到联络点的那家“土特产经纪行”，接上暗语，住了下来。当夜，店主通知他：“今晚有小船送你到刘团长那里。”张明达心里那分兴奋，简直没法形容。

进了根据地，什么都好办。刘思民团长，快人快语，告诉他：“我们有批营、连干部到军部去受训，你跟着他们去华中局就是了。”

走了四天旱路，都是晚上穿行于敌人的碉堡群中。同行的营连干部们，个个像飞人，而他这常坐火车、汽车的两腿两脚，可就显出无能了。不过，这是到华中局去啊！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到了那里，政治生命就可能接上了。再苦也要跟着飞呀！

当他被送到阜宁县境内华中局等待领导接见时，彻夜难眠。回到家了啊！回到母亲身边了啊！长期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敌人刺刀缝里活动，现在组织又遭到了破坏，他撤回自己的老家了啊！怎么睡得着？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于斗争环境艰苦，变化多，有许多党员，或由于交通联络阻滞，或由于环境突变，或由于负伤掉队，因而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们忍饥耐寒，千里跋涉，流落街头，甚至殒命中途。这些人，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心里，在行动。正是这些人，在找到组织以后，立场更坚定了，斗争经验更丰富了，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分子。

张明达正在经受着这场考验，还仅仅是开头呢。

华中局派人接待了他。态度亲切和蔼，语言中肯、明确，暖流通遍张明达全身，他也早有准备，在华中局，有什么不能说的？有什么不可说的？坦诚，这是党员向组织的唯一态度。他先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入党后的工作调动，何人可以证明，等等

等说个详细，然后把南京情报站几年来的工作概况，被敌人破坏的经过，尽他所见、所知，完全负责任他说个清楚。还有他失掉关系的原因和请求。

接待他的同志叫诸勋，默默地听着，不说话，见他说得渴了，往他大白碗里倒白开水。最后，对他说：“你把所谈的写个书面材料好吗？”

“好好。”

“有关人名、地点、时间写详细。”

“好好。”

于是他完全按照说过的情况，执笔疾书，第二天把材料交给诸勋同志。

“就这样，你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吧。”

“好好。”他知道，自从情报站被破坏以后，世界形势有什么变化、国内各战场的形势，他在这段时间里，完全不了解，需要补上这一课。更重要的是，诸勋同志代表组织，组织叫他参加学习，不就是收留下他了吗？更何况，对他所说的一切，组织也要进行调查核实啊，哪个组织能不经调查地相信一个只凭一张纸条而不是组织关系介绍信介绍来的人呢？

特别他又是个从上海情报科南京情报站那种绝对保密单位来的人。

他参加学习，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对于苏德战场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德寇伤亡数十万，苏军伟大胜利的内在因素，分析得头头是道。对于德日意三国法西斯必败，从国际形势到其国内状况都有具体阐述。周围同志，用赞赏甚至惊奇的眼光看着他，这些常识，是他用平时接触到的材料对世界大局进行分析得出来的。更何况，在这之前，在“中央社”，他所能看到的材料，用党员立场进行研究，完全能够说出一篇道理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月了，不见诸勋再找他谈话，虽然相信这里的组织定能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旷日持久地这样下去，是怎么回事？他渐渐坐立不安了，壮起胆子去问诸勋同志。

诸勋仍然亲切和蔼地对他说：

“你好好学习。这事，你别着急，我们正在调查。因为，你也知道，秘密工作系统，组织手续，不像别的单位。”

“好好。”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地，不由兴奋起来，暗自庆幸，“组织上调查去了。”接上党的关系是没问题了，在这里等到第一次参加党小组会的时候，向同志们说些什么呢？得好好想一想，可别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天冷了，每人发了棉军衣，他当然也分得一套，还有被褥。

一天，诸勋同志派人来找他，在一间民房里和他谈话，仍旧是那样亲切和蔼，语言中肯、明确：

“这样的，你所谈的和写的情况，我们作了研究，也作过调查，今天要跟你正式谈一次。”

“好的。”

“先说你们南京站的情况，你们的组织活动，过去我们不了解。”

“是的。”

“我们调查，也调查不清楚。现在，敌人要来大‘扫荡’，我们要进行反‘扫荡’。在这种情况下，你呢？不能跟随我们行动。怎么办呢？你暂且回去。只有回去，等敌人大‘扫荡’过去以后再说。”

这几句话，不啻在张明达心头浇上一盆冷水，怎么？调查不清楚？不让我跟随行动？回去？只有回去？亲娘啊亲娘，党是我的亲娘！从上海到兴化，

坐船换车，徒步行走，过关闯险，好不容易找到了亲娘，亲娘却说查不清楚不认他，不让跟着走，还要他先回去，以后再说。怎么办？！怎么办？！张明达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时间心血上涌，忍不住“哇”地一声，放声大哭起来，眼泪像决堤的河水夺眶而出。他边哭边请求说：“诸勋同志，我不回去，我要跟着你们走。我绝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哪怕叫我下连队当兵也好，给伙房打杂也好，当挑夫赶骡马也好，我不走……让组织上长期考察我……”

诸勋是受领导之命，爱莫能助，只能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不要如此激动，按照你说的，你也是老党员了，审查、考验，对每个党员都是长期的，时时刻刻的。对你这样安排，是组织决定，既是组织决定，谁也不能改变。敌人大“扫荡”马上就要到来，情况很紧迫，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不离开，你又不在于编制，我们行动转移，不一定通知到你，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隐蔽？万一被敌人俘虏，那就不好了……

听得出，组织对他的问题，不是轻率处理的，肯定是经过研究的。至于怎么调查不清？他想像不出来。可以肯定，组织也有组织的难处。

从诸勋同志的态度也看得出，他们只能如此，别无他策。

有什么办法？事情到了这一步。

还说什么呢？该说的都说了。

唉！

他脱下了棉军装，换上件不工不农不商不学的小棉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流淌……

回上海！于是他一路心中淌着热泪又回到了上海。除了应付关卡盘查作出应该作出的脸色，其余在车船期间，都是木木呆呆。

……

李得森等是于7月29日被捕的。十几天后，当张明达踏上奔苏北的客轮时，8月17日，仍隐蔽在南京的郑百千被捕了。

郑百千，是个书生，颇有点程和生那种脸型和眼神，不过脸上比程和生多个笑嘻嘻的乐天表情。仿佛在他看来，天下无处无事不是可喜可乐的形象。

他身体虚弱，常闹点小病，这也没影响他对什么事都挤起眼笑一笑，有时还语出幽默地边评论边笑。

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位爱国诗人，对子女的教育常晓以大义，寄以厚望。因而对郑百千的名字也起得很奇，令人难以揣摩其含意。他的哥哥叫郑一十，如果按个十百千万伯仲次第推理，或当是个序列记号吧？那就错矣！对此，老先生有《示儿歌》说得明白：

“大儿大儿名一十，命名取义汝应识。

尔要能一以当十，如此行道谁能敌。”

如此说来，按老人的意思，二儿郑百千则是“尔要能百以当千”了。好个“一以当十，百以当千”！

郑百千果然不负所望，在父母严慈相济教育下，一旦国家有难，抗战军兴，便在同窗好友邱麟祥的帮助下，奔赴浙江丽水等地，在我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因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党地下组织被迫疏散撤退，分别向苏北根据地转移。郑百千化装潜回上海法租界，想回家暂躲两天，以便再找邱麟祥帮助，介绍到苏北根据地。谁知一进家门，一个意外的消息把他惊呆了：一向以爱国自负的老父亲竟成了汉奸，到南京汪伪政府当了大官！

他有如五雷轰顶，百思不得其解。便写信给在无锡的邱麟祥，请他到上海，共商大计。

邱麟祥得信后，立即从无锡赶来，他把前后情况向邱麟祥细说一遍，并希望立即离开上海，这里已不是久留之地。邱表示十分同情。隔日领来了张明达，没想到，张明达不但无意帮助他去苏北，相反要留下他，说利用他父亲在汪伪政府的地位作掩护，搜集敌伪文化界的情报。组织这一决定，不但有违他的初衷，而且他也不可能和一个汉奸父亲和睦相处。但张明达却耐心地劝说他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但要与父亲和睦相处，而且还要取得他的欢心，要他为你谋求一个有利于搜集情报的高层职务……。张明达苦口婆心一席话，说得年刚二十出头、脑子里还充满幻想的郑百千，眼前呈现出一幅五光十色、充满浪漫和神秘色彩的图景。终于欣然地同意了。当即约定时间和地点到南京后碰头。

当他到了南京，突然出现在他老父亲的面前时，老人家不知是惊是喜，木然地望着他半天才“周吴郑王”地板着脸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你来南京干什么？”郑百千却笑嘻嘻地回道：“子从父命，您老来南京干什么，我也来干什么嘛！”郑百千说得轻松，以为这样便可以达到和老父亲“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和默契的目的。谁知老人家一听，竟拍案而起，仰天长叹一声：“唉，他们把炸弹送到我书房里，我是被人挟持才落到这般地步的，未料你这竖子竟如此不忠不孝！你，你就到江北去，我不愿再看到你！”说罢不容分辩便迳自回书房去了。

郑百千傻愣了，不笑嘻嘻了。回家板凳没坐热，便讨了个没趣，还谈什么“和睦相处”、“谋个高层职务”，真见鬼！不过，他当然不能老人叫走就走，这是组织交待的任务，死乞白赖也要赖着留下来。他一不争辩，二不申明，只一味求情。俗话说“儿大不由爹”，老先生终于托人给他谋了个中学教员的职位。

有了掩护职业，他便定期和张明达接头，按张指示，搜集投敌的文化界名人的活动情况。得益于老父亲的官位，得到的情报，都是和汪精卫“还都组阁”有关的。

1942年8月21日，星期五——这个可厌的“礼拜五”——郑百千上午在家休息，秋乏难忍，正恍惚入梦间，突然进屋来两个人，直呼其名：“你是郑百千？”他朦胧醒来：“什么事？”

“是你吗？”

“啊。”

“跟我们走。”

疑惑间，郑百千细看他们，都穿粗呢西服。随着他们走近，一股劣质香水味刺鼻。他顿时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了，当然也就心知出了什么事了。但仍旧问道：

“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

“到那里就认识了，走吧。”

“那么，我去拿件衣服。”他急中生智，力作平静，走进自己卧室。他的卧室，有个后门，通街。他拉开门，本想溜走，但还未探身抬腿，却见门外已有两个同样穿着西装的家伙守在门两边了。

他常笑，现在见此情景，不笑了。

他被他们领出门。走过一段街，在街旁有辆汽车，他们把他推上车，车

里已坐了一男一女。他一眼看出，男的也是个日本便衣，女的是个普普通通的其貌不扬的弱女子，不像想像中那种“神秘女史”式的中帼英雄，瞧她若无其事的样子，便看出来多半是吃冤枉官司的。

随后爬上车的是日本便衣，把他推到女的身边坐下，一副铐子把他俩铐在一起。车子开动了，发出十分刺耳的破旧的马达噪音。郑百千惊魂稍定，一阵莫名其妙的懊恼袭上心头，搞情报工作才半年多，还未来得及一显身手，便成了敌人的阶下囚，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唉！为此不免深深地叹了口气。突然，身旁那弱女子轻轻挤了他一下，用细弱得只有他能听到的耳语声说：“坚强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他猛抬头，这才发现这“弱女子”竟有着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正用坚强而又充满乐观的目光注视着他。他顿时感到热血涌动，心目中这个弱女子也顿时成了一位莫测高深的“神秘女史”，并从她那里得来一种力量，勇气倍增。随即向她点了一下头，坐直身，紧闭嘴唇，昂起头，眼光放散，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

后来他知道了，这女人就是李得森的妻子兼秘书张敏。

张敏没有按和张明达约定的那样通知郑百千。当时，仓促中，她为催张明达快速离开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主动承担了这任务。但是，正如她所料，她走不出门去了，房前屋后布满了特务暗哨。她若出门，他们便会跟上，她走到哪，哪的人肯定被捕。

郑百千和张敏被送到了南京江东门，汪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寄押候审。这个鬼地方，原是国民党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关押军事罪犯的。但其实主要是关押、刑审、戮杀共产党人的魔窟。这里的管理人员，从典狱长到狱卒，集封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凶残、野蛮传统手段之大成。当年恽代英烈士就是在这里的操场旁菜地里被敌人当众惨害的。

这里共分东、南、中、西四大监，四大监内又分天、地、人、日、月、星、智、仁、勇、改、过、自、新十三个大监牢，大监牢内各有十到三十几间牢房。在蒋介石政权统治年代，全国监狱林立，这个监狱堪称规模宏大，建筑一流的“模范监狱”了。

现在，这份“国宝”转赠给日寇及其宠儿汪精卫手里了。关押对象，当然还是共产党人为主。只是掌大权的又平添了个太上皇——日本鬼子。对于审讯、判刑、关押等全要呈请大日本警宪裁夺。

他被推进南监，“过”字监一间牢房里。这里已有17个人，都在，默默地侧耳倾听楼上地板的“叮咚”响声。像是有人在打架，又有用日本话的谩骂声。

“你是什么罪？”一个强壮的中年汉子问郑百千。

“不知道。”他沉着脸答。

汉子点了一下头，同时向他略竖了一下拇指，嘴角冒出一个笑：“好样的。”

他还不大懂，这汉子的动作、表情和这“好样的”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便轻声反问：“你呢？”

“一样的，我们都是。”汉子向牢房里人们横扫一指，继续说：“一般刑事犯不送这里。”

“噢，楼上在干什么？”

“拷问。”

过了一会，楼上不响了，两个狱卒，一左一右搀扶着一个青年从他们牢

房门前踉跄走过。那青年，头发散乱，鼻孔滴血，衣裤水湿，沾满尘土，经过他们的牢房走向里面不见了。那汉子愤愤地“哼”了一声，说道：“是中国人，就没有孬种。”

当天晚上他被安置在靠门边睡。难友们说：“你新来，睡这里。”是什么道理，他没心问，门边同样闷热，蚊子多，好像它们飞进来专找睡在门口的叮咬。他脱下衣服反穿，用衣领蒙住脸，也不抵用。

第二天，他没吃早饭，吃不下那种难闻的菜汤和糙米馊糟。饭后不久，忽听狱卒在外高叫：

“汪敬远！”

“汪敬远！”

片刻，又是昨天那两个狱卒架着那个青年从他牢房门口走过。不久，楼上又响起了用日语大声争辩的怒吼。其间不断夹着“噼啪”的耳光声和沉重的脚踢声。

郑百千好奇地问已经和他说过话的那粗壮汉子：“受审的是个什么人？”

“什么人？中国人！”

“怎么尽说日本话？”

“那是他会说日本话。”

“好像是他在骂他们，他一边骂，他们一边打，他骂得越狠，打得越狠，打得越狠，他也骂得越狠似的。”

“十多天了，天天如此，这样下去，他们会把他打成残废的！”

直到吃午饭，两个狱卒又架着汪敬远从他们牢房门口走过。他看这个汪敬远，已不像人样了。

这汪敬远是何许人也？他不知道，就像那个“神秘女史”一样，是个“神秘青年”无疑。

下午，一个狱卒出现在他牢房门外，大吼一声：“郑百千！”像一声炸雷，把他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他知道这是轮到他上场了，是金是铜，就看这一锤子了！

铁门打开，他跟着狱卒上楼，边走边摸自己瘦骨嶙峋的两肋，不知能不能经得起一顿毒打。因为他心定的那个不见于经传的“主义”，注定要挨打。他把那“主义”叫做“不承认主义”，原则是：不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即令张明达站在对面，也要笑嘻嘻的说：“我不认识他呀！”也不知道邱麟祥住哪里，是何许人。同样，即使邱麟祥当面指他为共产党，是他的联络人，也要瞪大眼，奇怪的笑，反问他：“你是谁呀？”

因为和他发生党关系的只有这两个人。

其次，一定要使审讯者相信，捕捉他是错了，方法是“软”。别像那个汪敬远那样和他们对骂，弄僵就不好收场了。其次要“冤”，要申明他对捕他完全不明就里，冤枉。第三要“远”，与党无关的，可以跟他们扯，扯得越远越好。与党有关的，在远处便给他们关上门。

孰料，“大日本”审讯官根本不问他这些，刚进门，脚未站稳，还没看清房里几个人，便有两名打手扑上他来，扭胳膊反剪起他，左右耳光一齐打，左右两脚一齐踢。刹那间他的眼便肿得睁不开，看不见人影了。只觉得两脸两腿麻木无知觉，好像不再是他的脸和腿了。

他被踩倒在地板上，蝉噪般耳鸣声里听得一个模糊的声音：

“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快快的说！”

他摇摇头。心里暗想，他们怎么知道张明达和邱麟祥这两个人的名字的？但是挨打这一关是熬受过去了。看来，自己也不比那个汪敬远差。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只是个下马威，“小菜”一碟。

第二次的开打，可叫这位书生长见识了，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一条很细很细的软蛇一样的东西在他背上一口一口的撕咬他的肉，他咬紧牙，稳坐不动。他自己都奇怪，哪来的这般忍受力？

“你的，快快的说！”

他又摇摇头，他知道，现在根本不必作那些什么软啦、冤啦、远啦的把戏了，只有拼死坚持自己的“不承认主义”一条路。这很容易做到，那就是：把心一横，就不疼了。

郑百千失踪了，急坏了他的老父亲，几天没有信息，翻遍家中箱柜，不见他留下一张纸条，老人心中窃喜：“竖子也许去投共党了？”秘密托人打听，结果说是“因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捕了”。老先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酸甜苦辣地老泪纵横，最伤心的莫过于冤枉了儿子，未能力儿子助一臂之力！夜里偷偷告诉老伴，二老泪眼对泪眼，一个说：“你还责骂他呢！”一个说：“他会原谅我的！”

……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他从头到脚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脱光，用药水涮洗，然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快快的，快快的。”宪兵们在病床边催医生。

他们绝不愿让他就此死去。因为他这跳车行动既说明了他的身份，又证明了他在这个情报集团里的地位。

不错，程和生在上海情报科的地位可以比喻作一个集团军的大总务。这个集团军从上到下、内内外外、人员组织、大事小情，他都掌握，他都知底，他知道的事太多了。

经过抢救，两天后，他苏醒过来。

由于要不断地给他抹嘴擦脸，更换垫布床单，两天来医院护士拒绝给他护理服务。看守宪兵使命令倪之骥干这些事，服侍他。

当他微睁开眼看见倪之骥时，声音微弱的说：“厕所！”并用右手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宪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骥背他上厕所，然后跑上楼去报告。三楼院长室临时改作审讯室。

倪之骥背起他，走进厕所，他却不下地，附在倪之骥耳边，断续他说：“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组织报警……”

倪之骥明白了，他要上厕所，是为给他下指示，便点点头。

当倪之骥背着他走出厕所时，四个日军宪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厕所门外了，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床。四个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声，抬起就走。

当他被颠颠簸簸抬到三层楼梯转弯处时，便溘然长逝了。

四个抬床的日军宪兵仍旧把他抬进三楼院长室，准备审讯他的日军宪兵军官看了看他，不知所措地惊叫了一声。

至此，日本警视厅特高课一共逮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程和生、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钧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

于是，一个再次震惊日本朝野的“中共谍报团案”的极密文件在东条内阁各相和皇室重臣间，随同“太平洋战区”的告急电报一起传阅。

各相和重臣们震惊之余，对日本警视厅又展开了一次猛烈的谴责。他们问：

“这样一个‘严重集团’在中国占领区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和南京长期存在，是受谁保护的？”

这是个警视厅怎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找不出可以把责任推到近卫文麿的根据。

东条英机对存在这么个“中共谍报团”的重视程度，几乎超过对太平洋诸岛战况发展的关心。

“大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自中途岛战役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基本上丧失了制海权。失败的丧钟即将敲响，或者可说东条英机已经听到了这钟声。在中国战场上，“占领区”内的“皇军”，不能向任何地方移动。中共正规军已经形成阵地作战力量。民兵、游击队就在他们城门外、碉堡外，日夜活动，有时眼看他们吹哨子集合，“皇军”不敢出动和他们交火。

这些形势的造成，和这个“中共谍报团”有没有关系？

这个谍报团送出过那么多的危害“大日本帝国”的情报，直到今天才发现，他们能说这是警视厅取得的一个胜利吗？这个所谓的“胜利”，能挽救帝国失败的命运吗？那个“大东亚战争”的战略计划，肯定在战争爆发前便已经被这个“谍报团”窃取去了。也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帝国失败的结局便已经铸成了。

于是，偷袭珍珠港取得战役胜利时挂在东条首相眉宇间那惊喜的笑意不见了。在几次内阁恳谈会上，他开始向与会的各相和重臣们深深叹息说：“大东亚战争本来是可以不发动的，但是，如果不发动这场大战争，那么日本必定要败给中国战场的蒋介石和中共，那将是日本帝国永久的耻辱。为了避免日本帝国的耻辱，我们才作这样重大的努力。”“开始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维系着帝国的存亡。但是，谁肯出面负起这个战争之罪责？我，只有我。”说到这里，他的眼圈竟被泪水润湿了。待到后期，他又向各相们强调说：“战前，重臣们普遍认为，为救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南进战争，宁败也无悔。那么，现在我们只能再作努力了。”

这个论调，当时，曾被许多忠于天皇的臣民们争相传诵。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们在痛悼这位忠于天皇的大将、首相时，仍认为他是“忠于日本帝国任怨负罪的英雄”，甚至把他供在日本“神社”里。

高桥兴助的两个打手把中西功施刑到“适可而止”至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为继续从他口里到重要供词，不得不给他治疗。

为此，高桥受到警视厅长官的严厉斥责，说：“把他打死，还能搞到什么重要口供？”在给中西功治疗期间，高桥又接手审讯西里龙夫。

一见西里龙夫，他就呆了。无论如何，他也不敢相信这个教授式的人是个中共党员！他的举止谈吐，一盼一顾，无处无时不自然地表现出一种贤者的尊严和风范。他的神态、气息，自然地告诫你：他身上具有一种神圣的

光环，不可侵犯。他睥睨地鄙视你。使你感到，日本臣民不敢仰视的天皇，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草芥。高桥自惭形秽了，不敢对西里龙夫施狂，倒是西里龙夫慢条斯理地对他讲共产主义。西里龙夫从容他说：他确实不遗余力地帮助过中国共产党抗战，他反战。他说，作为他，要拯救日本，在眼前只有走这条路。他也承认，他和中西功“志同道合”。

至于他和中共的什么人来往接触，他回答说：“你们调查去。”这使高桥很伤脑筋。绕过这个提问，问他给中共提供过些什么情报，他便从1938年说起，一件又一件，夹叙夹议，有许多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内阁的争斗，日本派遣军的罪行等等内情，高桥在此之前是从未听说过的。这使他惊奇，同时又感到大大的兴趣。

这种“审讯”断断续续进行了两个月。后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审讯开始时，西里龙夫在高桥对面坐下，清清喉咙说：“今天讲一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其未来。”或者：“今天讲一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及其未来。”

这方面，他有真才实学。审讯他的高桥兴助是个什么东西？他毫无学问，不过是一条法西斯政权豢养的狗而已。当然，狗也有狗的思维活动。高桥在西里面前，渐渐产生了一种迷惑：共产主义具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样的大学问家信仰共产主义？在这种迷惑的基础上，他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战局的发展，恰如西里龙夫对他讲解的那样：日本必败无疑。

正当他如此这般由疑惑而恐惧的时候，来自上海的报告说：“一个‘中共谍报团’要员跳车自杀了。名叫程和生。”

高桥兴助一听之下便大发雷霆：“怎么可以让他跳车？宪兵‘特高’们还有一点常识没有？他们是不是故意纵放要犯？给我一个个彻底进行审查！”

他要求警视厅长官下令，把此案要犯们押送到日本，由他亲自审讯。

不几天，东京派出的“特高”会同上海宪兵司令部派出的专差，给他送来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三人。

他一见这三个人，心里便叫苦不迭。看他们，一个个，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片，到处是伤，已经打成这样，还能指望他们“合作”？

所幸他们都还活着。暂且将他们送进巢鸭监狱，将息几天再说。趁这期间，他去“视察”中西功。

中西功经过治疗，身体仍很虚弱。但是已经能够讲话了。

他决定及早和他“恳谈”。

中西功还是不改初衷的神态，端坐椅上，面对高桥，从人类发展史的必然性说起，说到马克思主义，说到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说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说到她必胜的诸因素，说到他为什么断定日本必败，说到日本人民应该反对军阀集团给他们带来的灾难，有条有理。

高桥无可奈何，只得由他讲。

他也直言不讳地实说 he 为自己的党提供了哪些日本重要的军政战略情报。这是些用来证明 he 阐述的共产主义必胜的实例。简而言之，他是为了打败日本军阀，为了实现中日和平，为了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

他还津津乐道似地说了他是怎样主动联络、组织日本革命同志，帮助中共进行对日军士兵作反战宣传的经过，从形式到内容，他提出过一些怎样的

独到见解。

最令高桥震惊不已的莫过于他说：他根据得到的信息和资料，推论判断出日本将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份情报也交给了中共负责人！他说得很轻松，眉尖隐藏着隐约可见的笑意。

高桥实在忍无可忍了：

“你是个绝对死心塌地为中共服务分子！”

“不不，我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

“又是你那个共产主义！”高桥习惯地要跳起来，但仍强忍着。

中西功叹了口气，然后皱了皱眉头：“看来你真是不可救药的法西斯分子。”

高桥知道，现在再不可使用打手“教训”他了，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再承受那种方法了。也叹了口气，皱了皱眉头，问道：

“你真的以为大日本帝国一定要失败？”

“我不想再对你重复这些道理了。”

两人沉默了一阵，高桥压低了声音：“你再说吧。”

中西功也压低了声音：“我从另一个角度对你说说吧，你想想看，日本还有什么力量能挽救它的失败呢？军事斗争胜败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力量。现在的日本呢？你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经济方面进行一点掠夺的地点是上海，你们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一部分目的是要动员上海的中国民族资本和日本在华中的经济相结合，结果呢？毫无成效。后来，你们把这个难题移交给“兴亚院”去研究对策，同样也没有结果。汪精卫实行了市制改革，不仅帮不了日本，实际是和你们闹独立。你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却看不出其中危机，糊里糊涂把公共租界接收了，背上了个大包袱。这些你都不知道吧？我还告诉你，你们接收上海租界以后，上海的工人、店员、公司职员等等各阶层人大量失业，米价上涨，从原来的 130 元一担，一跃为 250 元，再一跃变成 400 元、600 元。市民在米店门前大声吵闹，眼看就要造成暴动，你们派军队镇压，饿死了很多人。你想想，上海 400 万市民暴动起来，会是什么后果？我可以这样说，现在的上海，是处在没有暴动的暴动之中。

“如果这一点你陌生的话，我可以对你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之后的日本经济实况。不错，你我都得承认，日本占领了南洋群岛，确保了日本巨大的物资地带，造成了日本战时经济的小康状态。米、油、砂糖等等，都可得到些满足。而世界各国的国力都在迅速消耗，相对而言，日本国力有所好转。”

高桥瞪了瞪眼珠。

中西功继续说：“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战时经济基础脆弱，这种小康状态，实际上比战前还是恶化了。就说南方物资吧，第一，种类不均衡，橡胶、砂糖过剩，其他则不足，米、钢铁，都不足；第二，运输距离遥远，石油开采设备被破坏，用于运输的船只不足。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船只损失 60 万吨以上，船只少。而且在海上航运过程，又常被英美拦阻，好不容易运到日本的那点物资，可供消费 241 费的数目便寥寥无几了。

“铁呢？这是用于战争的重要物资，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铁，日本铁矿极少，现在年产铁坯 400 万吨，炼铁设备严重不足。你们要在这个艰难的战争中迅速增加产量，是不切实际的。还有煤呢？在南洋你们得不到它，这是日本炼铁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么？我说的你听到了吗？”

高桥恼怒地眨眨眼：“你在对谁说话？！”

他像受了委屈，因为他真的在认真听。

经过这样的恳谈，高桥对中西功毫无希望了。于是提笔在判刑建议上写道：“被告背叛帝国，投靠中共，长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其利敌行为，造成帝国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尤其在大东亚圣战即将发动之际，被告潜回东京，刺探帝国进军日期，如此狂妄，其为害之大，令人战慄。被告在被捕后，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监狱里，对执法警官和狱吏，执意宣传共产主义，总以引导帝国失败为能事……鉴于被告罪恶极大，应该依法判处极刑……。”

写完，他忽然觉得，有一种沮丧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难能摆脱。

在这种沮丧情绪下，他着手审讯从中国解来的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

第一个，先审会说日本话的汪敬远。

这个汪敬远开始就令他十分恼火。因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说他是中国人，日本无权审问他。高桥知道，他是在搞合法斗争，也是他顽抗的方法和手段。准备对他用刑，他冷笑道：“阁下，你听着，待日本战败后，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们中国人对你的惩罚。”这使高桥不寒而慄。

他转而审讯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远那样“骄狂”，他不大说话，不争辩，承认是中共党员。但是仅此而已。关于其它，好像都与他无关。似乎他是在不知不觉中，为中共谍报团工作似的。这种手段自然瞒不过高桥兴助，便对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头照片为证，便得不到他一个点头。在他身上费去的时间不亚于汪敬远。

对陈一峰的审讯，没法进行。这个莫测高深的记者，不识时务，始终端着一副“无冕皇帝”的架势。他冷对刑具，威胁高桥：“我要发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你们的野蛮行径！”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皇帝”！

高桥率领他的审讯班子，轮流和他们三个交锋“恳谈”、用刑、取证。每场审讯下来，累得他筋疲力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不见成效。

“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上海“日本军事法庭”对郑百千、倪之驥、程维德、程鸿钧等的审讯，比高桥兴助在东京巢鸭监狱对中西功的“恳谈”尤为卖力。那些陪审的汪伪汉奸卖国贼，作梦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虽然日本必败的形势一天天逼近他们眼前，他们仍旧要向大日本帝国表示“亲善”。其办法就是在审讯中，尽可能表现出“仇共”面目来，给日本司法官看。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军和蒋介石之间，不断眉来眼去，在“反共”这一点上，日蒋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现在表现出一点“仇共”来，即使日本战败，他们在蒋介石座前，也将有一份表明心迹的机会，以便得到蒋家政权的信任。所以他们陪审时特别卖力。

然而这些“共党分子”，一个个，那脸色，那眼神，那答话，特别是那语气，不仅使日本司法官恼怒，更令这些汉奸们心惊胆颤。

随着大东亚战争和中国战区形势的变化，日本警视厅奉东条内阁之命，快速了结“中共谍报团”案。

东京：（巢鸭监狱）

高桥写西里龙夫“罪状”的报告书时，竟不知如何措辞为好。他想借机显示一下自己从中西和西里那里新学到的知识，又怕绕来绕去绕不明白，反

而绕出个“被赤色宣传蛊惑”的罪名。没法，指令书记官逐条誊抄了西里龙夫的“言论”和“事实”共厚厚四大本。最后，他在结尾部分，按例写上：“鉴于该犯坚信共产主义，危害帝国，应处极刑。”

关于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怎么办？

在难下判决的情况下，决定：长期监押。

上海：（江湾日本军事法庭）

日本司法官和汉奸达成共识：举凡与“中共谍报团”案有牵连者，无论有无供词，一律判刑。

于是，宣判前的最后审讯，匆匆地“按程序”进行了。每次3至5人，或者5至7人，点到名字，叫出监房，押进灯光阴暗的“刑庭”，宣判完毕，装上汽车，分别直送江苏无锡、苏州等监狱。这几天，监房通道里，不断响着点名的呼喊声。监房铁门里，挤满了人们各种表情的脸。

“郑百千！”“郑百千！”“郑百千！”

郑百千被难友们从稻草铺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稳。当狱警搀着他走出监房时，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狱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来，日本“特高”警察、汉奸特务越是打得狠，他心里越觉得要坚持下去，越不能放弃“不承认主义”。一旦放弃，便是功亏一篑。而且，他被打得耳鸣，日本话问些什么，听不清，反正不过是皮肉之苦呗。可怜一介书生，也真难为他了。有一天，东京来了个“特高”对着他耳朵吼道：“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的？”这是个老问题了，他仍依葫芦画瓢，照样来个摇摇头。

“他们统统，抓来的，你不说，杀啦杀啦的！”

他仰头眯眼：“拿来，我看。”心想，你们也真蠢，抓到了还拷问我！

结果没有个张明达或者邱麟祥照面对证。好一阵后，又听到疯狂地吼声：

“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满？！”

他揣摩，这半不拉的日本中国话，什么意思？“大日本”对我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吗。我对“大日本”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脸已浮肿而且发青，谁也看不出他笑。

“你的，承认！？”

他点了点头。

当狱警把他背进“刑庭”，扶他倚墙站定时，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灯光。他凭感觉知道，在他左右，也站着几个等待宣判的人。

“郑百千！”

他用力仰了仰头。

“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满？”

他点头。

“郑百千的，服刑的，一年！”

他又仰起头。什么？只为对日本大大的不满，就判一年刑？每个中国人对日本都大大的不满，在敌占区，这几乎是公开的，你们日本也承认的！就凭这判一年刑？见鬼！

当他与另一个小老头似的青年难友一同押往江苏无锡监狱时，便轻声对这位“小老头”发牢骚，叫屈：“哼，凭什么判我一年！”

“什么，一年？！”“小老头”有点结巴地向他皱着眉头说：“你听错了，七年！你和我一样判七年。你一点日语都不懂？”

“我的天，这是什么法律？关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满意了？”郑百千像在自语。

“难道你相信，他们还能在中国呆七年？”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充满乐观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郑百千的心中。他抬头向对方投以敬服的一瞥，这是他被捕以来继那个“神秘女史”和那个“神秘青年”之后又一个“神秘老头”。相比之下，自叹弗如。看来英雄梦难圆，“百以当千”又谈何容易？！

后来他和这个“神秘老头”在一个牢房里达半年之久，朝夕相处，得以互相沟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这个“神秘老头”原来是上海情报科的倪之骥，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党员，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牵连上了。

为了要弄清张明达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郑百千写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买通狱卒带出去发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试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几天，邱麟祥竟来探监了，说他安然无恙，仍旧坚守岗位。又告诉他，听说张明达已经到根据地去了，没有消息。

他听后，笑了。这是他被捕后第二次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承认主义”，使他的战友——另一个共产党员保存在原岗位上，而且来探望他。这真是一出好戏。

汪敬远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亲，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独生儿子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为“强国”作努力；悲的是敬远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邻居好心人劝解说，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哎，我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凭借日籍华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亲，壮着胆子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日文长信，措词柔中带刚。大意是说：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妇，自然已是中国人；再说汪敬远，是中国人的遗孤血脉，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又说，她儿子说过，他“要一心辅佐汪主席。”可是日本并无提携中国之真心。随意捕捉主席的随从秘书特任官，又押解东京，把中 246 国放在什么地位？即使敬远有罪，要判要杀，自有中国政府自治，日本有什么资格审判中国人？这席话，说得汪精卫落眉沉思，颇有“动情”之状。终于在 1943 年 3 月携团访日临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长”周隆库：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坚持把汪敬远等中国人引渡回国。周隆库照办了，也办成了。于是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乘汪精卫访问团回国的同一条船，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是国际间从未有过的名副其实的“引渡”。

在他们的苦难中也有可品味的场景。

汪敬远等三人在巢鸭监狱牢房里正盘腿面壁“反省”，一声声传唤，把他们先后传唤到了“接见室”。高桥坐在小桌后，每走进一人，他便客气地点一下头，并伸手示意，让他们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三人见面，谁也不说话，好像互不相识。

高桥命令汪敬远作日语翻译，然后郑重地说：“我想，你们可以作证，大日本警视厅对你们是友好的，是吧？”

汪敬远未及翻译使用日语问：

“这话什么意思？到什么地方，向谁作证？”

“就在这里，向我作证。”高桥点点头。

“为了什么？”

“为了需要。”

“谁需要？”

“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们，中华民国，都需要。你们三位，也需要。”

“我不需要，中国的国民不需要。是日本需要吗？”

“大日本帝国警视厅需要你们作证，我们是按法律程序友好地对待邻邦国民的。”

汪敬远思忖一阵，抬头正色说：“我是中国人，他俩也是中国 247 人，没有向日本警视厅作证的义务和责任。更不愿对日本的法律加以评论。”他决心和高桥单独“悬谈”下去。

由于他俩都说日语，李得森和陈一峰只能从他俩的语气和脸色上猜测发生了什么事。

高桥想了想，点头说：“这样说，也可以合理通过，这一项可以免去。第二项，你们愿意回到中国去吗？”

这话来得太突然，汪敬远毫无思想准备，不知他藏着什么杀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愿意吧？”

机灵的汪敬远，顿时明白了，用冷笑的口气道：“岂有不愿回到自己祖国的道理？”

“这是一种需要。”高桥无所谓地说。

“什么需要？谁需要？”

“我们需要，帝国法律要求你们来表达自己的意向。”

“日本帝国的法律对我国没有任何约束力。”

高桥傲慢地挺了挺胸：“汪君，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件首相的大风雨衣，这件大风雨衣，可以披盖住汪精卫主席和他的国民的。”

“我们汪主席也有自己的风雨衣。”

“不不，那是大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晚礼服而已。汪君，你太幼稚，我为你这一缺陷而惋惜。”

“谢谢。”

“而且你要知道，任何法律，都是胜利者按照他们的需要制定的外衣，它必须适合最高当局的身材。”

“诚然，以前我不知道日本对法律是这样看待的。谢谢。”

“好吧，既然你们愿意回中国，我们不勉强挽留，你们准备吧，请你翻译给他们。”

“什么时候走？”

“准备吧，具体细节由我们安排。”

汪敬远不敢相信警视厅，他怀疑这些疯狂的法西斯将对他们下毒手，于是对李得森和陈一峰说：“他说，要我们回国去，但是，我准备牺牲。你们明白啦？”

李得森和陈一峰向他重重点下头。

高桥见状，对他们笑了。然后向汪敬远探过头，压低声亲切地问：“有件事，我不明白，请汪君告诉我。”

“什么事？”汪敬远更加警惕地问。

“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一枚勋章？”

“什么勋章？”汪敬远也向他探过头去。

高桥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方形镀金盒，揭开盖，取出一枚蓝白相间的勋章，捏着缎带扣针，举在汪敬远面前，故意摆动了一下，使那勋章在汪敬远眼前摇来摆去。同时他的两眼疑惑地注视着汪敬远：“看，金鸷勋章。”

“我们没有送你这个鸟东西！”汪敬远忿怒地回答；他一直生活在南方，南方人读“鸟”，同北方人发音不同，这是个骂人的贬词。

高桥不懂这话。

“是你们送给我的。”高桥慢吞吞地说：“如果我们逮捕了中西功之后，你们马上逃跑，我或许得不到这样高的奖赏。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鸟，叫‘鸷’。你没见过吧？这是枚金鸷勋章。谢谢你们。不过，我仍旧迷惑，你们为什么不逃跑呢？中西功已经落到我们网里了，可是你们，半年不动，真奇怪！”

我们的汪敬远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来，为这个问题。他一直对老吴懊恼不已。今天经高桥一问，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在这个法西斯面前，他必须作出共产党员的正面回答。他冷静地想了一下，满不在乎地一笑，继之轻蔑地注视着高桥，正经地说：“这个问题，我即使对你详细说明白，你也不会理解，更不会接受我的观念。”

“不妨事，可以作为我请教你的话题。”

“好吧。”汪敬远眼神肃穆地沉思着说：“简而言之，我们中国共产党员目前的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这还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说的那一套嘛。”

“不错，在我们看来，谁能做好这一套，就是一个‘完人！’”

“不可思议，一个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汪敬远微笑着：“所以我说，你不会理解的，更不能接受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太伟大了，而你，太渺小了，警官先生，我为你这个先天性缺陷而惋惜。”

汪敬远估计，经他这一骂，高桥完全会暴跳起来，于是，等待着。

高桥竟没有发作，只是默默地思索。

……

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在上海下船后，被直接送到南京汪伪“中央军人监狱”去了。

在这个“中共谍报团案”中撞进网又跳出去了的张明达，眼泪泡着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刘广胄，详细说明和分析了苏北根据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请刘广胄再想办法帮助他找到党的关系。刘广胄也知道，他离开党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个月后，把他领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一幢三层楼的人家去。这里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名叫李复石，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地下党组织进行隐蔽斗争的重要联络点。刘广胄向李老详细介绍了张明达，老人答应，“尽力帮助，且待机会”。这以后，张明达一两个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后，李复石老人告诉他：“你的机会到了。”经李老的“亲戚”写了封信，他带着，第二次到了苏北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某师主要负责人，暂时被安排在盐阜地委工作，不久调到师司令部工作。

这次“亲娘”总算接收了他，因为他经过了李老半年多的实地考察。从此他重披战袍，又走上抗日征途；在沙场上而不是在魔窟里，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拼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从1943年春季开始战略反攻。这之后，英美报刊记者们，在宣传报道战争发展形势方面，起了正面作用。德国、日本已无防守战略可言，他们的败退是混乱的。苏联红军的炮兵部队使用了“喀秋莎”，英美记者们亲昵地称她是“斯大林的手风琴”。说“德国士兵听到她的演奏声，便神经失常，混乱地向自己的友邻部队开冲锋枪扫射。”

斯大林拉着他的“手风琴”，一直走到柏林。

斯大林走向柏林的一路上，铺满了德国法西斯军旗和德军的尸体。这景象，由近代化的电讯工具无线电台广播，一幅幅地送到了东条英机和日本内阁成员们的案桌上和重臣们的官邸里。太平洋战场上，滚滚浓烟里，皇军连续地“玉碎”，海空军舰飞机，难得靠近去营救，更无参战力量可投入。只好让他们“碎”下去，“碎”到最后为止。这些消息日渐压迫着在中国战场上的百万“大日本皇军”，在他们周围，不是重庆方面的国军，便是延安方面的共军。尤其华北，那些封锁沟，原是为对付共军而挖的，现在实地一看，竟变成共军包围他们的阵地了，好像特意为共军挖下的，找不出一条可撤退到海边的通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焦虑不安。重庆方251面，倒还好办些，因为毕竟有着某些关系在暗中联系着。而且，那个反共的大目标，双方已有过默契和行动，将来也必然是一致的。但是，延安方面却毫不容情，反攻性战斗，天天打，夜夜打，野外打，围城打，眼见得其意图是逼皇军投降。蒋介石先生远在四川，怎么办？

冈村宁次决定和中共周旋一番，下令在占领区的监狱中寻找中共的“高级要员”，作为他的特派使者，邀请中共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以施“缓兵之计”。于是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找到了“老中医”李得森，先把他释放出狱，要他去新四军军部请求派代表来南京谈判关于日军投降问题。放他外出的条件是以汪敬远、陈一峰两人的脑袋作担保。李得森认为是件好事，设法辗转找到了新四军，请来了军部代表。谈判中，中共代表提出立即释放汪敬远、陈一峰以及其他政治犯。于是汪敬远、陈一峰出狱了。

汪敬远出狱当天便坐火车回上海去看妈妈。

妈妈明显老了，头上有了丝丝白发，身板倒还硬朗。一见之下，惊叫一声“大桥”！眼泪便夺眶而出。汪敬远在床边默默坐下，一声不响。妈妈又看了他一阵，转身到厨房去烧水。

“妈妈，你别忙了，我到澡堂去洗。”

妈妈又转回，也不看他，低声说：“也要理理头发。”

“家里还有我的衣裳吗？”

“有的。”妈妈又转身去翻箱柜。一边问：“在家住吗？”

“不。”

妈妈又抹眼泪，她知道，她的儿子是个中国男子，不应就此在家住下，该为救中国效力，她叮咛儿子：

“以后别再粗心大意的。”

斯大林到了柏林后，回过头来，拉着他的“手风琴”往东方的满洲走。“大日本皇军”也听不得她的声音，惶惶缴械。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白光一闪，响起晴天霹雳，杀伤力超过过去的任何炸弹，日本人在遽

然间死亡前，不知何命其名，叫它“光弹”。君临日本的天皇裕仁，只得颁布诏书，向盟军投降。1945年9月3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乌苏里号军舰上，享尽了历史上的荣誉。世人若不健忘的话，这位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曾是从菲律宾逃回美国的败兵之将，现在成了赫赫功臣！

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爱好和平的人们欢呼反法西斯胜利。“中共谍报团”被捕的党员们，先后走出监狱，又开始了他们各自新的斗争生活。

中西功：这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在日本法庭上，被那些军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把他牵拽摔打得筋断骨碎，最后判以“极刑”。但是当东条们顶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时，慑于正义之神的威力，最终未敢对他处死。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他得以重见光明，仍继续在日本从事进步活动，并继续研究中国问题，发表论文。日共重建后，他被选为神川县委员长（约相当于我国的省委书记），1973年8月，因胃癌不治逝世，终年62岁。身后为人类进步事业留下了一部著作《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他的事迹将为后人永远传诵。

西里龙夫：同中西功一样，从巢鸭监狱释出后，仍继续从事日本进步活动并研究中国问题。日共重建后，曾被选为熊本县委员长，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年代初，受王学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请，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应邀来我国叙旧，由汪敬远、张明达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处故地重游，与尚健在的老战友们共话当年。

在南京，在当地工作的邱麟祥为向导，他们满怀激情地寻访了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他们寻寻觅觅、指指点点、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时而开怀畅饮、笑谈当年。说到开心处，或仰天大笑，话到伤心时，却又以泪洗面。当他们走进当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栋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时，更是百感交集。这时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宾的身份，就像当年“中联社”的指导官似的当起向导来了。他对每层楼每间屋曾是什么办公室？有些什么职员？都说得清楚明白，历历如在目前。

汪敬远：没有辜负妈妈的希望。凭他的机智，出狱后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国诞生后，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门工作。

陈一峰：出狱后，奉组织命令，走上新岗位。新中国诞生后，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工作。

从他们几位的简略纪要里，读者不难看到，这个群体（所谓“中共谍报团”）的成员们，为党的革命事业，都经历了严峻考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情报是为战胜对方服务的，古已有之。掠夺奴隶，需要先探知对方的活动集结地和人数、实力，这就要先派人去偷窥回告。我国著名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专有《用间篇》，为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各方面统治者奉为圭臬、战胜敌手的经典。任何国家、政党、社团、军队，以至家庭妯娌之间，要战胜对方，都要有侦察。当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功勋，至今没有得以真实正确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观、客观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阐明这些原因，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而且可以发出很有意义的议论。但是，这是政治家们的事，不是本书作者所

要描述的范围。

中共的情报工作创始于“四·一二”事变前后，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机关驻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为了抵抗敌人的残酷进攻和保卫自己的生存，确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开辟了革命的情报工作。由于保卫国家、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这项工作获得了各方人士奋不顾身的拥护和支持。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继形成，这项工作向最广泛最深入层次发展，甚至超越了阶级和国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使敌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情报工作实质上是第二条战线的隐蔽斗争，从事这种斗争的人员，有人被称之为“间谍”，有人被称之为“特务”，这些都是贬称。我们则称为情报员或侦察员。他们同第一战线的将军、主帅不同，后者战功显赫，勋章满胸，随之名声大振，流芳四海。而情报工作者则往往是无名英雄，黄土一抔，长眠荒丘，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业迹是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或由于特定的原因一时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隐蔽斗争先驱战士、卓越领导人之一李克农生前曾倡议，要为中共隐蔽斗争战线上的卓越战士树碑立传。这一主张是公正的，合理的。

张敏：那个被郑百千视为“神秘女史”的人，在这个“谍报团”里，她是个埋头苦干的情报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她对事物的客观思索，较之活跃的汪敬远、陈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终归宿，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甚至可谓不幸！

她继“老中医”李得森之后被捕，因查无实据，最终被作为李得森的家属释放。出拘留所后，生活无着落。她设法捎信给在苏北根据地的张明达，要求到苏北根据地去。经组织批准，她到了盐阜地委教育单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军军部时，组织上电召张敏到军部，让他们夫妻俩重逢团聚。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内务部工作。后来李得森因受潘、杨案件牵 255 连被捕后，张敏曾几次要求探监，因没有探监制度，均遭拒绝。为此，在“反右运动”时，她在小组会上说了句“日伪统治时期，犯人还允许亲属探监，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获准。”而竟被打成“极右”，送到山西省一个煤矿当小学教员。历时 20 多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儿家养病。令人同情的是，这时的她，就像一只羽毛凋秃受伤的老燕，惊魂未定，还未来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属于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唯一可以告慰她的，只有组织上为她举行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想方设法找了几位当年曾经与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并一一发了讣告。远在武汉的、曾经和她同铐一付铐子的郑百千也专程赶到了上海。在追悼会上，吊唁的亲友挤满了大厅，遗像四周摆满了花圈，有许多是老单位、老领导、老战友送的。郑百千和倪之骥、汪敬远特订了一只大花圈，签上了因故不能前来吊唁的张明达、邱麟祥等人的名字，放置在最前排。他们亲切地慰问了她唯一在场的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并帮助她（他）们接待来吊唁的人们。

在哀乐声中，郑百千凝视着神情自若的遗像，脑际里出现的却是在囚车上他亲眼看到过一眼的“神秘女史”的形象，耳边同时回响起她那坚定的声音：“坚强一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一串滚烫的泪珠，便忍不住夺眶而出……他心里默默念道：

“生活，你能不能对我们公正些呢？”

“……！！”

张敏因为一句话而被打成“极右”，却是因潘杨案件李得森被捕而连锁引起的。不妨可以认为，这一群“谍报团”成员，因潘杨案件受牵累、遭不白之冤，是毫无道理的。予谓不信，请看“史无前例”中的事实。

这些参与上海情报科地下工作的每个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为叛徒、特务，都没逃出这场“大革命”的灾难。够不上叛徒，便是“老反革命”。

“叛徒”，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第一位的敌人。这顶帽子，重逾千钧，可以把一个坚强的、内外红透的共产党员压垮、压碎、压成齑粉。

于是，他们一个个，或被监押牢房，或被押解劳改农场、工厂。至此，大概可以允许我们冷静地问一声：“为什么对他们如此不公正？……”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清除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本着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的平反。

然而上海情报科这群“反革命”却不是那么容易翻案的，因为他们曾属潘公麾下，在“潘杨”案件发生后，曾被上面定了性、判了罪的，服刑十来年了；没有被判刑的，则被劳改、内控使用等等，而他们确实是无辜的。

就拿那个当年日本特务眼里的“小把戏”，现在共产党的“老把式”、“造反派”眼里的“老反革命”张明达来说，当年，他提着脑袋往来于宁沪线上，不知有多少重要情报曾经通过他的手，迅速无误地转手程和生飞向延安。上海情报科遭到破坏后，他两次到苏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随军北上，到了东北。参加西满根据地的开辟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创立。之后又参加东北大区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工作，支援全国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东北一个大兵站负责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继之，他又为创立我国空军所需的地面支援，领导东北各省修建几十个军用飞机场。大区撤销，调至中央参加计划经济的开创和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工作。

他在革命实践经历中，包括在“文革”中，因为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当时领导人的决策，而被蒙受风雨霜雪时，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心：“真理是永存的，诬陷不实之词是站不住的，事实是最权威的证人。他竟奇迹般地经受了那场“大革命”的“锻炼”。

他平反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上海，会同钱志行和倪之骥等同志为程和生树烈士碑，使其光荣事迹得以公诸于世。碑上铭文中之一段云：

……

不，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着。

因为，你有——

一双星星一般灿烂的眼睛；

一腔永远奔腾不息的热血；

一颗比铁硬比钢强的滚烫的心！

……

他作的第二件事，便是为当年南京上海两地的蒙冤受屈的情报老战士昭雪平反。凡是熟悉的、了解内情的，莫不为之四处奔走，热心争取，向有关部门积极反映，或出具证明。被打成叛徒遣返山东聊城看仓库的李得森平

反了，陈一峰、汪敬远也相继平反了，邱麟祥、郑百千、刘广胄，还有……也都一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谁知道，这里面饱含着多少难言的苦辛！

这是积淀了四十多年的战斗情谊的结晶，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共同财富，孰能不倍加珍惜！？

张明达已是耄耋之年，他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同志，无愧于江东父老，赠之以“仁者寿”三字，受之当无愧！

中西功逝世十年之后的1983年春3月，中西方子遵从丈夫的遗愿，以中日友好人士的身份，专程到了上海。

关于中西功的革命事迹，特别他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们都熟知。因此，大家发自内心、尽其所能，热情地接待了她。

当年，她住在留青小筑的时候，刚和中西功结婚一年多，是位娴静的少妇。穿起和服，风姿楚楚。现在，她已年过花甲，两鬓染霜，额头、眼角、嘴边都布满皱纹。看来，身体虚弱。从坐椅上站起身前，必先按着扶手，缓慢地转身。

当年，她对丈夫中西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一无所知。只是在中西功被捕后，她才如梦初醒。怀着迷惘和恐惧，和小妹妹惠子乘船渡海，回到了中西功家乡三重县。

公公是个一心向富裕家境奔走的老人，他对战争费用日多、无止境地捐献，怨气冲天。忽见媳妇和女儿无端回家来，常在背地偷偷叹气。当得知儿子是个中国共产党员而被捕后，震惊之余变得沉默不语，而对方子则比以前更怜惜了。

日本投降，中西功被释放出狱，方子才得以和他见面。那之后，中西功为组建日共奔走，她是第一个支持者。中西功撰写他在中国的革命回忆文章，她是第一个读者，从中知道了许多过去中西功未向她吐露过的革命活动的情况。

1973年8月，中西功病体日渐垂危，方子日夜守护在他的床边。见他挨过一阵病痛后，精神好转些时，便轻声和他回忆在上海居住过的那段时光。因为她知道，丈夫中西功对那段岁月的珍视，超过其它漫长的黑夜似的日月轮流。

“我真想去看看！”中西功叹息着说。

“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了的人们。”

“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还有！……程和生！他像我的弟弟。”

“我也想打听清楚，一些至今我还不清楚的事！”

方子轻声安慰他：“等你病好了，我陪你一起去。”

中西功痛苦地笑道：“看来，只好拜托了！”

……

现在，中西方子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情报科的许多人的姓名，她已熟知了，然而她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她见过的，只有一个程和生，那个弟弟的容貌神态，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中西功很恭敬，对她和惠子很拘谨。走进留青小筑28号，喝茶，说话，都是沉静的。眼光从不离开对方的脸，坐在沙发上，绝不随意走动一步。

“这个中国青年！这个小弟弟！”她在心里呼喊。

按照她到达之前，书信往返提前约定的那样，原在上海情报科工作的现在上海居住的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三人出现在她面前。

“我们该怎样互相介绍呢？”她面对这三个老头，不由一阵心酸。

“不用介绍了！”汪敬远向她跨进一步，伸出双手，紧握着她的手，低着头，重重地点了又点，全身颤动着，泣声说：“我是汪敬远。”

中西方子感觉到他的泪水滴在两人手上，那样烫热，止不住也流下泪来。

他们之间，有许多话要说。有的要从头说起，有的则半空而来。回忆是主体，有笑声，有叹息。有长时间的沉默，有爆发式的大喊。止不住的眼泪在四张老脸上流淌。

四人一同到虹口施高塔路（现山阴路）留青小筑一带旧地仔细流览一遍，又到北四川路汉口路漫步寻觅。

“他在哪个地方跳车的呢？”她问他们。

“说不准啊！”汪敬远说：“我当时不在场。”

“应该是在这里，”倪之骥横划手臂，指点着行人拥挤的一段马路说：“当时，他用腿这样碰了我一下。”说着，他表演似地用力晃了一下左腿；继续说：“我还没看懂他什么意思，他‘嗽’的一声，就跳出去了。汽车停在那一带，就是那儿，现在盖房子那脚手架前那一段。两个‘特高’下车了，留下的一个使劲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向外看。”

中西方子抬头举目向各处仔细看，那匆匆的行人，那急驶而过的汽车，那高高的脚手架，那旧式的矮小楼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为遵从丈夫的遗愿，完成他的嘱托，她用日语喃喃念叨着：

“……

你为了掩护别人而甘洒热血，
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
你为了共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

这几句诗，是中西功生前写下的，是专为献给程和生的悼词，刊载于中西功所著《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一书中。

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都懂得悼词的意思，他们听着，听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中西方子站住脚，仰头轻声问他们：

“有件事，我要代替亡夫，特地向你们请教。”

汪敬远忙说：“夫人，何必用这样郑重的语气。有什么话，说吧。”

中西方子声音哽咽：“中西功逝世前，有时候很愁苦地对我说，他不明白，他已经被捕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转移地方？原地不动地，直等着‘特高’来破坏？！他说，你们的时间是很富裕的。”

三个老头，原地站着，你看我，我看他，都笑了。谁也没有回答她。因为他们认为：“当时没有撤退转移、坚持着阵地，这个历史的本身，应该是对她历史的、正面的、最好的回答。”再说别的，已是多余的了……

……

尾 声

——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0年，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犹如白驹过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这40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985年，上海、南京的有关党史研究单位，为了回忆、记述那一段历史往事，特约请这些老情报战士团圆欢聚。

这一天，他们像当年约定接头一样，准时地来到了会议室。当这些40年来各处一方、命运各异的老人——他们之中有老相识的，有从未谋面而“久仰大名”的——相见之下，莫不悲喜交集，心心相印。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出生入死，机智敏捷，时刻活跃在敌人的虎穴狼窟之中的“隐形”战士了。眼前，他们两鬓如丝，雄心依旧，白发皓首，壮志不移；但又毕竟已是七八十岁的老马了。

他们座谈的第一个话题自然是那惊涛骇浪的峥嵘岁月。1938年到1942年这四个年头，正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划时代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

特别是1941年底，德国进攻苏联，直指莫斯科城下。这时，日本“北进”还是“南进”，成为世界战争的焦点。全球各主要参战国，263也都集中视线于此。毛泽东主席当时说：“如果日本北进，则中国抗日战争时间会更长，处境要更艰苦。”因此，谁能取得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关系到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的命运。这时，苏联佐尔格的“兰瑞小组”已被日方破坏，侦察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共情报工作者的肩上。这一点，上海情报科的全体同志是自觉的。在这个自觉的基础上，中西功同志孤胆深入敌巢，获得了成功。此后，宁沪两地同志在敌人的追捕中坚持阵地的前哨，誓与阵地共存亡，为的是继续听候党的呼唤，在敌人的要害部位发挥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程和生同志为此义无反顾，英勇牺牲；其他同志也坚持到被敌人逮捕为止，这种忘我为革命的精神，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无愧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无愧于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目的。

说到这里，大家悲欢离合的经历，苦辣酸甜的心绪，一齐涌上心头，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此时，就总体来说，隐蔽斗争已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替代。这些老人，依然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活到老，奋斗到老。

他们的第二个话题是，从潘、杨案件受牵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即从50年代到80年代，长达30来年的坎坷境遇；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他们被逮捕、被审讯、被监禁、被劳改，没有被捕的则被无休止的审查，被“内控使用”，在“文革”中，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全面平反。座谈时大家一致深深感激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仍有勇气和力量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仍不愧为光明的、正确的、伟大的党”。

平反以后，大家也已到了离休的年龄了。时间不能复返，历史不能重演，

把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留给自己，把和平幸福、荣誉享受留给后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们说，我们的前辈正是抱着这样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的。我们是幸存者，我们应该活到老，贡献到老。

在热泪与欢笑声中结束了座谈会后，张明达等人，来到上海革命烈士陵园骨灰堂，面对已故的战友程和生、陈一峰、张敏等同志的遗像和骨灰，鞠躬致敬，追悼凭吊。这时，这些白发老人，对于这群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他们所经历的遭遇和饱尝的辛酸，情不自禁地一齐涌上心头，为之失声痛哭……

应该说，这终究是一出以敌人惨败、中国革命胜利而落幕的、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的悲壮戏剧！

附 录

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方知达

作者附言：

流光飞逝，往事如烟，而我 50 年前与日本同志一起从事隐蔽斗争的情景，却历历如在目前。

1939 年夏天，我开始往来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担任传递战略情报的政治任务，前后历时 4 年。这 4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时期，其间发生了震惊国际法西斯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和由此引发出的所谓“中共谍报团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国同志被捕。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事件在国外虽曾轰动多年，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现在为了纪念当年曾对我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过重大贡献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党员们，特别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位同志，我将当年进行斗争的情况以及后来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权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献给当时的战友和今日的读者。

本文曾于 1989 年 12 月在《大江南北》双月刊上发表过，现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重新整理发表于此。

1941 年 10 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其他与此案有关的还有一些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同国籍的革命同志。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已有多年。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 年夏，他们侦悉并发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此时决策是南进而不是北攻的两大绝密情报，就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得以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抽调东线兵力数十万人支援西线。为促进对德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乘机抓权专政。两个月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佐案”发生后，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同时疯狂捕人，把魔爪伸向四方、继续在东京、伪满、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就有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

一、风云际会中的两位国际主义战士

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 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学期

间，正是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他耳闻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看到了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在“书院”中和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1930年毕业后，他就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往后，他在新闻业务活动中，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又经《大坂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的介绍，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

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前辈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同文书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里龙夫外，还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9年他又参加由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同年底，“斗争同盟”成员向前来“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散发反战传单被发现，中西功等遭到逮捕（西里龙夫因母病返乡幸免）。获释后，中西功受停学一年的处分。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在校内外与革命同学一起参加各种革命斗争。1931年1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任“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这项反战斗争成功，二三月间，“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在船上，中西功遇到并认识了同船返日的尾崎秀实。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返回日本期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并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曾为尾崎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其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因为在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积极活动而先后被捕过。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1937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中西功于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他认为当前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设法调来上海同西里龙夫一道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并以此就教于革命前辈王学文。1938年5月，中西功的愿望实现，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

铁上海事务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中共的关系。

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所以来上海后，就被日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军特务部工作。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重要的特务机构，用以筹组和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对我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

二、潜入敌心脏，密报频频传

西里龙夫入党后，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他曾以日本记者身份去国民党南京活动。其间，他向组织上提供过颇有价值的材料。例如：日蒋秘密勾搭，蒋党暗斗内幕，蒋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倾轧，以及当时日本侵华的具体策划等。“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日军在华战场的迅速扩大，西里龙夫及时向组织上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其中有：关于攻沪日军的兵力，指挥，攻击方向，后援部队，作战部署；关于华中占领区日军分布和意图；关于徐州作战，武汉作战，广州作战，南昌作战的指挥、番号、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这里也有中西功的贡献。此外，“同文书院”同学、革命志士白并行幸还送来了日军武汉作战军用地图。

中西功于1938年来到上海后，他同西里龙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国同志的合作，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真是如龙腾云，如虎添翼。

从武汉沦陷、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1938年冬到1939年冬），这一年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凭借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向组织上不断提供了可对日本当前国策（战略方针）作出判断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1、武汉沦陷后，日本前线将领同统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线将领认为，乘势继续进攻，两翼包抄入川，彻底消灭蒋政权；统帅部认为日本兵力有限，国力已受重大消耗，两翼入川山重路远，继续蛮攻为不可取。

2、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略上的大斗争。以外相字垣一成大将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主张“力所胜任，适可而止”，只要蒋介石承认“伪满”和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协的政治、经济特权，便可与蒋媾和，以便换取喘息时间，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军阀为实体，以近卫首相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要蒋介石投降，否则就扶植汪精卫登台，建立新的“国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卫曾发表过“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的政策声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严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卫内阁垮台。

3、“激进派”得势后，施展两手策略。一手，不断派人与渝方要员密谈，劝蒋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卫等一批汉奸，另起炉灶。为此，起用特务派军人如土肥原等来沪统制对华政策，并设置各种相应的特务机关。

4、其间，新旧财阀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内阁设立“兴亚院”，把外务省处理对华的外交、政治、经济大权分裂出来，便于进行直接的掠夺和控制，其下设之“华中联络部”是其执行机构之一。

5、1939年9月希特勒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核心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但最感头痛的是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为了减轻负担和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它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企图以

此加强前方的统一指挥以便对蒋软硬兼施，对汪扶植登台，以及准备进行新的国际斗争的配合。

西里龙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还有华中日军分布，华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和“满铁”上海事务所内幕，日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路汉奸内讧等。

中西功在上海，在军特务部任职期间，除了及时提供日本统治当局内部情况，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情况，日本以上海为中心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策划等外，还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写了一本《三民主义基本问题》，作为日方提交汪派汉奸重建“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并把日本这一图谋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三、敌方战略，了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陷于法西斯德国之后，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客观形势导致欧美帝国主义势力重新组合寻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南进政策”推上了实际的进程。为此，它加速国内法西斯化，力图减轻在中国战场的负担，并开始向印支（越南）、泰国进军。在国际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40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为我战略侦察员对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良好时机。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中西功又设法控制了名为“满铁”主办实由军部操纵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

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东京同近卫首相秘书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相互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273有：关于军部搞垮阿部、米内两内阁，扶持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以推行“新政运动”加强政治法西斯化的内幕；关于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扩张战略的阴谋；关于制定“时局处理纲要”即力图解脱中国战场的重负以实施“南进政策”的策划；关于日本工业原料和战备物资匮乏的情况；关于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在日、德之间的斗争情况；关于压蒋未遂而向“对支战争长期化”的转变；关于进军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国境纠纷以渔利的内幕；关于日本统治核心正在酝酿新的世界战略的分析和判断等。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与南京、上海的中国同志共同努力，这一年还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继续玩弄两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争“结束中国事变”。诱降一手，由“总军”（日人对“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简称）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蒋介石代表宋子良、钱永铭等进行密谈，并一度策划日、蒋、汪在长沙或宜昌会面（未实现）。同时，以局部进攻，轰炸重庆，断蒋外援（进攻越北、桂南）作为配合，实行诱逼兼施。扶汪一手，经青岛三方会谈、“国府还都”、“调整日汪邦交”，到承认汪伪“中央政府”。至11月，因拉蒋无望，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定了“对华长期作战”和“以战养战”的总方针。

此外，还有以下重要材料：关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重要会议以及要员配备情况，关于日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沦陷区渝方军、政、特要员纷纷投敌的情况，关于占领区米荒、伪币贬值和日伪加强统治的情况，关于日本高级特务机关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

四、一字千钧，“联德、攻美、防苏”

1941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为参加重新瓜分世界，由蠢蠢欲动而进入积极行动的新阶段。为此，它依照御前会议先后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和“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加紧国内法西斯统治和力图结束侵华战争，以便为它顺利地向南方推进创造条件。在这样紧迫的政治环境中，日本法西斯警察和特务机关大大加强了它为了肃清其后方而厉行的监视、检察、镇压的行动。但是，即使在这样十分艰险条件下，中西功、西里龙夫依然利用合法地位努力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的成就。

1月间。中西功得悉日本插手泰、越边境纠纷企图在泰国建立南进前哨基地。这时，因英美坚决援蒋并力挫日本南进，2、3月间，日本不顾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攻苏而开始实行由“联德、攻苏、防美”战略向“联德、攻美、防苏”战略转变。为实施这一世界战略大转变，日本派出外相松冈洋右去苏联、特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去美国，分头进行阴谋活动，军部则加紧作南进部署。至5、6月，日本最高核心得知德国必将攻苏，这时，在军部，内阁、天皇之间秘密展开了“南进还是北进”的大辩论。结论是：“乘机南进，取得东南亚战略物资后，再回头北攻苏联”。为此，它通过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不惜对美英一战”的总方针。

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被佐尔格和尾崎秀实侦知，报告了莫斯科。7、8月，德国大军压境，苏联面临着被德、日东西夹击的危险。这时，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坚定地回答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日本确实已经没有国力分身北攻，佐尔格、尾崎秀实的报告和中西功、西里龙夫的证实，如前所述，使得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抽调东线大批兵力，支援西线的保卫和反攻。

8月，日本为了施放军事烟幕，大肆宣扬“关特演”（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但暗地里却严令关东军司令官不得向苏军挑衅，并密令新闻界不得刊登刺激苏联的文章。其目的是表面上依照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与德国遥相呼应，实际上却一边“威慑苏联”，一边在我国“满洲”调集日本、朝鲜、台湾的兵力进行实战编训，准备南进向美英作战。这时，中西功借口去“满洲”出差，来到当时日本备战中心的大连，亲自看到了伪满各地日军兵运繁忙，公共建筑住满兵员以及积极进行登陆作战演习等情况，并搜集到了南进部队编制表。

9月，日海军遵照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决定，提出“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即南进具体行动时间表，经御前会议批准执行。10月中旬，被日本特务机关苦心搜寻多年的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先后被捕。以东条英机（当时为陆相）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借口尾崎秀实是近卫文麿首相的秘书而把近卫软禁于贵族医院，由东条本人登台组成战争内阁，自任首相、陆相、内相兼总

管警察、特务。

尾崎秀实被捕后，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但他们坚信革命战友能以生命保证他们的安全，因而岿然不动，坚持积极工作。11月，中西功觉察到虽然尾崎秀实可能已经被捕，但革命任务需要，他仍然冒着极大危险以合法身分去东京，亲自了解日本“南攻北防”国策的执行情况和具体部署，作为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发展的依据。

11月中下旬，中西功从“满铁”绝密通报上看到了南进部队兵力编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单，同时，得到了南京“总军”正在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的消息，于是他向组织上提出了论据充足的日军将在最近三个星期内的一个星期天爆发“大东亚战争”的预报。果然，在第二个星期天的拂晓，日军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了。

这一年，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还在上海和南京党的隐蔽斗争组织领导下，同中国同志一道，搜集到了以下许多重要情况：

在步步南进的1941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方针是：1、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3、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以上亦是配合南进。

此外还有：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关于日攻美后日本13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等。

1941年4月，“满铁”为适应“总军”加强搜集情报的需要，在中西功负责的特别调查室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负责搜集蒋军、中共、上海租界上层的情报材料。中西功趁机把我们的人介绍进去担任班长，并安插了若干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不但能左右这个班的活动，并且可以开出合法的敌占区通行证，经过浙赣线去西南，经过津浦线去西安，为我建立交通线提供方便。我们掌握这个班直至1942年4月不能再利用为止。

五、活动在搜索、追捕的阴影下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转折的一年。反法西斯阵营由被动的防御阶段开始向主动的反攻阶段转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这个转折的主要标志。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在不到半年时间内，攻占了香港、菲律宾、277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的帝汶、苏门答腊、爪哇以及瓜达尔卡纳尔岛等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区域。但好景不长，5、6月间，日军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攻击战中大败，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攻势被遏制，往后即逐渐走向下坡路了。

进入1942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中国同志一道坚持工作岗位。在敌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严重情况下，半年中仍取得了以下重大的收获：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

英谈判停战，但法西斯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关于法西斯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将动用大量日军的报告；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侵略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 13 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此外，还有中西功对日本南进的分析报告，认为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日本对战局难以持久支持。

六、生死置之度外，功业水垂千古

1941 年冬，即尾崎秀实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收到了以“白川次郎”的化名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这个暗号的意思是劝告中西功“速速撤退”。1942 年 3 月，有人告诉中西功，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往后，中西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被捕的危险到来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但中西功始终认为日本在这场大战中不能持久，他还想回来继续为中国和日本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 5 月间，日驻沪 13 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功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打算到达浙赣线后相机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中西功认为这样走法可以为以后回来设下伏笔。不幸，中西功到了杭州后，突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诱捕并解往东京。

1942 年 6 月 16 日和中西功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以及“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白并行幸。

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解到东京日本特务总部后，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可是他们坚贞不屈，昂然屹立在法西斯恶魔面前。

在阴森森的秘密法庭上，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视死如归，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地陈述着自己的信念和意志：

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着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目前的任务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促使日本在侵华战场和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保卫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主力苏联，实现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我们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行列，是因为现代的日本遭受着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日本的革命活动受到严厉镇压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形下，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并促使日本侵华失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日人民均深受其害。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中日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中 279 日和平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我们绝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侦探。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个人的得失，什么好处和报酬。相反，当组织上遇到经济困难时，我们即以自己的积蓄倾囊支援。

“我们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明白自己所从事的秘密革命工作的危险性，我们知道随时有被捕和被杀的可能。但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时

刻准备牺牲一切而心甘情愿。”

在几十次审讯中，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昂首挺胸，侃侃而言。不止一次吓得日本法西斯法官窘促地打断他们的发言，慌慌张张宣告：“此处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讲坛，今日闭庭。”

最后，日本法西斯法庭对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一案哀叹说：“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以及友邦胜负，为害之大，令人战栗”。“被告西里龙夫、中西功沟通敌国，罪恶极大，已无保存价值，判处极刑。”在这之前，因西里龙夫、中西功一案而被捕的白井行幸等革命志士，有的病死狱中，有的被解送北海道强制苦役折磨，英勇牺牲。

翌年，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由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出狱后，他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西功于1973年因患胃癌逝世，终年62岁，遗留有《在中国革命风暴中》等著作。西里龙夫于1982年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1987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遗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

斯人已逝，功垂千古。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以及其他日本革命志士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对中日和平和中日友好所作的卓越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所进行的忘我奋斗，将永远牢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

注释：

尾崎秀实担任《大坂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时，1930年，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了德国记者佐尔格，以后成为革命战友。

“满铁”，全称为“南满铁道重工业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个股份公司式的财团法人，总社设在大连，经营“南满”铁路和重工业等。但它同时设有广大的情报网和研究机构，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研究，向日本统治当局提供决策性意见，被称为“国策会社（公司）”。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最大智囊库，又是参与侵华活动的特务系统之一。

“御前会议”，日本大本营（军部）和内阁（政府）联席会议把议案通过后，再到天皇面前进行答辩，枢密院长参加。这是当时日本统治核心有文武辅弼、元老重臣参加决策的最高国策会议。

作者小传

方知达 原名颜仁章，浙江宁波人，1916年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参加抗日斗争，“一·二八”事变参加“上海市民义勇军”协助十九路军赴宝山前线作战，后任共青团沪南区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春被捕，由史良律师辩护，与邓中夏同狱。出狱后任沪南青年救亡团长、苏浙别动队分队长、难民收容所主任。1938年转入对日战略情报工作。1943年去苏北，任新四军三师上校联络参谋。1945年秋随军北上，参加开辟西满根据地和创建内蒙古自治区，任内蒙党委秘书长兼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1949年秋调东北财委任办公室主任，参加恢复并发展东北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发生，任苏家屯总兵站站长，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东北修建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东北各省修筑各地数十个军用机场，支援创立我国空军以投入抗击美国空军的战斗。1954年后，任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国家经委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离休后，任国家计委咨询组副组长。著有回忆录《狱中苦读》、《上海市民义勇军》、《一颗丹心》、《敌营谈判》、《东蒙工作实录》等。1995年9月因病在北京去世。

梁 燕 山东莱阳人，1926年生。1945年2月参加革命。1947年秋入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习。1948年春分配到第三野战军第二纵队文工团，后任创作组长，执笔、领导创作的《为了祖国》《哪里跑？》两话剧，参加1951年浙江军区、华东军区文艺体育汇演检阅，并分获一、二等奖，创作组立集体一等功。1952年秋调中央电影学校编剧班学习，1953年毕业。先后在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杂志、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发表小说、影评、论文多篇；摄制电视短剧、连续剧多部；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尊严》及合作摄制影片《宝贝儿》、《那年的冬天》、《遗失的伴侣》、剧本《旧庄院的废墟上》、《冰坝》、《母亲》等。

陈三百 广西北流人，1922年生。自幼随父求学于上海，曾就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9年投奔浙江内地，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转到我党上海情报科南京站，利用其父位居汪伪政府高职作掩护，进行情报活动。1942年夏被日敌逮捕，判刑七年。抗战胜利前夕出狱，1945年4月奔赴苏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曾任21军文工团团长、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组组长、武汉军区胜利歌剧团团长、湖北省文联理事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会员，军队离休干部。已问世的主要作品有歌剧《王贵翻身》、电影剧本《陆军海战队》、军教片《硬骨头六连》、文艺片《人间彩虹》、大型京剧《孙中山》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等不下数十万言。

后 记

本书由方知达口述并提供创作素材，经梁燕整理撰写，陈三百参加补充，最后由方知达审改定稿，截至 1995 年初，历时 3 年余而成。

在写作过程中，承蒙朱玉琳同志盛情指正；成书后，又蒙罗青长同志热心为本书作序，谨此诚恳致谢！

